



# 美 國 十 六 家



著 德 堡 倫 美 國  
譯 聲 冀 張

五 十 年 代 出 版 社 經 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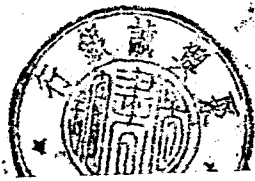
MA  
F171.21  
2  
2

美國·倫德堡著

張冀聲·葉篤莊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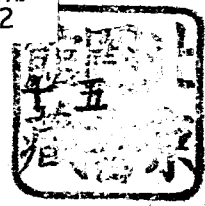
國際問題文庫第四種

美國六十年



3 0287 8536 2

年代出版發行



A389407

# 目錄

第一章	金圓王朝及其財富	一
第二章	富豪六十年	二〇
第三章	富豪 成長（一八九六——一九二二）	四七
第四章	富豪 成長（一九二二——一九二〇）	九五
第五章	金融資本與政治（一九二〇——一九三二）	一二七
第六章	黑幕重重	一五七
第七章	金融寡頭 新聞爭奪	二〇七
第八章	金圓控制下的新聞活動	二四八
第九章	非商業性的投資——慈善事業	二七八
第十章	教育——利潤和逃稅	三二七
第十一章	「新政」以後	三四九

目錄

三

## 譯者序

美國六十家 (America's Sixty Romances) 是近十年來美國出版界引起最熱烈爭論的一本書。

作者倫德堡 (Ferdinand Lundberg)，是一位新起的財政經濟學家，經常在美國各大報紙雜誌發表有關於財政金融問題的專論，曾出版有 *Imperial Hearst* 等著作，以觀察銳利，分析深刻，極爲學術界如巴奈斯教授 (Dr. Harry Elmer Barnes) 等人所推崇。美國六十家一書出版後，立刻引起全國的普遍注意和激辯，各報雜誌均紛紛撰寫書評，展開了熱烈的論戰，雖然各方面的批評，見仁見智，褒貶不一，但是大家對於這本書的價值及其重大意義，都一致予以很高的評價。

在本書中，作者以誰是今日美國的真正主宰及一般私有鉅富的使用方法爲主題，將近百餘年來美國百餘家大富家族統治全國產業金融，和對於政治，社會，文化教育整個國民生活無孔不入，無所不在的支配影響，作了一個全面的綜合研究，和深入表裏的科學剖析。作者在本書中所徵引的材料和參考之書籍達二百餘種之多，書中所列舉的每一件事實和每一個數字，不是來自國會和政府的正式文件，便是根據最有資格的權威者述，其真實性與可靠性雖對本書持反對意見者亦不能否認。所以，無論就材料的選擇和充

實，或是就分析的新穎和透闢方面來說，本書在關於現代美國的許多論著中，均係罕觀之作。它不但是一本最好的現代美國的透視，而且也可說是一本最生動最深刻的近代社會經濟史。誠如華爾特·米爾士（Walter Mills）在紐約前鋒論壇報所指出：「本書對於瞭解我們這個時代確有重大貢獻」。

作者在原著中所作引證，材料極為詳盡，甚至有些地方近乎繁瑣，如歷屆總統競選兩大政黨所收捐款名單，各鉅富家族盈利，納稅和逃稅的清單，以及各項慈善與教育等捐款的詳細敘述等等，在一般美國讀者看來或甚津津有味，但對於比較隔膜的中国讀者不免要感覺枯燥冗瑣，甚至會因許多人名地名和數字的糾纏不清，反而模糊了對於主題的瞭解。為了便利讀者，同時也是為節省篇幅，凡有關這些地方，在不損及文中主要事實和基本內容條件之下，譯時均略而節刪。同時，原著第十一章 Extravagance and Poverty（豪華與貧困），紀述各大富家族衣食住行等享受上如何窮奢極慾，都有詳細的數字和描寫，差不多等於替他們開了一箇家務賬，對於全書主題並無不可分割的直接關係，根據上述理由，亦將這一章大胆捨棄了。

此外，作者在各章的敘述中有一些很尖銳的批評和論斷這在以美國人立場評論本國，固無足奇；但在友邦出版，則似有未妥。因此，為了審慎起見，關於這些地方，譯時在詞句間不能不稍有所酌。但對於作者的原意和全書的主要精神，自請的裁量予以保存

的。雖然這些都是出於事實上，必要，但就翻譯應有的忠實上，對於原書和讀者均不能不爲之抱歉，譯者學疏才淺，舛誤之處在所難免，尙希讀者不吝教正。

一九四二、十一、二十日

## 第一章 金圓王朝及其財富

合國最有和支配着美國的是六十家鉅富，拱衛着這一階層的次一級的鉅富不過九十家。在這金融寡頭的小圈子以外，還有每年收入在十萬元以上，但他們的地位和財富却沒有那麼煥赫的三百五十餘家，不能列入在那個小圈子之內。

這些家族是支配着美國的現代產業寡頭的生活中心；他們在名義的民主形式的政府之下，經過一種巧妙的運用，從南北戰爭以後，便逐漸形成一個絕對主義的，金融寡頭地實統治勢力。這個勢力就是真正在支配着美國政治經濟社會的隱秘的幕後政府。他

們是金圓民主下的黃金主宰。

本書所述以六十家首富為主，當然有時也要牽涉到周圍的九十家。在他們貪慾的食指之下，在他們鉅大的財富所有權之下，這六十家是在掌握着人類有史以來最富的國家。直到產業革命之前，所有的歷代各國王朝與帝國千辛萬苦所積聚的財富，還趕不上目前美國一國的所有。譬如，變成赫赫的古羅馬帝國，其版圖面積還沒有密西西比河西部區域那麼廣闊；整個歐洲面積合起來也比美國所大無幾。



當然，單是土地廣大，還算不了什麼。中國也是一個大國呀。但是在許多具有決定意義的經濟條件方面，如資本積累的雄厚，技術水準的優越與設備的完善，資源的豐富與人力的衆多等等，美國都是蓋世無雙的。然而，似乎是一個很奇怪，矛盾，大不相同。美國人民仍舊處於貧困狀態中；成千盈萬的人們除了家中一些舊陋的傢俱和身上同一套衣服外，幾乎一無所有。

現在美國幾個大亨們，他們的威勢和地位已駕於歷代權臣貴族之上，而他們所掌握的確方更要大得多。十七世紀以來法國瑞亦留紅衣大主教，奧國梅特涅，普魯士俾斯麥或英國狄斯雷等大政治家的權勢和地位，絕不會大於美國一個沒有任何爵位的平民如摩根(J. P. Morgan)，梅隆(Andrew W. Mellon)，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福特(Henry Ford)和杜邦(Du Ponts)等人。決定第一次世界大戰結局的幕後人正是這幾個「平民」和他們的政治代表。叱咤一時，威震世界的拿破崙，其權威所至亦不過如此。

第一次世界大戰將美國的富翁們推上世界權力的極峯，同時也使歐洲統治階級中許多成員大權旁落，日就式微。在德國和奧匈帝國，支配社會財富的統治精英，那些大地主們，銀行家和實業家們，差不多一夜工夫變成赤貧。在英國和法國，那些舊時鉅富的輝煌也大為減弱，其豪壯之氣已大非昔比，繁重的捐稅負擔使他們舉步維艱，同時還有許多許多關係他們將來生存更嚴重的問題，逼迫在他們頭上。在德國，這個階級甘願被

積了。

在世界各國的財富階級中，祇有英美兩國還敢「敲尾保有着財富與權力的全部實質未變。祇有這兩國的資產階級仍然具有爲自己直接發言直接行動、自信和能力的全部實質。利用希特拉，墨索里尼或天皇一類、傀儡工具來蒙蔽大眾；他們也覺不到在經濟上失勢的各派別的強大政治聯合的威脅，像在法國那樣。這種幸運的局面也許是暫時的，二次世界大戰或將使這種局面發生變化。

在與廣大人民日趨貧困、對照之下，美國六十家鉅富在一九二九——三三的經濟恐慌中，他們的權勢實際上是日益加強了。雖然在這次恐慌以後，許多人因爲重新獲得工作或救濟，他們的經濟狀況稍有改善，但這種並非由於智愚和賢不肖而產生的貧富懸殊狀態依然如故。隨着經濟景氣的漸形恢復，全國的失業總數從一九三二年的二千萬人減至一九三七年的一千萬人，但另一方面驚人的鉅額利潤和利息，也自動地源源流入總共不滿六千萬的內層幾款階級手中了。

蕭蕭譯言 美國是一口充滿了矛盾的國家。她不但培育了歷史上未之前聞的最富有的階級，同時也產生了一個龐大的，很可能成爲永久性赤貧隊伍——失業軍。在落後的國度如印度、中國，日本或沙皇時代的俄國，我們看到成千累萬的貧困羣衆，自然毫不足驚異。但是在美國，豐厚、經濟和文化高度發展的北美環境裏，這種現象確是令人難

以置債。尤其是從美國建國的理想來看，這更是一個可悲的矛盾。

這種局面的造成，當然美國人民自己要負大部份責任。然而許多辯護家們却有意無意地在富有者象使之下，爲這種現狀盡其辯護之能事，認爲這樣一方面可以聚集鉅大財富，另一方面社會仍可待其實惠；同時財富在這些初期暴發戶慷慨豪爽的後裔掌握之下，正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一個偉大動力。小洛克菲勒不惜散其資財以從事服務社會事業，便是一個極明顯的實例。

儘管一般學者作家這樣的辯護，一些坦白直爽的大亨們有時也暗自承認他們的掠奪者地位。據說，老摩根很歡喜背他們的家譜，一直追溯到那個十七世紀時橫行加里森海上的著名海盜——亨利·摩根。爲着紀念這位祖先，他曾將他的一隻游艇全身漆成黑色，命名爲「海盜」號。因此，華爾街便流傳一個美談，說J. P. 摩根在海上旅行的時候，竟在船桅上高懸骷髏和大腿骨的海盜旗。

洛克菲勒的鼎鼎大名，在一般社會心目中，多虧宣傳和輿論統治的偉力，已和慈善與施捨不能分開。這種盛名的真價何在，以後我們將詳加剖析，但在這裏我們可以指出現在的約翰·洛克菲勒自呱呱墜地那一剎那起，便已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富翁。他們家族當然也是最富有的家族。

洛克菲勒在一九二四年平常年度繳納聯邦的捐稅共達六、二七九、六六九元，代表羅

他的收入共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這筆收入估計類僅佔其資本總額三萬萬元約百分之五，而這個數目也還不到華爾街所公認的他的財產的三分之一。在此以外，洛克菲勒家族還有鉅額資本投入於免稅的資產之內，主要的是購買紐約省和紐約市的公債；他們並且採取一種非商業性的投資政策——慈善事業，來有計劃地減少捐稅。在他擁有將近十萬萬美元的資本總額之下（他控制下的「慈善」經費尚不包括在內，這種慈善投資使他在教育，慈善等社會公共事業方面發揮了很大影響），洛克菲勒先生在一九二四年的個人收入估計當在三千萬與五千萬元之間。

帝俄時代沙皇尼古拉第二，他的每年收入至多不過一千二百萬元，並且還不能完全自由使用，因為根據歷代皇室傳統，他要供養他的一大羣皇親國戚，同時保持各處宮殿的富麗輝煌，也需要一大筆錢。此外，他和洛克菲勒先生一樣，也是一個萬人稱頌出名的「慈善家」。

英國維多利亞女皇的不動產，大部份是倫敦貧民區的地產，據估計價值九百萬鎊（約合美金四千五百餘萬元），現在這項產業大部份由英王承受，每年收入約有二百二十五萬鎊元。從兼領藍克夏公爵的領地中，英王每年還得到八萬五千鎊（四十二萬五千美元）的收入；此外，國會通過由國庫撥付的皇室經費，每年共有三十七萬鎊（一百八十五萬美元）。總計起來，英皇每年收入至多不過四百五十萬美元，其中所領的皇室費

預先便已註明專供皇家慈善事業之用。換言之，即等於國庫每年撥款他若干款子去施捨。如果和洛克菲勒的地價比較起來，這是毫不足奇的。他——洛克菲勒——之所以能夠以大慈善家和人類救星的面孔出現，完全是因為法律容許他為獲得私人利潤而隨意開發國家的石油富源和各種生產力量之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最富有的貴族是奧大利菲得烈大公，他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財產共值七萬五千萬美元。雖然如此，無論在歐洲或亞洲，從來沒有像美國洛克菲勒、福特、哈秦斯、萬得比、梅隆、和杜邦等家這樣的富有。

每當美國一個大富翁如老洛克菲勒逝世的時候，各部記者常將他們的財富和某印度王公相比，來說明他們那種近於神話的富有。在實際上，印度王公和美國百萬富翁比較起來，直如小巫見大巫。印度土邦王公的財產祇是死的珠寶和固定的土地，不能隨時變為他種財產；並且他們所處的社會也不能大規模利用西方增殖財富的技術。而美國的富翁們，他們的財產在一轉瞬間便可換成世界任何國家的貨幣，可以改變為土地，或債券股票。印度王公的財富是不易變動的，靜止的；而美國富翁的財產是活動的，有生機的。在世界貨幣的市場上，印度王公所有的財富總歸是無足輕重。

由於少數富翁們資本累積所促成，美國財富迅速增加，一天比一天更清楚地說明一個廣大民主國家已今非昔比。公民們站在選舉權之前，仍舊是平等的；俱在舉行的廣闊

權方面，東邊難平等。前者所能決定者少，而後者所決定大而且多。在美孚油公司，美國商業公司，杜邦公司，福特汽車公司以及其他各大企業組合之中，一種基本上封建性的，統治上獨裁的新的王朝貴族產生出來。在這種產業組合的王朝比較之下，俄國羅曼諾夫，德國霍漢采命，奧匈帝國的哈布斯堡各王室的財產，宛如林間螢火，顯得那麼微弱和渺小。

## 二

大富翁們用取得多數主權的方法，條文上的巧妙規定，分化成千累萬的許多沒有權力的股東，攬奪和持有者和銀行儲戶，使他們聽憑操縱，種種方法，來集中產業和金融的統治權於少數大亨之手。關於這一方面已有入作過精細權威的研究。但集中統治權於少數人之手，還可以經過更簡單和明顯的方法，許多人却忽略了，這也許因為方法太單純，也許這些方法與手段在歷史上曾屢見不鮮，不足為奇，以致很容易被人忽略過去。雖然我們並不輕視少數大亨們經過股份聯合的方法取得統治權的重要意義，但所謂股份公司不過是一種統治的工具，真正的主人翁却隱在背後，這也是一個顯明的事實。公司並不具產業統治權的所在地，同時從公司本身我們也不能看出幕後小集團互相勾結從中操縱的全部內容。

和在封建社會一樣，產業資本社會私有財富的統治中心，依然是家族血統和親友關係的結合。指揮銀行和金融聯合操縱公司的後台老板是家族集團。

現在的家族集團，它所握有的財富最高統治權，從資本的積聚一直到保管與防守，一代遞傳一代，絕不使利權外溢，這種情形和幾世紀以前，或羅馬帝國時代絲毫沒有兩樣。因為家族關係。（與公司這種新的組合形式不同），本身便是一個私有的實體，在法律上有嚴格的限制和保障，可以拒絕公開的監督，家族間很容易互相結合，在財政的往來上很容易取得互信和保守秘密。家族是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制度，任何政府代表人莫想窺探家庭間的秘密，必然會引起社會傳統習慣的反感。合夥組合較之公司組織帶有更多的私有性，更容易隱藏秘密，這是不錯的；但是現在這種方法與制度已經引起輿論抨擊，漸成爲公開的政府監督對象了。祇有家族關係，是避免各種公開檢舉最安全的場所；它並不是站在法律範圍之外，而是超於法律，較法律更有保障的實體。

## 三

百餘年來，美國許多鉅富的家族經過多少次彼此互相通婚的關係，他們的地位和勢力是更鞏固和增強了。兩姓鉅富通婚後，他們的聯合財產傳之於子乃孫，又再和其他鉅富的後裔結成姻緣。在這些兩個名門巨族之間也常有互遺婚姻的事，但這種婚姻結合

無論從社會的、政治的或經濟的意義來看，都比不上美國百萬富翁們的血統聯合。因爲歐洲的統治階級大部份都是破產的貴族，很少能夠使他們的美國配偶增加財富。他們的主要財產是世襲的爵位，有閒階級的生活風度，也許還有一兩塊貧瘠的領地，此外便是單身精神社會的那種特權。然而另一方面，美國的金圓却使歐洲的沒落貴族經過這種國際婚姻，得到確實的實惠，千百個沒落貴族的領地得以復興。一九〇九年據邁耳氏 (Gustavus Myers) 計算，美國鉅富和歐洲貴族這樣的通婚，共有五百餘起。現在這個總數當在七八倍以上了。

在美國富翁之間的互相通婚，無論從那方面來看，其意義要大得多。除去很少幾個例外，美國大富翁們已經在許多互相交錯的家族關係之下聯成一氣，正如在社會經濟事業上各董事會與公司理事之彼此互相參加一樣。老摩根所表示遵重的企業「公眾利益」，實際上就是這個家族的聯合利益。

鉅富家族這樣的相互通婚，如果其他因素繼續不變，兩三代以後，所有美歐財東們都成了血統親戚。現在已經有許多人，他們的身體裏面含有洛克菲勒、斯蒂曼，萬得比各家族的血液。還有許多人的身上混合着歐洲的血液和美國各大富翁的血液。

洛克菲勒家族締結許多婚姻是有重大的財政意義的。小洛克菲勒太太，原是已故羅特島鉅商和公用事業大亨，阿德里士 (Nelson W. Aldrich) 參議員之女。因此，她的哥



哥溫沙普·阿德雷氏便做了洛克菲勒統治下的柴氏國民銀行（Chase National Bank 美國最大的金融組織之一）的董事長。同時，已故參議員老阿德雷氏在世之日，最初做摩根，後來便做洛克菲勒集團的參議院代言人。

詹姆士·斯蒂曼的長女，伊薩白嫁給斐西·洛克菲勒；他的次女愛梨茜也做了威廉·洛克菲勒太太。因此，在威廉·洛克菲勒（約翰之弟）與美國紐約花旗銀行大亨之間，他們的金融結合又多一層生物學的保障。斐西·洛克菲勒與伊薩白·斯蒂曼所生的女兒又做了道奇（Dodge）太太，因此使洛克菲勒和斯蒂曼兩家與擁有五千萬財富的飛力普·道奇公司（Phelps Dodge Corporation）聯成一片。威廉·洛克菲勒之子，約翰·洛克菲勒之姪孫，J·斯蒂曼·洛克菲勒，和鋼鐵大王安得留·卡尼基的姪孫女南茜結婚，在一九三〇年生了一個兒子取名為安德留·卡尼基·洛克菲勒。

小洛克菲勒的妹妹愛蓮，嫁與萬國農具製造公司財產的繼承人哈盧德·麥可米克為妻。他們的兒子，收割機的發明人，羅羅耳最近又和詹姆士·斯蒂曼的離婚妻（同時也是摩根駱友，亨利·大衛·太太的母親）結婚。小洛克菲勒之子納爾遜，娶了賓西凡尼亞鐵路公司前董事長羅伯特的女兒。

以上不但是洛克菲勒家族和其他鉅富之家互通姻緣幾個例子。和洛克菲勒家通婚的那些富戶，同樣地又和其他鉅富締結婚姻關係。因此，我們從洛克菲勒一家追溯，將繼續

繼續維持關係，差不多可以包括全國六十家巨富的一半以上。

研究萬德比或其他超富家族的婚姻關係，可以發見同樣情況。美國富貴家族的繼承繼承，其關係甚廣，如果深入考察，非揭開他們的全部家譜作詳細研究不可。

富戶和富戶互通婚姻，一個很簡單的心理學上的解釋，是因為有錢人在締結婚約的時候，常常要懷疑到那些沒錢人求婚的動機。他們害怕那些企圖分得財產的野心家，因為確常有局外人憑藉一點姻親關係根據法律條文要求分享權利的事實。

生活上的互相接近也是有錢人容易互結配偶的原因之一，因為富強和窮光蛋是很少發生社交關係的。不管原因如何，婚姻關係使美國各大富翁的財產互相聯鎖，其作用幾不亞於組織合夥公司。所以，在許多事實上，單純的說某一個人代表某一份產業或財富，是很不妥的。

一九三六年當羅斯福總統備受富翁們操縱下的報紙抨擊的時候，他很憤慨地之稱爲「經濟的保皇黨」。事實上千百個鉅富翁的子孫確是名符其實的皇家貴族。例如威廉·余因德耳·司徒瓦之妹安妮塔，係葡萄牙前王位競爭人布拉干沙王子之妃。在舊·波克菲勒之女嫁給喬治·奎達斯大公；他們所生的子女因而得以承襲西班牙皇公親的勳位。威廉·華多爾夫·阿斯托自動脫離美國國籍（雖然仍舊保留他在美國的財產），化

了一大筆錢買得了一個英國爵士的名位。他的兒子被封爲海文男爵，又生了四男一女，呱呱墜地之後也都成了貴族。他們的曾祖河斯托一世，原來是一個窮光蛋，由販賣皮毛，做地產及機生意而成了暴富。現在的阿斯托家族已經在英國上流社會大出風頭。他們甚至爬上了皇室的邊緣，阿斯托爵士的孫女羅妃爾，於一九二九年嫁給現在的英國皇后之弟大衛·鮑威斯里馬勒爵。

具有美國血統關係的歐洲貴族，他們所享有的收入，要比他們那些沒有美國親戚和救護的關係，要豐厚得多。這是一種奇怪的諷刺：民主的美國每年要拿出一部份利潤和利息去養活那些與美國社會組織格格不入的外國貴族。更奇怪的是，這些汎大兩洋婚姻所生的子孫，長久居住國外，每年從美國各種企業中望收龐大進款，而另一方面同一年代的普通美國市民無論他們怎樣聰明，機智和有創造能力，却永遠沒有可能得到這樣鉅大的收入。美國勞動人民所創造的財富收益，不單使本國的富翁們，過着優修淫逸的生活，並且也供應着那些遙居歐洲各地的貴族們得以養尊處優。

福特，梅薩與杜邦幾個家族，他們的婚姻關係不像其他富戶那樣的顯赫，雖然安黛爾·梅薩也是娶了一個富有的英國女人。在許多橫貫大西洋的婚姻關係當中，大概最有意義的還是有錢的英國平民對美國富戶的結合，這樣在情感上使兩國有錢階級得到更進一步的聯合，正如摩根的金融組織和國際貿易在財政和經濟上使他們互相結和一樣。麥

可米克，阿斯托，費爾德等鉅富們和英國有錢的平民締結婚姻這樣的實例很多，不能在此一一詳述。

杜邦家族在他們沒有和普通門戶締結婚姻以前，盛行族內通婚；福特家族興起的歷史很短，還未來得及締結經濟色彩很明顯的婚姻。在杜邦家族中，堂兄妹或表兄妹間的匹配屢見不解，致使這個封建家族王朝的首長不得不下命令嚴禁同宗結合。一九三七年尤真·杜邦之女伊哲爾與羅斯福總統之子小羅斯福結婚，可以說是杜邦家族破題兒第一遭和一個美國資格最老的名門貴族相結合。

根據一九二四年標準，杜邦這個家族，在美國納稅收入總額比例中，列為第七位，但實際上單是幾個杜邦嫡系後裔每年應納捐稅的收入額便不止一百萬元。他們怎樣取得免稅收入，局外人無從探悉。杜邦這一家對於利用合法手段減少繳稅一節，總是花樣翻新，層出不窮的。

比如，在戶口登記冊上，杜邦家族的成年人口登記了七十三個，比洛克菲勒、萬德比、溫沙普、梅隆各家所報的數目都多。這樣，在財產額與收入的登記上，便可以化分許多單位，減少應繳捐稅。

在所有各鉅富家族中，其中有很多成員不用本族的姓氏，這是衆所週知的事實。隨便挑選不大不小的一家來說罷，美孚油公司主人普拉特一家各支系共有一百四十人。

摩根一家，單是J. P. 摩根之父（已於一九一三年逝世）一個支派便有十六個孫男女。

四

結婚有時可使一個家族的財富在普通姓氏之下掩避起來。比如，大富翁海提·格林的女兒伊利克沙·韋伯，嫁結阿斯托家的一個旁支，便採用一個不惹人注意的普通姓名，在一九二四年單在這個姓名之下，所繳所得稅即達五十萬餘元。他如洛克菲勒、康根、梅隆、萬德比、哈克奈斯各家的女子也有很多人用結婚方法，來取得不為社會注意的普通姓名。

當然，富翁家族中並不是所有的人結婚都限於有錢階級之內。不過，每當有一個富翁子女跳出本階級的範圍另擇平民配偶的時候，報紙上便把這當做騷動一時的新聞大登特登，由此可見這類事情的新奇罕見。小詹姆士·斯蒂曼和一個廚子的女兒結婚，里昂·萊因德娶了一個黑人汽車司機的女兒，諸如此類的事情，是太出乎常情之外，太惹人注意了，各報記者便想方設法獲得這種消息，來增加報紙收益。

很多人用化名方法在產業界中本已佔有重要地位，他們經過婚姻關係又隱密地和大財富聯成一氣。如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董事長陶納遜·布明，娶了杜邦家的

一個女兒。巴故公用事業大亨，安藏內·布拉特的女兒，嫁給一個塔梅地方副檢察官。康爾其斯·加拉文，結婚之後不久，加拉文便升任威爾遜總統的副檢察長顧問和外幣財產總監。後來又成爲化學事業基金的董事長和福羅里達大學的法學院院長。新舊西美孚油公司總經理，華爾特·蒂格爾，是約翰·洛克菲勒第一個老同夥莫理斯·克拉克的孫子。

在美國所有各大公司中的優越位置，其人選極大多數和大財翁們不是蔑李之親，便是有瓜葛姻緣。這種情形，很像封建社會的戚黨主義；在保險公司組織中尤爲盛行，任何有進取心的人如果沒有親族的援引，很難有被升擢和提高職權的可能。洛克菲勒家的子姪，外甥，姪孫等在洛氏各種企業組織中遞據要津，如果他們沒有這種家族姻緣，無論他們怎樣能幹，絕不會如此容易。

富翁家庭對於這種傾向，視爲當然。當亨利·福利提拔他的獨子愛迪索擔任獨特公司總經理時，他對新聞記者很坦白地承認，他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因爲他的孩子已過廿歲，應該出來歷練歷練，來負責任管一個萬萬元的產業！摩根統治下的許多企業，過去用人公開，任何人祇要適合條件即可擢用，但近來也是儘量將重要位置保留給大股東的子弟了。

美國紐約花旗銀行總經理查理士·米琪爾對於大富戶如該行歷代相傳的大股東莫爾

戴樂仁太太等所推薦的人選，幾乎是有求必應，很少拒絕。一九二九年正當生意鼎盛的時候，戴樂仁家又薦來一個外甥，米琪爾總經理得意之下，竟然表示拒絕，說該行應該錄用的戴樂仁家和斐尼斯兩家的額數已滿，不能再用。戴樂仁太太悻悻而去，第二天便將她手中的銀行股票在市場上拋出。這時恰是大恐慌到來的前夜。戴樂仁太太因而少賠虧了好幾百萬元，另一方面花旗銀行在股票市場上則大受其窘，並影響到它原訂合併銀業交易銀行的計劃不能實現。

鉅富家庭將自己的三親六戚安插到有別人投資的企業中去領取薪金，顯然有有其必要的理由。因為這樣可使這些親友們各有餘業安身，免得常來求幫告借，更可避免不肖份子在社会上為非做歹，造謠中傷，有礙家族令譽。

現在美國雖然有少數大企業主是本人所艱難締造的，但這一代的富翁極大多數，他們的擁有龐大財富是由於繼承遺產。我們祇消舉出若干女子，從未從事任何金融，實業或商業的活動，從未發明任何事物，在生產界中從未費一舉手一投足之勞，然而却坐收鉅大進款，這個事實雖三尺童子亦可知其為純係來自遺產承繼。對於這些生下來便是富翁的侍運兒，任你有多大辯護天才，也不能說出他們給了社會以任何貢獻或酬報，足以相當於他們所得到偌大財富。

在一九三六年，下列十九個女子，其中有幾個尚在荳蔻年華，每人都領有二千五百

萬元以上的財產，每年收益約在一百萬元以上。這十九位女子的姓名和她們所領有的遺產是：(一)瑪麗·加撒林·雷奧特。(菸業公司)；(二)瑪麗·杜克·畢多(菸草公司)和銀行)；(三)多麗孫·杜克·克爾威(菸草公司)；(四)約瑟夫·大衛士太太；(五)巴巴拉·瑞文特婁郡主(五分一角商店)；H·S·威克斯(股票與地產)；(六)查理士·斐森太太，朱恩·魏特尼之女(煤油公司)；(七)格特魯德·萬德伯·魏特尼(煤油及鐵路公司)；(八)斐恩·魏特尼太太(煤油)；(九)莫西·戴樂仁(花旗銀行)；(十)安德留·卡尼基太太(鋼鐵)；(十一)馬格魯特·米樂耳太太，路易絲·卡尼基之女(鋼鐵)；(十二)亞歷山大雷士太太，鄧曼林諾·奈梨金之女，後來改嫁萬登那家(菸草公司及公用事業)；(十三)霍里士·蓮奇太太(汽車公司)；(十四)麥迪遜·威爾遜太太(汽車公司)；(十五)伊沙白·道奇·司魯恩(汽車公司)；(十六)約翰·道爾斯太太(康拜爾油漆公司)。(十七、八)海倫娜·溫次屋茲。瑪堪和宮茜。溫次屋茲。頓內赫妹妹(五分一角商店)。(十九)H·S·魏克斯太太原來承繼她的父親和丈夫的遺產即達二千八百萬元，後來她的哥哥E·H·H·格林死時又指定她為主要遺產繼承人，又增加到七千五百餘萬元。

從一九四二年所得稅徵收簿中，可以看出還有許多女子，甚至於尚在襁褓中的嬰孩，雖無確定的財產所有權，但每年也坐領鉅大收入。因為各鉅富家庭常常將每年所得進



數化整為零，分做若干份，以減少所得稅負擔。筆是那些在自己名下擁有確定財產的婦女（其數目常在數百人以上），也毫無疑義地證明這種財富的累積絕不是由於所有人對於社會有任何貢獻的酬勞。這些婦女承其乃父乃夫之餘澤，坐領鉅富，祇不過給社會增加一些豪華與奢侈的點綴而已。

哈佛大學社會學家里金教授（Prof. Pritikin Sorokin）在一九二五年對於這個問題曾作一種權威的研究，證明美國的財富分配已達停滯階段，各大財富的主人大部份係隨妻與俱來，正和封建社會中的公侯伯子男爵顯的世襲一樣。據索里金教授調查，現在美國百萬富翁大部份都是富商，企業家，銀行家，金融家的後代。換句話說，這些後輩們，他們的財富並不是憑自己本領和天才奮鬥出來的。

索里金教授指出：「現在這一代的百萬富翁，其父兄從事『發財』職業的百分比，較之前一代要大得多。根據這個事實，再加上其他材料，我們可以有把握的說，現在美國有錢階級的圈子愈來愈狹窄，普通人愈難插足其內，它已逐漸成爲一個封建性的固定化的集團了」。

據索里金教授統計，前一代的美國富翁有百分之三八。三係出身貧苦，而在現在這一代的富翁階級中祇有百分之一九。六是從貧困環境中奮鬥出來的。照這位社會學權威看來，這種在家族之內職業與社會地位世代相傳的明顯傾向，說明了近代美國社會階級

的分野愈來愈成爲遺傳性的制度。『美國社會（至少是在上層社會中），正在轉變爲一種壁壘分明固定化的階級社會』。

如果說上層社會如此，下層社會亦何莫不然。對於別人已經佔有的，並且在用全力掌握得緊緊的財富，普通個人絕不要夢想祇憑個人努力便可分得一杯羹。和前期的封建主義一樣，現代資本主義也變成一種豪族的事情。

## 第一章 富豪六十家

家族關係的發展和互稱婚姻的增加，歷年收入在各家子弟間實行分配，在這種情形之下，現在美國各鉅富家庭所累積的龐大財富收益，很容易逃避一般社會的注意。有人認為各大富翁們的揮霍和對於他的子弟親屬的財產分配，至少是在上層階級之內，可以使大財富逐漸歸於分散，但事實上並非如此，我們只要從家族的觀點來分析各大財富的支配內幕，或從戶口冊上來研究一下那許多非有錢階級人口的變動情形，便可瞭然。

洛克菲勒和福特兩家每家財富均在十萬萬圓以上，此外還有幾家所積累的財產其數目亦相差有限。洛克菲勒家最初在美孚油托拉司資本額中僅佔四分之一，現在他是唯一的最大的股東了，統治美孚油公司的幾個巨頭，除洛克菲勒之外，尚有哈克奈斯，魏特尼，裴厄斯，弗萊格斯，羅哲斯倍屈佛，和布拉特幾家。此外，和該公司有重要關係的還有皮耳斯，阿琪堡，福爾格斯，奇斯布魯與克特拉幾家。

根據一九二四年的所得稅收入登記，以應繳額約佔各富戶的財產總數百分之五計算，同時再將許多富戶利用免稅和法律上種種漏洞如家族內部的舍夥經營等方式來逃避全部納稅的財產估計在內，我們對於各鉅富家族的擁有的實際財富數目，可以有一個較確的概念。根據幾方面可靠的系統材料，將捐稅收入所標明的財產與進款額三倍起來，我

窮便可得到一較接近真實的估計；不過同時還必需將非商業投資減稅百分之十五，教育慈善事業經費收入全部免稅，以及其他由於各種技術手腕來達到減稅等條件一併估計在內。

本章第四六頁所附統計表，即係依照上述辦法，並參酌官方所發表的估計，將美國六十家最大的富戶，他們在一九二四年在家族名義下所納的所得稅，應徵捐稅的收入總額，及實際財富總數估計臚列於下（凡是未用家族名義的個人有的未列入表內，有的併入他類原用的家族名義之內）。

表中所列的各家族姓名，將在本書中經常出現，他們是本書研究的主要對象，希讀者特別加以注意。除去很少幾個例外，這六十家鉅富構成了現代美國資本主義的核心。下表各家所繳納的捐稅數字，係摘自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至五日紐約泰晤士報。根據每個個人所繳捐稅先行算出各人收入總數，然後再加在他應屬的家庭總收入之內。各鉅富的財產種類甚為複雜，表內所列其進款來源，僅係根據其主要產業。凡是僅在一九二四年有進款而並非每年都有者，這一類的家族均未列在表內。非歷年皆有的進款，大部份，係屬於產業出賣的所得淨利之類。

此外還有些財富未列入表內，是因為這些財富已全部投資於各項免稅財產。如已故米琪于省參議員詹姆士·G·古森，原係福特公司基本投資人之一，當他在一九三六年

逝世時，他的財產總價值官方估計約在三千萬圓以上，但是下表並未將他包括在內，其原因係在於他的財產幾乎全部是政府債券，他歷年僅繳付很少一點所得稅。公用事業經理人，亨利·L·杜邦提和歐格登·阿穆爾，路易斯·F·斯威弗特等人在一九二四年根本未繳一文捐稅。

如果我們能夠知道各富戶投資的詳細種類及其比例，那麼便可經過其所納捐稅數目而測知其財產確數。兩個人有同等數目的進款收入，一個人將其財產百分之五十投資於免稅債券，而另外一個人僅投資百分之廿五，結果兩個人所繳納的聯邦捐稅則有多少之不同。但是，很明顯的，要想探知各家投資種類及其比例，簡直沒有可能。不過排列在表中較後的幾家著名富戶如古德斯，希爾斯，德萊克梭幾家，他們的鉅額財富是衆所週知的，他們在表中所載的納稅財產數目比較很小的原因，大概就是因為他們有很多財產已變爲掩人耳目的免稅財產了。他們也可能利用家族合夥方法，化名呈報。

關於各大鉅富的財產統計，還有一個困難，是各種投資的利潤多寡不一。其差別從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幾百。不過像後者這樣高利利潤的投資，僅屬偶然之事。如杜邦軍火工業在歐戰時的利潤即有百分之幾百；戰後大來輪船公司在請求政府實行補助的基礎之上，每年盈餘竟達百分之幾千。因此，我們必需注意，我們所要研究的各大財富是處在流動狀態中，隨時都是在變化着。

我們之所以不能得出各大財富的精確數字，只能作一個大約的估計，並不是由於研究統計方法上有何錯誤，而是主要的在於各大財富本身對於外面調查研究的多方防範及其本身的秘密性質。對於各個財富，我們根據其所應繳捐稅的進款收入類以三倍乘之，這個辦法自然難免有失實之處，但這是得出總額估計唯一合理的方法；其所得結果一般說來較為接近真實，並且寧少毋多，絕不誇大。在目前許多不相干的瑣屑問題都充滿了統計的時代，單單在財富聚集方面却缺乏詳細數字，這很明顯的係由於當局不敢開罪於各大富翁們之故。

表內除免稅財產未予列入之外，還有一些個人財富雖然頗為可觀，但和那些鉅富豪薩佛羅財富比較起來則相形見绌，所以亦未予列入。另一方面，有些個人財富不能歸入任何某一家族，如胡頓——波斯特——溫爾溼茲——麥堪——賓安胡集團係三家合組而成，其中任何一家的財產額都夠不上列入鉅富之林。

還有一些次一等的富戶，其組織與經營方式都和幾個大富家族相彷彿，但國規模不大，亦未列在表內，不過在本書敘述中時也要提到他們。

表中還有幾遺漏，是由於政府所公佈的稅收數目常常故意殘缺不完。國會雖然通過法令准許政府公佈這一類的數字，雖然不是很完全，但也不免遺漏富翁們之忌，他們設法在一九二五年稅收統計未公佈之前使國會將這條法案撤消。他們看得很清楚，如果這些

鉅大個人財富收入數字每年發表一次，當然要引來社會輿論的不滿與抨擊。各報即使願意系統發表這一類數字，事實上他們也辦不到。由此可見，搜集各家財富的統計數字，是如何困難的一件事。關於各大財富主人的許多旁支亦未列入表內，如果再將這一方面包括在內的話，那麼每家所累積的財富還要增大許多。這點希讀者加以注意。

多爾斯（康拜爾罐頭公司）和哈特佛（大西洋太平洋茶葉公司）兩家，由於國內稅務署所發表的統計凌亂無次，竟被各報所遺漏。有些不是在家族基礎之上積成的個人財富如伊斯特曼，柯達公司之喬治·伊斯特曼，安德留·卡尼基（他的財產顯然集中投資於免稅債券），查理士·史瓦普，H·C·弗力克，菲德烈·普林斯，哈威·發斯東等人，表中故意未予列入。但是這些人和他們的子孫，確是屬於最大財富階層之內，雖然他們個人權力所及是很有限的。將來他們的財富是否併入永久的家庭基礎之上，目前尚難確定。

無論如何，本章所列之表，關於美國大富豪族的財富狀況，可以給我們一個大致的輪廓。其中祇有摩根集團包括有非家庭性的集體收入。因為摩根集團進款不是單純，來自財產所有關係，以後我們將另加論列。

根據三倍徵稅財產的方法，其所得各富戶財富總額的絕不誇大性，可從以下幾個實例中證明。湯姆士·弗求恩·萊安，當他在一九二八年逝世時，官方對於他的財產估計

爲一三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在本方表中所列的數目僅爲一〇八、〇〇〇、〇〇〇元，如果憑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八年官方估計時這個期間財產價值增加估計在內，則表中所列一九二四年的數字可以說是十分精確的，紐約市政府對於個人財產估計其數目最多者，是在一九二七年逝世斐恩·魏特尼。他的財富估計爲一八六、〇〇〇、〇〇〇元，而本書表中所列魏特尼家，四個人的財富總數僅爲三二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二四年J·P·摩根所繳納的聯邦捐稅爲五七四、三七九元，其應繳遺產收入爲一、五〇〇、〇〇〇元。這筆應繳收入額按照估計其財產額百分之五計算，得數爲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再以三倍乘之，則其實際財富總額當爲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一九一三年他所承繼的財產按當時官方估計，爲七七、四六五、九七五元。其中有二千萬元現款在本族各方請求之下，分配給其他一般親屬，但這筆錢由於將老摩根遺產爭首都藝術館的所藏藝術品賣與該館，已經足夠抵償（青年摩根後來又自食其言，盡將此項古董全部收回不賣，此事曾引起輿論的憤懣）。所以，從一九一三到一九二四這十年中間，我們對於J·P·摩根的財富估計僅增加一千三百五十餘萬元，不能算多。

康拜爾罐頭公司總經理約翰·T·多蘭斯，隱蔽財富的手腕甚爲高妙。直到一九三〇年他逝世以前，沒有人知道他所擁有的財產總值達一萬二千萬元之鉅。他的財產一部份是康拜爾公司股票八千萬元，一部份是美國政府公債三千五百萬元。因爲康拜爾公司



無庸兼經營，所以股東的收得實數俱容具保守秘密；這種收金可以化整為零，這是最有不做稅納的處，或竟變為盈餘，提高股票價值，而免繳納捐稅。

就是對於那些已成公開的財富，我們也難得出其精確數字而計算，這和納稅法克勤勒，暗中將他的財產交與其子，他兒子又以同樣秘密方式分配繼承者子。甚至以保潔記的財富，實際上僅為一部份分配剩下的殘餘。鉅額財產常常在主人棄世之前由繼承者到遺產，獨家經營的企業或家庭內的合夥公司手中，這說明了為什麼遺產會登記納稅人享一如歐圖·H·康恩一類的富翁所公佈的財產數目是那樣的少。

各家財富依據一九二四年捐稅數字所作估計，和官方估計而相對於，這些數字雖然顯存異常的小，一個特殊原因係由於安德魯·W·梅隆任內財政部採取了一種不負責任態度。在這位屢繼巨萬的財政部長治下，對於富戶各種種樣法其的避稅法，其有極大的限制與自由。這後來在上議院的專門調查委員會中已予揭開，因此大更其應納的稅額而更甚於實際，對於一九二四年的應繳稅財產應以四倍倍之。

後來，為了使我們的估計切合於現在，最好應將一九二四年的財產總數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因為根據一紙保守派經濟學者的意見，美國財產總額的增長應有百分之二十五。人應當實地調查國家財富一風噴進的。

一九二四年聯邦納稅表中所列個人，其中有些人現在已死，但這對於財產總數

並無何影響，因為死者的財產是傳繼與他的子孫或親屬的。關於這一點，我們毋庸再加深究。

在各大鉅富中很少有幾個人是拜奧的富戶。唯一較爲新興的頭等鉅富，抵有亞特·福特一人。他龐大財富在一九一五年纔開始顯著。多爾斯樂的財富則始於一九一〇至一九二〇年間；此外還有一個比較最近興起的大富戶是地德羅高爾貴許兄弟，他們的財產總額只達十萬萬元。汽車製造家華爾特·P·克雷斯特的興起，使摩根、杜邦、費許和福特各家的汽車業競爭又趨劇烈，但是克雷特斯能保持獨立保有其財富不爲外人所侵入，或者能否成爲一個鉅大財富勢力，尚在未定之天。

在歐戰後勃興，值得我們注意的唯一的富戶，是弗洛德·B·歐德蘭，曾任摩根公司統治下的電業證券公司經理。他自己組織了一個托拉斯，名爲寰球公司，一九二四年其有資本兩萬元。現在這個企業托拉斯參加了所有的各種產業，雖在最初幾年代仍能蒸蒸日上。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的紐約泰晤士報發表寰球公司當時累積資產已達一萬萬元，現在估計起來，當不止雙倍此數；這個公司或許已成爲世界上最大的托拉斯，有人認爲歐德蘭是戰後繁榮和恐慌時期唯一成功的新興業巨戶，誠非虛語。

一般人常常認為通用電業公司經理歐文·P·楊格，美國電話電報公司華爾頓·D·基佛特，J·P·摩根公司經理湯姆士·拉蒙特，柴氏國民銀行經理阿倫·D·康金，美國汽車公司經理小阿弗瑞特·P·斯龍，新西面省美孚油公司經理華爾頓·D·基佛特等人，是美國大富翁的首腦。其實這種觀察是錯誤的。這些富翁多務農或商，實際上不過是代表金團王朝的幾家大銀行資本集團的經紀人而已。他們並不在這重要的權力；正如舞會上的伶人一樣，他們所說的話並不是自己的話。

但是，拉蒙特、威金、斯龍等人的重要性，我們也不可輕視。他們每個人都已擁有有相當財富，同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他們也未嘗不企圖把自已變成一億萬富翁。不過，他們每個人的權力都比他們自己所領有的財富應有的權力要大得多。因為他們每個人都集中代表着許多比他們更富有者的權力。祇是在其他未富厚比之，他們每個人所積聚的財富僅列為二三等以下。但我們對於這些人物不能單從其上來衡量，我們更應該從其的左而觀察他們，他們是資本主義的專家和學者。他們將自己的全部精力，苦心積慮，孜孜以圖，而那些托拉斯資本的主人翁們則過着豪華奢侈的生活，享盡人間幸福。

湯姆士·W·拉蒙特這樣稀有的聰明幹練的人物，他在整個戰後時代曾經是J·P·摩根形影不離的智囊，是威爾遜總統在其連任期內的密友，同時也是胡佛總統的機



富麗如微風撼巨樹，對於他們的偉大權力從來沒有威脅。甚至爾後維新和神權主義興起時代股票市場的變動可以使億萬富翁一旦歸於破產這些財團果能成爲過去了。據說地，在一九二一年前後屬於貧賤階級的人，也很少有人在這裏能夠時來運轉，脫出苦海。這種階級分野的固定化，更進一步地證明了索里金說在一九二五年所作的很多人還爲尚未成熟的結論。

三

美國各大財富的互相聯繫，結成一個牢固的自衛堡壘，這種情形使人想起封建時代的王朝一統，許多較小而擁有實力的家族，向一個具有超凡力量，勇敢與機智的當權的家主宣誓效忠，因而彼此互受其惠。

摩根家族可比作法蘭大革命前的布朋王室，它應該有的鐵腕堅決的毫不容情的將那些拒絕向它屈服，不肯服從它的指導的許多家族勢力推倒，洛克菲勒家族可以比作維多利亞時代的哈普斯堡王室；梅隆家族比做德國的霍亨索倫，杜邦比做拿破侖時代的羅曼諾夫王朝等等。封建時代歐洲名正言順的各王朝皇室，他們是從地域上壟斷農土，而這些沒有動位的美國資本主義大亨們則在產業上壟斷他們的統治領域。當然他們還壟斷着最顯並不起自覺的。不過，美國大富豪們却享有一個很顯而易見的特權，那就是他們所擁有的權

力並沒有像封建王國那樣在勳名上得到承認。這就減少普通人對於他們的異常注意。

總之，銀行合夥組織並非正式的聯盟合作，這是幾個佔有支配地位的大富戶們運籌帷幄之秘密革命的靈藥。這些秘密銀行合夥集團依其權勢大小次序如下：摩根公司，庫恩·羅比公司，布郎兄弟與哈利曼公司，雷曼兄弟公司，狄隆·雷特公司，邦布萊公司（康根系），古德曼，薩爾公司，赫加登公司和拉登曼，台爾曼公司。

有些富戶不參加合夥組織，例如，梅隆家即直接經過他們統治下的皮斯堡大商業銀行執行其權力。杜邦家族自己有一個公司，叫做克利斯丹那公司。他們經過這個自家公認在美國所參加的各種企業，比那一家都多。但是摩根公司，也有杜邦參加在內。洛克菲勒家通過美國最大商業銀行，柴氏國民銀行統治一切。福特家有福特汽車公司，他們在金融市場上的活動係通過花旗銀行。瓦爾堡和席甫兩家通過庫恩·羅比公司；雷曼通過雷曼曼合夥公司。

據我們的調查，摩根並不是現代美國鉅富階層中的最富者。他之所以擁有蓋世界無雙（也許是歷史上空前的）的偉大權力，是由於許多鉅富家族和公司無限財富在背後支持着他。摩根的聲望，他那有名的無情的運籌帷幄為富戶謀利益的政治機謀，使他在幾十年來漸漸獲得了許多富戶們的信任。摩根公司的總經理人，依照嚴格標準，使每個富人不覺其富有，但是他們在許多方面都是訓練練練的策士，他們都具有極高的道德。

能力不齊異樣的各主顧們服務；同時，他們在各種經濟組織和社會的活動中都是積極的  
 的犧牲。他們服務所得的報酬是薪水、津貼、佣金、股票、債券、集體參加太金融集團的權  
 利與權利。其中有些人如已故之梅威時，W. 威羅等，並不是為着金錢而聽人驅使。他  
 們所以從事此大事業或許是願意從事，舉重大機密方面得到滿足和報價。甚至在比較薄  
 悉內幕的以中聞也有以一種錯覺，實際上摩根公司的幾個幹練的經理人，他們自己在各公  
 司中並沒有多少股子，這在聯邦證券交換委員會的調查報告中已有證明。股票持有者是  
 那摩根公司的主顧和委託人；摩根公司不過負責監督各表股票是否得到滿意而歸還。  
 其目的在於常令他們的經理人在各公司中持有股票很少這一個事實，使得當地回管  
 摩根公司所舉論的指論。最顯著的一個例子是當社會上抨擊摩根公司曾從事美國參加第  
 一次世界大戰，因為該公司以百分之十個費的代價任同盟國在美採辦職務之故的時候，  
 摩根便以上述事實作為答覆。摩根經理人肯定的聲明，在他們所經理的幾百家公司處行  
 中，有他們股份參加的僅有十二家，並且他們的股份在這幾家公司的全部資本中尚不及  
 百分之三。

摩根公司則在朝自己並不需要很多的財產。若另有一群在金融界產業稱雄稱霸的技術專  
 這樣他們並可以逃避過多財產所有權的風險。  
 摩根公司不斷地遭受攻擊的時候，而它的委託者和股東們却很少被批評者所提及

這備為損失之時的銀行公司，它在社會和幕後發縱指使的鉅富大亨之間，起了一種巨大的隔障與緩衝作用。

摩根公司及其附屬各商業銀行，一般說來，是為萬德比、顧爾德、德萊克索、魏德納、希爾斯、萊安、杜邦、費許等這些大富家族們的權益而服務。所有這些大富戶們所擁有的財富比他們家族個人代表所經營的要多得多。十有七八，這些家族將大部分財務監督職務委託摩根公司代理，或者是請摩根公司作顧問，（他們深知摩根是為他們忠誠服務的）按照它的勸告去經理。不消說有時在摩根與洛克菲勒，或是摩根與梅隆之間，爾登和委託人對於他們的信託不免有畸輕畸重的變化，但摩根公司歷史悠久，權力龐大，除非有了重大外錯以外，它在各大富家族間根深蒂固的信用是難以搖動的。（譬如，假使第一世界大戰時德國打勝，摩根公司一定破產無疑）。除開很少幾次例外，摩根公司各委託富戶股票債券的聯合表決權，是盡可能與該公司董事會經理會議上的正式議決相一致的。

摩根公司在費拉達實亞省，倫敦，巴黎等地均設有分行。它發號施令的主要商業銀行是紐約信託保證公司，銀行信託公司，紐約第一國民銀行，和紐約信託公司。信託保證公司是美國第三個最大的銀行，其地位僅次於萊氏銀行與花旗銀行，但是以上摩根公司與花旗銀行聯合起來，無論資產總額方面，存款方面資源儲備方面都超過萊氏或花



摩根

無論摩根公司或該公司各經理人，在這四家商業銀行中都沒有多少股份。但這幾家銀行的董事會却均有摩根代表或經理人參加，並且他們業務處理的權被決定權是操之於摩根公司經理人的手中。這在華爾街已成蓋人皆知的事實。摩根公司希望減少社會對於它的權力的注視，自然矢口否認此事。除第一國民銀行的克斯而外，摩根在幾家銀行的經理人都是聘用的，他們本人沒有很大的財產累積。湯姆士·拉孟特是信託保證公司理事會主席。

摩根在美國產業界和金融界的權力範圍，是不能用統計來估量的。雖然如此，我們至少可以舉出三十五家銀行、保險公司等和六十家非金融的公司組織，是在他的操縱本下。此外，還有總值在一百六十二萬萬元以上的十六家銀行，保險公司，和二十六家各種公司是和他有密切聯繫的。

五十一家銀行與八十六家公司聯合資產共有四百二十二萬萬元，其中包括擁有三十萬萬元資產國外公司在內。摩根公司指揮下的美國銀行公司資產（約為四百三十餘萬萬元），佔美國所有一切公司的資產總額的六分之一。

和世紀的壘壘一樣，摩根公司這種核心機構，在它的四周還有許多據點在外面抗衡着，這些外圍組織在摩根公司的授意和影響之下可以進退裕如，舉凡全局的舉動公

再的權力而直接統治，而操縱指使，聯聯影響，層次井然，構成一個龐大的網孔密不透的勢力網。……我們可以舉出共有一百六十五萬萬元資產的八十家銀行和各種公司是在極度影響之下。……各種不同聯聯關係，各種不同程度的統治，操縱和影響，使聯聯公司和美達七百七十六萬萬元的許多公司資產互相聯繫。這個數目約佔美國公司財富總額四分之一以上。

和約翰·洛克菲勒多少有些直接聯繫的非銀行性質的公司至少有三十六家共有資產值二百二十萬萬元。(摘自 *Escheater* 美國統治者——*Rulers of America* 一書第五十七頁)。

和梅隆一系的有賓西拉凡尼亞與歐羅巴兩省的若干富戶，他們在梅隆領導之下的聯合力量亦頗強大。

「在梅隆集團支配之下的銀行和保險公司約有三十五家，各類公司約有四十幾家，聯合資產總額共達四十二萬五千萬元。……還有其他銀行公司直接間接代表梅隆集團的，供有資產值一百三十萬萬元。」(同書六六頁)

席甫與瓦爾堡諸家的代表銀行爲庫恩·羅比銀行公司。曼哈坦銀行，化學銀行信託公司均有庫恩·羅比參加在內。總邊曼哈坦銀行，席甫與瓦爾堡諸家和耶魯芬·巴克集聯橫聯繫，經過後者他們和葛雷——顧萊特相聯繫，這幾個銀行組織，都是獨成一系，

不受摩根或洛克菲勒的影響。

雷曼兄弟公司和庫恩·羅比公司一樣，在紐約省商業和政治方面，亦佔有重要地位。雷曼公司代表雷曼家族各支，在一九二四年該公司所有資產便達一萬二千萬元。在全國佔第十六位。該銀行信託公司（分行遍全國的一個大商業銀行）股票百分之二十以上，即操於雷曼之手。這個銀行之於雷曼，正如柴氏銀行之於洛克菲勒，「四大行」之於摩根一樣。

花旗銀行，美國第二家最大銀行，在某些方面是華爾街所有金融組織中最引人注意的。和別家銀行不同，它並不單獨和某一個秘密合夥集團相聯繫，自從洛克菲勒集團脫離該行後，它並不代表某一兩家大富戶，而是代表許多中等富戶的聯合勢力。在這些富戶中，沒有一家願意完全信託某一金融大亨，他們都很頑強地堅持自行其是，常常不肯聽華爾街社會的意願如何。這種情勢會使花旗銀行成爲在最近華爾街歷史中一個最不就範的份子。直到一九二九年，花旗集團這企圖保持其超越地位和柴氏銀行相對抗，但到底敵不過洛克菲勒在柴氏銀行中的龐大勢力。

幾十年來花旗銀行成爲斯普魯、裴恩、戴樂仁、道奇、威廉與裴利、洛克菲勒諸家統治下的一個家族堡壘。很久以來，它被認爲洛克菲勒家的產業，因爲約翰·D·洛克菲勒與裴恩的夥友如約翰·阿道伯德、利亨利、羅賓斯諸人，經常利用該行權爲和其他競爭

者商戰的工具，最明顯的一次實例是在二十世紀初葉的銅業爭霸戰中，洛克菲勒終於

過該行將格羅斯他斯·薩因茨勢力打倒。

傳事後來，洛克菲勒家漸漸將主要業務信託轉移於公平信託公司，在十九一九年

又轉移到美比銀行。不過，威廉·洛克菲勒這一支的勢力依舊留在花旗銀行。

亨利·福特向來是不信任銀行資本的，因為各銀行資本曾多次企圖攔阻他的發展。

但在歐戰以後，他也開始利用花旗銀行來擴充其商業經營。華爾街一般人均信福特在問

接操縱花旗銀行，但他的舌人却堅決否認此事。無論如何，福特公司持有許多股票，而各銀

行的多數股票，而這些銀行又都是花旗銀行的分行或通融行，這却是盡人皆知的事實。

花旗銀行的主要股票持有者是一個美籍意大利人，A. P. 齊亞尼尼，他在加里弗

尼亞省銀行界是一個領袖人物。雖然他在花旗的股份之大不亞於洛克菲勒之於美比，但

是他秘密旗幟的支持者。這因為齊亞尼尼歷後說有許多富戶或

斯潘曼和威廉·洛克菲勒集團是花旗第三大股東。

花旗銀行的持強勢力在於它在世界各處有七十五家國外分行。其他各美國銀行在國外支行至多不過五家。因此，花旗銀行取得了經營大部進出口業務的權益，因而它對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具有很大的影響。

二 最重要的一點，是大部份鋼鐵及他種非鋼鐵類的金屬工業，經常求助於花旗銀行，這主要的由於煉鋼工業是該行的主要經濟基礎。自一八九五年以來，花旗便支配着安拿康達煉鋼公司，這家公司在一九二九年的產鋼量佔全世界的總產量的百分之四十。花旗銀行在煉鋼業的支配地位，使許多鋼鐵巨子不得不全部或部份地受其範圍。

所有在金融界佔支配地位的諸家族，都是經過銀行的信託，參加某一次重要產業或經濟部門的經營。他們的銀行也就集中力量專營一種基本工業，或幾個有關的工業，雖然他們實際的魔掌並不敢鬆任何有利可圖的他種經濟活動。摩根公司及其附屬各銀行，很久以來便在鋼鐵，煤礦和鐵路各業中佔支配地位。洛克菲勒經過柴氏獲得統治着煤油工業。豐業銀行主要業務是經營各項零備百貨業，同時又操縱着聯合化學染料公司。梅隆家各銀行專斷錫業為中心業務，同時專營煤礦，鋼鐵，煤礦及煤鐵路為附屬業務。

不消說，所有這些集團是從各方面在整個產業機構中保持其統治地位。但是每一家

在一種主要產業部門中擁有差不多完全的統治權。成在最近戰爭以來在某些新興工業

如電氣業，航空，無線電，公共汽車，化學工業，汽車業等。大家常常明白，冒險侵犯另一集團所獨佔的企業，必將引起各方的聯合而產生這一真理。

在這些鉅富家族所建築的龐大集團的金融堡壘之外，還有許多重要的專業和保險公司，進一步加強了各大金融資本在工業，金融和服務各方面的主導地位。各種專業性的專業基金如捐款興辦的學校，大學，宗教機關，社會服務機關，醫院等，也可以說之為非個人的財富。這些專業基金對於大富翁們都是必要的，它不但幫助鞏固他們的金融統治，並且也提高了他們在社會上的支配地位。這些專業基金的管理和支配大權，是操在華爾街各大銀行之手，大都是屬於洛克菲勒和摩根兩家。

最後，為了明瞭大金融資本如摩根公司等的大權力情形，現在讓我們簡略地研究一下摩根統治下的美國電話電報公司。

據柏利和敏斯兩氏的調查，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資產總額，超過聯邦二十一省的財產總額，比八千個中等的公司的聯合資產大得多。

當然摩根公司是否認他們統治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他們屢次提出任何私人在該公司中握有兩股股票都沒有超過百分之一以上。然而事實上，該公司的實際統治確是操在華爾街的一個小集團手中，雖然股票名義上是由老易勝經理，並樹立他在他人賬上。

公司股票半數以正確分散在社會各層手中，然則董事會却是應得的董事會，是持有絕對的統治大權，一般小股東們自然無力過問。

所以，很明顯的，公司股票在小戶頭的股票持有者中關係得愈廣，則董事會們所應斷的實權愈加鞏固。這樣的經濟，即儘其本身沒有領有權，也是極有價值的，因為決定誰有資格取得公司產品的發貨單，誰可以得得到該公司應有的利潤權，誰是之於少數董事們的手中。拿別人錢來賺取最大的利潤，而本身却冒最小的危險，這當然不是妙算與生意。

美國電話公司雖然規模頗大，但是在整個美國中，這不過僅佔很小的一角。像該公司統治下的各大型企業包括：美國鋼鐵公司、通用汽車公司、美商道爾頓聯合公司、聯合礦產公司、全通及國電電燈公司、電業證券公司、尼羅埃羅的實業公司、電力公司、聯合企業公司、標準油公司、米爾頓、華特及哥倫比亞電話公司、美國罐頭公司、埃那佛鐵錫公司、菲爾巴礦業公司、維爾莫爾煤礦公司、埃爾德曼鐵礦公司、鐵道公司、

祇有在和廣大市民的社會經濟狀況對照之下，才能夠對其土地與大企業的統計與

可憐一比較壽命

在一八五〇年，擁有百萬之以上財產的人數僅有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在一九一七年，這一數字已增加到百分之十五。在一九二〇年，這一數字已增加到百分之二十。這說明，在過去幾十年中，美國人的財產增加了百分之五十。這說明，美國人的財產增加了百分之五十。這說明，美國人的財產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一九一九年增加百分之四百。

擁有二千萬資產每年收益在百萬元以上者，在一九一九年，僅有六千人。在一九二〇年，這一數字已增加到一萬人。這說明，美國人的財產增加了百分之五十。這說明，美國人的財產增加了百分之五十。這說明，美國人的財產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雖然在歐戰和戰後幾年內，美國經濟繁榮，但在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年，美國經濟陷入蕭條。這說明，美國人的財產增加了百分之五十。這說明，美國人的財產增加了百分之五十。這說明，美國人的財產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濟繁榮時期，其純收入總增百分之五十。收益在二萬五千元至三萬元者，其純收入僅增加百分之三十。換言之，財富愈大，它的繁殖力量和數額愈大。同時在收入菲薄的階層，亦祇有很少數人能夠改善其經濟狀況，而且其所改善者亦非常有限。財富的增進並不是長久依照上述比率增進，因為市場上的投資率則如雲霧一般，隨着年月的增進而益形擴大。

雖然在一九二九年收入在五萬元以上者，佔存款總額百分之三十，但是據稅務局統計，全美能有這樣收入的僅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〇。五。這些存款大部份集中於少數人之手，它的流動性和力聲當然要劣於儲蓄收入階層的零星存戶。同時這些小存戶存在各銀行與保險公司的款項，又是由代表大收入階級利益的各銀行經理人所自由支配。

杜安氏很明白地描寫每年收入在五千元以下者，他們的收入大部份用於衣、食、住、行和醫藥等生活必要消費上。

據杜安氏統計，在一九二九年全國國民每年收項在五千元以下者僅百分之九十九。另方面，全國流動資金總額百分之八十二係集中在那些每年收入在五千元以上，以數億佔全國百分之二的小部份人手裏。非常明顯，雖然在繁榮時期，極大多數美國人民在經濟繁榮時期，金錢過度盈餘過管從手到口的貧困生活。

一 因為進款收入，而其種類與性質則有極大差別。有很多收入，如果單從個人財產來看，根本不能算作收入，實際上僅是「本手裏的錢」去隨生活維持費而已。據一九二九年全美國家總收入約為七兆八千五百七十六萬〇〇〇元，其中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係屬薪給和工資。儘管這些薪水利工費不全是供用於生活必需，其數額確屬可觀。另一方面全國總收入百分之三五、或二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不是個人勞力酬報而是財產收益，其中包括地租、利息、股息、紅利、股票、租金、保險費、和企業經營費等。有錢階級的收入正是屬於這一類的收入（雖然持有股票或存款的普通人民也可享有這種收入，但為數甚微）。同時富翁也不忘記攬取他種進款，他可領取（理論上說也算是勞力所得來的）巨額薪金獎金，和佣金，這種收入本身的數額亦寡，也正並由他們所持有的股票表決權來決定。

下層社會幾乎將其全部收入用於維持生活必需，而每年收入在百萬元以上的上層社會份子的化費：衣、食、住、行、醫藥、衛生、教育、娛樂甚至連「慈善事業」包括在內，其所費尚不及其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甚至連那些收入更多的大富翁們，雖然過着奢侈極端的生活，他們一切化費在其總收入中所佔比例亦甚有限。據最近大賬目中看來，有錢階級各種消費，的確是奢侈和浪費的；如果再從社會需要方面來看，這種浪費當然更可以說是罪惡的；但是的如果拿富翁們每年的總收入與窮苦階級

比較，則他們這種九牛一毛的耗費不但不能算多，甚至可以說儉省的。窮苦人們節衣縮食，省下三毛五毛，常常被人以嘲笑而憐憫的口吻譏之為吝嗇者；此乃毫無足奇。最奇怪的則是現在的一般富翁們一方面被譏為鄙吝，同時又被頌為慈善家，實在是一個滑稽矛盾。

不管對於收入分配問題如何看法，其結論必一：不及百分之二十的人幾乎佔有一切，而其餘百分之八十則則手空空。財富本身已經獨佔化了。

在一九三三年死去的一百三十萬美國人口中，祇有一萬人或百分之〇·七七人口，留下五萬元以上的納稅財產。同年全國有收入的人口四千三百萬人，雖然納稅標準已減低到一千元，但有資格繳納所得稅的人數僅有三百六十餘萬人。這種情形由來已久，但於今尤烈。

關於富有階級財產日趨分化或分散這個有意編造的理論，國內稅務署參事拉伯特，且·加克遜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參議院財務委員會上曾提出有力的反證。他說：

「許多人認為大財富在三代以內便歸於分數。……這種說法，對於從前一個祖父一生辛苦積蓄傳到他的孫子手裏很容易便被化完用盡，當然毫無疑義。即對於現在一般小康之家，這種說法也可以說是正確的。但是對於在目前情況之下的大富翁們，則完全不然。大富翁的財產不單是繼續長久存在，並且不斷在生長和擴大。」

「這是因爲目前富戶的財產是那樣龐大，儘管它的一部份子孫後裔如何揮金如土，也至多不過將他們個人所領有的進款收入用罄而已。並且，這些大財富，大部份都交與銀行託經營，他們採取一切法律的和經濟的方法來防止它的分散。現在大多數大財富的經營，不但可使它永久存在，並且一代隨着一代的向前增大」。

我們可以舉出一個最近的事實來證明加克遜所說的正確性。一九三七年八月四日，約翰·洛克菲勒之弟，威廉·洛菲勒遺產監理人曾在紐約法庭上將其財產分配詳情提出報告，威廉·洛克菲勒在一九二二年逝世時遺下財產五千萬元，在遺囑上指出以其收入一部分與他的四個子女和十四個孫男女，而以其本金留與其曾孫，自一九二二到一九三七年，他們子女和孫男女只得其遺產收入九、五一四、八三四元，在這十五年期內遺產收入增殖到一三、九四七、三六一元。據推測，到了一九五〇年，他的五十個孫子所承繼的財產，除去他的子女和孫男女應得的收入以外，當在此千五百萬至一萬萬元之間。

由此着來，威廉·洛克菲勒在他死後，又產生出五十個百萬富翁。同樣地，他這些子孫們如果也是他們的財產委託銀行經營，又可以照樣留下鉅大財富給他們乃子，乃孫以及曾孫。直到洛克菲勒的法律顧問公佈他的這個遺囑之前，一般人還不知道一個人在法律上可以將其財產傳至第四代這種事實。老實說，法律對於有錢有勢的人不過是一個如何解釋和運用的問題而已。在一九五〇年以後，除非有非常變故發生，兩個偉大洛克

美國六十年

四六

菲勒王朝將繼續繁榮狀大，他們每個家族成員均將成爲百萬、千萬和萬萬的大富翁。

## 六十家鉅富一覽表

家族名稱及納稅人數	主要財富來源	1924年 納稅總數	納稅之收入 總計	納稅之財富 總計	三項後之全部 財富估計	全部財富之 最高估計
1. 洛克菲勒, 二一人 (Rockefellers)	美孚油公司	\$7,809,939	\$17,955,000	\$359,100,000	\$1,077,300,000	\$2,500,000,000
2. 摩根, 三四人 (Morgan Inner Group, 包括摩根的家族, 同夥人及各大摩根公司之董事經理等)	摩根公司	4,796,268	12,620,000	276,000,000	728,000,000	.....
3. 福特, 二人 (Fords)	福特汽車公司	4,766,863	11,000,000	220,000,000	600,000,000	1,000,000,000
4. 哈克納斯, 五人 (Harkness)	美孚油公司	2,776,735	7,550,000	150,200,000	450,000,000	800,000,000
5. 梅隆, 三人 (Mellons)	鋁業公司	2,237,876	7,500,000	150,000,000	450,000,000	1,000,000,000
6. 范德比, 二二人 (Vanderbilts)	紐約市中心 鐵道公司	2,148,892	6,005,000	120,100,000	300,300,000	800,000,000
7. 魏特尼, 四人 (Whitneys)	美孚油公司	2,148,992	5,375,000	107,500,000	322,000,000	750,000,000
8. 美孚油集團, 二八人 (Standard Oil Group, 包括阿其包德羅哲士, 畢德福, 柯特蘭, 弗格勒, 普拉特, 班尼民等家族)	美孚油公司	1,737,857	5,435,000	118,700,000	356,000,000	.....
9. 杜邦, 二〇人 (Du Ponts)	杜邦地產公司	1,294,651	3,925,000	79,500,000	238,500,000	1,000,000,000
10. 麥克米克, 八人 (McCormicks)	萬國農具公司 及芝加哥論壇報	1,332,517	3,520,000	70,400,000	211,200,000	.....
11. 巴克, 二人 (Bakers)	第一國民銀行	1,575,482	3,500,000	70,000,000	210,000,000	500,000,000
12. 費許, 五人 (Fishers)	通用汽車公司	1,424,533	3,225,000	64,500,000	193,500,000	500,000,000
13. 顧根翰姆, 六人 (Guggenheims)	美國冶煉公司	817,836	2,185,000	63,700,000	190,100,000	.....
14. 費爾德, 六人 (Fields)	馬紹爾·費爾德 公司	1,197,605	3,000,000	60,000,000	180,000,000	.....
15. 柯蒂斯-布克, 五人 (Curtis Bok)	柯蒂斯出版公司	1,303,223	2,900,000	58,000,000	174,000,000	.....
16. 杜克, 三人 (Dukes)	美國烟草公司	1,045,544	2,600,000	52,000,000	156,000,000	.....
17. 白溫德, 三人 (Berwinds)	白溫德-懷特 煤礦公司	906,495	2,410,000	40,000,000	150,000,000	.....
18. 雷曼, 一七人 (Lehmans)	雷曼兄弟公司	672,397	2,150,000	43,000,000	129,000,000	.....
19. 魏德納, 三人 (Wideners)	美國烟草公司 及公用事業	772,720	1,975,000	39,500,000	118,500,000	.....
20. 雷納德, 七人 (Reynolds)	雷納德烟草 公司	652,824	1,950,000	39,000,000	117,000,000	.....
21. 阿斯託, 三人 (Astors)	地產	783,002	1,900,000	38,000,000	104,000,000	300,000,000
22. 溫沙普, 六人 (Winthrops)	各項	651,188	1,735,000	34,700,000	104,100,000	.....
23. 斯蒂曼, 三人 (Stillmans)	花旗銀行	623,614	1,700,000	34,000,000	102,000,000	500,000,000
24. 鐵姆金, 二四人 (Timkins)	鐵姆金滾軸 公司	781,435	1,850,000	37,000,000	111,000,000	.....
25. 皮加恩, 四人 (Pitcairns)	皮特堡玻 璃廠公司	752,545	1,660,000	33,200,000	99,600,000	.....
26. 瓦爾堡, 八人 (Warburgs)	庫恩羅比公司	598,246	1,620,000	32,400,000	97,200,000	.....
27. 麥特加甫, 四人 (Metcalfs)	羅特島紡織廠	623,817	1,510,000	30,200,000	90,600,000	.....
28. 克拉克, 三人 (Clarks)	聯家縫紉機器 公司	533,087	1,475,000	30,000,000	90,600,000	.....
29. 費普, 一六人 (Phipps)	卡尼奇鋼鐵 公司	431,969	1,435,000	29,700,000	89,100,000	600,000,000
30. 庫廉恩, 四人 (Kuhns)	庫恩羅比公司	565,608	1,440,000	28,800,000	86,400,000	.....
31. 格林, 二人 (Greens)	股票及地產	443,021	1,200,000	24,000,000	72,000,000	.....
32. 裴特森, 二人 (Pattersons)	芝加哥論壇報	365,211	1,015,000	20,300,000	60,900,000	.....
33. 塔夫特, 三人 (Tafts)	地產	329,639	900,000	18,000,000	54,000,000	.....
34. 狄林, 三人 (Deenings)	萬國農具公司	315,701	825,000	16,500,000	49,500,000	.....
35. 狄爾萊斯特, 六人 (De Forests)	公司法律顧問	292,013	635,000	13,200,000	41,100,000	.....
36. 顧爾特, 五人 (Goulds)	鐵道公司	354,563	565,000	10,300,000	33,900,000	400,000,000
37. 席爾斯, 三人 (Hills)	鐵道公司	226,327	360,000	7,200,000	21,600,000	150,000,000
38. 德萊克塞, 二人 (Drexels)	根摩公司	131,616	300,000	7,000,000	21,000,000	100,000,000

由 個 人 出 名 納 稅 者

39. 湯姆士·萊安 *△ (Thomas F. Ryan)	股票市場	791,851	1,800,000	36,000,000	103,000,000	.....
40. 傅斯特 (H. Foster)	汽車機件公司	569,894	1,700,000	34,000,000	106,000,000	.....
41. 奈德利·約翰森 (Beridge R. Johnson)	勝利照像公司	542,627	1,250,000	25,000,000	75,000,000	.....
42. 阿塞·詹姆士 (Arthur C. games)	鋼鐵及鐵道 公司	521,388	1,200,000	24,000,000	72,000,000	.....
43. 那許 (C. W. Nash)	汽車公司	459,776	1,100,000	22,000,000	66,000,000	.....
44. 蒙提莫·施甫 (Montimer Schiff)	庫恩羅比公司	459,410	1,100,000	22,000,000	66,000,000	.....
45. 詹姆士·帕登 (James A. Patten)	米婁商場	425,348	1,000,000	20,000,000	60,000,000	.....
46. 查爾士·海登 * (Charles Hayden)	股票市場	427,979	1,000,000	20,000,000	60,000,000	.....
47. 阿蘭多·魏伯 (Orlands F. Weber)	聯合化學顏料 公司	406,582	900,000	18,000,000	54,000,000	.....
48. 喬治·布魯門曹 (George Blumenthal)	拉薩德公司	415,621	900,000	18,000,000	54,000,000	.....
49. 歐格登·米爾斯 (Ogden L. Mills)	礦業	372,827	900,000	16,000,000	48,000,000	.....
50. 米琪爾·福雷德三 (Michrel Friedsam)	商業經營	292,396	700,000	14,000,000	42,000,000	.....
51. 艾德華·麥克林 (Edward B. McLean)	礦業	331,125	700,000	14,000,000	42,000,000	.....
52. 猶金·希金斯 (Eugene Higgins)	紐約地產	379,263	700,000	14,000,000	42,000,000	.....
53. 亞力山大·柯赫蘭△ (Alexandes S. Cocharn)	紡織業	271,542	700,000	14,000,000	42,000,000	.....
54. 克可但德夫人 (Mrs. L. N. Kirkword)		268,556	625,000	12,500,000	37,500,000	.....
55. 海倫·蒂孫 (Elen Fyson)		258,086	600,000	12,000,000	36,000,000	.....
56. 阿奇爾·洪丁頓 * (Archen D. Huntington)	鐵礦公司	226,353	575,000	11,500,000	34,500,000	.....
57. 詹姆士斯托羅 (James J. Stonow)	李金孫公司	222,571	575,000	11,500,000	34,500,000	.....
58. 木力斯·羅森瓦特 * (Juluis Rosenwold)	席爾士·羅比 克公司	208,812	500,000	10,000,000	30,000,000	.....
59. 班納特·巴魯 (Bernard M. Baruta)	股票市場	268,142	625,000	12,500,000	37,500,000	.....
60. 克里西奇 (S.S. Kresge)	商品貿易	188,698	500,000	10,000,000	30,000,000	.....

註：\*已故 △財富傳與其家族

### 第三章 富豪的成長

(一八九六——一九二二)

在這一片新大陸的處女地上，最初財富的創造完全是政治的產物。英國和荷蘭的皇家將大塊的土地和各項賺錢的經商特權分賜給他們的功臣親貴和有勢力的各公司。現在美國整個東部的城市，各縣與各邦，當初完全是私人的莊園領地。初期的皇家實稅，後來的關稅；金融建設公司對於各銀行與各鐵道經營的津貼；公用事業的經營特許；大塊公家土地讓與各鐵路，礦業和地產公司；各項證券債券的免稅等等——這些都成了新大陸新興地主貴族所獨享的財產特權。

一七八九年獨立戰爭，當時那些領導戰爭和擁護戰爭最熱烈的上層份子，一般說來，他們的經濟利益已經不限於土地。他們擁有小工廠，證券，債券和商品，他們最迫切希望的是使這些新興的產業領有權得到保障，脫離英國的束縛，使美國成爲一個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當時在詹姆士·麥德孫和亞力山大·漢姆列登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立憲政府，便自覺地以保障這種新型的財產所有權爲其主要任務。

最初在秘密會議上所草擬的憲法，主要內容着重於商務的管理；後來鑒於一般人民的抗議，纔補充了第一次的十條訂正案。這個憲法賦予政府以明顯的裁制與均衡之權，



而同時也保障了有產者極大的發展自由。

直到一八五一年南北戰爭的幾十年之內，美國所有的政治紛爭大部份均係來自有產階級方面，他們不僅在議會上不斷互相爭論地產利益與商業利益二者究竟誰應該得到優先保障的問題，並且在傑克遜總統任內挑起一般農民由經濟上的失勢轉為對機械的憎恨。當地主階級幾次政爭都接連被北部工業資本家和大商人戰勝以後，南部的農業黨派首先拔刀起來反抗。所以，一八五一年南北戰爭，係以反革命始，而以革命終。

北部勢力在此次鬥爭中的獲得勝利，使地主階層永遠被排除於政治大權之外，使主張關稅政策的工業資本家取得了壓倒的權勢。

工業資本進入正規化階段，並且逐漸蜕化為財政資本統治，是開始於一八九六年。馬克·阿摩索·韓納 (Marcus Alonzo Hanna)。約翰·洛克非勒的政治代表，是這個新時代的政治開創者。這個時期的主要特點是大規模地開闢國外市場，產業界空前的聯成一氣，大資本生產的積極推進，各項新技術的普遍應用，以及全國生產資源及其政治機構顯著的集中於銀行資本控制之下。不過，雖然新興的金融資本隨着韓納政治勢力之伸入全國而開始走上統治地位，但其獲得統一的壓倒的權威，還是在一九二〇年華倫·哈丁當選總統以後。

在韓納現身於華盛頓之前，三十幾年來美國產業界對於政府當局的影响祇是零星散

浸，各自爲政；在韓納領導之下，產業資本這種政治影響便成爲自覺的，正規化的，有系統有計劃的勢力，一切動作都是以大工業資本集團的利益爲前提，經過精密的計劃和佈署。在韓納之前，新興的工業資本家們對於美國兩大政黨祇是站在外面亂叫亂喊一陣；在韓納推動之下，各工業家和銀行家們紛紛加入政黨，將他們自己組織成爲兩大政黨的骨幹。在韓納以前，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干與政治，還是秘密的，自知理虧的，即使在前途確鑿之前，他們還要矢口否認；在韓納以後，公開干與政治，第一次坦白承認，並且狡猾地或誠摯地多方辯護，認爲這是爲着民族國家的利益。

在韓納以後，行賄疏通已經不再是干政的主要手段了；第一、因爲從麥金萊到胡佛各重要高級職位人選都是富有階級所一手包辦；第二、財富集團從內戰以來所千方百計且夕所求的各項富源與特權終於擱到手裏了。

所謂富源主要是社會公有財產，即一般公民所共有的廣大土地。在一八六〇年，美國土地半數以上係由政府經營，租與人民使用；但到了一九〇〇年，這種社會公有的財產十分之九以上都被各鐵道公司，礦業新迪加，地產投機商等紛紛搶購以去。說起來，這確是驚人的事實；今日美國大部自然富源的所有權是握在美國鋼鐵公司，鋁業公司，美孚煤油公司，各鐵道公司手中。

開放國家資源任憑私人開發，與年俱增的保證關稅制度，以及其他便利財富追求者

的各種法令與設施，這些對於國家社會，當然也有它的有利之處。政府的放任政策，使大小企業家和野心家在爭求發財致富的刺激之下，總是加速了國家的建設與繁榮。但是這種利益的代價和社會的犧牲是太大了。那些慾望無窮的產業資本家們，拿他們所促成的物質上的建設與改進，却要和國家永久的靈魂相交換。

在一八八〇年以前，美孚煤油公司便和兩大政黨有所默契。約翰·洛克菲勒經常捐助鉅額經費給共和黨；他的合夥人阿立文，且。更慷慨地大量捐助民主黨，並且隨時與該黨領袖洽商各項問題。一八八〇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詹姆士·加費德很焦慮地問他的同僚說：「洛克菲勒先生是否願支持我呢？」在加費德的競選運動中，洛克菲勒捐了大批款項，同時美孚油公司的政治家韓德爾回了張一千元的文章給俄亥俄省共和黨支部。在省及中央各級政黨與議會，隨時隨地盡量行賄，以便產生效果，這已成該公同的確定的政策。

前紐約市長之子，糖業大王亨利·海弗美爾，有一次在全美工業委員會席上曾說：他是向來樂於捐助兩大政黨的。他坦率的承認，「這些捐款使我們得到許多的便利保護」。海弗美爾係美國煉糖公司董事長，一九〇九年他曾因長時期偷漏關稅被罰款二百萬元，而名聞全國。

機智多謀的韓納，在洛克菲勒鉅大財富支持之下，使美國大財富操縱政治的技術日

粹精進，這從一八六〇年以後，歷屆選舉活動的龐大經費開支一點可以看出。在韓納以後，某一政治人物的走上政治舞台，可以說完全是靠着金錢堆砌起來的；各大財富所化的這項費用不但一次比一次增多，而且開始像普通營業收支一樣，詳細的一筆筆的記在賬本上。

民主黨格羅瓦·克里伍蘭 (Grove Cleveland) 兩次任內 (一八八四——一八八八；一八九二——一八九六年)，無論在私人方面或一般政策方面，都比以前各屆總統和工業資本有更密切的連鎖關係；他背後來繼任的共和黨政權開闢了先路。很可注意的，在克里伍蘭兩次大選獲勝的每年度，民主黨的競選經費都超過共和黨。

克里伍蘭任內的海軍部長為紐約威廉·G·魏特尼。魏特尼曾任紐約市公司參議，和洛克菲勒關係甚深，他之參加克里伍蘭內閣完全是由於洛克菲勒的一手推薦。首都市街鐵道公司的股份，大部併入在他和萊安二人手中。要人們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而成爲大富翁者，魏特尼是一個顯著實例。

克里伍蘭在其第二屆總統任內，J·P·摩根與奧格斯特·巴力蒙 (August Belmont) 是他的主要財政顧問，經常和他們在白宮內會商。這兩位大銀行家會德恩克氏發行政府公債兌換黃金，結果這些證券很快便被華爾街各大銀行購買一空，因之需要再增加發行。銀行得到這批公債，立刻便以高價在市場上拋售。這次公債發行的一切商洽，

都是由曾任克里伍蘭法律顧問，現任摩根公司律師的P·L·司台特森經手辦理。

克里伍蘭爲華爾街効勞，最顯著的一件事是一八九四年，違反憲法規定，派遣聯邦軍隊赴伊里諾省，事先並未接到該省省長之請求，名義上說是爲保護郵政，實際是爲鐵礦普爾曼的罷工。結果造成美國史上第一次流血慘劇，引起軒然大波。

克里伍蘭卸任後，在摩根建議之下，被聘爲哈立曼，萊安公平人壽保險公司董事。一九〇〇年，克氏又和裴恩，魏特尼及俄亥俄省參議員加烈文，普來士共同經營某證券交易所，後來又參加某鐵道公司的創辦。

## 二

和塔夫特與哈丁一樣，麥金萊(McKinley)也是來自美孚油王國中心的俄亥俄省。自一八一六年韓納對他大加賞識以後，洛克菲勒便一直支持着他。在他任職參議員期內，提高關稅法案便係由他一手主腦，並在該項法案上冠以麥金萊之名；一八九一年韓納積極幫助他成爲俄亥俄省長。

韓納與洛克菲勒的密切結合，始自一八九一年，以後便繼續未衰。他們原係中央高級學校的老同學。多少年來韓納的煤鐵生意便與賓西拉凡尼亞省鐵路公司結不解緣；這樞鐵路公司在運費上給洛克菲勒很大的折扣，後來差不多整個的成了洛克菲勒的獨家產

案。韓納原有其處油礦，經洛克菲勒的要求，亦與美孚油公司合併。韓納的許多親友，都是美孚油的股東。一八九〇年八月二十一日，韓納在洛克菲勒的請求之下，曾寫信給俄亥俄省的高等法院院長大衛，K·華特孫，命令他設法將某項控訴美孚油公司的案件撤消。華特孫拒絕接受十萬元的賄金，繼續進行該項控訴，結果被趕下台。繼任院長弗郎基士，孟奈特接到四十萬支票，又拒絕了，也被撤職。這個案件在一九〇〇年終於撤消，因為韓納派了一個自己的人專為處理此事。大富戶們憑其龐大經濟與政治勢力，設法推倒那些不願被收買的政府官吏，這已成司空見慣之事。

麥金萊和美孚油公司關係之密切，不亞於韓納。一八九三年，當他任俄亥俄省長時，他的個人財政陷於破產狀態，經馬克、韓納、麥榮、海立克、撒木爾、馬塞、查力士、塔夫特、亨利、弗力克、安得留、加尼、等人秘密援助，始得免破產。韓納經常借款給各省在任省長。麥金萊在他走入白宮之後，為給韓納在參議院留有空缺，特調八十歲老翁俄亥俄參議員約翰·施爾曼為國務卿。施爾曼因年事過高，力不勝任，就職不久便行辭職。

但是施爾曼在其長期政治生涯中，確對洛克菲勒和其他華爾街大亨們効勞不少。一八七五年現金收發法案的實施，完全是參議員施爾曼一力促成。紐約共和黨機關報發行人亨利·司托達德在他的回憶錄中曾寫道：「施爾曼和花旗銀行關係異常密切，所以在

這次構兌風潮中，大家都認為花旗是施爾曼的後台經理」。

當一八九七年韓納曼受洛克菲勒控制下的俄亥俄省議會之推戴，走入參議院之後，差不多每屆大選都遭受指摘或控訴，認為其中黑幕重重，但是參議院在韓納曼入監強控制之下，拒絕實行調查。

這是一宗賄賂活動來營謀政府高級職位，並非新奇之事，在俄亥俄省，尤屬司空見慣。參議員裴恩之子阿烈文，係俄亥俄省議員，像在賭桌上下賭注一樣，他堂堂正正地撥款六萬五千元，為他父親活動進參議院的選票，以便提高美孚油公司的政治地位。

雖然麥金萊與大富鉅富們關係如此密切，華爾街還是另外又在「一八九六年推出一個利維·莫騰 (Levi P. Morton) 為總統候選人。莫氏在「一八八九——一八九三年間曾任副總統，紐約省長，莫騰信託公司董事長等職；華爾街許多幕後活動都有他參加。雖然摩根集團在支持着莫騰，但麥金萊終於在韓納曼天才的幫助之下取得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資格。但是麥金萊之獲得金融界的一致擁護，還是在「一八九六年八月十五韓納曼與詹姆士·J·希爾會晤以後。希爾提議介紹韓納曼華爾街，結果在五天之內，這兩個產業與金融界代表人募集了充足資金，進行大選活動，收買選票，動員輿論。

韓納曼和摩根代表的合作，並非偶然之事，因為在不久以前洛克菲勒已經是一個銀行費本家了。由詩萊資本家起家，逐漸成為工業費本家，約翰·洛克菲勒早在「一八九〇年

前後便開轉換方向，大量購買當時全國最大的銀行——花旗銀行的股票。在以後二十餘年間，花旗銀行董事長詹姆士·斯蒂曼的名字，就等於洛克菲勒的化名。

一八九六年共和黨競選經費的確實數目始終是一個秘密。據世界晚報所載，約有一千六百萬元之譜。而據韓納德的作者，赫伯特·克魯雷估計則為三百五十萬元，但這個估計祇限於中央委員會的捐款數目；事實上一般大亨們都是直接捐款給各省和各縣競選委員會，再轉交各議員候選人。總之，歷屆選舉都有大宗捐款暗中活動，這已成無可爭辯的事實。

在麥金萊當政之後，取締托拉斯法案自然成了一紙空文，因為這條法案對於美孚油公司的威脅比那一個公司都大，麥金萊的貨幣政策也正合大亨們之意，正式定名為金本位法。丁芝雷關稅法案對美國關稅提高了百分之四九——五〇，更是依照大產業資本的意願。麥金萊任內重要立法，都是經過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納爾遜·W·阿德雷氏之手。

阿德雷氏是共和黨在參議院的靈魂，七屆大總統都直接間接受他的控制。他是小洛克菲勒的岳父，他的政治生活堪稱聲名狼藉。一九〇五年二月麥克魯爾新誌曾宣佈幾個難行鳥的政治機構是在他和查理·布雷爾操縱之下，腐敗不堪；參議院多數議員都受他的收買；他們憑藉在立法機關中的支配地位，取得了永久經營公用事業的特權。阿德雷



氏當他在一八八一年脫離雜貨批發營業走進參議院的時候，他僅有財產五萬餘元，但在他經過了三十多年的政治生涯逝世以後，所留遺產竟達一千二百多萬元。

新聞界一致鼓吹的對西班牙之戰，使麥金萊任內最初幾年的美國社會增加了不少的糾紛和困難，但是麥氏本人並不積極主張這次戰爭。在一八九六年，麥氏曾與紐約論壇報社長魏特斐，李頓通信交換意見，兩人都贊成美國應該佔有古巴，但兩人又都一致主張應該儘可能延緩和西班牙發生武裝衝突。海軍部副部長提阿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亦參議員和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兩人的走上政治舞台都是靠着摩根的支持），他們二人是華爾街主戰派的主將，堅決擁護戰爭，並在各方面努力促成之。老羅斯福（即提阿多·羅斯福）在他任職海軍部第一天起，便積極整理海軍，準備參加此次戰爭。他並且獨斷獨行，秘密命令杜維攻擊馬尼拉，雖然當時菲律賓並不是所謂紛爭的所在也。

關於此次戰爭的真實動因，直到現在還沒有任何文獻發表。但下面這些事實是不容置疑的：洛克菲勒在議會中的代言人要求戰爭；赫斯特和普列塞的報紙鼓吹這次戰爭；狄阿多，羅斯福和洛奇極力促成；麥金萊與赫納表示同意；而直接受惠的曼洛克菲勒和斯帝曼的花旗銀行，因為戰後不久古巴與菲律賓，乃至拉丁美洲各處都佈滿了花旗分行，同時古巴的製糖工業整個歸於花旗銀行的手中。最黑暗的一幕是由麥金萊自己演出，

因為他把西班牙在宣戰前夕已經完全屈服，同意接受美國的一切條件這個消息扣住，未  
在議會上宣佈。

美西戰爭很快結束以後，韓納所全力主持的托拉斯組織以空前速度大規模向前發展。  
。單在一八九九年一年之內，便有九十二家托拉斯出現，其中包括新哲西省的美孚油公  
司在內。這種現象是前所未有的。

這種新的托拉斯聯合組織，和從前的那種「信託」公司意義不同。這種托拉斯實際  
就等於持券公司 (Holding Company)，在特定的國家法律允許之下，幾於無事不可在  
他經營範圍之內。美孚油公司以及其他許多公司，包括美國煉糖公司在內，都是托拉斯  
的組織。洛克菲勒的企業（美孚油公司）的真名就是叫做美孚油托拉斯；經過這種方式，  
洛克菲勒和他的夥友在托拉斯形式之下，統治了四十幾家附屬公司，一切業務大權完全  
操在持券公司大亨們的手里，而一般實際股票持有人反而無權過問。

在這種新托拉斯時代，美國銀行集團經常是在摩根領導之下，他的主要任務是誘導  
互相競爭的各產業巨頭在一個聯合企業組織之內，將他們所握有的現金、股票或債券實  
行互相交換。然後再將這些聯合公司（托拉斯）的證券在報章雜誌上大吹大擂，向一般易  
欺的民眾推銷。收入所得歸於各子公司的原來股東，銀行拿到的是鉅額回扣各項手續費。  
。據美國財政部公司司報告，摩根托拉斯在一九〇一年經理美國鋼鐵公司的證券，收取

折扣及手續費共達六二、〇〇〇、〇〇〇元，但該公司（美國鋼鐵公司）的盈餘財產實僅有六八二、〇〇〇、〇〇〇元；然而證券票面值却達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多。對於全國電氣公司，國際農具公司，美國電報電話公司，庫根也拿到同樣的手續費和回扣。

這些新發行的證券，大部份至少有一半是「虛」的，並無實值，所以許多公司如美國鋼鐵公司等，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根據這溢額投資總數計算，簡直沒有盈利。在最後三十年間，這許多機巧和花樣，都隨着公司的破產相繼暴露。就是那些仍能繼續維持的托拉斯，他們所發行證券在市場上的價值，也常常跌到零度。經過一連風潮以後，一般小戶投資者，經過報紙花言巧語的宣傳解釋，宛如驚弓之鳥，紛紛忍痛將證券及股票價拋出。而那些幕後操縱人和各子公司老闆們則將貶價這超過實值的證券，囤積起來，厚利。

商業經營與軍事行動的密切配合，美西戰爭主戰派在一八九九——一九〇九年間獲得的利益，比從前歷次戰爭的直接機要大得多。

據麥金萊第一任期滿，一九〇〇年調查，一八五家新托拉斯聯合組織，擁有資金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全美產業資源約有三分之一以上係在他們手中。這方面，這些公司的證券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其市場價格較之一八九九年和一九〇〇年跌

華北百分之四七。美國銀行公司證券每張由四〇元跌至八元之角餘，結果成千上層的水戶受害，虧損不堪。

一九〇〇年大選，麥金萊又獲勝利，其原因在於對西班牙戰爭的勝利和熱帶殖民地之擴展，掩蓋了他第一任內的許多缺點，同時許多見獵心喜的野心家也著意有賴於其狗彘身鉅富之林。這次麥金萊的爛帳，仍是由於韓納和金融界各集團聯合勢力支持。

從麥金萊各部人選上來看，便可反映出這次再度推戴他的產業金融界各派的聯合陣幕。約翰·施曼(John Sherman) 激進激尾身洛克非勒和韓納的代言人。繼任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 係共和黨台柱林肯時代的老閣僚。內務部長康納力脫·布利脫(Christopher N. Bliss) 是摩根——萊安競選基金的監察人，公平人壽保險公司的董事長。陸軍部長為奈里胡·陸特(Elwin Root)；原任萊安後又改任摩根的法律顧問。海軍部長費爾德·諾克斯(Philander Knox) 歷任梅隆所屬各銀行的董事長，多年担任弗克萊鋼鐵公司的財政事務，加尼基鋼鐵公司之改組為持券公司。他是一個重要經手人。費力克曾親自要求麥金萊任用諾克斯加入內閣。

洛克非勒最得力的法律顧問約瑟夫·周奈特(Joseph H. Choate)，多年來為萊

油公司効勞，這次被麥金萊派他為駐英大使。隨着國際金融資本勢力的興起，自一九〇〇年以後美國駐外大使幾乎所有各重要地點，如倫敦、巴黎、東京、柏林、羅馬等大地，實際上都是摩根、洛克菲勒、梅隆、和其他各大銀行集團所信任的代表。

麥金萊再度當選後，一九〇一年九月突被無政府黨人刺中，傷勢甚重，不治而死。這個事件使摩根、洛克菲勒等巨頭們大為震動，產業及金融界頗受影響。他們立刻將各項投機證券紛紛拋出。

麥金萊死後，依照憲法，副總統提姆多羅斯福升任大總統。這又是一件使金融產業界大亨們頭痛的事。因為羅斯福一向積極鼓吹改革。不過在基本上，他還是保守主義的。所以，這種口頭上激進主義，對於防止社會上的不滿情緒，其作用實際上倒是有利於大財富們的。麥金萊對於大富巨賈們的要求向來是有求必應，從來表現任何敵對的姿態，而老羅斯福一直到今天在彼一般人回憶中還認為他是一個偉大的解放者和改革家。

老羅斯福之走上政治舞台，完全是藉助於摩根集團的援助，但這是在摩根漸漸對於他這種激進姿態表示不滿之前。他之被選為副總統，正是他們計劃把他打入冷宮的事實。當他在紐約省長任內，他加種種不入耳的改革主張，雖然祇是限於微小的無傷大雅方面，也頗使一般大亨們很不開心的。於是，羅斯福即其中之一人。

美西戰爭以後，老羅斯福報紙譽為時代英雄。產業金融界巨頭們仗利權通衢，爭榮譽做政治資本，一八九八年紐約中央鐵道公司董事長趙塞·狄蒙，通知該省大商紳士·普拉特，(Thomas C. Platt) 請推戴羅氏為紐約省長。紐約中央鐵道公司的發言，其權威不遜於法律；於是羅氏便在該省選舉中，得到美國東部金融界如互助，公平，紐約等保險公司的捐助(廉根也捐了一萬元)，果然當選為紐約省長。

在紐約省長任內，老羅斯福曾於一九〇〇年三月十五日被紐約世界報公開指摘他在某項違法案件上有贖職和護當事人湯姆士·萊安和麥金萊閣員奈里胡·陸特之嫌。事實經過是這樣：在陸特兼任國民信託公司顧問期內，該公司非法對外貸款共達五百萬元，其中四十三萬五千元貸與L. P. 斐恩；斐恩係政府銀行與保險事業總監，同時也是華爾街了賭與收買選票的經手人。另有二百萬元貸與該公司(國民信託公司)董事長湯姆士·萊恩的候歐·席但尼爾。但是老羅斯福對於參加此項舞弊的陸特，斐恩及萊安等人竟未加追究。後來羅氏並且赦免陸特參加他的內閣。

雖然如此，老羅斯福仍舊使廉根感覺不快，因為他所提議的徵收特許企業稅，至少在理論上是防害到在他們所把持下的公用事業。同時，紐約省政治領袖普拉特，也把他弄做勁敵，提議選他為副總統，把他調開。在一九〇〇年共和黨會議上，老羅斯福自知在政治上已經擱淺，同意普拉特等建議，被推為副總統候選人。賓西拉凡及亞省著名的

奎奈(Quay)，也極力贊成這個建議，因為他擔心政治大權落於洛克菲勒與赫納蒙爾之手，所以他和梅隆——弗力克派巨頭便希望推出一個難以霸壓的個性插在最高行政機構當中，來牽制他們。奎奈這一派並且從各方面設法引導此人向這方向走。弗力克親自拒絕向老羅斯福私人顧問，後來又參加伊茲美運河(Isthmian Canal)委員會。麥金萊與赫納一致反對讓這位口頭激進派參加一九〇〇年的副總統競選，但未生效。因此，他們祇能在後來的事務行動表現上給羅氏一點顏色，讓他明白美孚油公司的鉅大勢力並不可侮的。

在老羅斯福宣誓就職以後，摩根集團對他的親戚已與前不同，因為這位新任副總統在一九〇〇年十二月曾以私人名義宴請摩根。經過這次宴會，將摩根先生對於他在紐約省長任內主張徵收特許企業稅的誤會煙消冰釋。使摩根可以放心積極進行美國鋼鐵聯合公司的組織。

老羅斯福升任總統以後，很快地便和參議員阿德里雷氏，和海爾(Hale)等和他們在上院中的共和黨實業派同夥成立了諒解，羅氏表示仍舊繼續麥金萊政策不變，同時這些實業界的代表們也答應和他協力合作。

老羅斯福在議會所發表的首次演講內容，預先會遍徵國內一般大亨們的意见。海爾、赫納、歐特、諾克斯、阿德里雷氏等人都有詳細讀過他的講稿。為求面面俱到，海爾

這些在實業界巨頭代表們所提出的應酬應答的建議，他都不予接受。結果這次總統就職後第一次宣言，詞意含混，內容空洞，以致全國各地界對於他的真意何在，就種種議論紛紛，竟有數星期之久。講詞中的積極主張方面大家都與華爾街所希望者不謀而合，祇有設立商業部與勞工部一點對於洛克菲勒不大投機，傅老羅斯福自一九〇〇年以後本來就與洛克菲勒不大投機。講詞中曾提及「托拉斯」問題，但也就此提到而已。此外還生龍活虎巴拿馬運河，和減低糖稅，後者正是美國蔗糖公司所旦夕以求的。

在其全部總統任內，老羅斯福好像一個恭謹的學生，所有一切重要文告和空言，每次都先送請幾個金融界巨頭們審閱，徵求他們的意見。他的第三次年度施政報告，便是先將底稿送交花旗銀行董事長斯蒂曼核閱，並且答允關於通貨問題部份加以修改。他甚至曾於一九〇三年十月八日邀請摩根到白宮來和他「商談某項財政問題」。

大富翁們對於這位新總統的安全感，到了二九〇二年二月老羅斯福突然命令司法部長詹寧斯對於北美證券公司提出逮捕托拉斯法的控訴的時候，這種安全感之感顯又歸於消逝。諾克斯遵照老羅斯福的指令，認為這個勢力宏大的鐵路公司聯合組織觸犯違法。諾氏原係梅隆——弗力克派的人，他對於有關摩根公司的意見顯然是另有作用的。實際上他對於聯合公司在原則上並不反對。

北美證券公司同是幾月之前由摩根公司發起組織的，計劃將北太平洋公司，大東方公



司，和芝加哥，伯林登及坤塞各鐵道公司聯成一體。在這個聯合公司開幕那一天，在摩根辦公室中曾舉行一個業務會議，參加者都是各該方面的有力人物如喬治、巴克、哈立曼、詹姆士、希爾、詹姆士、斯蒂曼、威廉、洛克菲勒、和新海文鐵道公司的摩根代表 C. S. 麥蘭。

老羅斯福這次突然態度轉變，使摩根大為吃驚。他立刻要求會見總統，當他問到同樣性質的聯合鋼鐵公司是否也在被控訴之列，羅斯福回答道：「在我們沒有發見他有違法行為以前……」。事實證明：以後老羅斯福從未發見聯合鋼鐵公司有任何違法行為。

泰里胡、陸、爲了此事走出閣，替摩根——希爾担任北亞證券公司的辯護人，被動結果，使最高法院於一九〇四年三月十四日底下了一紙判決希爾的釋放令。

關於這次大吹大擂政府對於摩根的「勝利」，已故參議員羅伯遜，拉森來特曾指出其真實性質，說：「政府法官們在草擬此項解散令時，忘記了將其他互相競爭的，平行的類似聯合組織與企團也一併包括在內；同樣的，羅伯遜也沒有在羅森方面規定今後各公司營業必需經過本公司董事會獨自處理，不得再有聯合操縱等情。所以，結果這道命令仍歸是一紙具文，各聯合公司組織經維持券公司和拉新協定，仍舊可以暢行無阻，任所欲爲。政府採取此次行動的初意，結果是一無所獲，自己打消。」

羅斯福這次下令解散聯合公司，他的動機何在，局外人自能得知。而許多機關地裏要他這樣做，因為經過這道解散會的條文規定，應根與希爾對於各鐵道的主權是增加，受犧牲的祇是他們所要排擠的哈立曼勢力。拋開這些小的方面的影響不說，老羅斯福此次有聲有色的斷然行動，使他在一般人民心目中總認爲是一種反對大財團壟斷的舉動，這是在毫無疑問的，一般人民對他的這種錯覺經過緊接着的一次演講旅行是更爲加強了，成爲他一種有力的政治資本，這也是在毫無疑義的。更值得我們注意與回味的的是：老羅斯福此次強硬行動是於初的一次，也是最後的一次，以後他和摩根家族的交手還有幾次，這幾次行動更有聲有色的了。老羅斯福這次行動不啻表明，他已經在全國人民面前展露了，這下可斷了他的獨立不阿和無所偏依，自此以後他便可聽任摩根自由發展了。

老羅斯福和摩根爲了博得社會喝采實行假戲真做之際，洛克菲勒對於這假戲真做，主人摩根之心却真日俱增，並且是頗有理由的。他們極力反對新商務部與勞工部及其公司管理向之設立，但羅斯福以先發制人的手段表現他的大總統威權。爲了麻諸洛克菲勒所主動的各方面的謗言的抗議，他特爲招待一次新聞記者，當季宣布約翰·洛非克勒曾拍給九位參議員的一封信，電文上說：「我等堅決反對政府取締托拉斯之立法。吾等代表即將前來與諸君會商。此項立法必需立即撤銷」。

老羅斯福和洛克菲勒的對立，更加深了一般人民的錯覺，認爲總統確是反對大財

富的寒湖領袖。但是我們祇消看一看老羅斯福政府的組織人選配備，更正證顯他雖然這  
些富而不仁的一羣並無敵視之意。北美證券公司的一幕喜劇結束之後，陸特又回到政府  
任國務卿。波士頓殖民信託公司董事，摩根的非正式代表。喬治·塔其本也告辭

（Robert Bacon）於一九〇七——一九〇九年內任職郵政部長，後又繼塔其本之後任海軍部長  
繼任三塔鐵道公司及公平人壽保險公司董事長保羅·莫騰也替於一九〇九內任職海軍部長  
任海軍部長之職，當時正是這爾大公司大股東老羅斯福本人和哈立曼對於西太平洋的行政  
攻，海陸及地城問題進行機密佈置的時候。塔其本轉入參議院的時候，副國務卿是

（Robert Bacon）——也是摩根的移友，立即擢升為正國務卿。在兩俄交俄省反  
對勞工運動著名的威廉·霍瓦特，塔夫特於一九〇四年被任為陸軍部長。愛曉克省州總  
行家萊斯里蕭（Leslie M Shaw）：在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七年間任財政部長。摩根繼  
任海軍部長（Hoyt Satterlee）也曾一度任海軍部副部長。

繼之、摩根、泰恩、梅隆、弗立克都有自己的親信安插在老羅斯福左右。就這深寬  
聯動在老羅斯福政府中一個人無役不有。單是這件事已經足美孚油公司大舉擴充廠址及  
可

本要

老羅斯福任內擴張，在老羅斯福任內積極推進的巴拿馬運河計劃，是有各大財團

最初華盛頓方面總是認為開鑿新美運河只有經過尼加拉加，因為美國在該處已  
取得一運河開鑿權。早在三八八〇年便在現在的巴拿馬運河地帶開始挖鑿，但不久即  
中止。在這期間該公司勸主要債權人飛力普·布羅——瓦瑞拉（已死）  
前是——位巴黎出版家和投機商之手。奈黎胡·陸特曾在私下裏稱他為「反倫理罪  
犯」——瓦瑞拉聽到美國要在中美開鑿運河的一些風聲便特與威廉·克倫威爾做  
他的法律顧問。

一九〇〇年倫敦和黨大會幾乎要通過贊成尼加拉加路線的計劃，但克倫威爾以協助  
共和黨競選經費多義直接送給馬克·韓納六萬元，（出在法國運河公司的賬上）因而阻  
止了這個議案的通過。韓納在參院會席上演說，竭力主張開鑿尼加拉加為不可能的巴拿馬  
路線務必結果參議院於一九〇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通過贊成巴拿馬計劃的可彭那議案，但參  
議員阿爾巴馬省代表摩干提出抗議，指摘此次議案有通賄嫌疑，並指出「八九九年  
會通過贊成尼加拉加運河為「最適合的路線」。當時，老羅斯福也是如此在參議院  
無有案可稽的。

老羅斯福一場爭論使社會人士第一次知道在中美還有另一條運河路線問題。對於七

利之徒在馬計劃裏面是有豐富的油水可掙的；而在尼加拉加路綫中却沒有多少外快可圖。

一九〇一年五月，麥金萊總統所指的伊斯美運河委員會，進行克倫威爾的巴拿馬計劃，對於這個名存實亡的法國公司所保留的未用的特權，估價結果，認為應付四千萬元。很奇怪的是，這個數目正和法國公司所要求的不謀而合。最初，該公司索價一〇九、一四七、五〇〇元但隨即減低，因為巴拿馬運河費用估計需一四四、二三三、〇〇〇元、尼加拉補需一八九、八六四、〇〇〇元；前者加上四千萬的權購買費，和後者相差無幾，這可使共和黨對於他們的新建議振振有詞。

於是在政府撥付四千萬元，經過摩根公司，交與法國公司那些姓名無可查考的所謂股東們。不過，這筆錢是在政府派遣海軍藉口協助巴拿馬革命推翻哥倫比亞國在該地的統治以後才交付的。

這次巴拿馬所謂革命完全是人工製造的，伯騰——瓦和克倫威爾是整個事件的主謀者。甚至一九〇三年七月十三日的紐約世界報便言此次革命並且說出爆發的時日——十一月三日。布腦——瓦瑞拉事先便經過華盛頓接到美國。繼向巴拿馬移動的通知，並請他的同謀起事者。「革命」成功後，布腦——瓦瑞拉一變而為巴拿馬新共和國的政府大員。

這名姓什名誰，雖然老羅斯福爲了和緩各方面的指摘，曾肯定斷言克命威爾已經過期，股東名單交给了他。一般人所懷疑的是，如果這個法國公司確實有所謂股票持有人的話，那麼這些人絕不是原來的投資創辦人。（如果是他們，那麼要求補還股份票項，當然是很簡單而合理的行爲），而是一些無孔不入，拿最低微的代價在巴黎來收購跌價的巴拿馬運河股票的投機家們。這種觀察並非完全出於揣測，因爲繼承原來法國公司的老國巴拿馬運河公司成立於一八九九年（發起人爲奧各茲特、巴里蒙、庫恩、羅布公司，來維、奧勝等人），而且此次發起人的聚會地點就在克命威爾的律師事務所中。這個新運河公司，從摩根公司所經手收集的四十萬元中拿到一千五百萬元。在這公司的章程和招股說明書中，瓦瑞拉與克命威爾合夥的究竟都是那些人，從未見有任何記載；但從各方面的表現來觀察，此次巴拿馬運河事件顯然是一個大騙局，所有金融政治界的巨頭都有他們的份。當議會請他宣佈股東姓名時，克命威爾一再堅決拒絕。在這以後幾十年內，克命威爾不斷向共和黨捐贈大宗款項，並且兼任幾個大聯合公司的法律顧問。

巴拿馬運河關連的一切用費最後結算起來，比尼加拉加路鐵所估計的費用要大許多。美國政府於一九零一年特給御用的巴拿馬共和國一千萬元，自一九一三年以後減爲二十五萬元，繳納河地租借費。

老羅斯福第一任了，雖然他並沒有做出任何有積極性的社會立法，但國內一般人民却相信這隻大鱷是網義華爾街的一位英雄。一九〇三年，摩根在波士頓政界代表人與議員洛奇通知老羅斯福，告以摩根和其他金融界領袖贊成仍舊擁戴他在一九〇四年的選舉中連任。連不久還在抗議他的限定價格法令的製肉業巨商們也竟表示贊成再選老羅斯福。

商業金融界大王們竟能夠和他們明顯的白宮中的敵人在政治上互相合作，如果老羅斯福在這些方面沒有一套巧妙技術的話，那似乎太不可解了。他所常用的手段是：對於幾個少數著名的托拉斯，幾個經濟慎選的政敵，在無關重要的方面加以擁護或保護其勢力的公司和大財富們場所欲為。對於摩根，老羅斯福不斷公開斥責他為「罪惡的魔手」，但實際上這位大銀行家歷次的要求和主張，總是如願以償。

五

共和黨在一九〇四年的競選經費仍和從前一樣的龐大，不過關於此次經費來源的調查報告在一九一二年參議院的調查報告上有案可考。

從此次競選各方捐款人的名單上，可以看出金融實業界對於老羅斯福及其屬下的任職人士的影響。在一九一二年參議院的調查會議上，老羅斯福是這批名單中的人。

但不幸，哈立曼許多信件發表，確實證明他對於這一場顯然是知情。

E. H. 哈立曼自認爲老羅斯福一九〇四年競選連動的經理人。在此大總統連任後，立曼與老羅斯福往來的許多信件，不但說明了他們關係的密切，並且暴露了他們如何多方種種設法博取產業金融各界巨頭的贊助，如何徵詢各方意見，如何安插康復總統是總統推舉的官員等等。

老羅斯福再度當選後，政府原來對哈立曼的中太平洋與南太平洋兩價鐵礦公司案，案件的控訴，於一九〇五年被司法部長自動撤銷。這顯然是對哈立曼在一九〇四年係以競選的一種酬報。

哈立曼與老羅斯福這種密切關係，突於一九〇六年因公率人壽保險公司的股東爭奪和緊接着的保險公司黑幕事件，而告中止。原來美國各保險公司和共和及民主兩大政黨都有密切關係；這些公司是金融資本控制下的樞紐，他們一方面擁有鉅大產業資源，另一方面又統治着紐約許多重要商業銀行。

有一位游說青年黑森·海特 (Januaa Hassen Hyde)，從他父親手裏承繼公率人壽保險公司五〇二張股票，佔該公司股票總額的百分之五二。根據信託規定，黑森僅得五〇二張股票每年所分紅利總額祇能限於三，五，四元。因此公司便可拿這一點事權從該公司該公司的平等互惠精神。但是另一方面，這五〇二張股票握在一個人手中便可操縱幾千萬



產業資源和許多大銀行與信託公司，更可隨意支配巨額基金。

一九〇五年二月該公司董事長，詹姆士·亞力山大 (James W. Alexander) 和其他三十五個職員，建議董事會應該給全體股東們以表決權，意思就是說海特在公會中的大權對於全體是不利的。經過幾個月反覆爭論和暗中活動，公司董事會推定亨利·羅力克、哈立曼、布力斯、詹姆士·希爾等人（都是董事）成立一個審查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報告對於海特在公司中的統治大權，大加抨擊，並且舉出許多例證。

這位青年海特在審查委員會恫嚇之下，將他的股票全數以二百五十萬元之代價轉讓給湯姆士安萊，雖然在這之前曾有人出價七百萬。希爾亦曾出價五百萬。引起軒然大波的，正是這五〇二張股票的轉讓，倒這不是上述謠言弊端。

萊安這種不聲不響的將海特全部股票一人獨吞，使哈立曼大為憤怒，他表示如果將這些股票照原價出售一半，哈立曼在阿爾班尼省的政治力量一定要將整個保險公司內幕和盤托出。萊安終於屈服，但這個事件傳到紐約世界報的辦公室中，該報便公開要求對於所有保險公司實行一次總檢查。油已經撥在火上。議會不能置之不理。最初派我到適當的法官家有胆量來處理這個案件。世界雜誌提出請查理士·伊凡胡夫 (Charles Evans Hughes) 來担任。胡氏原係公平人壽保險公司董事長的顧問，當然願意到該處任顧問，於是便應聘為委員會顧問。

偵查結果：各保險公司基金大都份都經一般董事和高級職員們動用。他們私人地接  
握企業；這些私人投資的保險公司亦由公司負擔；這些董事和職員們從各托拉新手中購置  
大批證券再以高價賣與本公司；他們的親戚朋友在各保險公司中担任名義的董事不  
勝數；公司職員所拿的薪水與佣費大得可驚；幾十年來各公司支付鉅額款項，以維持其立  
法司法界之用，以便不干涉他們在各省的各種違法行為。在這種情形之下，各大保險公  
司如洛克菲勒之互助人壽保險，摩根之紐約人壽保險，萊安與哈立曼之公平人壽保險等  
，他們的盈餘收益當然最小。各保險公司對於各有關政客，另有秘密薪給名單，著名者  
如參議員爾塞。狄票、大衛·希爾等亦赫然在焉。狄票在任何公司都沒有名義，但每年也  
領到二萬元。

這個大黑幕案幾乎全國所有各大富巨賈都被牽連在內。如詹姆士·希爾、弗力克、  
萬羅氏、阿斯托、道奇、巴樂蒙、哈立曼、洛克菲勒、巴克、費許、裴金斯、全斯萊、  
詹姆士·斯雷曼等產業金融界著名大亨們都是各保險公司的董事或監事。

在這次大檢查中，發見各保險公司在政界上串通行賄的中心人物是摩根的一個朋友  
，紐約人壽保險公司副董事長喬治·裴金斯(George W. Perkins)裴氏是所謂「黃狗基  
金」的保管人，由各保險公司共同捐助，專做行賄之用，利用阿爾班尼神祕的「快樂之  
官」做他們的辦公處。關於他動用紐約人壽保險公司基金捐贈共和黨這個大舞臺，他

在紐約法院提出反訴，結果竟然勝訴，原案撤銷。世界雜誌對此大加抨擊，指出該案所有假造公司賬目之嫌，要求實行複審，但法官置之不理。也許是偶然的，自一九〇二年以後，裴金斯和老羅斯福函件往來，關係甚密。

此次大檢舉結果，固然使法律約束較前嚴緊，使有些非法行為難再發生，但各保險公司的後台老板，甚至所有的重慶職員仍舊原班人馬，絲毫未予更動。目前四大保險公司的董事們都是摩根、洛克菲勒、梅隆、杜邦、花旗、庫恩羅比各大財團的頭等或二等角色，因為一九〇五年以後公司根本法並無任何改變。

一九一二年衆議院普求委員會(Pujo Committee)指出：「所謂被保險者經過互助方法可以統給人壽保險公司的辦法，全係欺人之說。……結果經理實權仍舊落在少數有力者的手裏」。

政府命令各保險公司不得經理銀行及信託公司。他們遵從了這個命令，結果是使他們統治下的各銀行轉讓與各大金融界首領。摩根公司從公平人壽保險公司手中接管了該公司家商業銀行，將他們併入他治下的銀行信託公司和保證信託公司。本來摩根從接管銀行已經買到大批保險公司股票，這次歸併更增加了他的支配實力。一九一〇年摩根以三百萬代價買進哈立曼——萊安在公平人壽保險公司中的全部股份，其票面價值有五萬一千餘萬元，每年所收紅利尚不及其股本百分之一，但據羅昂·布即狄斯估計，這些股票每年

使他還有五萬零四千元資產的支配大權。  
集所以整個人壽保險制度依然是被社會抨擊的對象。

此次哈立曼與萊安衝突的結果，最後失敗是在哈立曼方面。

一九〇七年世界新誌社得到一封哈立曼在一九〇六年寄給一位共和黨主持人西德尼·威布希持的長信。在這信上他首先提到他係被迫捲入此保險公司紛爭的漩渦；他奮力想幫助狄票往大位，但末如願。在一九〇四年的競選中，老羅斯福以一百萬票的多數再度當選，其中有五十萬張是他活動的結果。最後他指出萊安在各電氣公司，烟草公司，轉民信託公司的操縱把持，在皮業銀行之最初併入西部銀行後又改入商業銀行方面種種複雜糾纏的手腕，完全是由於奈梨胡，陸特的參謀設計，而這種情勢的造成又出於萊安，陸特與老羅斯福的互相串通之賜。而他（哈立曼）則被排擠在外面了。

復次，在保險公司事件之前，老羅斯福使已動員力量向哈立曼進攻，他組織了一個省際商業貿易委員會特為檢查哈立曼治下的各鐵道公司，將其中內幕與弊端盡情予以揭露，使他在公眾面前成爲一個可詛咒的爲富不仁的對象。

哈立曼死於一九〇九年，留給他妻子的遺產約有一萬萬元。這位赫赫一時，處處難比公司的大亨，摩根可怕的勁敵從政治意義上來看，終於被這位大總統給打败了。

一九〇四年大選，哈立曼雖然效勞不少但募集競選經費的領導者還是摩根集團。

美孚油派也慷慨地參加合作，但他們採取兩個派作法，另一方面還暗中接濟民主黨。約翰·阿其包德(John D. Archbold)，美孚油公司副董事長曾向老羅斯福的代表康諾力斯·布立斯表示贊成共和黨的關稅政策，並請他轉告總統希望能夠接收美孚油的捐款，聽清美孚油對總統並非敵意。

一九〇四年大選中，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為最高法院阿爾登，B·巴克(Judge Aiton B. Parker)，該黨所收各方捐款的詳細數字已無可查考。不過根據參議院選舉問題檢查委員會調查結果，還有一些零星材料頗堪注意。如大銀行家奧格斯圖·巴樂門捐獻二萬五千元，他同時也是民主黨執行委員會之一。甚至和老羅斯福有密切關係的葉安，也捐了四萬五千元。亨利·海文邁耳(Henry Havemeyer)捐一萬元，可是他的公司則捐給共和黨。

在巴樂蒙和葉安教訓之下，巴克宣布贊成金本位制，這個主張在民主黨政綱中是沒有的，因此頗引起一番激動。結果巴克這種聲明，使民主黨不得不正式撤銷布利安(Randolph J. Bryan)的白銀政策，改為贊成麥金萊任內的金本位法案。

華爾街社會都知道巴克的被擁為總統候選人，是遵照洛克菲勒的意旨行事；而他和葉安在大都會證券公司中是有密切聯繫的。另一方面，阿烈文·裘恩曾力勸韓納阻止共和黨再推老羅斯福這個消息使老羅斯福頗為恐懼，使他因而更仇恨美孚油公司，但是韓納

自麥金萊過刺之後，身心俱敝，並沒有接受這個建議。

西克爾的被推爲民主黨候選人，使威廉·蘭多爾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非常氣憤，因爲他本人也正千萬萬計想走進白宮，結果竟被一個無藉藉名的對手捷足先登這種憤恨使他後來不斷的在他的報紙上毫不客情的盡量揭露洛克菲勒諸多違法黑幕。著名的阿其包德私信在報上的公佈，使一般社會對洛克菲勒有正直威和近議感的一向信念大爲動搖；這些信便是赫斯特買通的奸細偷出來的。

洛克菲勒集團積極推戴這位向無藉藉名的巴克先生爲總統候選人，最確切的實證是湯姆士·W·勞森(Thomas W. Lawson)於一九一二年任參議院席上宣誓證明美孚油公司的經紀人，W·W·羅哲士「通知他們的代表在民主黨大會上採用一切方法推舉巴克先生」。勞森是波士頓金融家和交易所經紀人，他和羅哲士及阿其包德在鍊鋼公司股票聯合投機上曾發生齟齬。此外，還有一個證明，小詹姆士·飛力普，對於洛克菲勒集團並無任何懷疑理由，在一九〇四年四月也寄信給華爾街月報社長巴朗說：「美孚油將推舉巴克先生爲民主黨候選人」。不過因爲民主黨這些記錄和賬簿的銷燬，使我們無從查知美孚油捐款的確數，也許巴樂蒙和萊安的鉅額捐款中，有一部份是出自洛克菲勒。

老羅斯福二次當選後，又開始大談其社會改造問題。同時社會不安的現象亦與日俱增，特別是西部各省，威斯康辛省省長拉伯特·拉弗來特(Robert M. La Follette)長期

裁制特權階級的戰鬥戰爭亦因徒勞而告終止，

總統因對未來社會前途焦慮不安，希望能長久保持現行制度，故不免流於激進主義。稱老羅斯福傳作者麥加布瑞里所剖析，他這種激進思想祇是表現在言論上，他的內心是陷於矛盾苦痛之中，他在他的政綱上確有若干進步主張，以便防止社會主義與混亂的興起，但同時他又多方努力來和緩右翼的反對。

南北戰爭以後，美國貧富懸殊的矛盾現象日益顯著，同時羅斯福一屆總統任內大部份財富資源均被大富巨賈提佔以去，而前此可使社會不安與不滿情緒得以公開發洩的社會安全瓣亦漸行封閉。這種安全瓣直到十九世紀末葉還在開放着，在言論出版方面如亨利·喬治(Henry George)之進步與貧困。(Progress and Poverty)和華德華，白蘭壽(Edwards Bellamy)之回顧過去(Looking Backward)在行動方面如庶民主義運動、候選新台及普爾曼工潮，以及其他人民關於經濟改革等要求等。

同時，政府對於一向慣於某種限度自由的人民，其統治力量亦隨之日益加強。南北戰爭後，在產業發達工資制度日益普遍之下，總統大權固不斷使用而日益提高，如總統對於議會決議有再議權及決權之創製。同時最高法院，法官均由總統委派，其職權範圍亦逐漸擴大，超過議院權力之上。在南北戰爭之前，最高法院祇廢止過一件議會決議。但自一八六〇五一九三〇年，共廢止了五十八件到了一九三〇至一九四〇年間，最高

法院對於議會立法這種牽制大權更發揮到了極致。

老羅斯福會使用總統否決權達四十次之多，在一九〇六年，他以警告的口吻宣佈請議員洛奇說：「勞工們不少危險份子，誰也不敢預測他們這種不滿意動將發展至如何程度」。

不過，總統自有他維持在一般人民心中威信的辦法，他仍集中火力，發關反對美國煙草托拉斯與美孚油公司。美國煙草托拉斯，和美孚油一樣，也是洛克菲勒統治下的企業，雖然萊安和詹姆士，杜克也有不少股份在內。老羅斯福對這兩大公司的檢舉，已變成對於洛克菲勒敵對集團的一種政治的報復，結果加強了摩根——梅隆勢力克集團的勢力，而洛克菲勒則被削弱。

美孚油檢舉案於一九一一年經最高法院判決「解散」該公司；但公司的各部份仍繼續存在和擴展，到了一九二九年洛克菲勒又將各部重新組合在一起，開始恢復舊觀。在一九〇七年某次普魯寧法庭判決中，董道斯法官使一般社會輿論大為快意，對美孚油公司罰鍰二千九百萬元，但結果不久他的地位亦因之不保。

關於他在二屆任內的反托拉斯政策，老羅斯福曾有一次私下對馬克來布說：「當然既要有可能藉口，我對每個案件都設法從寬辦理」。並且他的檢舉也祇限於少數幾個企業所注目的大聯合公司，「即使採取有利於政府方面的判決這種判決也從未發生真實結果



。同時政府官吏對於這些案件的執行也採取消極與推諉的態度。

在一九〇六年十二月總統在議會發表演講，提出以下幾點主張：徵收所得稅及遺產稅；限制公司登記立案；禁止各公司支付政治活動經費；規定鐵路員工最高工作時間；限制司法機關干預勞資紛爭的權力，議會遵照總統意旨，明令通過嚴禁各公司銀行有政治捐款行為（但各公司銀行的私人捐款則未加禁止），並規定鐵道職工最高工作時間為十七小時。至其他各項則置之不理。

在他兩屆總統任內，老羅斯福為配合華爾街的對外經濟發展，曾繼續不斷要求並增額經費，建設龐大海軍。一九〇七年並曾派遣艦隊巡遊世界，聘問各國。他不顧一般人對他侵犯憲法規定的指摘，積極在外交方面擴張其總統大權。例如，在他第一任內，為着迎合歐洲債權人經過摩根公司所提出的要求，老羅斯福竟下令接收自治領關稅。在其第二任內，他和英日兩國成立關於太平洋問題的祕密協定，事先議會及全國毫無知曉。據史學家畢爾特(Dr. Beard)博士觀察，這個協定為美國站在英日方面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奠下了始基。

總統獨自決定插足於歐洲列強瓜分中國商業權利的競爭，堅持美國亦應共享特權；不久以後，在一九〇九年摩根公司便發起組織一個專為資助中國鐵道的美國信託公司（新迪加）。後來一九一〇年及一九二〇年的各國銀行團便由此而起。在這兩次的銀行團

中，都是由摩根公司代表美國參加，這個新進組織所發行的中國鐵道證券美國銷售一空，結果將近百分之五十的虧損，都落在一般證券購買人的身上。

摩根在老羅斯福任內對於白宮影響之大，可從一九〇七年的恐慌中明顯看出。後來許多人公開指出，連老羅斯福本人也暗示到，這次恐慌，即使不是完全因為美國鋼鐵聯合公司違反施爾曼法（取締聯合組織法）併吞田尼西鐵公司而起，至少也是因為這種事件而嚴重化。當時田尼西煤鐵公司雖還不是很重要的企業，但其礦藏之富却在世界首屈一指。

如果說這其中有陰謀的話，那麼許多證據毫無疑問地說明這完全是摩根與洛克菲勒兩個集團企圖瓜分某充經濟資源的聯合冒險。在這個時期中，洛克菲勒和摩根兩派在許多投機行動上已經實行互惠合作，不斷地營業往來和互相交換地位。

田尼斯煤鐵公司被併吞和奧加斯特斯·海因茲（Augustus Heinze）破產這段故事的開頭，正是在一九〇七年秋天全美聖公會在其舉行常年大會的時候。會議行將終了時，股票市場大跌，有些交易所岌岌可危。

摩根以聖公會長老的資格參理其蒙大會，在返回紐約的火車上，一路興高采烈，不斷唱歌，在當時金融界危機震撼之際，摩根這種高興表情確甚奇怪。在幾天之前，十月十六日，聯合鍊銅公司股票暴跌，該公司老闆海因茲辭任國貨銀行董事長，立即辭去

銀行聯涉。同日奧圖、海因茲公司亦隨之倒閉；遂在數千里外之物特。海因茲銀行亦實告清理。這些風波，康根在理其業便已接到電報，但他不但惶然目若，並且與敵頗高。其中究竟有何蹊蹺呢？

許多歷史家分析一九〇七年的「銀行界恐慌」，多不注意海因茲倒台的含義。雖然各方面的事實都確切證明海因茲與聯合銅礦公司的倒閉完全是洛克非勒允許康根併吞匹尼新鐵公司所提的交換條件。海因茲多年來被洛克非勒治下的化合銅業公司（一八九九年改為銅業托拉斯統治安那康達銅礦公司及其他各種冶煉企業）視為眼中釘背七刺，久思去之而後快。這個銅業托拉斯的董事有威廉·洛克非勒兄弟、詹姆士·斯蒂登、亨利·羅賓士、羅伯特·白康（Robert Bacon）。後者係康根夥友，老羅斯福的密友，後來又參加內閣。

化合銅業公司產品成本高，聯合銅礦公司成本低，結果後者可以較低價格傾銷各地市場。在一九〇一五—一九〇四年間，化合銅業公司股價一萬五千元之股票票面總額，跌落甚速。一九〇五年四月四日波士頓新聞報主筆克拉蘭斯，巴爾發表一條新聞，謂化合銅業公司當局曾向他表示關於海因茲聯合煉銅礦公司的競爭問題，「正在謀求解決之道。」這個解決之道終於在一九〇七年十月十六日實現了。在這一天所有交易所聯合一致壓迫聯合銅礦公司的股票價格，使之暴跌，海因茲各銀行對該公司的貸款立刻被寬

各清理。海因茲事業亦隨之完全破產。

使摩根高興的另外還有一件事，尼克勃克信託公司在十月二十三日亦宣告倒閉。在尼克勃克倒閉之後，當天財政部長喬治·考提留 (George B. Cortelyou) 兩年後，考提留繼續担任摩根——洛克菲勒的紐約瓦斯公司董事長垂二十五年之久，便立刻與摩根舉行秘密會商。第二天，市場上的日拆突然升至百分之百，老羅斯福總統立備從國庫撥出二千五百萬元交與摩根公司，賦予摩根統治金融市場的全權。

威是預先辦好的，政府也在參加合作。

在尼克勃克倒閉的那天，紐約太陽晚報登載一個新聞：美國信託公司亦發生擠兌風潮。這完全是捏造的謠言，但當天太陽早報也登一個引人注意的消息說，美國信託公司董事長歐克萊·曹尼 (Owleigh Thorne) 行將辭職。兩個消息互相呼應，更增加了人們對美國信託公司的懷疑。

在太陽晚報發表這個假消息以後，第二天 (一九〇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紐約太陽早報第一版也登載一篇關於美國信託公司發生擠兌風潮和銀行界激夜會議的特寫，作者署名阿杜夫·顧赫。這些消息，都是假的，所謂擠兌和危機云云，全係虛構。太陽報發行人「摩·拉芬 (William Latham)」，受摩根私人津貼，晚報的創辦與早報的收購，都是由摩根出錢。紐約太陽早報雖然不像太陽報那樣背景顯赫，但邊識者正利用這點使人相

信他們所虛造的謠言。據事後司坦萊委員會調查，太晤士這一篇特寫是喬治·斐金斯寫的，目的在刺激銀行界的不安情緒，太晤士報礙於摩根的威勢，自然不登，並且還帶不許一字提到摩根或斐金斯。這篇帶有煽動性的特寫，劈頭一句便是：「目前主要可慮的危機之點是美國信託公司」。

在紐約太晤士報發表這篇虛構的故事的當天，果然引起各存戶爭先向美國信託公司提款，一天之內共提出二千五百五十餘萬元，較之前一天一百五十八萬元提款額差不多增加了十倍。

所謂銀行家澈夜開會，也可說確有其事；但這個會議是摩根故意以美國信託公司發生危機為名召集的。當時美國信託公司董事長曹尼亦參與此會，聽到這個消息，其驚異之狀可以想見，因為他自知公司組織鞏固，準備充足；但太晤士報這個活龍活現的謠言，使他不容置辯。

曹尼很快便明白這齣戲的意義何在。原來在他的公司所存貯證券中，有一部份是開西鐵公司的股票，做為該公司對一個洛克菲勒集團（筆很小貸款（四十八萬餘元）所收的抵押，這個洛克菲勒集團中，包括有阿烈文·斐恩，L. C. 韓納（馬克·韓納之弟），J. B. 杜克，F. J. 倍文，和摩根公司。這個集團拿政府的總統治金融市場，他們認為對於這個發生危機的銀行公司有實行援助之必要，要求該公司將田尼西公司

股票交出，換領美國鋼鐵聯合公司的證券。後來事實證明，所有各銀行凡持有田尼西股票者，都在摩根命令之下被迫拋出。

曹尼本人持有一萬二千五百元的田尼西股票，並無任何抵押，但他也必需答允讓這些股票一併拋出，他纔能得到摩根所應允的三十萬元和其他同種證券。經過這種方式，亨利·弗力克、愛爾勃，加雷 (Ellert Cary) 和摩根他們本人從各方面——大部份為銀行與交易所，所搜集的田尼西股票共達三〇，三七五，八七五元，使美國鋼鐵聯合公司取得了全部的領有權。

不過當美國鋼鐵聯合公司在放手併吞田尼西煤鐵公司及其豐富礦藏以前，它必須得到白宮的正式允准，因為政府有權實施取締托拉斯法。同時它還需設法使這種行為不致引起社會輿論的指摘。因此，一九〇七年十月廿八日摩根弗力克和加雷三位大亨集議決定在這個虛構的恐慌着手調整以前，先商得總統的同意。於是弗力克和加雷又啓程赴華盛頓，第二天謁見老羅斯福，報告某巨戶有倒閉的危險。他們原打算明白指出這個「巨戶」的各字，但老羅斯福很奇怪地，要求他們不要說出，可是報紙上早已登載美國信託公司發生危機的驚人消息了。

老羅斯福這個奇怪的要求，一方面使這兩位摩根代表免得因證實這個傳聞發生危機的企業而顯露痕迹，一方面也使總統自己避免准許公司併吞之嫌。假使總統一定要知

羅弗力克與加雷心目中的某巨戶名稱，在當時情勢之下他們祇能說莫爾和希萊爾無異重要的交易所。這兩個小企業機關的危機，使總統沒有理由利用「挽救全國經濟危機」名義，暫行停止取締托拉斯法之實施。這兩個交易所的擱淺，使加雷與弗力克得以暗示老羅斯福還有更大更重要的金融機關亦將發生危機，同時也暗示給一般社會他們此次驚見總統，是和傳言甚盛的美國信託公司有關。

從官樣文章方面來說，老羅斯福對於此次風波內幕毫不知情；但實際上他對於這次併吞的全部詳情必定瞭若指掌，因為只有他才能够賦予摩根公司以統治金融市場之權，向這二位拜訪他的客人保證他不執行「取締托拉斯法」。華爾街的恐慌是消除了。美國鋼鐵聯合公司取得了他們垂涎已久的田尼西煤鐵公司股票。洛克菲勒與新蒂曼擠掉了美國信託公司所感受的壓迫亦隨之消滅。各方面皆大歡喜，連一般社會人民，當他們在報上讀到摩根先生毅然挽救危局和大總統對於各金融界領袖此次互相合作儲蓄騰許種種記述的時候，也不禁為之欣然色喜。

在他卸任以前，老羅斯福還做了許多事使一般產業金融巨頭對他深表感激。

一九〇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命令司法部部長邦拿波特(Branpaire)撤銷對萬國礦業委員會的控訴。在這之前，該公司創辦人，摩根的夥友妻金斯曾訪謁總統提出質辯。妻金斯同時又是老美證券公司董事長，著名的保險公司黑幕案，他也是一個主角；他和出版家

弗蘭克·羅塞二人，不但是老羅斯福的政治密友，並且在財政方面幫忙最多。

在一九〇七年三月間當摩根訪謁白宮時，老羅斯福曾以私人名義向摩根保證對哈立曼的檢舉，決不會擴大為對於所有鐵道聯合公司的總檢查。同年，他又向摩根保證新海文鐵道公司可以向波士頓與梅國發展。這不但違反政府法令，並且也違反了波士頓與梅國鐵道公司一般股票持有人的意願，以後二十多年來他們不斷的反對這種使新海文與摩根公司大獲其利，使他們大受損失的聯合。

在老羅斯福任內，洛克菲勒家族雖然在白宮中頗受冷遇，但他們在整個美國政治上仍擁有很大勢力，其中詳情業經一九一二年參院競選問題檢查委員會予以揭露。各項證件材料大部份都是赫斯特設法從阿其包德在美孚油公司的辦公室中偷出，在報上公開發表。

阿其包德的信件，和哈立曼一樣，其中所牽涉的人物和所顯露的事實不勝一一列舉。參院議員潘諾斯 (S. Parsons) 係美國工業委員會委員，當該委員會進行調查各公司組織及業務概況時，他得到阿其包德賄金二萬五千元，將委員會關於各公司股東名單的報告，轉密送給阿其包德一份，並依遵照阿其包德的要求，設法將該項報告中所提出的改革意見擱置下來。

其他如賓西拉凡尼西及俄亥俄省行政及立法當局，直接間接受美孚油集團的賄買



，影響與操縱的事例，尤其更僕難盡。

## 六

老羅斯福二屆任滿，繼任總統威廉·霍瓦特·塔夫特 (William Howard Taft)，事實證明，不能使任何人滿意；一九一二年他的被迫辭職，也許正由於這個原因。他的被推爲總統老羅斯福出力不少，因爲很顯然的通過這個昏庸無能的人物，他仍然可以繼續保持總統實權，正如韓納之與麥金萊一樣。塔夫特，這位保守派中的保守派，也和麥金萊相同，倒是很坦白直率的一個人物。兩個人都是本來面目，不善於做出自由主義的姿態。他們由衷的敬佩華爾街中的人物，而老羅斯福對於這些大財富們始終是表示個人的憎惡。

如果就一般產業金融巨頭方面來說，塔夫特與老羅斯福政權的基本不同之點是在老羅斯福偏袒摩根，壓制洛克菲勒，而塔夫特則將這座傾倚的天秤平衡過來，抑制摩根公司，幫助處在逆境中的洛克菲勒。曾和老羅斯福在政治上發生衝突的杜邦家族，也和塔夫特交了朋友。

當塔夫特被推爲總統候選人消息發表以後，約翰·洛克菲勒立即公開表示擁護。和塔夫特競選政敵民主黨候選人布利安，已經是第三次參加競爭了這次形勢已經預示他

又歸於失望。在一九〇四年所有贊成老羅斯福的一部份曾經擁護巴克的人們都一致支持塔夫特。但一九〇八年塔夫特的競選經費，却並不比以前三屆爲高。

塔夫特本家在此次大選中捐款最多，據一九一二年參院競選問題調查委員會所搜集的證件，安得留·卡尼基·摩根公司，各捐二萬元，他如弗力克、斐金斯等人所捐均在萬元以上。杜邦亦捐二萬元，但爲共和黨所婉辭拒絕，因爲當時該公司爲火藥合同有歐陸軍部嫌疑被控一案尚在懸而未決。後來塔夫特將此案撤銷。民主黨這次也認真起來，也許是由於害怕赫斯特的揭發。美國煉糖公司捐款一萬元亦被退還，因爲該公司也正任爲斤兩問題而被政府檢舉。

塔夫特上台後的美國，和老羅斯福任內的情形已有很大不同。例如，在一九〇〇年，美國共有托拉斯一四九家，資本總額四十萬萬元；當這位「專好與托拉斯爲難」的老羅斯福走出白宮以後，全美托拉斯增至一〇〇二〇家，資本總額達三百一十萬萬元。

老羅斯福最明顯的貢獻，是他把美國政府的效能大爲提高，比以前要強有力得多。如文官制度的普遍推行，森林區和水電區的收回，灌溉計劃的推進，海軍的擴大等等。推選老羅斯福所化的錢不但使那些捐款的大亨們獲得特殊利益，並且從事業經營的觀點來看，也給他們帶來前例所無一個最好最有效率的政府。

塔夫特總統從來不明白爲什麼他不能和他樂與交游的大富翁們公開地在一塊飲酒聯

歡。他的顧問們日常工作之一便是如何設法使他避免與產業金融界寡頭們接近，盡可讓使這些巨頭們到白宮的訪問對外保守秘密。塔夫特歡喜和亨利·弗力克在一起打高爾夫球，但是他的夫人却想盡方法阻止他和他所最欽佩的約翰·洛克菲勒一同作這種遊戲。以過，J. P. 摩根倒是常常到塔夫特的避暑山莊，舉維萊去拜訪他，不為人們所注意。有一次摩根頗傷了塔夫特的自尊心，他竟然邀請總統到紐約來說話，還有參議員阿爾雷士參加。塔夫特回覆摩根，如果要會晤他，請到華盛頓來。

一九一一年四月間，參議員阿爾雷士，他的女兒阿培，和她的丈夫小約翰·洛克菲勒秘密到白宮去便餐，他們悄悄地從後門走進，塔夫特並下令不將在白宮訪客的名單上登記，以便被機警的新聞記者們所發覺。

在立法方面，塔夫特政權的成就不過是更進一步加強了大財富們地位。在他就職後第一次演說中，他雖宣稱將遵照共和黨政綱實行改良關稅制度，但完全是一片敷衍搪塞的口吻。整個講詞祇讀了兩分鐘便完畢了。

實際上關稅制度不但絲毫未加改革，議院反而通過表恩——阿雷士法案，將六百餘項的關稅額提高，使美國產業資本家們可以在關稅壁壘保護之下，縱情抬高物價，編一盤工資水準則在丁奇來注——限制之下不能比例的上漲。參院財政委員有阿爾雷士，洛奇。海爾等人很快地將鞍轡關稅率重行釐訂。阿爾雷士在議院辦公室中整整工作了一個月。

八個鉅額，當時各公司代表們蜂擁在客廳中紛紛要求更高的關稅率。祇有很少幾個壟斷的項目稅率略為減低，其他一律較前提高。

卑維力支和拉弗來特二人雖然拚命反對這個法案，結果無效。參議院也和最高法院一樣，擠滿了各公司的代表和代言人。拉弗來特曾指出，在此項法案中所減的關稅僅有四萬五千元，而增加的數目則達一千餘萬元。在舊關稅制度保護之下，洛克菲勒和萊安的美國煙草公司每年盈利達其資本額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十年工夫，該公司其獲利達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受犧牲的當然是社會一般人民。

雖然如此，塔夫特終於批准了這個法案。最初他曾表示不滿，但很快便改變了口吻，居然認為這是歷來最合理的關稅法。

塔夫特也想振作一番，試行一下取締托拉斯法。但他祇將這個法案的鋒芒指向摩根集團。一九一一年他根據司坦萊委員會報告，曾下令檢舉美國鋼鐵聯合公司。

政府對美國鋼鐵公司的提出檢舉使老羅斯福最後和塔夫特決裂。老羅斯福抨擊塔夫特說，當後者在他任內做閣員時，對田尼西煤鐵公司與美國鋼鐵公司的合併曾示贊成，現在竟出爾反爾，實屬背信棄義。同時，這次檢舉和接連着又對國際農具公司抽控訴，更引起摩根的憤怒，因而他對於塔夫特的連任競選中盡表反對。但塔夫特亦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司坦萊委員會報告既已發表，在高舉矚目之下，他祇有這麼做作一下，別無他

途。

洛克菲勒對於一九一一年最高法院命令美孚油公司實行解散的判決，也感覺無計可施。審判長愛德華·懷特在他的判決書中曾指出自從一八九二年俄亥俄高等法院判令解散後，十九年以來，該公司依然逍遙法外，而且變本加厲，弁髦國法。

麥金萊和老羅斯福時代的外交政策，在塔夫特任內仍舊繼續推行，「金圓外交」這名詞便是在這個時期叫出來的。依照華爾街利益向外擴張政策，在國務卿費蘭德，C·蘭克斯(Phinader C. Knox)倡導之下，更趨積極。

塔夫特對於洛克菲勒花旗銀行的發展方式甚表贊成：銀行附設證券交易所的盛行一時，塔夫特本人要負很大責任。一九一一年他曾與花旗銀行董事長萬德里普和康根收表亨利·大衛孫在白宮秘密會議；會後他便下令禁止總檢察官弗德立克·雷曼發表關於銀行附設證券交易所不合法的意見。雷曼這種意見，直到一九三三年二月參院組織銀行與通貨檢查委員會在橡翠華爾街種種不法行為時纔被發見出來這些如雨後春筍般，各大商業銀行紛紛設立的附屬證券交易所，鑿鑿在社會上危害大眾利益達二十餘年，他們經理各母行的證券股票，操縱證券市場，經常將靠不住的證券售與一般不知底蘊的人民。如果不是另有其他牽連各大財富的黑幕案發生，塔夫特這一任的政權威信還可勉強敷衍過去，因為上述關於證券交易所的弊端是在二十年以後才被揭露的。在塔夫特當政

期內發生的一件大黑幕案是內務部長巴林格(Richard A. Balmiger)縱容顧根輪船與摩根公司侵佔阿拉斯加省礦產。巴林格在任職內務部長之前，曾任顧根輪船公司的法律顧問。當顧根輪船與摩根公司虛造文件向政府申請他們在阿拉斯加有開發礦產之權的時候，巴林格竟不顧國家財富私人不得開發法律之規定，擅加允准，結果和森林部曼賓初特(Pinchoff)生發衝突。塔夫特立即將賓初特免職，仍留巴林格在位；結果與情諱然，紛紛指摘，最後不得不讓巴氏辭職。摩根與顧根輪船這次所主張的權利據估計在一萬萬元以上，後來經法院判決無效。但這次舞弊案本身如何解決，却迄無下文。

塔夫特政府對於一九一二年衆院普魯委員會的調查報告，完全置之不理。據普魯委員會調查，摩根巴克，斯蒂曼經過托拉斯與持券公司等方法，差不多完全支配全國金融市場。在摩根掌握下的各公司資本總額共有一七，二七三，〇〇〇，〇〇〇元。摩根公司各同夥與各附屬公司，洛菲克勒與斯蒂曼花旗銀行各董事，和巴克第一國民銀行這三個集團合在一起，他們在三四個銀行與托拉斯。十家保險公司，三十二家交通運輸機關（快郵公司與輪船公司尚在不內），二十四家製造與貿易公司，十二個公用事業機關中共佔有三四一個董事權，也就是握有絕對支配權，資金總額共計達二二，二四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路易·布郎兌斯(Louis D. Brandis)在研究這個報告時，指出這三天金融資本集團

所支配的財富較是實際上絕不止以上這個數目。他認為最大的危害倒不在這慶少數幾  
個寡頭統治這龐大的財富，而是在於他們這種統治是利用「別人的錢」來維持和擴大  
，大財資本的本質即在於此。這種統治方式，使金融成本永遠不會壓足，它不斷要求  
擴大與發展，它運用各種巧妙的方法坐取鉅大盈利，而原有的資產主人（股票證券持有  
人）反而絲毫不能分享。布郎兌斯所預見的這種後果，直到一九二九——三三年纔降臨  
全國。

## 第四章 富豪的成長（一九二一—一九二〇）

一

在一九一二年全國大選中，起領導作用的是摩根公司，其次花旗銀行，湯姆士、萊安、喬治、哈威、加可布、庸甫、克里伍爾、道奇、和賽路斯、麥克米克。

在共和黨大會上競爭總統候選人的，祇有老羅斯福與塔夫特二人。前者個人聲譽超邁，而後者則頗受有力者的愛戴。結果後者戰勝，雖然老羅斯福在初選和大選兩次運動中都曾竭盡力量，作頑強奮鬥。

在大選之前，老羅斯福的幕後贊助人爲喬治·麥金斯與弗郎克·穆塞（Frank Munn）二人。他們都極力鼓勵老羅斯福和塔夫特一較雄雌，在共和黨選舉大會上他們也會努力勸他不要妥協。據司坦萊委員會調查，穆塞對一九一二年老羅斯福的參加預選捐助六萬七千餘元，麥金斯捐了十二萬三千餘元。梅隆與力克雖然當時支持塔夫特，也捐了十四萬四千餘元，坦、韓納（馬克·韓納之子）捐七萬餘。

塔夫特參加預選經費的主要捐助人爲安得留·梅隆兄弟，勞福臨鋼鐵公司，奧得留·卡尼基、庸甫、及庫恩羅比公司等。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競爭者爲俄亥俄省長周德孫·哈蒙（Judson Harman），詹普·克



拉克(Champ Clark)和伍求·威爾遜(Woodrow Wilson)三人。

支持威爾遜的金融界巨頭是國家銀行的克里伍蘭·道奇；後來在威氏的兩屆總統任內他是非官方人士中最有勢力的一人。道奇爲威爾遜的參加預選籌集了八萬五千餘元；庫恩羅比公司的大股東席甫，和國際農具公司經理麥克米克亦捐獻了不少。威氏競選經理人廉威·馬康伯(William McComb)代萊安和查理士·莫飛(Charles Murphy)認捐一萬一千餘。紐約地產經紀人亨利摩威根索(Henry Morgenthau)，後來被威氏任爲駐土耳其公使，捐了二萬。……

共和黨在芝加哥的預選大會上，擁護老羅斯福的代表們在最初提名時是獲勝了，但經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在陸特和阿德雷氏主持下的詳加審查，這些代表的投票竟大部份被宣佈無效。這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爲陸特曾對老羅斯福結有私怨，認爲在一九〇八年時便應該舉他推出白宮；阿德雷士和洛克非勒有不可分的密切關係；老羅斯福壓迫美孚油的舊恨，當然不會忘記。在這樣情勢之下，梅隆——弗力克這一派勢力通過國務卿諾克斯之口也對老羅斯福表示反對。

老羅斯福參加初選競爭失敗以後，穆塞和裘金斯二人在芝加哥安納斯飯店客廳中仍力勸他位前任總統再接再厲，參加第三黨競選，就在這個飯店客廳裏產生了一個新的政黨——進步黨，當時雖然號召了萬千顆忠實的自由主義者踴躍參加。

紐約晚報發行人亨利·哥德達德觀察，若羅斯福當時不願以個人聲望做此冒險，因而頗表懷疑；要不是穆塞和裴金斯的極力堅持，他不會和塔夫特高門的威廉·華特（William Ward），裴金斯和穆塞是這次老羅斯福反塔夫特的競爭中的最後主腦者。在此次競爭中，曾有人向穆塞提出如果能以二十萬元代價，收買各代表的選票，便是可保證老羅斯福取得候選資格。穆塞拒絕了這個建議，但後來他和裴金斯爲了支持進步黨競選和戰敗塔夫特却化費了更鉅額的款項；由此看來，有人懷疑他們二人並不十分熱切希望老羅斯福競選獲勝，這不是沒有理由的。裴金斯和穆塞心中也討厭韋廉遜或其他民主黨候選人（除開布利安以外）當選，這種揣測可從裴金斯經過克里伍蘭·邁奇之手捐給威爾遜競選不少的經費這一事實中，得到部份證明。銷行遍全國的「普威爾遜大事宣傳的「真美國人」，（True American）邁奇與裴金斯便資助了三五，五〇〇元。

當老羅斯福表示再接再厲與塔夫特一較雌雄，這位前任總統的失敗已成不可避免之勢。在這些三大政黨（共和，民主，進步）的逐鹿中，穆塞與裴金斯二人和老羅斯福幾形影不離，他們四處奔走，爲他籌備用費，佈置講演，動員華爾街巨頭們參加協助。總之，老羅斯福反塔夫特運動的全付擔子都落在他們肩上。據歷史家大衛·撒維里·莫塞（David Saville Muzzey）銳利的觀察，這三個政黨的政綱，如兼他們共同的綱領除外，

可以說並無多大分別。不過，進步黨曾企圖出類拔萃，在他們政綱內加入一條激劇取締托拉斯的綱領，但旋即被該黨執行委員會主席喬治·麥金斯將它刪去。因為此事，阿莫斯·賓初特(Amos Pinchot)曾在黨內進行強烈鬥爭，要求老羅斯福撤免麥金斯，但被遺拒絕。這位賓初特先生或者過於天真了，他大概沒有看出塔根和他的原公司都是進步黨的靈魂與主宰；其他一切不過是表面點綴而已。

參議員卑維里支(Beveridge)也被勸加入進步黨，麥金斯和穆塞答允他這個新黨將保持永久基礎，在大選過後仍繼續奮鬥。然而在競選運動三個月以後，穆塞竟公然開表不進步黨所獲選票雖然超過共和黨，仍願併入共和黨；麥金斯對於卑維里支的嚴詞質問，只是一味敷衍搪塞，支吾其詞。

當時候到了，這福急就章的進步黨應該宣布善終正變的時候，穆塞和麥金斯將責任推在老羅斯福身上，避不出面，以免顯露對卑維里支失信的痕迹。

大遠過後，老羅斯福立刻準備重返共和黨；他這種離奇的反覆行動，遭到卑維里支克痛切的批評，他說：「我想歷史上絕找不出第二個這樣的實例，一個政黨或一備選總統如此條件地利用，如此狡猾地自私地被破壞，像這次進步黨之迅速組成與迅速解散一樣。」

在羅斯福新編黨綱會議後，進步黨大會上，卑維里支曾表揚大會主席和主席

黨人。

在一九二二年大選中老羅斯福最有名的一次演講是在哥倫布斯省。在這次演講中，他會太聲急呼主張改革司法法，結果喪失了許多心存觀望的保守派的投票者。他看見風頭不佳，又立刻改變口吻表示他贊同司法改革祇是將來的一種可能趨勢，這一下子好像逆轉果又引起西部各省自由主義份子和一般農民對他的懷疑，紛紛轉而擁護威爾遜。和從前歷次關於公衆問題的演講一樣，老羅斯福這次演講也是預先經過大亨們修正過的。這次演講的作者，係紐約銀行信託公司（摩根所屬）董事長E. C. 康維斯（Converse）。

穆塞和斐金斯二人在一九二二年對進步黨所投下的政治資本共在五十萬元以上，此外穆塞又化費了一百萬元收買紐約新聞報，爲的是使老羅斯福在紐約有一家早報替他宣傳。據老羅斯福告克萊普委員會，他在巡遊全國所用的鉅大開支，也是由他們兩人負擔。總而言之，老羅斯福此次競選一切經費完全是由這兩位專門和塔夫特對作的摩根同幫負責供給。

但據後來發見，穆塞和斐金斯並不是完全自己掏腰包。許多款子係秘密來自詹姆士·斯帝曼、艾伯特·格雷（美國鋼鐵公司經理），但厄爾·索特（美國罐頭公司創辦夫），並兼任摩根所屬越家鐵道公司和銀行董事，查理士·布魯克（新海文鐵道公司副董事長）等人。

民主黨在巴爾提摩的初選大會，經過長時間的投票選舉，詹普·克拉克首先被排擠下去。最初是克拉克佔優勢，經過布利安的積極活動，威爾遜又居上風。

布利安(Bryan)這是第四次參加競選了，他看到克拉克得到赫特，萊安巴樂薩和塔梅社(Tannery Hall)的公開支持，由羨生忌，便想從中阻撓，將克拉克壓制下去。但他沒有料到，威爾遜會坐收漁人之利，克拉克被打下之後，所有選票立刻轉投威爾遜。這個結局完全是在萊安精心策劃之下促成的。

威爾遜的被推為總統候選人，可以說是克里伍蘭·道奇個人的勝利。克里伍蘭·道奇是花旗銀行董事，道奇銅礦和軍火廠的繼承人，韓納·裴金斯以後的幕僚政治牽線人。對於萊安、哈威、威廉、洛克菲勒、斯蒂曼、和摩根公司，威爾遜的勝利也就是他們的勝利。總之，除開喬治·巴克一人而外，所有銀行界的大亨們皆大歡喜。

在初選運動中，威爾遜演講中關於財政和貨幣問題的意見，都是由花旗銀行董事長弗郎克·萬德利普(Frank A. Vanderlip)供給，經過威廉·吉普士·麥加多(William Gibbs McAdoo)往返傳達。威爾遜拒絕和萬德里普會面，使後者頗不開心。這位候選總統很顯然害怕被人發見和金融界往來。

在後推為候選總統以後，威爾遜在斐利·巴樂蒙(銀行家，公司董事，奧格新圖·巴樂蒙之弟)敦促之下，立即聲言主張美國航海輪船有通過巴拿馬運河之自由權，不管



英國方面認爲這種行動係違反一九〇一年海——羅斯福協定的協議。

威爾遜在當選之前，二十年來即爲華爾街所熟悉。道奇與麥克米克都是威爾遜在普林斯頓大學一八七九年級的級友。當威爾遜於一八九〇年回普林斯頓擔任教授時，道奇與麥克米克也因富有之故被推爲該校董事。他們很賞識威爾遜的才幹，便在各方面積極幫助他。

一八九八年威爾遜因普林斯頓薪給菲薄，預備提出辭職。道奇和麥克米克慷慨贊成爲他籌備一筆私人補助經費，要他仍留普林斯頓任教。這年私人補助經費的捐助者除道奇與麥克米克二人外，尚有花旗銀行大股東莫西斯、戴樂、裴恩及倍塞、裴恩等人。一九〇二年，這批富翁又設法推選威爾遜爲普林斯頓校長。在他舉行就職典禮時，摩根、哈威、華爾特·倍奇、克里伍蘭、道奇與麥克米克都以該校董事資格出席參加。

道奇和威爾遜多少年來成爲知交密友，過從甚密。威爾遜的結婚多大皆爲道奇介紹。倍奇(Russell Page)和安得留·卡尼基，向他們爲學校捐款，都是經過道奇的介紹。在一九一〇年之際，道奇和威爾遜關係的密切，正如一八九六年韓納之與麥登案。

到了一九〇二年，一位有力的人物開始與威爾遜結了不解緣。這位人物便是哈普斯兄弟出版社社長喬治·哈威(George W. Harvey)，他對於威爾遜在他書局出版的一「美國民族史」書，大爲賞贊。哈威是一個激頭激尾在摩根——萊安那裏下的人物，他在



一八九九到一九二六年間所出的私人機關報——北美評論，完全是宣傳華爾街前見解與主張。

哈威靈他經過多年鍛鍊的敏銳的政治眼光，幾乎一眼便看出威爾遜是種黨人材料，因而便開始滲透華爾街各大銀行公司的會客室，極力推許和讚揚威爾遜。經過他這樣努力吹噓，果然生效，一九〇四年威爾遜被選在戴里孟尼克的一個私人客廳中和湯姆士·萊安（其稱黨報編輯的摩根代表威廉·拉芬（William Lathin））、紐約南方會社社長約翰·魏茲（John A. Wetzl）及新台登等各金融巨頭及其代表會見，當晚共和黨陸軍部長奎黎胡·陸特，亦應在場。此次會見，在愛德華·米琪爾（Edward Mitchell）紐約大圖報編輯的向憶錄中曾有記述。

在這次會見中，拉芬和陸特的所獲印象，並不見佳。但是哈威靈並不氣餒，仍堅信他已經選中一個未來的美國元首。在一九〇六年在某次羅斯福俱樂部籌款宴會上，所有各黨享有名譽們都應會參加，壓根亦在場，哈威又再敢地提議這位普林斯登大學校長應該破選入白宮。同時他更露骨地在哈普氏週報上替威爾遜太舉宣傳。在一九〇六年五月十日該報竟預言一九〇八年民主黨候選人威爾遜的勝利。

在那年民主黨預選大會上，哈威親自出馬替威爾遜搖鈴。威氏在普林斯登等候消息，真如熱鍋上螞蟻一般；但是結果被布利安捷足先登，他（布利安）第三次取得了候選

資格，同時也第三次證明如果得不到幾個握有統治實數的鉅富集團的許可，總統是難白宮。但哈威仍不灰心，在一九〇九年五月哈著氏選報上又預言威爾遜一九一二年必能當選總統。○年將出任新西州省長，一九一二年必能當選總統。

如果我們要瞭解使威爾遜當選美國總統的許多因素，我們需要在此對於哈威加以簡短介紹。哈威之顯露頭角，有賴於湯姆士·萊安和威廉·魏特尼(William C. Whitney)二人提攜者不少。當克里伍蘭二次參加大選運動時，哈威担任紐約世界雜誌的經理，和萊安與魏特尼二人關係至為密切。一八九一年，他辭去世界雜誌社的職務，改就魏特尼和萊安的京都街市鐵道公司的廣告經理與宣傳主任，該公司大批溢額證券大都係由他經手在社會上推銷。他這種利用報紙為京都公司宣傳的成功，使他成為萊安與魏特尼許多證券市場活動的幕後親信。其實，他的職務很簡單，祇是監督各報所載新聞事實，設法使一般讀者對當時進行的證券交明發生信任，然後再到證券市場去活動。差不過將近二十年的時間，哈威從事這種買賣空賣空的勾當，結果引起摩根公司的注意與信任。

哈威在世界雜誌社服務時，曾居住新西州省，一八八八年被任為該省省長之隨員官，榮膺上校之銜。一八九〇年又兼任新西州省銀行及保險公司的政府監督。○年他和新西州省這許多關係對於萊安和魏特尼在該省所辦電氣、瓦斯等企業活動幫助甚大。他和萊安與魏特尼二人的親密友誼，即由此而起。詹姆士·斯賓斯(James Spence)



就是由哈威介紹給魏特尼的。斯密斯後來被推爲參議員，成爲新舊兩省民主黨的領袖。完全是魏特尼出錢活動的結果。飲水思源他當然不能不感謝哈威。一九二〇年華府月新舊西省民主黨大會，推選省長候選人，斯密斯採納了哈威的建議，設法使威爾遜被推爲候選人。據傳，道奇爲了此事曾送給斯密斯七萬五千元；關於競選經費也是由道奇籌措。結果，果如哈密所預言，威爾遜當選了新舊西省長。

在威爾遜任職省長期內，哈普氏週報更拚命替他宣傳，爲下屆總統競選預做準備。哈普氏週報，大家都知道是摩根集團的機關報，它這種公開誣謗，未免有些令人難以爲情。因此威爾遜會要求哈威不要如此露骨誣謗，據說爲了此事二人曾發生爭執，種種傳說更幫助提高了威爾遜在西部各省民主黨中的威信。雖然如此，哈普氏週報仍舊繼續爲威爾遜努力宣傳，不過表面上和緩許多罷了。

在一九一二年的民主黨全國預選大會上，哈威故意擁護克拉克，但據哈威傳的作者指出，他這種做法完全是爲着迷霧布利安的視線，當布利安設法將克拉克壓下去之後，哈威立刻設法使阿爾巴馬省推選威爾遜；反對威爾遜最堅決的塔梅公司老闆莫萊，也是經哈威努力疏通纔改變態度的。

以「新自由政策」爲號召的威爾遜競選運動異常成功，甚至一般民衆也爲他這次競選經費捐獻不少的零星小款。當參院競選調查委員會調查威爾遜此次競選經費來源時，

他可以理直氣壯地指出係人民自動樂捐，金融界巨頭們知道奇和麥克米克的捐款已被選還。實際上，這奇與麥克米克捐款數違，完全是他們鑒於調查委員會的成立，看見風聲不佳，被迫如此的。但這個事實却更造成了威爾遜清高的聲譽。

自從一九一二年參院調查委員會對於歷屆競選實行檢舉以後，各鉅富以私人名義對於各政黨的大宗捐款，漸形減少。在威爾遜第一屆任內，所得稅法的實行，促進了一般政治捐款的增加。爲了減少所得稅額，各公司銀行競相抬高職員薪金待遇，但有一不成文的附帶條件即各職員應表示「熱心公益精神」，將他們進款的一部捐贈兩大政黨或該公司所指定的慈善事業。在一九一二年以後，各產業金融巨頭們也命令他們的家屬化整爲零，分別參加政治捐獻；因此，他們的妻子、兒女、姊妹、兄弟、諸姑子們，乃至大小隨從僕役都很熱心地解囊捐助歷屆選舉經費。所以，自一九一六年以後，各政黨所獲捐款其數額在五百元至五千元之間者特別多，追究起來，這些不大不小的捐款人十有八九都是和幾個大的家族有關係的人物。

## 二

威爾遜以革新派與自由主義者面目走入白宮。華爾街並未發生激動。正如喬治·哈威後來所說，大富鉅賈們「對於威爾遜先生的言論雖然認爲流於過激，威脅到他們權益

，但並沒有任何敵對的表示。他們知道這不過是他所玩的一種政治手段罷了」。

威爾遜第一屆總統任內，雖是實行了不少無傷大雅的表面改革。安德遜新關稅法案將裴恩——阿德雷士法所訂的舊關稅率削減了百分之十。另外又製訂一個所得稅法案。做爲該項新關稅法的補充法案。依照這個所得稅法規定，收入在三千元以上者僅徵百分之二，收入超過二萬元以上者另徵累進附加稅，但這種附加稅對於五十萬元以上的收入，也只抽至百分之六。於是一般自由主義者們便交口稱讚這個新稅法是限制財富積聚的一個制動機，但實際上各大財富依然固若磐石，未曾因此而影響分毫。亞當孫法案規定，鐵道工人每日工作八小時制，是在全國鐵道工人總罷工危脅之下通過的。

威爾遜在其就職後對議院首次演講中，其詞句的動人，曾使一般平民與自由主義者大爲興奮。他說：「我們對於一切近似特權或任何不合理的制度與規定，必須設法予以廢除」。

聯邦銀行準備法案係在威爾遜第一任內通過的。純從技術觀點來看，這是三條最有積極意義的建設性的法案。不過和所有各項法令一樣，其推行實效如何完全要看執行者是那一種人。聯邦準備制的施行，從最初便操在華爾街的手里。

這個聯邦準備法的通過是有一段歷史的。早在一九〇八年，參議院的感是阿爾德里奇便以貨幣委員會主席資格提出過這樣的提案。貨幣委員會的方案，係來自華爾街的一次

總商會議。一九〇八年秋天，華爾街各大銀行公司領袖及其代表們，忽發雅興，聯翩赴喬治亞海濱伊克島俱樂部去獵野鴨。當時參加者有庫恩羅比公司股東保羅·瓦爾堡 (Paul M. Warburg)，摩根公司經理亨利·大衛孫 (Henry P. Davidson)，花旗銀行董事長萬德星普，上院貨幣委員會專門委員皮亞特·安德留博士 (Dr. Platt Andrew)；銀行信託公司 (摩根集團) 的副董事長班亞民，斯特郎 (Benjamin Strong) 等人。

這次伊克島會議時間頗長，並且對外嚴守秘密。與會者都搭乘阿德雷士的私人專車，旅客概用假名，避免被車上僕役認出。所以，在很長期內，外間還不知道會有這個會議舉行。

這次會議的主題是，各銀行家一致主張美國應有一個中央銀行，像歐洲各國那樣，以便加強大規模統治全國國民經濟的效能。從前美國聯邦銀行曾發揮過這樣的權能，但不久便被傑克遜總統給取締了，因為它將全國龐大金融權力集中在私人手中。

常阿德雷士將這次伊克島會議人討論結果經過貨幣委員會的形式提交議院的時候，立刻遭到各方一致反對，認為是貪鄙的華爾街的一種企圖。當時，這個提案只有暫行擱置。

威爾遜政府的任務就是要設法將伊克島方案的主要內容寫在輝煌的國家法典之上，而不露痕迹。威爾遜將此項法案的起草責任交予保羅·瓦爾堡，也是當年參加伊克島會

議的一人。瓦爾堡會和所有各金融界巨頭會商此事，關於政府方面的意見，他便向威爾遜的私人代表文德華·浩斯上校(Colonel Edward House)請教。

這個由瓦爾堡會同華爾街起草，經過威爾遜與參議員加特·格拉斯在詞句上略加修正的聯邦準備法，骨子裏仍舊依照伊克島鴉鴨人的方案，以創設中央銀行爲主，祇不過披上一些美麗的法文外衣而已。華爾街中有些未參與樞密的方面曾對此項法案表示反對，但美國銀行公會則表示贊同，這是很有意義的。

根據此項法案，紐約聯合準備銀行實際上在十二個各區聯合準備銀行系統中成爲中央總匯，因爲紐約是全國金融市場中心。其他十一家聯合準備銀行行址也都建築起巍峨大廈，富麗堂皇，爲的是迎合各地地方人民的區域觀念，減低他們那種惟恐內地各省受制於紐約的傑弗遜式的感覺。班亞氏·斯特郎被任爲紐約準備銀行第一屆總裁。斯氏也是伊克島會議參加者之一，曾任銀行信託公司總經理。他是高級金融界的一個能手，多少年來代表紐約各大銀行參加處理全國貨幣制度，深得金融界的信任。在斯特郎主持之下，美國銀行準備法在不爲國人懷疑之下，開始和英格蘭銀行與法蘭西銀行建立連鎖關係，因而大大加強了西半球政治現況下的金融組織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大戰以後，華爾街之滾滾利源和財富勢力的迅速膨脹，得力於此聯合準備制者甚大。

在威爾遜舉行總統就職典禮五天以後，摩根公司代表亨利·大衛森和威爾遜·魏特尼

之姆維拉特·威爾特(Willard Straight)到白宮請謁，要求總統准許美國參加六國對華借款團。威爾特拒絕了，這或許是因爲當時他仍偏向於以道奇與麥克米克二人爲代表的一般銀行產業家的孤立觀點。除道奇外，塞路斯·麥克米克，也始終是威爾遜一個最親密的顧問。

威爾遜就職後不久，所遇到的一個最大問題是墨西哥問題。而這個問題又和克里伍蘭，道奇有密切關係，因爲道奇在墨西哥擁有很大的銅礦，墨國內政糾紛，他是第一個幕後策動者。

一九一一年墨西哥獨裁者波非羅·狄亞子(Porfirio Diaz)被逐下野。狄亞子多年來在其任內曾與美國礦業及煤油業資本家如赫斯特、杜亨尼、道奇與洛克非勒等，在互惠條件下密切合作。

據墨西哥油礦公司總經理斐西·費伯在一九一八年對人說，這次驅逐狄亞子的革命運動實際上是由克雷·皮爾斯(H. Clay Pierce)發動的。皮爾斯係洛克非勒親信，他在皮爾斯華特油公司中握有百分之三十五股票，餘百分之六十五又是在美孚油公司控制之下。『皮耳斯想把墨西哥油礦公司合併過來，他要求狄亞子取消油類進口稅，以便美孚油產品從美國大量輸入低銷，但狄亞子拒絕了。於是皮耳斯便接洽弗郎西哥·馬德裏(Francisco Madero)大宗款項，鼓勵他起來革命反對狄亞子』。當時誰也沒有料到後果

如何。

美孚油的傀儡馬樺臺上台後不久，於一九一三年二月十八日又被英國煤油公司的工員維克多羅·胡艾塔 (Victorio Huerta) 推翻，連性命也丟掉了。墨國政治紛紛愈來愈益嚴重。加蘭撒 (Carranza) 及其部下潘求·維拉 (Pancho Villa) 又從北方揚起叛旗，反對胡艾塔。加蘭撒黨人很快便得到克墨伍蘭，道奇和各有關美國資本家們的支持。威爾遜總統從最初便拒絕承認胡艾塔政府。

但後來道奇等美國富豪們鑒於局勢發展日益嚴重，恐惶或將影響他們在墨國境內的投資利益，主張美國應承認胡艾塔政府；只要他答允實行選舉政府，這樣使他們可以有機會安插和他們有親善關係的人物。這個意見書經過南太平洋公司董事長克魯斯尼特交給浩斯上校，浩斯又呈與威爾遜。這個意見書係由堪薩斯省律師哈夫 (D. J. Huff) 草擬，在呈遞華盛頓之前，經過道奇及各有關公司代表人審閱同意的。

威爾遜對此項意見書完全同意，經過外交手續正式通知胡艾塔。但竟被拒絕，原因很簡單，他的後台老板英國煤油公司表示反對。當胡艾塔上台時，英國政府及其影響下各國很快便予以正式承認。威爾遜當時會照會英外相格雷爵士，聲明美國誓必驅逐胡艾塔。

直到一九一四年上半年，威爾遜纔對胡艾塔絕望，知其絕不會屈服於道奇，洛克菲

部正被威頓行將擄之下。於是華盛頓方面便開始若干搖擺行動。一九一四年四月九日，美國水軍在德輝皮隊登陸，藉口補充煤水，實際上是在示威。同月二十一日，美國兵艦奉命炮轟維克羅茲，阻止英國輪船轉送軍火給胡艾塔。略有死傷，財產損失頗重。

胡艾塔在四面楚歌，內外交迫之下，終於是年七月十五日被迫下野，繼任參謀受花旗發行支持的加爾撒氏。但加爾撒氏革命部則發見他也背叛革命時，這些人便在搖盪。維拉領導之下再起反抗。當時美國報紙一致將維拉描寫成爲一個叛亂性成的土匪。一九一五及一九一六兩年，威爾遜曾幾次派遣軍隊幫助加爾撒鎮壓維拉叛亂。

關於道奇和加爾撒互相勾結的經過，一個著名誠實的新聞記者布萊頓曾有詳細記述。據布萊頓調查，一九一四年二月十二日美國政府對墨西哥的軍火解禁，以及後來加爾撒源源獲得大批軍火，都是道奇在幕後策動的。一九一三年五月（在軍火解禁以前），飛力普、道奇公司經理在阿瑞桑那省邊境秘密偷運九萬匣子彈給加爾撒代表，這種違法行爲在國境邊上被巡邏兵所發覺報告政府。檢察官莫里遜立刻對道奇和溫撒斯特兵工廠負責人嚴詞指責，並準備提起公訴。消息傳出後，司法部立即要求莫里遜辭職，但後者拒不受命。十月二十二日司法部長麥克瑞那德又命令莫里遜不得控訴溫撒斯特兵工廠。莫里遜接受了後一個命令，但仍繼續對道奇公司兩個地方職員進行控訴。不久，這個訟案也被麥克瑞那德給撤銷了。莫里遜氣憤之下，給華盛頓拍了一很長的電文，對總檢察



官及司法部的違法覆職表示抗議。在這個電文中，關於此案內幕敘述甚詳。

一九一六年六月伊里諾省代表威廉·羅登堡又公開抨擊道奇會先後依給加蘭撒子彈百萬餘匣。他指出在政府頒佈軍火解禁令的前一天，道奇會赴外交部密談，其中顯有內幕。這種指摘與抨擊，當然更不會有何實效。

道奇的軍火企業對於威爾遜行政確有重大影響。當一九一五年，美國商輪路易西安娜號被德國潛艇擊沉，威爾遜向德國提出強硬抗議，美國華情激昂之時，道奇毅然出任「救濟路易西安娜號殉難者基金委員會」主席。據紐約港收稅員杜得來·弗爾德·馬隆證明，這隻所謂向韓莫爾所載大部份都是運往英國的軍火，並且這些軍火大部份又是道奇所有的溫撒斯特，雷明吞和聯邦子彈公司的產品。

道奇是唯一和威爾遜保持親密友誼，從未發生齟齬的朋友和顧問。他的種種行為在許多方面照穿了威爾遜式自由主義的原形。一九一五年道奇所屬阿瑞桑那省礦工舉行罷工，要求增高工資，礦方會同員許多打手將罷工工人包圍，企圖武力彈壓。但因該省省長洪特的反對，結果罷工勝利。後來在省長改選時，道奇動員他的政治勢力來反對洪特結果，後者以三十一票之差落選！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德皇兩屆威爾遜政府的大事件，美國億萬富翁的繁榮也因此而走  
上了一個新階段。

世界市場被戰爭弄得四分五裂，國內經濟停滯的危機以及由此可能引起社會各階層  
的不安與騷亂，使美國產業金礦界巨頭們竭力推動美國捲入戰爭，而一般農民，工人，  
中產階級及各業知識份子也接受了他們這種戰爭的鼓勵和領導。

正如有些歷史家所指出，這次大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這些因素早在前幾十年便  
在醞釀着關於這次大戰一針見血的問題，倒不是誰引起這次戰爭？也還不是誰使美國參  
戰等問題？值得研究有意義的問題倒是那些人從此次戰爭中大獲其利，並且設法維護他  
們這些利益？事實非常明顯，第一次大戰的利潤大部是歸入百餘家鉅富家族的荷包里。

歐洲各戰勝國雖然拚命將戰爭的負擔加在戰敗國身上，但他們的戰爭利得總不能抵  
償他們的損失與消耗。美國拒絕參加凡爾賽條約的經濟分贓，確是很冠冕堂皇的事。華  
爾街巨頭們當然甘心擁護他們的政治家這種決定，實際是因為他們在此次戰爭前後，不  
但已經從國外，並且在國內大獲其利，造成了空前繁榮與強國的支配地位。

從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美國宣布參戰之日起，到一九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爆發一批  
遠征軍返回國土時止，美國政府共支付戰費三五、四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元。另一方面  
，美國各公司銀行從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到一九二一年七月戰時工業生產活動結束時

止，共獲純利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約等於政府所支出的全部戰費。但是國家職費係由全體人民負擔，而這些公司的戰爭利潤却完全由少數富翁們所獨享。據普求委員會調查，這些公司戰時盈利三分之一以上是屬於「金融托拉斯」支配下的企業。

第一次大戰美國政府公債約達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較之戰前國債增加了三十多倍。政府要想收回這筆債款，只有從重向各公司企業課稅之一途，但自一九二〇年管政的共和黨政府對於富翁們都寧願減輕，亦不肯增加他們的捐稅負擔。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對於摩根公司特別幸運，解除了它當時的經濟危境。一九一四年，摩根統治下的紐約，新海文與哈特佛鐵道公司因濫發債券及從事各項投機，虧蝕達四萬萬元。該鐵道公司證券的慘跌，致使新英格蘭省一般孤兒。寡婦持有是項證券的零星小戶都落得手中幾張廢紙，莫不叫苦連天。據省際商務委員會調查報告，摩根公司曾秘密從該鐵道公司庫存中支去一千二百萬元。新海文公司董事長C. S. 梅隆事先曾警告公司諸董事，紐約。維斯徹斯特與波士頓鐵道公司證券每磅市價尚不值一角，但該公司董事會仍舊慷慨地將這批幾等廢紙的證券從摩根手中以相當高價收買過來，據省際商務委員會指出。從一九〇三年六月三十日到一九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期間，摩根公司使新海文公司的資本總額由九三、〇〇〇、〇〇〇元增加到四一七、〇〇〇、〇〇〇元。

○者，但其中祇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真正投資在鐵道業務上，其餘都經過Union Trust公司用在投機經營上。結果是該鐵路公司一般小戶股票持有人被騙被竊，身受損失，而無可如何。

在一九一四年仲夏之際，摩根公司因為新海文鐵道公司破產而陷於窘境，岌岌可危。但恰在此際，歐戰爆發，摩根公司幸運地被委為英法政府的駐美金融代理人，負責辦理同盟國在美採購大宗軍需。於是這個大金融集團得以轉危為安，又交好運。

據一九三六年尼維參院委員會(Nye Senate Committee)所揭露，當歐戰爆發十幾天之後，即一九一四年八月十日，國務卿威廉·詹寧斯·布利安曾向威爾遜報告，摩根公司擬經過英國羅斯柴爾德銀行貸款與法國政府，徵求政府意見。布利安當時認為金融界私人對交戰國借款，因為利益攸關的關係必然使他站在借款國方面，這樣將使美國難以維持中立。

八月十五日，布利安又寫信給摩根公司，聲明「美國銀行對於正在交戰的外國貸款，顯然與中立國之真精神不符」。這個聲明不啻正式承認美國反對對歐洲交戰國貸款。

但是善於隨機應變的紐約銀行家們，這時便採取另一個途徑去接近華盛頓。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花旗銀行副總裁撒木耳·麥克羅伯特(Samuel McRobert)通知國務

部參事羅伯特·藍辛 (Robert Lansing)，告以銀行希望能夠幫助外國政府在美國市場進行採購物資，以便繁榮美國對外貿易，但這個辦法必需對採購國有充分信用供給方可實現。

當天晚上，正值布利安不在京城，藍辛謁見威爾遜。二人商談結果，認為信用供給和貸款係截然兩事，貸款不可行，而信用租借則可。

第二天藍辛在紐約大都會俱樂部將這個意見轉告摩根公司某代表。兩天後又在國務部轉告花旗銀行代表。在這一一切非正式談判中，道奇與威爾遜的保持密切接觸，是可以想像的。

在藍辛與威爾遜這種非正式意見傳佈出去以後，同盟國政府便經過摩根公司在銀行信用担保之下開始大量在美採購軍需。所有的銀行都參加這項業務，商業銀行以花旗銀行為主腦。

隨着歐洲戰局的發展，德國在各方面戰線上不斷勝利的消息相繼傳來的時候，美國金融危機也跟着一天比一天嚴重。

同時，負責辦理對同盟國金融業務的摩根代表亨利·大衛孫在一九一四年十二月曾通知美國國務大臣路易·喬治，肯定地預言不出六個月以內美國一定會解除對同盟國正式借款的限制的。大衛孫是掌握美國財政金融大權的領袖人物之一，他當然有這種把握。

和權力。果然，過去了六個月零幾天，威爾遜總統批准對英法兩國巨額借款。

爲了在政府方面進行准許這種借款的準備工作，紐約聯邦準備銀行總裁班亞民·斯特郎於一九一五年八月十四日寫信給浩斯上校，以警告口吻指出金鎊對金圓的匯兌比率日漸下跌。意思就是說，英國購買與付款能力日益減低。據尼維委員會推測，英鎊的跌價或許正是美國銀行家和英格蘭銀行串通好的一種手法，藉此來恐嚇華盛頓當局，使他們不得不在維持英鎊匯率的表面理由之下准許對英法實行借款。

國務卿布利安去職，由盛辛升任。八月二十五日，盛辛將芝加哥第一國民銀行董事長福爾干(J. B. Foregan)寫給馬加多(McAdoo)財政部長關於對協約國貸款的信，抄錄一份，呈遞威爾遜，並附上他的意見，認爲局勢已經改變，同盟國政府因在美大批採購軍需所積欠的巨額債款，必需採取相當辦法來維持這些債款。

第二天威爾遜在回覆盛辛的信上說：「簡括說來，關於這個問題余意認爲，『政黨對於此項交涉不應有任何贊成或反對行動』，此意甚是，但至少就我們這方面來說，此項意見祇能口頭傳達，不可見諸文字」。意思就是說不要彰明瞭著，免露痕跡，貽人口實。

在敘述對同盟國公開進行貸款以前，讓我們先回顧一下在一九一五年四月間摩根公司大股東湯姆士·拉孟特(Thomas W. Lamont)在費拉德費亞省美國政治社會學院，

曾發表過一篇演講。這篇演講未在報上發表，尼維委員會也未加注意。

但是這個沒有發表的演講，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它證明了銀行家的希冀歐戰延緩下去，以便獲取最大的可能利潤。在詳細說明大戰發生後金融情勢的變化，及美國出口貿易的空前增加，拉孟特很興奮地在他的聽衆面前指出美國將一躍而爲世界金融中心的光明遠景。要發展到這樣的局面，其可能的決定因素，拉孟特認爲：

「另一個因素（這要看戰爭是否延長），就是我們可以將那些遠握在外國投資人手中的證券收買過來。……如果我們能夠繼續大量收回這些證券——這種機會就要看戰爭能否延長到足夠的時間容許我們這樣做，那時我們就可完全脫離了每年以繳付利息方式向國外付出大宗現款。……以後我們所支付的將是內國公債的利息，交在我們自己國民的手裏，而不是付與外國人。這樣的發展，在我國財政方面是有極項重大的意義的。」

「第三個因素，也是依靠戰爭的繼續和延長，那就是我們將來能否在真正大規模之下成爲對外國的貸款人。剛纔我已經提到，自歐戰發生以後，我們已經直接貸給外國政府約二萬萬元。但比較來說，這個數目不能算大。我們是不是要成爲對各外國政府真正大規模的債權國呢？我們是不是要成爲對南美洲或世界其他各地的私人或半官性的企業——這些企業直到今天仍在英、法、德各國資本支配之下——的債權人呢？如果戰爭延長到足夠的時間幫助我們走上這樣的有利地位，如果我們能有充足的資源掌握在我們手

籌，那麼毫無疑問地我們必能由債務國一躍而為債權國，並且這樣的轉變遲早一定可使美金代替英鎊，成為國際匯兌的標準貨幣」。

拉孟特這篇演講，如果參照尼維委員會所舉發的各項證件來讀，實具有第一等的歷史意義。這篇講稿第一次在白紙黑字上寫出摩根公司和華爾街各大銀行家所以督促美國政府走上它後來所走的道路，一種露骨的自覺的經濟動機。

當美國聯合華備銀行拒絕對英國戰時支票及購貨單實行再貼現時，拉孟特曾建議英格蘭銀行以停止採購來報復，結果引起整個工商界的恐慌。此後不久，威爾遜便以上述迂迴方式准許各銀行對同盟國進行大量貸款。

一九一四年年尾以後，直到一九一五及一九一六年整個時期，各大財富巨頭，和他們的代言人，在報紙雜誌，講台與課堂各方面，公開宣傳贊助協約國，反對德國，積極進行，不遺餘力。特別是新聞界更竭盡全力促成這種輿論準備。

在威爾遜總統准許對同盟國貸款以後，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五日，在以摩根公司為首的各大銀行代表團發行對英法貸款債券五萬萬元。購買是項債券最大的戶頭為摩根輪船兄弟（鋼鐵業），詹姆士·斯蒂曼，J. P. 摩根，喬治·巴克，安德留·卡尼基，維森·阿斯托，奧爾康·海提·格林·威廉·克拉克（煉銅業），班茨萊姆鋼鐵公司老闆查理士·施達布等。第一年貸款撥出六萬二十萬元，第二年直到一九一七年初，又撥出



六萬萬元。所有各大保險公司，銀行與公司在他們華爾街老闆督促之下，都紛紛購買此項債券，以致全國金融財政都被交織在協約國戰爭機構之內。

到了一九一七年春季，協約國積欠美國銀行債款共達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同時軍事方面也被德國打得焦頭爛額，到了岌岌可危萬分嚴重的境地，一般人均認為協約國的借款信用已達最後限度。是年三月，俄國發生革命，沙皇政府倒台，解除東線上的壓力，使德國軍隊更得以集中於西綫打擊英法聯軍，這又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一九一七年三月五日美國駐英大使華爾特·辛尼斯·倍奇拍一長電給威爾遜總統，他說：「我認爲目前最嚴重的危機，絕非摩根對英法政府財務代營機關所克勝任。現在的需要異常迫切，任何私人機關絕難應付，因爲這樣的私人代理機關勢必引起各方面同業的嫉妒與競爭，以致影響事務之進行」。他認爲未來局勢對於美國產業金融前途不容樂觀，但是「如果我們對德宣戰，則我們給予同盟國最大的援助就是這種貸款信用的保證。在宣戰以後，我國政府可以對英法貸款實行大量投資，或負責担保。……」。最後，倍奇以警告口吻指出，除了參戰以外便祇有坐視國內經濟崩潰之一途。

四個星期之後，威爾遜總統要求議會批准對德宣戰，表面理由是敵人的潛艇非法活動危害商輪運輸，議會除開很少幾人而外，立刻將此案通過。

美國參加後，所發行的第一期自由公債，其中有四萬萬元無償給摩根公司，用以抵

債務政府對該公司所欠的借款！在參戰這個期間內，美國借給歐洲的貸款共達九，三八六，三〇〇，〇〇〇元，其中四，一三六，〇〇〇，〇〇〇元，貸予英國，二、二九三，〇〇〇，〇〇〇元貸給法國。美國參戰，使政府得以動員全美國民的信用支持協約國。它不但幫助了美國若干鉅富家族離國避之，並且又給他們展開了一個新的發財機會。

歐洲各國並沒有從美國國庫中借到一個現錢，他們所拿到只是各種戰爭物資。得錢的是那些美國產業的主人。他們利用這筆巨款去擴大全國產業設備，增殖他們財富的規模，同時也就提高了他們的權勢。一句話說來，美國政府所發行的戰爭公債，只不過將錢從全國人民手裏吸收過來轉交到那些擁有銀行和產業的鉅富家族手中而已。

雖然後來歐洲各國對於他們的戰時及戰後借款未能如約全都償付，但是他們（除了俄德兩國而外）對於欠與美國各銀行和銀行家的債務却全都償清。一文不少。歐洲各債務國很早便可以清償他們的借款，不過需要用貨物來折價。但對於用貨物的償債任何方式，美國銀行家和產業家們都經過他們的議會代人和白宮政府，表示堅決反對。

## 五

在戰時緊急局勢之下，金融產業界重要人物和他們的代表紛紛在政府中各部就任要

職。當然，有許多人很早以前便積極活動，引導美國走向戰爭。

負責接洽英法行借款的摩根代表亨利·大衛孫，在一九一五年曾出資創辦一個民間航空隊。——「第一沿海航空巡邏隊」，附設於耶魯大學。一九一五年里昂德·伍特將軍在紐約開辦商人訓練營，班拿德·巴魯首先捐助一萬元，積極代向華爾街籌集經費。摩根公司各大股東立刻參加贊助。萬德比夫人捐給紐約國防軍一個救護列車。老羅斯福、亨利、洛奇、奈黎胡、陸特及其他摩根公司的忠實同夥，在威爾遜感覺全國一致支持他以前便早已極力要求參戰了。

華爾街把這次戰爭認為是一個有利可圖的大好機會，各方面理由都是很明顯的。在一九一六年尾，證券交易市價比一九一四年平均上漲了百分之六十。對於證券持有者和各銀行，一九一六年是美國有史以來空前繁榮的一年。例如，一九一五年杜邦公司經過摩根公司收到英國貸款一萬萬元，他便用這筆巨款來擴充它的炸藥廠；在很短期內，杜邦家族在美國工業界中立刻從第三等地位躍升至頭等的領袖地位。生鐵價格在一九一四年購五十三元一噸，到了一九一七年漲到九十二元。在一九一三年，班茲來姆鋼鐵廠未交貨的定單僅有二四，八六五，〇〇〇元，到了一九一四年尾，增至四六，五一三，〇〇〇元；在一九一五年竟達一七五，四三二，〇〇〇元，一九四年軍火出口總值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一九一五年增加到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一九一六年，又增

至一，二九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在美國參加戰爭以前，華爾街已經賣給協約國各項物資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當銀行界將他們從事戰爭營業在財政方面的冒險，經過督促政府對總官職的辦法，轉嫁到全國人民身上之後，這些大富巨賈們「激於愛國熱忱」，都感奮願把政府行政權力握在自己手裏。當時政府也不反對他們這樣做。所以，戰時政府各項關係重大的職位，特別是那些關係採購方面職務，都保留給華爾街的愛國志士。絕非偶然。大部份重要任命，威爾遜事先都徵求道奇的意見。大衛孫之被任為美國紅十字會會長，毫無名望的巴魯(Bernard M. Baruch 銅業證券的投機家)之榮任權力極大的戰爭工業管理局局長，都是道奇一手舉薦。

巴魯就任戰時工業局局長以後，每年化用政府經費平均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在他的所屬機構內(包括各種委員會)盡量引用華爾街的金融界，投機家和他們的代表。該局人事及行政，在戰後曾受到衆院格加罕委員會(Graham Committee)的嚴厲指摘，巴魯亦因此撤職。

所有各戰時工業的購買委員會，各會委員十之八九就是各該工廠的經理或重要職員，他們對於產品評價都是根據成本加利潤的辦法計算。據後來調查，所購產品成本費本身都是盡量溢報，以便隱藏超額利潤。

萊安任陸軍部次長時，摩根夥友其德華·斯台提諾斯 (Edward R. Steettinus) 亦在該部內服務，負責監理協約國在美採購軍火事務，一直到美國正式參戰。摩根的另一個夥友羅素·萊芬威爾 (Russell Leffingwell) 在馬加多之下任財政部次長，他經手委託摩根公司代表德外特·馬羅 (Devight Marrow) 為新賓西省國民戰時儲蓄委員會主席。同時馬羅對於運輸方面雖無任何經驗，也被委任盟國戰時運輸處委員，負責分配運輸各國的噸量。赫伯特·胡弗 (Herbert Hoover) 倫敦各礦業公司推銷經理，被任為全國糧食管理部部长，花旗銀行董事長萬德比，被聘負責主持全國戰時儲蓄郵票運動。國家銀行副總裁撒本耳·麥克羅伯特兼任法規整理委員會主席。湯姆士·萊安的法律顧問保羅·葛拉威次 (Paul D. Cravath) 被委為美國駐歐參戰代表團顧問。

紅十字會派赴各國的服務團，完全是政治意義的，各服務團領袖都是和華爾街有密切關係的人物，他們在紅十字會名義之下，進行各項有利於華爾街戰爭目的的活動。

意大利服務團領袖為莫飛，他的主要使命是提高意國的作戰情緒。意大利自經加波瑞多大災禍以後，人民生活困苦顛連，厭戰之心日增，莫飛利用紅十字會的救濟工作，緩和了意國內部這種危險情緒，使革命危機得以減小。派赴俄國工作的紅十字會領袖人湯姆生上校 (William B. Thompson) 與魯賓上校 (Raymond Robins)，他們自己便公開承認，他們是奉行陸軍部的政治任務的。他們在俄國最大的成就是在全俄社會民主黨

大會中賄賂了足夠的代表，幫助克倫斯基不致倒台，以便推動俄國繼續戰爭。此次代表大會的活動費共有一百萬元，均由湯姆生慨然捐出。在他留俄期間，湯姆生經常和拉孟特與馬羅電報柱運。他和克倫斯基政府秘密談判結果爲他自己和他的朋友們獲得了許多資產和讓權。

湯姆生和紅十字會的目的是阻止俄國單獨與德媾和。當俄國革命黨人民不顧一切宣佈和平時，湯姆生立刻變更宗旨，設法阻止俄國供應德國物資。紅十字會捐贈大宗糧食和現款給反德主戰派，而對於親德反戰的極左派則分文不予捐助。

胡佛的戰後歐洲救濟委員會，也具有同樣的作用。糧食及各種物資救濟大量送給法國政府，絕不接濟自由派和過激派政府。

直到大戰結束，那些金融家政客們仍舊擔任威爾遜，寸步不離。在巴黎和會席上，巴魯坐在威爾遜身旁；拉孟特也以財政部代表資格出席參加，威爾遜國際聯盟計劃書中的金融部份，便是由拉孟特草擬。威爾遜對於他們的意見幾乎完全言聽計從。凡爾賽條約的祕密草案，在美國參院看到以前，便已經送到摩根手裏。

歷次戰後國際金融會議，都是在摩根公司操縱支配之下，戰後重要國際債券，連兩次賠款借款，都是由該公司經手籌集。第一次世界大戰使摩根公司洛克菲勒及梅隆銀行各鉅富集團的權力陡然又增大了幾倍。

從美國鉅富家系的個人觀點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確是南北戰爭以後唯一最有積極意義的大事件。

## 第五章 金融資本與政治（一九二〇——一九三二年）

在一八六〇——一九〇〇年這個時期，美國工商資本家們，不管他們所用手段如何，不管他們所造成的浪費與損失如何他們究竟成了不少的巨大的建設工作。但在一九二〇——一九三二年這個期間，他們的子孫後裔與繼承者的貢獻則祇是限於投機取巧，不斷的組織各種名義的托拉斯和持券公司，發行種種花樣的空頭證券與債券。在這樣情形之下，操縱、串通賄賂等政治上的種種弊端更乃當然之事。

在一八九六年到一九二〇年時代，歷屆總統治下的政府，雖然主要的只是為少數特權利益服務，但多少還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戰後三次共和黨政府則每况愈下，轉納斯手創的黨紀已蕩然無存。

戰後銀行資本的勢力愈趨鞏固和強大，一九二〇年後三屆共和黨總統的當政完全是銀行資本家一手造成的。當一九二〇年共和黨初選提名時，最初各鉅富家族以他們的銀行為代表，大部份擁護里昂·伍德將軍(Leonard Wood)。伍德繼任美國駐古巴及菲律賓第一任代表，頗著功勳。但不幸伍德這種金融界背景恰在投票前夕被人揭露，立刻失掉了號召力，以致功敗垂成。原來擁護他的人轉而投票贊成哈丁。

自從一九一八年共和黨在議會大獲勝利以後，大家都看出下屆大選民主黨前途黯淡



，很難繼續保持選民擁護，同時在花旗銀行支配之下的威爾遜「鋼鐵政權」，將被另一個「汽油政權」所代替，亦為極明顯的趨勢。大戰時期汽車工業的蓬勃發展，很清楚地顯示石油業將在一切產業中取得優勢。亨利·福特廉價汽車的驚人成功，指出了汽車工業可能開展偉大的市場需要；各種刊物如華爾街月報便早已預言不久將是一個汽車專制時代。

在威爾遜執政時期，汽車製造家們曾努力設法爭取聯邦公路建設法案的通過；在道爾法案之下，國庫撥款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興築全國公路網，表面上說是為了幫助農民，實際上是為促進新興汽車工業的發展。

金融資本為要保持它在此次大戰中所取得的支配地位，要求政府實行某些特殊政策。已經表現出來的如：對戰時暴利企業的放任政策；減削戰時所得稅的稅率；在聯邦壟斷制度下信用機構的發展，以便利投機事業和幫助剩餘資本流入基本工業的活動；政府管理金融與產業的延緩施行等等。

前兩項政策很快便見諸實行，但逐漸地發生了一個矛盾和困難問題急待解決。對於大財富所得稅的減輕與豁免，使國家財政陷於困難境地；而國家財政的健全與鞏固對於各大私有財富的福利又有密切不可分離之關係。

那麼這個矛盾和困難應該如何解決呢？經政府當局和金融產業界領袖苦心焦慮的結

果，終於想出一個兩全的辦法，那就是決定在國內市場上發行幾萬萬元外國證券，來抵償平官商零量小戶積存的儲蓄款；由這些外國債券吸收來的現款再轉賣歐洲及南美各國，使他們得以繼續購買美國貨物；同時，更重要的是，這些債券又可以用以平衡美國與各國政府間的債務收付。在這個辦法之下，使一九一七年產業金融資本家們爲了保障自身利益，轉嫁到政府身上的財政危機，因而得到了部份解除。

所有一切對私有財富的限制完全取消。政府不但加限制，反而與財政資本協力合作，特別是在聯邦準備制度的運用上，各種投機企業，持券公司，投資托拉斯，抵押商行，與各種證券交易所活動，更加魚得水，空額活躍。

一九二〇年的大選，民主黨一蹶不振，與共和黨相形之下，幾乎說不上競爭。當時該黨總統候選人係一位俄亥俄省的政客，報業經理兼著名汽油公司股東——詹姆士·考克斯 (James Cox)。副總統候選人爲弗蘭克林·D·羅斯福。考克斯，係國贊助威爾遜的國際聯盟計劃而出名。雖然在擁護他競選的主要人物中有摩根公司的拉孟特，但當時在關於國聯問題上，摩根集團已經分裂爲兩派，所以連拉孟特許多同夥都反對考克斯當選。

共和黨哈丁之被推爲總統候選人，係由湯姆生和哈威二人首先提議主張。早在一九一九年，狡猾的哈威便獨具慧眼，選中了哈丁。當時他曾在許多朋友面前，秘密寫下他

認爲可以獲得初選的總統候選人姓名，裝在一個信封中，封存起來，在該黨預選大會過後，將信封當衆打開。那個人名字果然正是華倫·加馬柳·哈丁（Warren Gammahel Harding）。

從一九一九年初起，華爾街在辛克萊煤油公司的威萊·海斯（Will Hays）主持之下，便開始爲共和黨籌集競選經費。所有各銀行公司的經理董事，與重要職員都有捐獻，每人自一百元至一千元不等。

自一九一九年正月初一到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共收集二，三五九，六七六元，爲總統候選人個人所收捐款尙未包括在內。據參院委員會及有關各方面調查統計，共和黨此次大選經費所收各方捐款，已知者已達一千萬元（摩根·洛克菲及萬德比等巨頭向來捐獻數目最多，而此次竟查不出有他們的名字，殊爲可疑），而民主黨經費僅有二，三二七，七五〇元。兩黨的勢力懸殊，於此可見。

在哈丁被提名爲候選人的前一天，在布萊克斯東大飯店的喬治·哈威房間中，曾開覆舉行秘密會議，與會各大財富的政治代表如亨利·洛奇（摩根），米迪爾·麥克米克（芝加哥國際農具公司），李德·斯木特（島特糖業公司），紐約省的革德汝茲（摩根），康乃克蒂克省的壽郎克，布蘭底吉（摩根）等人，都是參議員；不是參議員唯一的一人約瑟夫·格隆威，也是代表潘羅斯參議員，係因病在費拉德費亞省，但仍經常和哈威

的旅舍通電話，交換意見。

當晚哈丁曾被邀親赴時威旅舍說話，與會各代表很鄭重地徵求他意見，是否能夠擔任白宮之職，他也很鄭重地表示願謁誠以赴。於是事情就這樣預定了。當時哈丁與舊之餘，曾要求參議員黑羅姆·約翰遜 (Hiram Johnson) 担任副總統一職，但後者躺在床上一根根地翻身轉過去，拒絕這個榮譽。

在預選大會上，哈威雖然不是代表，沒有出席參加，但整個會議的程序都在他直接影響之下進行的。出面的各重要人物如愛伯特·格雷，亨利·大衛孫，拉孟特·賓西拉，凡尼亞鐵道公司董事長阿爾伯特·李德，梅隆、巴克、萬德、里普等大亨們都和大會主持人及重要職員取得密切聯繫，隨時商洽。大會每天的議程都是經哈威和這些大亨們順先決定。

在哈丁被提名為總統候選人通過以後，那些幕後策動家們又決定推出柯立芝 (Calvin Coolidge) 為副總統候選人。本來威西康辛參議員李恩洛特提名在先，但大會主席洛倫採取靈敏手法，出奇制勝，設法將這位摩根集團內定的候選人先行提出通過。和考克斯·塔夫特與麥金萊一樣，哈丁也是被俄亥俄美孚油捧起來的人物。當他從一個小城鐵報紙發行人，被選為俄亥俄省議員 (一九〇〇—一九〇四年)，再被任命為該省副省長 (一九〇四—一九〇六年)，後又升任參議員 (一九一四年) 的時候，完

奎是洛克菲勒與韓納政治力量一手提攜扶助的結果。所以有人說他是美孚油代表，他的政權充滿了石油氣味絕非偶然。

柯立芝更顯然的是摩根集團的一個工具。最初他歷任北安普頓市市長，一九一三年任麻省議會主席，都是羅雷，克里因（Murray Crane 美國電報電話公司董事長兼其他幾個摩根公司董事）和馬羅積極活動的結果。德外特·馬羅，和柯立芝原係阿姆赫斯特學院同班同學，一九一五年柯立芝任麻省副省長，兩年後又升任省長，更是馬羅一手促成，一九一九年波士頓警察罷工，柯立芝毅然實行鎮壓，頗為當地一般保守派所欽佩。因此馬羅和芝加哥方面在此次大選中曾認為他應被選為總統候選人，但未成功。

一九二〇年民主黨的初選大會，馬羅在芝加哥極為活動，他的住所裏也成了幕後策動的大本營，不斷與各方代表接洽和爭辯。當哈丁提名當選的消息傳來時，他曾寫信給拉孟特表示不滿。

哈丁大選獲勝以後，哈威立刻居於優勢地位，成為政治上紅極一時的人物。也可以說，哈威是當時白宮的真正主人。哈丁總統曾請他出任國務卿一職，但他表示拒絕，寧願就任駐英大使。哈丁就職後，他的關員名單曾打長途電話給當時駐在紐約的哈威，徵求他的同意。

直到他去世以前，哈丁總統經常和哈威通信，許多事都徵詢他的意見，即在哈丁死

幾月哈威對白宮的影響仍未稍減。柯立芝也是不斷和他通信；當哈威辭去駐英大使一職返國以後，他仍經常出入白宮與柯立芝會談，有一次柯立芝曾寫信給他說：「吾兄隨時有在何意見，至祈不吝見教」。

由於亨利·弗力克的推薦哈丁任命安德留·梅隆 (Andrew W. Mellon) 為財政部長。在以前，梅隆在社會上尚不出名，雖然自一八七一年以後他已經是美國五大鉅資之一。美孚油公司法律顧問查理士·伊凡·胡夫斯被委為國務卿，顧保哈威的主權。

胡夫斯與梅隆是哈丁政府中兩個最重要的角色。一個負責辦理外交，管轄聯邦儲備和聯邦市場分配問題最為微妙複雜，折衝樽俎之間，亦煞費周章。另一個負責整理國庫財政金融，也是一個關係重要的工作。無怪洛奇在一九二三年對巴蘭說：「金融界對於哈丁非常滿意」。關於職債處理問題，巴蘭曾引證胡夫斯自己的話說：「鄙人與洛奇先生相知甚深，現在在徵詢摩根先生的意見」。

此外，哈丁政府的重要閣員如陸軍部長魏克斯 (Senator Weeks)，傑敏士頓及貝斯總理，和摩根有密切關係。郵政部長海斯 (Will Hays)，係辛克萊石油公司法律顧問。赫伯特·胡佛經過羅生與拉孟特的推薦，被任為商務部長。羅生、道奇、哈雷、辛克萊與杜翰尼的密友參議員阿伯特·伐爾 (Albert B. Fall) 被任為內務部長。米爾干省上議員艾德文·丹白 (Edwin B. Penby) 任海軍部長，愛歐華省議員亨利·華拉

兼(Henry A. Wallace)任農業部長。司法部長道赫提(Harry M. Daugherty)，是哈丁本人選定的。

除了本人，還有一批私人顧問，一般人識之爲「撲克內閣」(Poker Cabinet)，包括梅隆、哈威、威爾、海斯、威爾、施瓦普、哈雷、辛克萊、威廉、李格雷(芝加哥口香糖公司老闆)、華爾特、蒂格爾(新西美孚油經理)等人。總統這批私人朋黨聚會，頗引起華盛頓各界的談論。後來提拔東油田舞弊案發生，經議會調查，又發覺K街一幢綠房子係總統和他的接見朋友經常聚會之神祕處所。

據老羅斯福的女兒阿麗孫·郎沃茲(Alice Longworth)訪謁白宮之後所說：「聽到許多傳聞，由於好奇心的驅使，便想親自觀察一下事實是否如此。事實證明所傳果然不虛。總統和道赫提、賓斯、斯奎斯、阿里克斯、莫爾等一密友歡聚在一個小客廳裏，滿室煙霧迷漫，茶盤上擺滿了各種牌子的威士忌酒(當時聯邦法律實行禁酒)，每人手裏拿着撲克牌和籌碼；衣襟敞開，腳放在桌子上，痰盂放在一邊」。

哈丁就職以後整個政治就在這一羣撲克閒黨掌握之下進行。胡夫斯的成就是和各協約國磋商戰債償付問題的解決途徑，以後列強海軍縮減的談判；雖然這些事情也是爲着一種當翁們的捐稅利益，但比較起來，總算是一「乾淨的」工作。梅隆與高彩烈地開始運用國庫管理大權。伐爾和丹百，經過總統的同意，准許辛克萊——杜翰尼——美孚油聯

合公司開發建設海軍社田。海軍建設所有機關華爾街舞舞和職時營私圖利份子的案件，同時對於勞工組織則極盡鎮壓取締之能事。

最值得注意的是胡佛利用商務部職權，幫助壟斷企業大規模的發展。在大戰期間，從前取締托拉斯種種措施完全停止施行，甚至連表面上維持托拉斯壟斷壟斷壟斷的委覺也放棄不用。在胡佛主持之下，托拉斯運動採取了一個新的形式更普遍的向前發展。在大戰期間，各種企業發起組成了近四百多個同業聯合組織，政府不惟不加干涉，反而積極加以贊助。

在這樣情形之下，壟斷和托拉斯化已達於最高階段。直到一九二七年，經胡佛與商務部的安排，所成立各種商業協定共有二四三起，都具有聯合抬高物價，加重最後消費者剝削的作用。此外，胡佛這運用很機巧的方法，幫助大財官們大賺其錢。例如，在他任職商務部長的初期，他曾錯誤預言是年糖產歉收，以致影響糖價上漲，糖業托拉斯在三個月內獲利達五千五百萬元。

在梅隆主持之下，財政部對於各大財官們所減免的所得稅超過六十萬萬元以上。在他到任之前，從來沒有過減免批發業捐稅的事。梅隆的減稅詳細計劃，係由財部副秘書巴克·吉爾勃(S. Parker Gilbert)草擬，後來吉爾勃加入摩根公司。

另一方面，梅隆對於一般零售業和企圖普遍實行加稅，這種政策顯然是要增加中下社



會人民負擔。此類計劃雖然在梅隆策動之下經過哈丁，柯立芝和胡佛幾次提出議會，但終因參議院兩黨反對派的堅決反對，未得通過。

當梅隆就職之初，一般大富翁們正在爲國家徵收戰時過分利得稅問題，甚感苦惱。當美國對德宣戰的時候，議會曾通過一個法案，決定以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公司收稅爲基礎實行徵收過分利得稅，其辦法如下：凡收益超過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基礎百分之十五者，過分利得稅徵至百分之二十；超過百分之十五以上至二十五者，抽百分之三十五；超過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三者，抽百分之四十；超過百分之三十三以上者，徵至百分之六十。儘管徵收這種含有取締的捐稅，各大企業在照章繳付之後，其所獲利潤仍甚鉅大。對於個人收入，該項法案亦規定加徵附稅；凡個人收入每年在八千元至五十萬元者，加徵百分之二至三，收入在五萬元至十萬元者，加徵百分之十二至二十四；在十萬元至二百萬元者徵百分之二十七至五十二；在二百萬元以上者，抽百分之六十三至六十五。

一般富翁們想出許多巧妙方法以逃避此項捐稅。一個辦法是投資於免稅的政府證券。聯邦證券供不應求，各省及地方政府便在銀行家督促之下也發行了許多各種免稅證券。其他逃稅的方法或投資海外；或宣佈股票紅利，將現金收益轉化爲盈餘留待以後分配；或大興土木，建造並不必要的工廠、旅舍、和辦公室；或發給公司職員過高薪俸；或

從稅務法律技術方面（如私人持券公司等），求避免徵稅。戰後富有階級的收入雖然顯著增加，但在一九二二年收入在三十萬元以上者所繳所得稅僅三六六，〇〇〇元，和一九一六年實行戰時捐稅法以前的是項稅收一，〇〇〇，〇〇〇元比較起來，反而減少了兩倍！

然而梅隆對於這些逃稅弊端並不加制止。直到各方不斷指責和要求，財政部纔起草一九二一年的賦稅法案；可是在這個法案中過分刻得稅的規章却完全取消了，一年之內使各大公司股東省下了一，五〇〇，〇〇〇元。對於個人收入附加稅，梅隆主張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廿五，結果議會通過由百分之六十五減至五十。議會這點讓步並不能滿足梅隆及其擁護人的慾望，到了一九二三年又遞過了補充法案，再度減低對富戶的稅收。一九二四年財政部提出的新稅案要求將附加稅在由百分之五十減至百分之廿五；這種提議是太露骨了，連一向馴順的議院都感覺礙難接受。折衷結果，改訂為百分之三七。五，而遺產稅凡在一千萬元以上者都由百分之廿五增至四十。梅隆仍覺憤憤，勸促柯立芝使用總統否決權，推翻此議案；但總統參酌其他方面意見，沒有接受他的勸告，仍舊批准原案。

一九二六年梅隆又提出新法案，經柯立芝簽字批准。在這個新法案中規定：個人收入附加稅最高標準減到百分之二十；基本稅率定為百分之五；財產贈稅及遺產卡專

稅完全撤銷。到此為止，梅隆在其財政部長任內幾度實行減稅政策的結果，據官方統計，每年替各公司和私人富戶，一共省下了四十萬萬元，而完全豁免的部份尚未包括在內。

假使這些政策能夠適可而止，後來的僵局也許可以避免。然而梅隆意志異常堅決，一定要做到對於大私有財富的捐稅實際完全取消，方肯罷手。財政部自己都駁認，自梅隆上台以後，國內稅務若採取一種對於租稅法的「自由」解釋政策，准許免繳一九一七年以後所訂的新稅。在某一個時期，曾有二萬七千多個律師，會計師和租稅專家應集華盛頓處理各種呈請減稅或免稅的案件。

這種局面不久引起參院成立特種調查委員會，由米其干省參議員詹姆士·庫贊（James Corzens）任委員會主席。在庫贊所查的條件中，有一件是關於鉅礦公司的。一九一三年威廉·湯姆生以一萬元代價買進該礦，一九一八年却以六十萬價格賣出，盈利率達百分之五千九百餘，然而財政部對於這個財產轉移却完全沒有收稅，因為根據一個非常牽強的理由，認為此項財產最初轉移時實際上即值六十萬元，故不應課稅。

在其第一屆四年財政部長任內，梅隆對他本人退還稅款四〇四，〇〇〇元，僅次於退還約翰·洛克菲勒之稅款四五七，〇〇〇元。在收到發還稅款的各大各公司中，美聯鋼鐵公司領到二七，〇〇〇，〇〇〇元。截至一九二四年年底止，財政部發還稅款名單

記簿裏有一萬餘頁。到了梅隆去職時，這個記錄差不多又增加了兩倍。許多實例當然無法在本書中一一引證。

梅隆對庫贊和參議院自由派份子揭露一九二三至二四年稅收黑幕的舉動，自然深惡痛絕；經過多方努力活動結果，他和柯立芝終於達到目的，使這種不愉快的行為停止進行。事實上，庫贊調查委員會也沒有力量將所有稅收的曲折複雜內幕詳細澈底揭發。不過，庫贊委員會的報告，却非常明白地證明財政部在這位皮特斯堡銀行家和鋁業大王（指梅隆）主持之下，幾乎所有每項稅收都有可疑之處。在梅隆治下，財政部發還撥款總額共達一，二七一，〇〇〇，〇〇〇元，其中有七百萬元歸入梅隆私人荷包，一千四百餘萬退給了他的公司。在免稅，減稅和降低稅率各種方式之下，差不多有六十萬萬元等於從國庫收入中流入私人手裏。這個龐大數字，使國債當然更加增大，而另一方面也使私人的戰爭利潤至少增加了此款的一半數，因為戰時大宗收益之一便是靠這種種租稅的逃遁。梅隆對於他加在國家財政身上的這種破壞與困難，仍不壓足。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他和胡佛總統又宣佈下年度（一九三〇年）對於個人和公司賦稅再減百分之一，合計減稅公司稅收共減一萬萬元，私人捐稅共減六千萬元。

梅隆在財政部各種工作進行中使用各種手腕以遂其私慾。在他的任內，他不斷地向社會宣傳國家收支極差甚鉅，財政赤字問題極為嚴重。他這種聲明，影響所及，使選民

軍人和居民不能不繼續請求政府津貼和經濟。在全國普遍要求補救和增加津貼的運動中，梅隆總是預告國庫虧欠，而實際上每年均有盈餘。但自一九二九年起，由於經濟大停滯，他時時他又預言可以預備金為的基礎將被激發，而政府將增加所得稅與遺產稅。

一九二九年他陷於嚴重悲憤的時機。他曾經對勞倫斯說：「我將不再繼續政策幾年代實行種種政策之錯誤，否則則國家債務早可掃清，但國庫在此困難時期可以負起與應負之責。」可命比亞大學教授，著名財政專家賽格羅德士(S. H. Hoopes)以此時梅隆痛斥梅隆徵收遺產稅與所得稅減少，以至國庫收入中出奇的不足。

梅隆的積極政策，對於一九二四至二九年時投資繁榮，不啻紅火上加油，使老實人瘋狂，因為稅收與稅利是使私人資金增多，而這些過剩資金大部分不能找到正當的權力的繼續出路，於是紛紛集中流入股票市場，或投資於勞資與抑挫所，或虛擲於種種的奢侈享受，而這些企業在恐慌到來後，又均紛紛陷於崩潰之境。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哈丁病死於任內。雖然死非其時，但對於政府政策並未因之有何改變。

去請示下院核以請受選以副總統資格代理總統職權。一九二四年大選，柯克之管理權在  
可謂極其妥當，其關係極其密切。其任內金銀貨幣市長的查爾士·C·威爾遜（Charles C. Wilson）  
（Charles C. Wilson）。

其次，選民們是馬克·華納法投起來的。他的出名，除有名的選民新時狀言對名譽士是種  
單張的以外，就是在俄國小國亦有感。華納門（Warren）銀行經理亦曾開過  
二國。

其次，羅伯爾與新黨首領之區，一九一〇年曾運動當選為伊黎諾斯省參議員。羅曼西米  
林德爾（Lindell）與法蘭西（Franco）供給。因海尼斯與共和黨另一一五號案與米古積  
有關係，故他與他們約於期滿後在芝加哥論壇報上發表，以致功敗垂成。其關係在  
法蘭西與共和黨。

這羅打聲聲其大，在嚴重的羅曼西米林德爾與銀行亦因死事而  
受影響。在他參議員運動失敗後不久，便陷於週轉困難的窘境。為了避免受聯邦銀行的  
檢查，羅曼西米林德爾的國庫銀行發行登記簿者區發行。但更取得者銀行的登記簿者，  
儲蓄者通過省政府的公家會計稽核員審查，證明該行確係照章存有現金準備。再在受檢  
查時，方能發給。但不幸羅曼西米林德爾，拿不出這一筆現款出來。這時，羅曼西米林德爾  
始信託公司經理華萊士通知公司董事會及其他職員，竟擅自開了一張一百三十五萬

的私藏，交給羅瑞門來應付查賬稽核員。這登記冊發出後，羅瑞門馬上將支票退還，後來羅瑞門銀行倒閉，幾千萬元存款被虧蝕，伊黎諾查高等法院認為道威斯應負責任，便令中央信託公司對於羅瑞門銀行的負債應賠出二〇，四五七，五一一元。至於道威斯本人，因他在伊黎諾查應有相當政治力量，法院除了判決文中指節他的不當外，並無任何處罰。

民主黨正副總統候選人爲前任駐英大使，摩根公司法律顧問兼下院議員，約翰·W·狄威士(John W. Davis)，及威廉·布利安之弟查理士·布利安。

在此次狄威士與柯立芝的逐鹿中，摩根公司對兩位候選人極盡其組織與操縱的能事。在柯立芝方面，競選經費的籌措人爲德外特·馬羅，在民主黨方面，仍舊是湯姆士·萊安主持一切。據參院拉佛雷特委員會法律顧問弗蘭克·華爾士估計，此次共和黨募案總數不下一千五百萬元，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所用經費僅九〇三，九〇八元。

在此次競選捐款中，分拆起來，凡是舊生糾紛或被檢舉的富商和政公司銀行，捐款最爲踴躍。斯托底斯堡——費省聯合瓦斯公司的大股東，曾因舞弊案和公司一倍被人控告，經全國總檢查官設法將此訴案撤銷。還有經過美國稅務整理委員會調查的各糖業公司經理董事，紛紛捐出巨款。希望提高關稅的紡織業股東們也慷慨巨款。威廉·湯姆生移友，胡佛的積極擁護人查理士·海登(Charles Hayward)，捐出五千元；當時他正

在俄國政府通知萊特馬丁飛機製造公司（馬登係該公司董事）送還溢額貸款五百二十萬  
鎊之一案。大獲後，政府果然很快撤銷此項通知。中西兩部檢察公司董事長哈雷·梅奧克  
梅 (Hartley M. Mackner) 和其他因提埃東油田黑幕案被控的份子，都構出可觀的數目。  
梅博士業大任朱力斯·弗來施曼 (Julius Fleischman) 等計劃向政府要求減稅的各企  
業領袖，在此次大選中都紛紛給共和黨捐助巨款。純油公司董事長，副總統候選人之弟  
海曼·戴威士 (Herman Davis)，和他的夫人各捐五千元。當時純油公司向政府請求  
減免稅款，同時還有一個被政府檢察案懸而未決（罪名是操縱俄亥俄汽油價格）。後來  
，該公司被罰稅款的要求經政府照准，控訴案亦被撤銷。一句話，還是那套賄賂收買的  
舊把戲。

在大選之前，哈丁的黨班內閣必須預先組織停當，但柯立芝不願多所變更，惟恐因  
此而擊進到共和黨的統治機構。雖然在各方壓力之下，他仍延遲了相當時期才要求道藩  
提辭去司法部長職務；當後者被迫辭職時，他並且表示惋惜之意。海軍部長丹白，因會  
承認違禁將海軍油田租與石油托拉斯開發一案，亦不能不辭職引退。國務卿胡夫斯任  
辭了，繼於一九二五年辭職，仍回任美孚油公司總裁；繼任者為敏內蘇達省參議員蒂爾  
克·H·凱洛格 (Frank B. Kellogg)，共和黨政權的中堅份子梅隆仍聯財政部長原  
職，梅隆部長胡倫亦繼續連任。





萬萬元以上，而美墨兩國關係自威爾遜第一任政府以後日趨惡化，已達於嚴重境地。

雖然外交政策及其他駐墨西哥大使，和國內產業金融界密接聯繫，但他們的身方成績並不比美國一般大富翁們滿意。一九一九年，洛克菲勒、羅根、福特、安那度、鋼鐵公司、和 E. L. 杜蘭尼 (Edward L. Doheny) 發起組織一個「保護美國在墨西哥協會」，把把事情拿到自己手裏來。這個團體將會鼓吹干涉政策。在該會發言人參議員伐爾一再要求之下，上院特為此專成立一個委員會（自一九一八年八月至一九二〇年五月）。該專務職取所謂美國人民在墨西哥境內遭受虐待的報告，編譯使干涉主義的宣傳取得了官方的承認。廣爾達總統在聽到伐爾的報告以後，立刻決定修改對墨西哥的對外政策，當他任期將滿時對於墨西哥採取了進一步的強硬態度。不過他還不肯採納其於實踐的要求。

威爾遜和柯立芝繼續採取威爾遜的和平外交政策。一九二三年，柯立芝承認兩年前提議的關稅協定和國政府，並允准對軍火給他。兩國邦交一時似乎友好，但一九二五年因加雷新總統頒布石油七五折，兩國關係又頓趨緊張，該項土庫法規定將墨西哥境內所有礦區及存儲石油永久所有權一律改為五十年定期租借而美國資本家在墨西哥有產業者大動公憤，兩國衝突立刻趨於緊張。一九二七年赫斯特系報紙（赫斯特在墨西哥大舉擴張土地）接連發表許多誹陷美國參議院自由派份子參加墨西哥問題激發叛亂陰謀

的假造文件，使局勢愈趨惡化。

他在這個緊要關頭，馬羅出任駐墨大使。經他交涉與威脅結果，墨國政府終於讓步，將土境法加以修正，另訂一個石油法案，

馬羅留駐墨西哥，直到胡佛上台，一九三〇年派他參加倫敦海軍會議美國代表團時，纔離開墨京。同時他又被推新晉西省參議員。

和哈丁一樣，柯立芝在人事選用和政務處理方面都沒有老羅斯福那樣精幹和圓通。

這特提辭職後，他曾委任他的老同學，哥倫比亞法學院長哈爾蘭·斯東(Harlan F. Stone)擔任司法部長，但是斯東竟然不遵照他的意思做，擅自決定引用取締托拉法，對梅隆的鋁業公司提起檢舉，致使柯立芝大為其難，不得不採斷然手段立刻調任他為最高法院推事，把該項訴訟壓下來。

斯東調職後，柯立芝改派一個組織托拉斯的專家查理士·華倫(Charles E. Warren)擔任司法部長，以為這樣的人選當可不致再鬧出禍事，但他沒有料到參議院對於這樣華倫的金融界代表，會拒絕同意，於是柯立芝只得再改派溫孟特省參議員約翰·薩默特(John G. Sargent)。

此外，像這樣粗率露骨，有欠圓通的例子很多。如費省鐵道公司一個經理竟被任命為該商務委員會主席，負責督鐵道之責。奈底格·布登德德(Edward Brooke)一個著名的

糖業 經紀人，他的主要工作是運動提高糖類關稅，柯立芝竟甘願派他爲關稅委員會委員，以致該委員會竟變一個產業界的權利代表機關，祇是設法提高關稅，而不謀減低。

佛德尼——馬廉伯法案賦予關稅委員會有改革關稅制度之權；在該委員會建議之下，總統可以增高或減輕關稅率至百分之五十。六年之內，柯立芝減低進口稅率的貨品祇有藍筆桿、書草、石炭酸，北美鵝鶉幾種無關輕重之零星貨物，而增加稅率却有八十種之多，連鐵礦（摩根公司產品）亦包括在內。已故參議員艾德華·加斯提根（Edward P. Costigan）一九二一年辭去關稅委員會職務，他指摘柯立芝在該會中佈滿了私黨，完全取消了它的應有作用。

關於救濟退伍軍人的一切有效的法案，都被哈丁柯立芝否決。爲着應付嚴重的農業問題，兩人祇批准那些虛應故事的法案，對於任何積極有效的法案都概行擱置。對於參院自由派議員努力爭得的管理電氣公司法案，柯立芝採取惡工政策。一句話說來，凡是有益平民的舉措概行不理，凡是有利於大財富的法案定能通過。這一切行爲，其意義何在，祇有從在羅倫策動的柯立芝兩位親密顧問——馬羅與哈威二人的背景與作用方面來觀察，纔可瞭然。羅倫策，海姆生在一九二七年時用開玩笑的口吻說，他願意一生奉送柯立芝爲國王，梅隆做皇后。

權立憲如野忠實地為大財富們服務，是有他的應得酬勞的。當他退任後，紐約人壽保險公司立刻推他為董事，米爾士、李德系的紐約先鋒護地為他的投保特優致謝。按每字二十五美分計算，一月三三年至三四年間，銀行與保險調查委員會發給聯保公司一九二一年至三三年間保費二名單上有梅立憲的名字。又據德律風者可以接獲低於市價價格購買該公司股票，並將其林其之所購股票，按市價少付三萬餘元。這雖然於由康根公司承辦一筆關金。

四

胡佛上台時，正趕上全國經濟大恐慌。但是這個惡劣的責任却不能推在他身上。這是羅斯福所採行的政策影響及，且胡佛又正處於必然的境況。我們所以硬要命來與羅斯福老羅斯福與委員會，原兩處與委員會，胡佛之與梅立憲下的本報。由胡佛來收歸苦果。

當胡佛之任滿，羅斯福放棄連任以後，阻止胡佛當選的動數是美參議。梅立憲也極思一試總統威儀。但是梅立憲這們狡猾的企圖，在塔隆尼城共和黨初選大會一役，初選僅和康根控制下的政治勢力給戰勝了。共和黨此次初選競爭，也可以說是康根金控資本和梅立憲金控資本兩大集團的明爭暗鬥。湯姆士、柯亦蘭 (Thomas Cochran) —— 康根公司



在一九二八年大選中，共和民主兩大政黨的競爭至為劇烈。民主黨候選人為紐約的會長阿弗里德·史密斯（Alfred E. Smith）支持他的是圍繞杜邦和安那康達鋼鐵集團的野心勃勃的少壯派，這一派份子大部份係天主教徒，使美國政治又加入了新的色調；而在這以前，天主教在美國祇屬切幾個大都市的地方政治；但自此後，羅馬天主教在金融資本的政治機構推進之下，已變為一個全國性的勢力。

在此項競選運動中，兩大政黨的政策並沒有什麼基本上的不同。認真說來，民主黨在史密斯領導之下，比從前任何時期都更和共和黨相像。譬如，該黨這次竟把他們傳統的國策政策自動放棄。表面上爭鬥的中心是禁酒問題。胡佛是主張「乾」政策（禁酒政策），因此得到美國監理會反沙龍同盟的擁護。但直到一九二三年以前，在意志剛強的杜邦領導之下，禁酒運動纔在全國政治生活中成爲一個關係重大的經濟問題。

史密斯本專批評提拔東油田舞弊和共和黨其他種種黑幕，但對於梅隆的捐稅弊端和華盛頓當局所統容的投機狂潮，却持非常審慎態度，絕口不談。雖然如此，他的演說確實吸引一部份本來對他粗笨的東方土音和他奧塔梅社（註）的關係沒有好感自由派份子轉而擁護他。

譯者註：塔梅社（Tammany Hall），原爲紀念一位參議員塔梅氏在紐約建築的一個社









內，胡佛資質固卓絕，任內對於重及平民與勞工的措施均斷不實行。在這方面，他倒像魯哈丁和柯立芝。和他約兩個前任總統一樣，他雖法法地批評商幹，而擴張加稅，他對於裁減所得稅率，對於退伍軍人的津貼辦法，他也堅決反對；對於農業問題，他也像前任一樣，祇是採取一種和緩敷衍的政策；對於所有企圖統制電力公司的立法，他也一概予以擱置。

但是經濟恐慌迫使胡佛所處地位似乎比哈丁或柯立芝要顯得殘酷得多；雖然如果柯立芝和哈丁處在相同處境之下。毫無疑問也會採取和他一樣的做法。事實上，柯立芝在過位後，也還不時地出面對胡佛許多無情的措施表示讚許，他對於胡佛反對聯邦政府實行失業救濟一案曾表示積極擁護。

胡佛任內有兩次精彩表演，在全國面前暴露出共和黨的真實面目。第一次表演是全黨存，用槍刺和水龍將退伍軍人要求津貼的請願隊伍趕出華盛頓；第二次是逃避對於失業工人的救濟。當產業家和銀行家們不願為繼續原有發薪名單而損失他們的超額盈利，紛紛將千百萬工人關在廠外，流離街頭的時候，衆院一再要求政府撥出公家經費，救濟失業工人，都被胡佛堅決拒絕了。當胡佛一方面開始撥出公庫資助各銀行和鐵道公司，一方面繼續拒絕救濟失業隊伍的時候，華盛頓社交會的茶桌上曾流傳着他私下的一句名言：「聯邦政府對於有實際困苦的任何個人，是不能救濟的」。紅十字會在康根公司捐

揮之下，祇能做些表面點綴式的救濟，並且提倡近乎開玩笑的所謂集體互助方案，讓富人們幫助窮人，窮人幫助窮人。

爲着在外面做出些種種的行動，胡佛主張各省實行地方失業救濟，表面上說得冠冕堂皇；提倡各省自治。事實上，全國大部份資金經費都被廢棄於紐約，波士頓和費拉達費亞幾個東部大都市的鉅富們吸收過去，而一般工業省區如米其干，俄亥俄和伊黎諾以及其他偏僻省份，實際上都沒有流動資金可以動用。所謂地方救濟也者——實際就是不救濟。

胡佛在他敬謹奉行廢根圈定的政策過程中，却犯了一個大錯，他很蠢笨的引起洛克斐勒的憤怒。洛克斐勒份子雖然依然是共和黨員，但在一九三二年大選中，他們祇是在名義上擁護共和黨，實際上這個美孚油集團其他支派却很顯明在支持民主黨。讓危機發難其自然的政策，結果證明對於洛克斐勒最爲不利，因爲石油每次跌價都直接危及他們的地位。同時，洛克斐勒在紐約洛氏中心區擁有鉅大地產投資，地產價值的暴跌也使他們陷於窮困之境。此外洛氏集團統治下偉大的柴氏國家銀行在許多投機經營也遭到嚴重損失，其中包括有福克斯電影公司，全國劇院美備公司和對德借款等。

一九三〇年，胡佛企圖和緩洛克斐勒，任命阿墨·伍德氏士 (Arthur Woods) 上校負責解決失業問題。伍德士係洛氏基金會的董事，曾任紐約市警察廳長，後又就任洛氏

中心公司董事。經過與許多經濟專家研討以後，伍德士提出報告，失業人數至少達五百萬人。三歲政府撥出一萬萬元用做建設公共事業的方案，督促胡佛提交議會通過。但胡佛拒不採納。當胡佛進一步又否決了華格納法案（主張設立聯邦勞工雇傭機關）時，伍德忍無可忍，憤而辭職，於是洛克非勒便和胡佛立於堅決敵對地位。到了一九三二年，民主黨與進步黨在議會結成聯合陣線，提出兩倍於伍德士計劃數目的救濟計劃，不聽胡佛同意便予通過。

## 第六章 黑幕重重

在早期社會，尤其是在封建時代的歐洲社會，各階級的特權均有正式規定。這一種階級的法律不能適應於另一階級。對於僧侶階級有教會法庭，貴族有貴族法庭，凡是能夠爭得權利保障的平民與手藝工人，也為他們設有特別法庭。當然，低層階級所規定各項權利較之上等階級要狹窄而空洞得多。

美國的統治階級要維繫並加強他們的優越地位，他們不能像封建社會那樣界線分明，率直行動，他們必須遵重十八世紀以來所傳留的民主傳統與民主機構，因此當立法和司法機構對於他們的行為橫加阻礙時，他們祇有採取偷偷摸摸，陰謀隱蔽和間接的方法，來達到他們的目的。

當 E. L. 杜魯尼因提拔京油田舞弊案被控，終於宣告無罪之後，參議員喬治·諾瑞士 (George W. Norris) 曾說出一句一針見血的名言，他說：「我們應該通過一條法律，對於價值一萬萬元以上的任何個人，不准再控他有罪」。如果這條法律能夠通過的話，現行社會制度便正式取得了合法保障，而理論與實際互相矛盾的現象亦可消滅。

關於戰爭利潤內幕，衆議院曾成立特別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在伊黎諾省代表威廉·

格拉罕 (William J. Graham) 主持之下，進行調查了三年之久，各種證件彙報告不樂。成二十一厚冊，將所有形形色色欺騙詭詐，營私舞弊，腐敗廢職種種黑幕發於塵有盡有，全盤托出。

在這次格拉罕委員會所檢舉的人物中，許多人替他們辯護說：在大戰突擊的緊急情況之下，他們所做工作總算克盡厥職，有功國家，不能對他們過於苛責。但據格拉罕委員會調查，事實上某些部門稱職的人選常常有計劃地被調開，而代以不稱職者；無私人利益關係的人物設法排擠出去，代之以對於該項工作決定有私人利害關係的人物；專家有時為非專家所代替；低價的訂貨不買，專買高價的；明知是劣等材料也予接收，經過考驗的上等材料反而不要；有許多鉅額開支藉口軍事需要，完全是為着有勢方的私人企業的利益。各公司承辦與訂貨不按公平分配，總是華爾街金融資本家在政治上有大力者享有優先權。

政府戰時購買委員會，係由羅根翰姆集團的一位股票經紀人班納特·巴魯 (Bernard M. Baruch) 主辦，據格拉罕委員會調查，許多弊端都應由他負主要責任。巴魯同時也是花旗銀行與銅礦業重要股東，他經過這奇關係可與威爾遜總統發生接觸。

關於銅礦工業，第三屆議會第六十六次會議中的衆院一四〇〇號報告曾指出：「……最初的計劃規定銅礦工業及其他製造業應由一人或很少幾個人實行集中統制

和支配；這種集中統治在整個戰爭時期，成爲規定物價與統制物價的最高勢力，戰時物價較高漲，此實爲主要原因之一。當時政府計劃要求使所有產業集中化，却未顧到其結果與影響所及。

在這方面，政府是完全抹煞了取法托拉斯法案。據格羅罕委員會調查所得：

「國防會議和陸軍部所屬各經理機關，不僅准許他們破壞取法托拉斯法，反而在許多地方獎勵他們命令各部門產業實行聯合。……事實上，政府各經理機關在大部份業務進行中，拒絕單獨和某項獨立企業實行買賣交易，除非他們疊加聯合組織。……我國可以毫不誇張的說：美國有史以來從沒有像這樣有計劃地積極幫助違法的托拉斯與聯合公司組織的發展。」

在威爾遜對議會發表宣戰演講的前兩星期，巴魯便和安那麗達鋼鐵公司董事長約翰萊安將產鋼廠家聯合起來，組織一個聯合五金批發公司，每一角六分又三分之一每磅的價格賣給政府四百五十萬磅鋼。參加聯合五金公司的企業，除安那麗達以外，還有二十六家公司大部份是在摩根或羅根汗姆統治之下。

在政府方面，巴魯成立一個鋼鐵採買委員會，參加委員有萊安聯合製地礦業公司與馬格納鋼鐵公司經理 W. A. 克拉克，莫雷·羅根汗姆，飛力普道奇公司副董事長斯摩士·麥可林，烏達煉銅公司屬於摩根與羅根汗姆代表查理士·馬可尼，肯尼克特鋼鐵公



司（屬於顧根翰姆）經理斯蒂芬·倍奇，以及那維達，金歐與雷易等銅礦公司代表。當這種由銅礦老闆和銅業聯合公司代表組織購銅委員會，負責替政府辦理銅類採購職務的露骨滑稽行為，引起各方紛紛抗議之後，這個委員會不得不宣告解散。但是新組織的委員會不過換了一批較爲隱蔽的人物而已，他們所起的作用仍舊一樣。

政府第二批購買銅產，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五日。價格按每磅 $23\frac{1}{2}$ 分計算。到了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五日，銅價又增至每磅二角六分。據格拉罕委員會調查，每磅銅的平均生產成本，約在八分至一角二分之間，和售價比較起來，利潤竟達百分之三十三至二百。如魯麥特奧海里加礦業公詞在一九一七年所獲利潤爲百分之八百，在一九一八年爲百分之三百。

由於採購數量的龐大，以及如上所述各銅業公司，特別是安那康達集團所得的優厚利潤，照情理上講，政府購銅價格應該要低得多。但實際上却完全不然。

在此次政府戰時物資採購中，究竟那一部門鑿實最大，公家財富所受犧牲最多，就好像被野牛圍追過後的瓷器店，執好執壞，簡直難於分辨。

在第六十六屆議會第二次會議，衆院第六三七號報告中曾指責政府用去十萬萬元巨款製造戰鬥機，結果竟一架沒有交貨。此案在一九一八年曾轟動一時，威爾遜總統不得不下令指派查爾士·胡夫斯頓調查。經過調查結果，發現此項飛機製造中確有弊竇不

罪。胡夫萊斯，被費公款，營私舞弊等重大嫌疑；胡夫萊斯雖被揭發，但與胡夫萊斯同屬一類。胡夫萊斯（H. H. H.）雖亦被揭發，但經法庭審判，總檢察官與陸軍部長巴克均表贊同。但後來巴克又將此款送與俄國企業界及可以提出新證據，下令再予開庭重審。結果特別軍事委員會宣佈無罪。

狄茲亦係俄國軍械省人，屬於花旗銀行集團；職前曾任全國現金配儲製造公司董事。一九一七年陸軍部長巴克（也是俄國軍省籍）委任狄茲為飛機製造總長一職，是時飛機製造公司總長瓦德·柯芬（Edward E. Coffin）的推薦。據此，狄茲亦係俄國軍械省人。

一、據此案卷中，關於為何委任狄茲擔任此職一節，並未提及。胡夫萊斯在報告中曾提到該飛機製造廠完全集中於俄國軍械省之代頓城內，將大部份承造合同交與他國企業購辦，雖然這批人對於此等工作毫無任何經驗，……在他以前所有飛機引擎都是採用俄方製裝備，但狄茲却改用自由式馬達的內燃機，因為他在製造這種內燃機器的公司中有極大的利益關係。

此外，格登寧委員會並指出，狄茲在一九一二年曾因為用行賄和其他違法手段排擠現任飛機製造商，被聯邦法院判處二年徒刑。雖然這判決決被撤銷，未予執行，但「其違法行為為有案可稽，在未予調查清楚以前，這樣的人物是不應該派充任

如此重要職務的」。

一九一八年正月狄茲雖然表面上被撤職，改由一個股東經紀人據伯特·孟特哥美 (Robert Montgomery) 繼任，但實際大權仍操在他的手中。五月後飛機製造局長換任約翰·萊安，航空裝配處亦跟着再換威廉·波特耳 (William C. Potter) 充任。但所有這些人對於航空事業，都是完全外行。

據格致學委員會引證情報局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之特別報告，萊安錫芝加哥，老雷瓦基奧聖保羅鐵道公司 (斯蒂曼·洛克菲勒花旗銀行集團在這個公司中擁有巨額股票) 的董事；當他就任飛機製造局長以後，與各木材公司訂立合約，規定該公司必需使用芝——米——聖鐵道，及鐵道公司西北區地產上之木材，作為飛機用木，政府除撥款六百萬元貸與各該公司外，並另貸一千二百萬建造一條通至該鐵道公司森林場地的支路。據格致學委員會調查，這條支路的建築費較之實際所需的數目要超過兩倍以上。同時，陸軍部幾個監察官關於此案也提出報告，指出許多更確實的證據證明萊安等具有侵吞公款營圖私利的大嫌疑。結果這些條件報告的監察官很快便被調職或撤職。木材專家們的意見被置之不問，當局甯願聽從那些賣於木材完全外行，而對於企圖訂立濃厚合同從中分肥的人們的詭計。資料優良，價格低廉的木材不用；寧願訂購價高而質劣的

在政府所撥十萬零五千元內的飛機製造費中（一架飛機未出），其中有四千八百七十餘萬用萊特買從樹膠，由米瓦基鐵道公司及花旗銀行所附屬的樹膠公司供應。雖然加拿大所出樹膠質好而價廉，英國飛機都是採用加拿大膠，但萊特却執意購用美國樹膠。

雖然航空界先進在這筆十萬元航空建設費的分配中，並沒有分得一杯羹；但狄特爾斯和海登等許多公司却競相購買萊特的大名，因為萊特首先創製飛機試驗成功，他的名字在社會上具有一種號召的魔力。一九一六年，狄德斯與開特林（Kettinger）一九一八年擔任全國汽車公司副董事長）合辦一個空頭公司，名為代頓五金製品公司。後來這個公司又成立代頓萊特飛機製造公司（又是一個空頭機關），持有林肯汽車公司一千份股票，專為美國飛機承製自由式引擎，後來不久該公司又與福特汽車公司合併。據格拉罕委員會調查，代頓萊特飛機製造公司當它和政府簽訂價值三千萬元的三千九百四十架飛機承製合同時，該公司是連一個資本都沒有繳進的。而這筆款子却是政府投資航空工業第二筆巨款。

狄特爾斯同時也是聯合汽車副董事長，（政府訂製飛機合同該公司亦參加在內），當他就任飛機裝配廠長一職時，他將他名下的股票轉記在他的妻子名下。他和開特林曾於一九〇八年創立代頓工業試驗所，推銷專供自由式馬達使用之戴力克內燃機。

當鋼鐵業與汽車業巨頭們用各種手段乘機大賺其錢的時候，鋼鐵業大亨們當然也不甘落後。一九一六年上半年海軍委員會規定各鋼鐵公司所出裝甲鋼鐵成本每噸為二六二元，而實際政府乘價每噸竟在四一元至六四元之間。蓋茲萊德鋼鐵公司董事長猶金·格魯斯(Guthrie R. Grace)也承認每噸成本至多不過三一五元一噸。蓋蘭鋼鐵公司與海軍委員會在國內將價格提到最高限度，而在國外同種鋼版，對俄國售價祇三四九元一噸，對意大利售價三九五元，在日本售價四〇六·三五元一噸。

在這種情形之下，各鋼鐵公司當然獲得了極豐厚的利潤。據參院委員會調查報告，本週期內蓋蘭鋼鐵公司盈利達八八八、九三一、〇〇〇元，超過其股票票面價值。在鋼鐵業中，戰時全額所有各部門產業，其盈利額最少為百分之二十五，最高達百分之七、八五六。第六十六次議會第二屆會議第九九八號報告中說：

「據委員會所查，政府製造鋼鐵計劃截至目前為止，所耗經費已達一一六、一九四、九七四、三七元，而這筆巨額費用直到停戰時並未製出一磅鋼。對於此項計劃，政府可謂毫無貢獻。此項鋼鐵製造計劃，係由國防會議戰時產業局所創議，該局由參議院特·巴魯也承認為此項政府計劃的主持人。……在任何時期，國家均不得由陸軍部為了戰爭目的進行大規模建築鋼鐵廠的計劃。……政府各種建築鋼鐵廠的合同，都是由戰時軍令部署名訂立的普通種類合同，就是說，承造商

的一切利益均應維持，任何風險與損失都歸國家承擔」。

據德在英國確鑿證據根本沒有設立有必要，因為智利國天然硝鹽產量異常豐富；但政府仍然擬備巨款建造這些工廠，致使鋼鐵、銅、水泥、動力機等物品的訂購經費頗受影響。杜邦公司領到九千萬元，在得尼西省之老希克萊，在成本加利潤條件之下承造一所硝鹽廠；戰爭結束以後，該廠以三百五十萬元之代價售與亞虛維爾企業公司，這個公司的大股東就是杜邦。

據巴魯解釋，此項鉅大硝鹽廠計劃，是因為恐怕德國潛艇活動可能攔阻智利硝鹽的輸入，但格致率委員會認為這種考慮是不能成立的。無論是老希克萊廠或硝鹽廠，都是不必體的，兩廠的建設對於公款是一種巨大的浪費和奢侈的開支，同時，該委員會指出，「無論從那方面來說，當初發動此項計劃的負責人均不能辭其咎。」

皮特及其他各項雜貨的採購，由席爾斯公司（郵購物代辦所）董事長朱立斯·羅森瓦特（Julius Rosenwald）經營。格拉罕委員指出，雖然這些貨品在歐洲可以用較低價格買到上等貨料，但仍從國內製造廠和經紀人手中購買，因為羅森瓦特的席爾斯公司和這些雜貨廠家與經紀人有密切的營業往來。席爾斯公司和孟特格美華特公司（屬於摩根）的同時興起，完全是因為二十年來政府工商界包圍之下創辦了農村免費郵遞制度；不然的話，這種新興郵購業務是不能存在的。直到今天，這種農村免費郵遞制對於政府依然

是一個賠本事業。

第六十六屆議會第三次大會第一四〇〇號衆院報告，指出巨額炮彈的浪費，爲了製造這些炮彈，班茲萊姆鋼鐵公司和他附屬的米底維爾公司，曾向各大鋼鐵公司購買龐大數量的鋼鐵材料。炮彈訂貨單是由國防會議顧問委員會簽訂，委員會主席即巴魯氏。關於炮彈採購詳情，格拉罕委員會的結論如下：

關於三十七種口徑炮彈政府共簽訂五十三個合同，付出九、一三四、五九二元，但這些炮彈却沒有一顆送到前綫。關於七十五種口徑的炮彈，共訂六八九個合同，付款三〇一、九四一、四五九元。在這一大批炮彈中，購方僅用了六千個。三吋口徑炮彈製造合同有一四二個，用費四四、八四一、八四四元。也是一個都沒有送達前綫。四・七吋口徑炮彈合同四三九個，用費四一、七一六、〇五一元。前方軍隊僅用去一萬四千餘顆。六吋口徑炮彈製造費二四、一八九、〇七五元，合同三〇五個；一五五種炮彈製造合同六一七件，用費二六四、九五五、三八七元；八吋的合同三〇一起，用費五一、三七一、二〇七元；二四〇種的合同有一五二件，用費二四、一三六、八六七元；還有九・二吋，十二吋，及十四吋口徑炮彈製造費共達六五、〇六三、九三二元。——所有這些口徑的炮彈也是一個沒有運到前綫。此外，我們訂立一一一件合約，用款四七八、八二八、三四五元，製造所有各種類型的大炮，白炮、炮車等等。在這些龐大可驚的建造

費中，所遺各項運送前方我軍，真正在戰場上使用的不過有三十九架七五磅高射炮車，四十具一九〇六年式的四·七吋口徑炮，四十八輛四·七吋同式大炮拖車，二十具八吋臼炮，和同數的臼炮車。

雖然訂貸款部是預付，但貨物卻從未按期如數交出。政府很寬大地允許未完成的合約繼續在戰後完成，其中有些是不願停工的英國和法國各軍火公司。在停戰以前各廠所繳炮彈共值一七，六八九、四〇六元，佔全額的百分之三十七。

在戰時這種侵吞公款分肥中，洛克菲勒也參與在內。據格拉罕委員會調查：

「在大戰期間應時興起的各種企業公司中，最明顯的代表是國囚焦炭公司……該公司資本股金共二百萬元，但一文未繳。……該公司鑿設之初，便得到居住克里伍蘭地方的美孚油大股東們的支持與贊助。……該公司向陸軍部呈請在克里伍蘭建造一套六十座焦炭附產提煉爐，每爐造價約需十萬元。負責審核的陸軍部職員們當時使懷疑該公司是否有此資金能力。於是美孚油公司便出面擔保，合約簽訂以後，該公司所有賬款均由美孚油公司代付；造工作開展後，陸軍部便又將美孚油公司的墊款如數歸還。因為，國囚焦炭公司實際完全是一個傀儡，在此項計劃中並無一文資本投入在內。」

許多大公司利用戰時政府訂貨當做擴充他們工廠規模與生產能力的一種橋梁，拿公家的錢來進行許多費錢的設備與改革；這自然要使政府許多訂貨對於戰爭勝利毫無關係。



由摩根，洛克非勒等所屬各大公司經手造建，成本在二十五萬元以上的煉焦廠共有一百五十個。據格拉罕委員會所指出：

「爲了建造這些工廠，政府對上述各大公司預付鉅額定款。……據調查所得陸軍部對於各公司建造焦炭附產提煉鍋爐計劃所撥貸款共達二八，六四一、九二三、一八元，其中有一六，七三七、九三二、一八元是不需要償還的。但是政府並沒有從這些工廠中得到一點焦炭附產物。所以我們很懷疑，這些煉焦附產提煉爐的建造計劃，是否根據戰爭所必需」。

一句話說來，此次歐洲大戰給美國鉅富家族以空前良機，使他們得以利用公款大發其財；而且毫無例外地，每家都盡量利用這個機會積極活動。截至一九一九年九月一日爲止，陸軍部所用經費共計一八，五〇一、一一七、九九九元。據格拉罕委員會考查，這個數目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用在與爭取戰爭勝利毫無關係的用途之上。當然，這些鉅富家族，是需要戰爭勝利的，他們所處心積慮的祇是怎樣使普通納稅人民對於這個勝利盡可能支持最高代價。當公家財政掌握在他們手中的時候，他們絕不要求政府實行緊縮和節約開支的。他們所希望的節約和緊縮，祇是當政府需要將經費用於退伍軍人和救濟失業的時候。

格拉罕委員會所調查的種種，都可以做爲提出控訴的根據，並且也有幾項次要物

受到法院檢察。但沒有一個月被判處罪惡。到了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所有各檢察案均被撤銷。

戰爭結束以後，在政府與各大公司之間還有許多相互的權利主張。但這些權利主張與要求，其解決方法，差不多百分之百是有利於富商巨賈的。關於過剩戰時物資與軍需品如何處理問題，也總是設法使各公司不受損失。例如，戰後政府仍存有一萬萬磅的銅，同意各銅礦資本家的要求，決定分期分批逐漸在市場上拋售。結果各銅業公司將他們過剩的七萬五千萬磅黃銅以超過成本的代價首先脫手，以致政府脫售時市價下跌，虧損甚大。

共和黨麻省參議員約翰·魏克斯曾於一九一九年仗義直言，痛斥飛機製造的黑幕。後來當他就任哈丁任內的陸軍部長時，他接到他的一位交易所老同事和朋友查理士·海登（屬於摩根集團）一封信，請他對於萊特馬丁飛機製造公司（海登係該公司董事）特別關照。當時該公司正在被控在戰時內所領貸款超出其應領數五百二十六萬七千餘元，同時該公司盈餘在百分之二百七十以上。在魏克斯要求之下，司法部長道赫提設法將這個案子沖淡，最後竟完全予以撤銷。根據道赫提個人繳納所得稅的鉅款登記，他在萊特馬丁公司中便擁有二千份股票。

此外還有許多戰時舞弊案，在道赫提及以後幾屆司法部長任內從未加以審判。如果

估計到從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四年期間內經過政府警察官所檢舉的案內和正式調查報告，其數目之多直可汗牛充棟，然而從來沒有實行過一次審訊和判處，可謂咄咄怪事。

根據參院檢查道赫提特別委員會報告，道赫提的司法部事實上成爲替有錢人擔災解難之地。在他治下，不僅戰時舞弊案，即其他違法案件亦都設法消除。聯合瓦斯供應公司（摩根）一次刑事被控案，到了司法部結果被撤消了。聯邦貿易委員會幾次建議煙草公司，木材公司和萬國農具製造違法實行壟斷，應予檢舉，但司法部長道赫提却置之不理。戰前法院明令規定波士頓——梅因鐵道公司和紐約，新海文及哈特佛鐵道公司（摩根）兩家應分別經營，不得有混淆操縱情事。但道赫提却設法將此項法令變更，不顧波士頓與梅因公司股東及麻省公衆事業委員會的抗議與反對，擅自決定將兩公司糾紛案重行審判，經過與紐約市長及聯邦法官秘密會商之後，竟然獲得政府命令准新海文公司董事仍有權參加波士頓與梅因公司董事會。

因爲道赫提對於戰時各項舞弊案概不追究，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一日共和黨議會代表伍德羅夫曾聲言若道赫提氏對林肯汽車公司（福特）再不實行檢舉的話，他必將提出彈劾。雖然如此，道赫提仍舊置之不顧。

牽連道赫提在內的戰後最大舞弊案，是關於美國五金公司案件。該公司原係德國人所經營的鋼鐵公司，美德開戰後，由敵國財產監督委員弗郎其斯·加文（Francis P.

（譯者）接收過來，轉交一個美籍董事會處理，安德留、梅隆和亨利、康樂索都參加在內。這個美籍董事會以七百萬元代價將該公司拍賣與一個臨時組成的聯合公司，包括亨納、第立克、哲、康基、威廉、赫斯特和該公司原有若干德籍職員。一九六二年政府又將這筆款子發還給該公司原主德人李查德·馬頓。據馬頓在法院中供認，他事先曾與約翰·金之手送給有關當局一筆錢，其分配如下：司法部長道赫提和哲士、斯密斯得二四，〇〇〇元，金氏本人十一萬二千元；敵國財產監督委員米勒（哈丁委任）得五萬元。所有這些受賄者都獲傳訊，但約翰金和斯密士兩人在受審以前便先後去世。米勒被判入阿特蘭他反省院。

提拔東田田案，其大致內容早為社會所熟知。但產業金融界和政治界大亨們對此案舞弊案的詳細經過，一般人却不甚了瞭。一句話說，這個案子主要内容就是政府當局擅自將鉅大海軍油田讓予商人開發。事件的主動是辛克萊與杜翰尼煤油公司，執持是政府中一般腐化官僚。

老羅斯福的長子（小蒂阿多·羅斯福），原係辛克萊煤油公司董事，在哈丁總統任內，被任為海軍部次長。他的弟弟阿其包德·羅斯福在一九一九年經他親自向哈利·辛克萊（Harry F. Sinclair）買，被任為該公司副董事長。在任職海軍部後，他聽從海軍上將格立芬（Griffin）的建設，在海軍部法令上補充上一條，規定該部得將海軍油田

租借與內政部；內政部長伐爾又狡猾地將這一條修改為內政部長有權隨意處置此項油田。當時海軍部長丹白和次長羅斯福對於這種不合理的規定，竟都表示默認。一九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哈丁總統簽字批准，宣佈為正式法令。

這一幕騙局，最初由丹佛郵報首先揭露，猛厲抨擊海軍油田租借之不法。丹佛郵報老板是彭飛爾和塔曼出名的兩位賭棍和屠客。經哈雷·辛克利送給他們二十五萬元捐款以後，該報的攻擊纔見中止。但另一家報紙聖路易快郵報嗅出其中玄妙，便開始撰寫社論，大肆批評；於是引起參議院的注意，特別組織一個委員會進行調查此事。

有關各界要人，直接間接，或多或少參加提拔東一案者，其人數之衆，至為可驚。這個案件醞釀的第一步是一九一八年辛克萊煤油公司與柴氏銀行董事威廉·湯姆生被任為共和黨競選委員會主席，負責籌集選舉捐款。第二步是哈雷·辛克萊的法律顧問，摩根麥金斯的親信威爾·海斯被推為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在一九一九年尾至一九二〇年初，湯姆生在市場上大量買進辛克萊煤油公司的股票，他顯然是估計到辛克萊黨在共和黨政權之下必能大獲其利；柴氏銀行在資金上積極支付他。直到一九二二年尾，股票經紀人利文摩爾又替哈雷·辛克萊·布來耳公司及柴氏證券公司等，接命收購辛克萊煤油股票。辛克萊、杜翰尼的汎美煤油公司及運輸公司，和馬孟茨煤油公司（都參加提拔東海軍油田的租借）股票的大量拋售，使華爾街金融界巨頭都有機會參加煤油分潤，但

參院調查委員會擬定未將購買煤油股票的人名單公佈出來。

杜翰尼爲了提拔東海軍油田租借的成功，將贈內政部長代爾十萬元酬勞金；辛克萊達給代爾二十三萬自由公債券，七萬一千元現款，在代爾辭職赴蘇俄談判油田租借時，又送他三萬五千元旅費。總而言之，代爾所得賄款，有案可查者共達五十萬元，證據確鑿，於一九三一年被判監禁。這是美國有史以來，內閣大員第一次因舞弊被判處罪刑。

一般人民公認辛克萊，杜翰尼和代爾三人是此次油田租借黑幕案的罪首，但同時還有大批金融資本家也參加在內。美孚油公司和此案亦有相當瓜葛，這是衆所週知的事。譬如，中西部石油公司（印底安那州美孚油公司的附屬公司）在辛克萊與杜翰尼取得政府特許租賃權以前，也曾爲提拔東油田主張權利。丹佛的一位律師斯太克曾受聘代表該公司要求租賃提拔東油田。但後來辛克萊白杜翰尼輸獲得此項租借權，中西部煤油公司情願退讓，接受辛克萊一百萬元的酬報。

這使斯太克律師大爲氣憤，原來他計劃可得到酬金一百五十萬元，現在中西煤油公司祇能給他五萬元。他證明印底安那美孚油公司所以甘願放棄對提拔東油田的權利要求，是因爲它預計從辛克萊公司建造通達提拔東的油管裝置中可以沾到很大利益。參加議員華耳西認爲辛克萊正是用這種方法買通美孚油公司，以便減少另一個強大的政治勢力對於提拔東油田的競爭。美孚油和辛克萊兩家在西部各州的地下油管及其他許多產業上

，本來就是利益共的。

其他許多方面參加這個騙局的，係經過大陸貿易公司的安排。這個貿易公司是由哈雷·辛克萊、普拉瑞汽油瓦斯公司（洛克菲勒）董事長詹姆士·歐納耳（James O'Neill）和印地安那美孚油公司董事長拉伯特·司徒瓦特（Robert Stewart）根據加拿大法律，秘密組織起來的一個空額機關。該公司成立於一九二一年，其主要目的即在從亨羅爾上校手中購買麥克薩及德克薩斯油田產油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每桶售價為一元五角。大陸貿易公司又以每桶一元七角五分售價轉賣給該公司創辦人所屬各煤油公司，所獲盈利一直扣留在大陸公司這幾個創辦人手裏，直到後來內幕揭露後，才分別退還與各該公司。

辛克萊犯了一個大錯，他送給內務部長威爾的二十三萬自由公債券，係登記債券，署名為大陸貿易公司。當提拔京油田租借黑幕開始傳聞各地時，他又捐出一八五、〇〇〇元債券交給威爾。海斯幫助償清共和黨經費虧欠。威爾、海斯之弟奧圖·海斯當時正任辛克萊的法律顧問。威爾、海斯不願公開使用這些公債票，因此便秘密拿這些債券和幾個共和黨要人換成現款。美孚油公司需要職員約翰·普拉特換了五萬元；詹姆士·伯登也換了五萬元，但不久他便感覺這樁交易是不道德的，爲了在良心上求安穩起見，轉捐出五萬元給芝加哥醫院。海斯送給梅隆五萬元，他收下放在保險箱裏一個時期以後，

覺得不妥又退還給海斯，給他一張五萬元的支票。

小洛克菲勒在提拔東案第一次偵查時，曾出庭證明他對於印地安那美孚油公司董事長司徒瓦特「絕對信任」，絕不致有舞弊情事。直到一九二八年，司徒瓦特背着美孚油公司股東，連洛克菲勒也被瞞在內，便與大陸貿易公司勾結，並且將他私人所辦公司的煤油以高價轉賣給美孚油這些事實被揭穿以後，洛克菲勒纔決心將他撤換。司徒瓦特在職時，年俸十二萬五千元；退職後每年仍領到七萬五千元俸金。

杜翰尼和辛克萊二人，最初都經法院判決釋放。某一次審訊時，發見一位陪審官從辛克萊代表人手中拿到賄賂。辛克萊雖然被判禁閉六個月，但與本案無關，完全是因為對一位參議員的鞠問，表示傲慢不屑，拒絕回答的原故。

戰後美國海運局在芝加哥的一位廣告商阿爾伯特·拉斯克(Albert D. Lasker)主持之下，也是對於少數富有者大開方便之門。洛杉磯城鐵輪船原係沒收德國商輪奧羅斯號，以十萬元代價賣給洛杉磯時報發行人和洛杉磯輪船公司大股東哈雷·詹德勳(Harry Chandler)，事先二人早已安排好，趁該船開出港岸的時候，登報招標，使旁人無從看貨投標。這段內幕後來被參議院調查委員會發見證明。一年以前，詹德勳曾出價二十五萬元購買此船；歐戰結束時國際海輪公司曾出價六十六萬元；海運局均未接受。此後政府曾化費二百八十一萬元修理這條輪船；據專家估計，單就廢鐵而論，該船價值即在十



萬元以上！

此外海運局曾將十七隻輪船賤價賣給加渥大來家族，組織大來輪船公司。同時大來公司為政府在中國建造四艘運輸輪，每艘成本為二百二十五萬元；後來這四條船又從政府手中轉歸大來公司，每隻售價僅三十萬元。還有一條輪船加勞號政府造價共費一百六十二萬餘元，國際商輪公司曾出價八十二萬五千元沒有成功，後來大來公司僅出三十七萬元便買了過去。一九二三年十月間，大來公司又買到七隻「總統」號巨輪，每隻五十五萬元；然而政府當初建造時，每隻成本却用去四百一十二萬八千餘元。

一九三三年，參院委員會調查海洋郵船合約，發見大來公司股東對於大來支付了鉅額的獎金和回扣。該公司以一千三百九十七萬五千元代價從政府手中買到的那十七條輪船，大來得到佣金六十三萬五千四百九十餘元，另外還有七萬四千多元的利息。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大來公司從那七隻總統號郵船中便獲得純利六百七十四萬六千餘元，但同時直到一九三三年它對政府所欠的貨款却拖延不付，可是對於大來本人的佣金却按年照付，一文不欠。根據合約，雖然政府有權扣留原船，但却不肯這樣做。

拉斯克在其海運局長任內，曾提出一個商船法案，據參院委員會調查，按照這個法案所有各大公司如美孚油美國鋼鐵公司等為裝運自己產品的輪船企業，政府都應給與津貼。照此計算，美孚油公司每年應領津貼一百五十萬元，美國鋼鐵公司應領五十萬元。

美國企業如福里打包公司和國際器具公司，在政府對於各商輪實行津貼以後，航空業與此類津貼以前反而增高，曾不斷表示抗議。

當維德執政之初，航空工業尚在獨立經營的初創階段。大財富們在壓足了戰時厚利之後，對於航空工業暫時不感興趣。但自歐戰以來，若干熱心人士却做出許多有價值的貢獻，一九二七年林白橫越大西洋的飛行更震動了全世界。這時，德外特、馬羅也獲著政府完成其航空建設計劃，而一般大富巨賈們也開始試探從這個新興企業發財的可能性。

當著使貧窮的鉅富們能夠暢所欲言，那些獨立經營的飛機製造家和技師們必須設法趕進企業圖外，把他們的財產併吞過來。被利用執行這一任務的工具是胡佛的郵政部長華爾特·布朗 (Walter F. Brown) 據上院委員會調查，採用取消或壓制航空郵寄合同的手段，強迫一些獨立經營航空事業者與專為吞併他們而成立的航空公司（這些公司都有強大的共和黨與華爾街背景）相合併。

威廉·羅伯特森 (William B. Robertson) 及其同僚，是林白橫飛大西洋的主持人和聖路易至紐約航空公司的股東，他們設法為林白此次試飛籌集資金。他們找到一位紐約股票經紀商，C. M. 凱斯 (C. M. Keys)，後來在林白大西洋飛行成功之後，凱斯與賓州鐵路公司合辦歐美航空運輸公司，結果最初提倡人羅伯特森反爾被迫退出。林白這位名

震全球的人物雖然仍被留任，並給他十元一股的股票二萬五千份，但公司負責人施羅爾他將這些股票轉賣出去。歐美航空運輸公司的董事和大股東包羅有萬德比、查理士·梅空、賓香鐵道公司運輸部經理施芬(Shaffer)，和林白私人顧問亨利·布利金瑞支。該公司即以「林白航線」為名，藉資號召。

同時，魏特尼、威廉·萬德比、李查特·梅隆、及彼士頓等捕各銀行家也組織一個航空公司。參議院議員勃溫可報告，這些航空公司聘請俄裔俄裔俄裔之子或郵政部長約密及雷耳·費斯(Laur. Ross)為顧問，專為煽動麥克內耳——華特曼斯航空郵務津貼法案的通過，結果如願以償，費斯得到酬金三千元。

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九日，郵政部長布朗召集整個大航空公司經理舉行的秘密會議，希望各線停止投標競爭。在催簡短致詞退出會場以後，各公司經理在次長梅克拉罕主持之下，將各航線實行互惠支配。當時郵政部長保羅·韓德生曾表示反對，認為此次會議是過火的，將來一定引起糾紛，結果果然不出他的預料。

各大航空公司併吞較小公司，也是採用洛克菲勒在十九世紀時併吞原美孚油公司所採用過的典型的策略，威脅與高壓手段。例如，一位熱心航空事業者克星羅·鮑爾(Chester Bell)曾創辦克星羅至畢特堡航線。一九三〇年間，梅隆集團組織一個空運公司，三營艦隊向他提出校買。有一次李查特·梅隆曾打電話給他要他將公司出售



種廉價的服務。同時他接到通知，他的公司與航線應出售與梅隆的德列文航空公司。

當韓利物登拒絕出讓時，郵政局即以取消航郵合同相威脅。他證明布朗的代表會與韓利物說：「我們總算弄出許多路子你都不接受，我們決不能放任你這樣下去，我一定會辦好這件事的」。結果韓利物登是屈服了，將他的公司以一百四十萬元代價轉售與航線公司。

布朗還要強迫某些大公司實行合併。梅隆——萬德比集團主持的歐美航空運輸公司在布朗命令之下，與西方航空快遞公司合併。後來西方航空快遞公司又奉命將它的洛杉磯至達拉斯航線轉售與美國航線公司。新成立的公司，定名為歐美西部航空公司。

一九三〇年八月郵政部為開闢兩個大西洋航線登報公開招標，但公告上限制凡航程不及二百五十英里，沒有半年以上夜間經驗者不得參加投標。這一條限制，在麥克納維斯航線法上並無規定，實際上即等於取消較小航空公司的參加資格。

為了取得投標資格，許多小航空公司自行合併，成立聯合航空公司，其所開標價較歐美西部公司差不多低三分之一。但結果郵政局還是和後者簽訂了合同，在十年之內，每年政府虧損至少八十三萬三千餘元。

從一九三〇年布朗非法召集航空郵政會議起，到胡佛政權終結時止，美國政府的航空郵政經費共耗去七千八百零八萬四千餘元，超過其實際航郵重量所應付數額兩倍以上。

。藍特之郵部等於給各航郵公司特權。

很可慶幸的，所有胡佛任內這些航郵合約，到了一九三四年二月九日都被羅斯福政府認為違法，一律予以取消。在新訂合同之下，每年航空郵政經費由一九三三年的一九、四〇〇、二六四元減至七、七〇〇、二三八元。不過，儘管換立新訂約，以及後來許多相應的改組與合併，航空工業也和煤油、鋼鐵、鐵道、電氣、鉛業、汽車和化學等工業部門一樣，仍然掌握在梅隆、摩根、魏特尼、萬德比等集團手中。

隨着各大財團承包航空郵運事業，證券市場又給他們開闢一條新的發財之源。

花旗銀行總經理戈登·藍支勒(Gordon Kenchur)之弟弗力德立克，代表該行及其附屬各公司，發起組織聯合航空運輸公司，合併了許多公司。當他最初買進普拉特·魏特尼公司一、二六五張股票時，每張僅值二角，總共祇付二百五十三元。在該公司宣佈股息紅利為百分之七、九〇〇時，他的股票增為一〇一、二〇〇股，換領聯合航空公司股票時又變成二一九、六〇四股。到了一九二九年五月，藍支勒最初的二百五十元股票投資，值價竟達三千五百五十七萬五千八百餘元。

花旗銀行附設的證券交易所——花旗公司，經理波普式飛機運輸公司股票發行，市價每股九十七元，而該公司經理董事則准按二十五元價格購買。差額之數即作為送禮，弗力德立克，藍支勒一人所得是項總金額達九二、一七五元。花旗公司推銷聯合飛機公

兩股票，淨賺五百八十九萬五千餘元。

在藍支勒以二五三元購買普拉特——魏特尼公司股票的同時，查理士·狄茲也以四十元代價買到二百張股票。查理士·狄德斯即胡夫斯法官要求付予軍事審判的那位狄茲之子。這位小狄茲被任爲聯合飛機公司會計，他的原值四十元的股票，到了一九二九年五月總值達五百六十二萬四千餘元。當一九三四年參議院委員調查航空郵政的時候，小狄茲僅三十一歲，和他的令尊在大職期間担任航空部要職一樣，也是對於航空技術一竅不通。不過，技術知識在大財政資本領域之內，倒不是必要的，尤其是對於可以予取予求的政府。

二

在一九二九年開始崩潰的禍國殃民的投機繁榮，澈頭澈尾完全是少數鉅富家族一手造成的。在這種投機狂潮的每一階段都是由那些最富，最有聲譽，最有權勢的人們發縱持使，設法將過度膨脹的證券推在一般被迷惑的社會公衆身上。遭殃吃苦的沒有一個是真正富衆；雖然有幾個他們的經紀人如鐵木耳·伊索爾、查理士·米琪爾(Mitchell)、萬施威利根(Van Sweringen)和伊瓦·克魯格(Krug)不得不被犧牲。

註：伊索爾、查理士·米琪爾、萬施威利根、伊瓦·克魯格。

許多人不懂得上述這些人，於是其對經濟政策的代表而已，他們在經濟政策上的所得也祇限於經紀人的利益。在生客之間彼此已有默契，如果事情出了毛病，那些投資者們便應默然地設法保護自己，不得連累他們的主人。事實上，上述那幾位權威者並非是戰士的英雄氣概。

使成千累萬普通小戶損失約二百五十萬美元，使股票市場狂瀾，根柢是在哈丁任內打下的。摩根、洛克非勒、杜邦、梅隆、葛德比、和...對於哈丁政府的影響，我們已經十分熟悉。爲要使投機景氣更大規模的發展，聯邦儲備度政策必需大加修改，因爲一九二〇年的金融制度不能夠適應證券市場的高度膨脹。

一九二三年以前的聯邦準備處總裁爲W. P. G. 哈丁（與哈丁總統毫無親屬關係），他担任七歲至十歲之間，是一位青年企業家，卡普公巨百民了家，精力甚於...與哈丁勢力圈外。

哈丁總統秉政後將他黜職，改任貨幣稽查司司長克里辛格(D. B. Cristinger)爲聯邦準備處總裁。克里辛格過去，祇從事過小規模經營，對於大規模公家財政可謂毫無所知；哈丁總統幕後支持者顯然正需要容易駕御這樣的人物。

克里辛格完全在摩根的一位代表班亞民·斯特朗影響之下；當時後者正在和紐約華捕銀行商議，要求聯邦準備處大量收購政府公債，以便供應各銀行充足流動資金。進行



各項有利貸放。這在聯邦金融準備法上是可以的，但祇能做爲應急手段方能採用。一、二三年並沒有任何緊急情況，而聯邦準備處便開始收回政府債券，這顯然是別有用意的計劃。從此三年之內，聯邦準備處繼續執行這一新政策，投機景氣因而日趨高漲。從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九年，各大銀行的放款增加十餘萬萬元，所有這些錢都變成證券市場的紙片；同時，在這五六年間，全國工商業貸款總額幾乎沒有變動。例如在一九二二年，各銀行對交易所貸款總額爲一，九二六、八〇〇、〇〇〇元，到了一九二九年尾，增至五，三三八、九七九元。

據標準統計指數報告，從一九一二到一九二九年，股票平均價格從六〇元激增至二一二元；同時在這幾年間幾千百個投資信託公司，持券人和其他許多類似的性質曖昧的企業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成立起來。

柯立芝總統和財政部長梅隆不時地發表聲明，表達人心，和緩交易所貸款驚人增加在社會上所引起的恐慌與不安。在一九二八年，準備處爲着避免各方批評，特授權各準備銀行將貼現率由百分之四提至百分之五。但這不過是一種遮眼法而已，如果要平息投機狂潮貼現率還得大大提高，方能生效。從一九二八年春到一九二九年春，交易所貸款增加了兩倍。一九二九年初，準備處曾發出警告，將現金準備至百分之二十，因而各大商業銀行均望，採取退守。但花旗銀行董事長查理士·米琪耳出面打破了這種

難購，他立刻在金融市場上拋出二千五百萬元現款，並以挑戰口吻聲稱凡願借款者都可有求必應。紐約的金融資本家是公開藐視華盛頓。

一九三三年參院銀行貨幣委員會於華爾街的調查報告，共有八大厚冊，一萬餘頁。一九三二年的審問記錄也有三大厚冊。這兩部報告和記錄，從頭到尾是一部罪惡記錄，這種罪惡行為完備，澈底和無孔不入，簡直不知其所以始，亦不知其所以止。任何個人畢生精力亦難於完全認識和瞭解。我們在這裏祇能摘要略述一二。

參議院第一四五五號銀行貨幣委員會的調查報告，曾指出各大銀行公司有計劃地將故意集中起來的過剩現金拋入金融市場，宛如火上加油，使投機狂瀾更加高漲。統治這些銀行與公司的人們董事，經理和大股東們，也正是那批對於兩大政黨選舉運動捐獻最多的人們。鉅富大亨們對於聯邦準備制度的操縱與控制，保障了這種助長投機政策繼續無已。

根據參院報告，在一九二九年全美三十三家主要商業銀行從柴氏國民銀行與花旗銀行一直到紐約、波士頓、費州、芝加哥各銀行機關，對於證券市場聯合經營貸款共有三四起，總額為七六，四五九，五五〇元；在一九三〇年，貸款共百四十五起，總額為三四〇，九二二，七五〇元，這些銀行經過他們附屬證券公司，直接參加證券投機活動共有四五四起，其目的即在故意將股票價格提高，轉售給一般被報紙和政客宣傳迷惑了的人

民。據參議報告，在一九二九年至少有一〇五種證券交易發行是在這種幕後操縱之下。讀者當能記得，銀行附設證券公司的起源，是有政治背景的。花旗銀行首先獲得塔夫特總統的允許，開始組織花旗證券公司。前面也曾提到當時總檢查官認為這種附設證券公司是違法的，但他的建議不但未被接受，反遭撤職；他所做的報告直到後來參院銀行貨幣委員會進行調查纔被公諸於世。

除了各銀行貸款促成證券市場的繁榮以外，各大企業也紛紛對各交易所證券投機進行比期放款。

大產業公司參加金融市場活動，這在從前是沒有前例的。同時許多私人也和銀行公司一樣，把他們的現款投放到比期市場中來。例如，皮爾·杜邦本人保有三千二百萬元現金活躍在金融市場上。摩根公司的比期放款竟達一萬一千餘萬元。

爲要使這些借款獲得利潤，必須設法鼓勵社會一般人們參加投機，新聞雜誌故意歪曲的記載和論說，確能發揮這個作用，許多經過交易所不斷買進拋出，放款方面決無虧損可能，因爲實質實證券者保證金受到損失時，他的證券立刻被拋出，對交易所經紀人的借款亦隨之算清數目。

在幕後操縱投機狂潮的各大銀行與公司，絕不是不可捉摸的抽象的東西。隱藏在這些機籌組織的是有血有肉的人，是那些歷史上未之前聞的骨瘦如柴的實業家或金融家。

代表。

譬如在花旗銀行董事會中包括有飛力普遜奇公司副董事長，已故克里伍蘭，邁奇之子爾魯·邁奇；萬國農具公司董事長西魯·赫爾·麥克米克；倍西·裴恩；詹姆士·斯蒂曼，約翰·洛克菲勒的姪子倍西·洛克菲勒；畢克曼·溫沙普；尼克拉斯·布拉德(Nicholas Brady)等等，除弗來特·費盧是二十世紀一家汽車企業(全國摩托公司)的代表而外，其餘都是南北戰爭或十九世紀各產業金融家族集團的代表和世襲成員。其他如柴氏國民銀行，保證信託公司，第一國民銀行紐約信託公司，銀行信託公司等，各家的董事會成份都出不了摩根，洛克菲勒，希爾，梅隆等百餘的親戚戚黨和代表。

這些來自大富之家的人物，同時也兼着各大產業公司的董事。例如摩根的同夥和代表在一九二九年把持着八十九家公司的董事會，在他們支配下的資產總額二百八十萬萬元，等於當時全國的公債總數。摩根勢力下的各銀行公司的董事會，同時和其他大公司的董事會又相互連鎖，相互參加，這使得摩根公司在全國產業界中更成爲一個無孔不入，無遠弗屆的龐大勢力。

### 三

戰後金融資本各大富家族，在政治方面已取得支配地位，他們的一切作爲都顯然是違反社會利益的。許多政府調查與偵訊機關，總是聘到那些億萬鉅富代表不斷的承認「過失」和「判斷錯誤」。然而實際上，除了一九二九年至三三年的大恐慌而外，每件事務的發生與發展都是根據計劃，預先經過安排，佈置，恰如所期；並沒有所謂「過失和判斷錯誤」。

美國鉅富家族有一個特點，即他們的家族代表和首長，大部份都會因爲犯法或遭受過檢舉和傳訊。除非把某些下等社會也算計在內，我們再也找不出類似的這樣的「企業集團」。從南北戰爭時代起至一九一〇年止，在這個期間內差不多所有成功的有錢的企業家們，都受過最高法院，或地方法院的審訊，雖然沒有一個被判罪罰，在這「美商金融界犯罪者的名單中，J. P. 摩根，約翰·洛克菲勒，E. H. 哈立曼，飛利普和歐格登·阿穆爾兄弟，賀·顯特，喬治·麥金斯，E. T. 司徒台斯堡，湯姆士·蓋家，哈雷·麥克萊，E. L. 杜翰尼，詹姆士·希爾等等大名均赫然在內。這些人的被控，有時是他們政敵（實際也即是在金融上的敵對者）所佈置，但最多還是政府檢察官爲着敷衍民主與和緩民憤，不得不做出一點姿勢。

在現在我們這一代梅隆·杜邦及其他許多富翁們也曾被控逃避捐稅，操縱貿易，或實施違反公衆利益的非法行爲。這樣的事，在一九二〇年差不多成了富翁國民日常生活

的一種普通特權。

然而，查理士·米琪爾逃避所得稅和撤木耳·伊索爾利用郵遞實行詐騙，兩案都終於被判無罪由此已可窺知在美國司法行政機構下的法律過去如此，現在亦無大改變。那就是說：窮人關進監獄，富人可以逍遙法外。

從參議院所收到的許多證件中，證明美國第二家最大商業銀行——花旗銀行(National City Bank)在它的幾家統治家族集團操縱之下，成爲一個侵害社會利益重製的工具，歐戰以後，和戰前及大戰期內一樣，該行經過它的主要產業組織——安那康達銅業公司，使公家財政蒙受嚴重損害。在兩次股票市場的投機操縱中，倍西，洛克菲勒和萊安有一，七五〇，〇〇〇張溢發的安那康達股票拋售出去，使社會八民平空損失了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同時，該行又違法經過他所附設證券公司——花旗公司，直接經理該行股票發行。一九二九年九月，花旗銀行股票市價在該公司操縱之下，被提高至每股五七九元，總額共達三，二〇〇，〇〇〇元；而同時其登記價格每股僅值七十元，總額僅三八五，〇〇〇，〇〇〇元。交易所經紀人用各種手腕將這些股票及其他可疑的證券，拋售給一般易欺的社會民衆，使該行大股東們坐收厚利。

花旗銀行及其附屬證券公司在宣布分配八分紅利以後，另外還有所謂經營手續費佔

全部收益百分之二十，歸與銀行及公司職員。這在一般小股東們是完全不知道的。花旗公司的經理費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九年間共達一〇，五一一，六七〇元，花旗銀行爲八，四九〇，六三四元；同時，這兩筆所謂經理費的三分之一是給了米琪爾，另外還有巨額薪俸和參加股票市場投資的盈利，此外，還有特別秘密優待股票，廉價售與該行及公司大股東和重要職員，如在波音式飛機運輸公司與聯合飛機運輸公司，就是採行此法。

譬如，花旗銀行董事和大股東們，特許以每組股票五九〇價格購買聯合飛機運輸公司股票，而在公開市場上則售價爲七七一。每股一八一元的差額即等於贈送。倍西·洛克華勒共買這樣的證券四百份；斯蒂曼一五〇份，摩根同夥巴特羅得六四五份；狄茲特到二百份。爲着使這些股票容易拋出，一方面經過御用報紙散佈空氣，一方面故意抬高市價，以便造成投機狂熱。

單是從航空公司得到廉價股票及股息，紅息，花旗集團仍不滿足，他們另外又擅自規定發給每人鉅額薪俸和獎金。例如，藍支勒在一九二九年從聯合航空公司領到薪俸和獎金四二九，九九九元。從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三年，除了他原來不及三百元的投資獲得驚人鉅額股票紅利而外，他共領到一，二五〇，〇〇〇元的所謂薪俸和獎金。

從一九二六到一九三二年，政府給與聯合航空公司的津貼共達四千餘萬元，該公司每年從原來每七五〇元的投資中淨獲紅利平均達一百萬元。另一方面，參議院委員會在

航空郵政的調查中發見，該公司所雇用的航空員與機師，雖然每天冒性命危險，辛苦工作，他們的薪水却異常菲薄。

花旗銀行參加一萬萬元以上認魯公債的整理發行，但該行駐滬代表曾提出警告，認為該國經濟狀況頗不鞏固。果然不久此次債券都變成廢紙。爲了勸誘認魯當局發行此項債券，該行曾給予經手人以巨額佣金。認魯總統的兒子得到四十一萬五千餘元的酬金。在歐戰期間和戰爭結果以後，花旗銀行曾根據戰時價格對古巴糖蔗種植商撥出二千三百萬元貸款。後來糖價下跌，古巴糖蔗商無力償付所欠該行本息三千萬債款。據聯邦銀行稽查員報告，此項貸款已無追還可能。因此該行於一九二七年特成立糖業公司以便承擔此項貸款。當該公司成立時花旗銀行用增發股票方法將它的資本由五千萬元增至七千五百萬元。這筆增額資本又轉撥給花旗證券公司；花旗公司便拿這筆錢收買糖業公司股票。這樣結果，糖業公司等將二三，〇〇〇，〇〇〇元原貸款退還花旗銀行，另外再增加上一千一百餘萬元的債票。所有這一切，顯然是一種會計的手法，將該行一步呆賬設法推在一般股票購買人的身上。這個秘密直到一九三三年幾被參院委員會發見。

當證券市場發生慘跌以後，花旗銀行特撥二千四百萬元基金幫助該行職員彌補股票市場上的損失。一般高級職員都分得此項貸款，直到一九三三年尚未償清。但該行一般低級職員雖然在市場膨脹時，在當局鼓勵之下，一共買進了一千二百萬元股票，後來當



證券暴跌，賠累不堪的時候，却未得到行方的一點資助。

該行董事長查理士·米琪爾在一九二九年雖然他個人進款超過四百餘萬元，但仍設法逃避繳納所得稅。他所用方法異常巧妙，他把他的股票證券以低價轉賣給他的妻子，故意在賬面上造成虧損。雖然後來波聯邦法官提出控訴，但結果仍得宣佈無罪。

柴氏國民銀行 (Chase National Bank)——除開美倫銀行以外世界最大的一家金融組織，也是同樣的情形；並且在許多曖昧企業的競爭上和花旗銀行是針鋒相對的勁敵。該行也是違法附設證券公司，經過它發行自己的股票和經營其他證券的投機。該行董事，大股東和高級職員在買賣股票債券方面，均享有特別優待。

柴氏銀行董事長阿伯特·魏金 (Albert H. Wiggin) 利用他本人家庭合夥公司，參加在該行資助之下許多次的證券投機活動。有一次是一九二八年對辛克萊煤油證券的投機，結果獲利一千二百餘萬元，魏金個人得到八十七萬七千餘元。

此外，魏金還參加各種市場操縱活動，使他自已大發其財，而該行一般小股東們則受連累和損失。他將該行證券盡數拋出，利用各種家庭合夥公司方法，（有一個公司設於加拿大），來逃避聯邦所得稅。

在他主持之下，柴氏銀行曾要求古巴政府發行一萬萬元公債，以便從中取得佣金和盈利這等積款名義上是充做修築古巴公路經費，但據一般築路承包商估計，此項費用

至多不過三千萬元。同時，上議院普拉特修正法案禁止對古巴貸款，因此柴氏銀行必須採取不正面碰觸此項法令的迂迴方法，才能達到其目的。

爲了湊足一萬萬元之數，在築路之外，又加上各種公共事業修建費，其中毫無必要的政府官舍建築費反列爲主要項目，所需費用共達六千萬元。容易賄買的古巴政府，對於這一切計劃完全唯命是聽。建築公司從古巴政府領到三千萬元期票，拿到柴氏銀行贖現，就在這樣方法之下避過普拉特法會的干涉。早在一九三〇年之初，柴氏銀行便將四千萬元古巴債券完全拋銷出去，除抵償三千萬建築費的期票而外，並相下佣金和手續費一百四十餘萬元。古巴政府此次貸款計劃，完全沒有提到該國政府在一九二九年的歲入抵償歲出，尚不敷百分之十，也就是說有二千餘萬元的公共事業建築費合同不能償付這個事實。所以，此項計劃書完全是假造的，以便證明古巴政府財政狀況良好，縱有存餘，債信鞏固。在這次一萬萬元貸款中，柴氏銀行實際祇付予古巴八千萬，除了付給該國總統馬朝多的女婿布郎朝五十萬元手續費外，餘一千餘萬元均歸做該行盈利。此項債券拋銷出去以後，結果是古巴政府無力按期償付，市場價格慘跌，一般購票人遭殃。

柴氏銀行和古巴總統馬朝多關係甚爲密切，它和花旗銀行同爲馬朝多在政治上主要的支持人。一九二五年，當馬朝多競選成功，就職古巴總統之際，摩根代表亨利·加特林 (Henry Gattin) 送給他五十萬元代他償付競選費用開支，同時柴氏銀行及顯赫翰姆

集團代表也損賠同數。馬朝多之內弟被聘爲哈瓦那（古巴京城）柴氏銀行的法律顧問，支領優厚薪俸。同時該行又貸借馬朝多私人十三萬餘元。

馬朝多用暗殺一切政敵（連國會議員包括在內）的方法，來維持他的統治，他的一切做爲柴氏銀行都經過它的古巴代表隨時接獲報告。這是經過參議院銀行貸幣委員一檢查該行信件發見的。在馬朝多任內，哈雷·顧根翰姆曾親任美國駐古巴大使；實際上，自一九〇〇年以後，所有美國駐古巴大使不是代表柴氏便是代表花旗銀行的利益。

阿爾伯特·魏金雖然如此假公濟私，劣跡昭彰，當一九三二年他退職時，柴氏銀行董事會仍通過每年贈送他津貼十萬元。這個規定是經過洛克非勒（自一九二九年，該行大權已操在洛氏手中）同意的。直到一九三三年參議院對該行進行調查時，這件祕密才爲社會所週知。於是魏金只得「自動」表示放棄接受這筆津貼。和米琪爾一樣，魏金也是被社會一致所指責，認爲他是柴氏銀行一切爲非做惡的罪魁；同時，另一方面，他也和米琪爾一樣，他的所做所爲無一不是經過代表上述若干鉅富家族的該行董事會同意與核准的。

美國第三家最大的銀行——康根的保證信託公司（Guaranty Trust Company），其許多非法行經，亦不亞於花旗與柴氏。該行董事長係威廉·波特（William C. Potter），以前曾任顧根翰姆的經紀人。

保證信託公司最大的一次黑幕，是它與摩根公司串通參加萬·施威利根兄弟籌備維持券公司的大騙局。萬·施威利根兩兄弟——歐瑞斯和曼蒂斯。雖然直到他們死去以前，他們二人的大名幾乎天天見報，引起一般社會的注意，但實際他們不過是摩根公司代表而已，他們自己在金融界上並沒有什麼獨立地位。這兩兄弟原在克里伍蘭州經營地產業，初無藉藉名，他們之走上金融場市完全是摩根一手提拔，他們之創立三十萬萬元的龐大持券公司，使社會損失億萬，銀行家賺進鉅萬，這一個大騙局，也完全是在摩根主使之下做成的。

萬·施威利根一案的騙局，和新海文違反取締托拉斯法的情形不相上下。譬如，在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〇年，萬·施威利根新組織的阿里翰尼公司經過摩根公司及保證信託公司拋出去一萬六千萬元的股票和證券。在摩根公司協助之下，萬氏兄弟表面上支配了二萬三千哩的鐵道，包括柴薩舉克與俄亥俄鐵道，涅克布雷特鐵道等幾家公司，各該公司股票和證券的公開銷售，供給萬氏兄弟以充足現款，使他們得以在金融市場上操縱播弄。

雖然沒有聲明用意，萬氏兄弟動用阿雷翰尼一萬萬元現款，購買對於米蘇里太平洋鐵道公司的統治權，這樣使摩根公司兩位忠實代表將貫通東西兩岸的運輸綫連成一體。但當恐慌來臨時，米蘇里太平洋鐵道公司，都成了阿雷翰尼公司一個賠累的贅瘤。

到了一九三〇年十月間，阿雷翰尼公司陷於擱淺，因為它代米蘇里太平洋公司購置的產業的價款一千零五十萬元已經到期，必須償付。但該公司現款早已用罄，並且不能向外借款，因為該公司發行優先股時曾附有條款規定向外借款不得超過其資產額百分之六十。

於是摩根公司撥出一千零五十萬元按照一〇五元半的價格，買進米蘇里太平洋公司百分之五·五股票，並且在契約上規定，在合約有效期內阿雷翰尼公司仍可將是項股票贖回。雖然後來該公司無力收回此項股票，但這筆錢總算幫助了它，使它得以償付到期的產業價款。所以用這種巧妙方法，實際上阿雷翰尼公司仍舊等於違反該公司優先股的規定，向外取得借款。

米蘇里太平洋公司曾直接向摩根所屬各銀行借款二千三百萬元，後來這筆借款到期，但該公司無力償還，於是向政府設立的金融建設公司申請貸款。當時省際貿易委員會中一部份專家曾提出意見，認為此項貸款除幫助摩根公司解除一筆呆賬以外，別無意義，不應核准。但是摩根神通廣大，哈丁總統對這位大亨自辯不敢拂逆，結果儘管專家們表示反對，金融建設公司終於通過了對米蘇里太平洋公司的貸款。據事後發見，米蘇里太平洋公司在申請貸款之前，曾假造一張資產負債平衡表，證明該公司確有存款。當摩根公司利用這筆公款將他們的呆賬沖銷以後，米蘇里太平洋公司便決便由關稅廳走向破

產。

據一九三六年參議院省際商務委員會在摩根公司檔案中發見該公司一個備忘錄，證明該公司至遲在一九三三年正月便已知曉米蘇里太平洋鐵道公司對命融建設公司所提出的報告是假造的。但是摩根公司却保持緘默，對於政府和股票持有人始終不予通知。

保證信託公司曾於一九三〇年擔保萬·施威利根公司發行三千萬元證券，致使社會損失一千五百七十五萬餘元。這一筆證券發行所得一部份係用以贖買克里伍蘭地產。當證券發行之際，該公司許多產業已經賠累；同時，在證券發行之前，該公司附屬的克里伍蘭建築公司的資產淨值故意高估，寫成一千六百萬元，這樣使萬氏兄弟公司財政狀況在表面上顯得比實際上要堅實得多。

萬氏兄弟公司這種濫發證券，一九三七年參院調查委員會主席參議員佛登·惠勒曾稱之為「不正當的營業」，「完全不依規矩的投機」。為着增發此項證券，萬氏兄弟公司曾故意將其地產價值抬高，登記為二千五百五十三萬餘元。紐約交易所十五位經理曾預購阿雷翰尼公司的股票與證券，該公司按遠低於市面的價格售與他們。

九個商業銀行的董事和經理，因為曾與搭救萬氏兄弟公司的三千九百五十萬元債款，都得到了摩根公司對他們個人特別通融借款的酬報。上院委員會同時證明，柴氏銀行對於摩根手下這兩位萬氏兄弟的投機活動，表示嫉妬。柴氏銀行副董事長威克爾（Wickel）

R. Tinker)曾於一九二二年寫信給魏金說：「我認爲我們應該設法以從事國外業務的同樣精神從事鐵道投資活動——換句話說，我們用不着，顧及任何他人……摩根公司與庫恩羅比在鐵道企業方面劃分給我們的範圍，那簡直是笑話……」。

摩根公司在萬氏兄弟投機活動每一階段中都居於很可疑的操縱地位，一九二九年二月，摩根公司曾訂購三百五十張阿雷翰尼公司股票。該公司股票市價每股爲三一至三五元，但有一百二十五萬股却按二十元價格祕密分給「局內人」，一轉手間便可獲得市場盈利一千三百七十五萬元。這些祕密優待股，大部爲摩根同夥們所得，但同時還有許多優待股分配給公司董事經理，交易所職員，銀行與保險公司董事長，和政界要人。據參議院銀行貨幣委員會指出，這種分贓式的分配，乃是提高公司影響與地位的一種手段，因爲這實際即等於送禮。

這種按二十元計算的優待股係以一千股爲單位實行分配，照市價三十一元計算，其差額共一萬一千元。政界要人中收到是項優待股票者如：海軍部長查理士·阿當斯(Charles A. Adams)得一千股，前任陸軍部長牛頓·E]克(Newton P. Barker)得二千股，前財政部長，現任加省參議員威廉·吉布·馬加多得五百股；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約翰·拉斯克卜得二千股。各鉅富家族得到是項優待股者如喬治·巴克得一〇、五〇〇股；李查德·梅隆得六〇〇〇股；米琪爾與魏金各得一、〇〇〇股；新西州漢字

通公司董事長蒂格爾得「五〇〇股，美國鋼鐵公司的梅爾·戴樂仁和全國汽車公司阿福瑞特·斯隆各得一萬股，等等不勝枚舉。

在其他證券發行上，摩根公司也同樣的安排好一個「優待局內人名單」。譬如當一九二九年七月標準商標公司發行股票時，特撥出七二二、六〇〇股按低於市價十元的代價，分配給各被優待者，津貼總數共達七百二十二萬餘元。美國鋼鐵公司股票在發行之前，先拿出六十萬股按低於市價百分之二四的價格分配給少數局內人。

標準商標公司分贈每個局內人每一千股票中包括價值一萬元的津貼。這一批優待股，其中有三千股贈與柯立芝總統，戰時採購委員會主席班納特·巴魯得四千股；其他如梅隆，顧根翰姆，湯姆生，希爾斯等巨頭大亨們也都利益均霑。美國鋼鐵公司優待股的分配情形，也大致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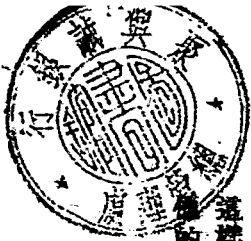
在金融市場上沒有一個有勢力的人物能夠站得住腳，如果他得不到最富有權力的家族集團的支持與幫助。瑞典火柴大王克魯格和從做愛迪生祕書發跡起來的英國移民撒木耳·伊索爾，這兩個人的興起與失敗，便是明證。

使美國損失將近二萬萬元的克魯格大騙局，在他包羅萬象的企業中，裴西·洛克菲勒也是董事之一。克魯格之得以走進美國資本市場，是經過一個和摩根公司有密切關係，最有信譽的一家波士頓紐約公司——李·希金孫公司的援引。當克魯格因事業失敗於



一九三二年自殺之後，他那外強中乾龐大企業整個失敗的責任完全推在他一人身上。並且認為他「欺騙」了他的同夥。但是關於他的破產內幕詳情，從未見有官方調查；許多報告記載還是從私人債權團的調查中得到一鱗片爪。所有法律執行機關，無論是各省法院或聯邦法院都拒絕接受此案；因為在債權人的調查中發見一些特殊情節牽連到許多有錢有勢的顯赫人物。很明顯地，克魯格無論是從摩根銀行或柴氏銀行，要獲得銀行借款，並非難事；但事實上沒有人肯費工夫去考查他的錢究竟是怎樣安排的；爲什麼當衆銀行接到警報時，他們竟然不加考慮立刻收回貸款，坐令社會公衆遭殃？

在一九三三年參院銀行貨幣委員會的報告中，樸率直地指出：「此次使美國投資大衆遭受鉅大損失的克魯格與托爾發行證券契約訂立，各投資銀行應負有責任。一九二九年，在李·希金孫公司主持之下，組織了一個持券公司，包括該公司，克拉克道奇公司，布朗兄弟公司，紐約保證公司，紐約花旗公司，皮特堡聯合信託公司（梅隆），及狄隆李特公司在內，從克魯格與托爾公司五千萬元的五分保息債券購買到二千六百五十萬元股票。該持券公司購買是項債券的價格，係按百分之九六·三五計算。在此項債券協定中實規定克魯格托爾公司五千萬元五分保息債券必須存儲於指定受託銀行處，以指定某種證券存儲做爲擔保。……在此項債券協定之下，克魯格托爾公司有權隨時收回其所存各種債券之一部，或另以其他一部合格證券代替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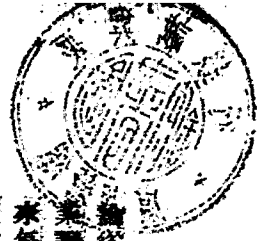


「隨鏡之鑄印在廣所稱「合格債券」，在金融界習慣中規定任備包括三萬人以上所屬應所發行的證券應為合格。在這一條規定之下，於是巴爾幹及中歐各小國和鐵道發行的不可靠的證券都被搜集了來代替可靠的債券如法國政府債券等。

據本耳·伊索爾在報紙上也是被公認爲一個不藉外援獨力奮鬥取得投資界信任的冒險家。其實完全不然。伊索爾在芝加哥的發跡，乃是藉助於該城幾個大戶的投資；他在這一大財富集團中，最主要的後台老板是馬紹爾·費爾特（Marshall Felt）家族——馬紹爾·費爾特公司的大股東和芝加哥最大的地產所有人。

費爾特家族成員及馬紹爾費爾特公司重要職員和伊索爾的許多企業經營有根深的經濟關係。馬紹爾·費爾特的姪子斯坦來·費爾特曾和伊索爾及其他合夥人一同被控利用郵遞方法實行詐騙。在伊索爾信用破產，被迫下台之後，他的各項財產被併入馬紹爾·費爾特公司大股東和與費爾特家族有密切關係的各銀行手中，和克魯格一樣，伊索爾在其實告破產之前，如果要從無論是屬於康根系或洛克菲勒系的各大銀行取得借款，或請求這些銀行的附屬證券公司幫助將伊索爾公司各項證券在市場上拋售，都非難事。但他並不這樣做。也和克魯格及萬·施威利根兄弟一樣，伊索爾正是忠於他的代理人職務，因爲他的破產對於他的東家倒是有益的。

關於各鉅富家族超越法律範圍以外的種種行爲，真是一部二十四史，無從說起。無



論從那一方面的情形觀察，無論是關於那一家統治家族，我們都可發見同樣的故事。電業證券股票公司在摩根支配之下，曾於一九二七年藉口整理該公司所有資產，設法將原來每股一股變為三股。據聯邦貿易委員會指出：「在整理前「舊」電業證券公司投資總額為一四八，五〇一、二九〇元。在整理之後，竟改寫為五四七，七〇三、一一八元，本室增加了三九九、二〇一、八二七元，這個激增之數簡直令人難以想像」。

奧圖·康 (Otto H. Kahn) 曾承認他和他本家親友假做證券交易，以假證明虧損免繳所得稅。皮耳·杜邦和約翰·拉斯可普互相交換二千七百萬元的證券，以便證明他一九二九年營業賠蝕。一九三〇年在摩根十七個同夥中，祇有五人在一九三〇年繳納所得稅；在一九三一及一九三二兩年中，沒有一個人繳納所得稅。湯姆士·拉孟特將所得稅賣給他太太方法逃避了一一四、八〇七元的捐稅。另一個康漢爾將組織家庭信託公司，將實際上的盈利故意在賬面上寫成虧損。

一九三七年春暮，J. P. 摩根本人從歐洲歸來，曾以嘲笑口吻發表公開談話，談及該國各種法令規章，他認為任何人——除非他是一個「傻子」，都必定要想方設法利用法律中每一個技術上的漏洞。他指出屢該歸罪的不是逃稅者個人，而在議會，它應該設法出一種完備嚴密的法律，使這種狡猾，屢獲長於利用漏洞的份子也無從得逞。當此新決定對於各種法律漏洞現象進行調查的深夜，摩根這個談話似乎是在替他的公司辯護。

法行爲而做辯護。實際上也確是如此。不久後，謝利在紐約見他的主要代表謝士，謝士特別利用一個私人的持票公司——比流公司，實行逃稅已有長久的歷史。

以上所述都是一九二九年恐慌時期的事，但這種形同劫掠的舞臺現象並不限於這個時期。

往以前來說，我們可從羅賓遜舉出一九二五年芝加哥，米爾瓦基和聖保羅鐵道公司破產的內幕來看一看。原來這個公司的大股東是威廉與倍西·格克賽勒，歐格曼·阿穆爾 (Ortha Amos)，和哈克尼新 (Hughes) 幾個家族。除謝利一家而外，其餘幾家大股東在公司宣佈破產以前便將他們的股票拋售出。但是這幾家主要大股東，對於使公司破產和一批小戶股東受持有入損失億萬的責任他們卻不能辭脫，因為公司之陷於破產，由於謝利在各條上實行電氣化，化費了一萬八千萬之故。鐵道電氣化計劃就是謝安那鐵道公司有利，因為一方面電氣裝置需要購買大批的銅，另一方面又需要從聖地拿電力公司（當時係，安那康達附屬公司）的電力供應。安那康達公司董事威爾·哈克賽勒和約翰·萊安，同時也是米加瓦基鐵道公司的董事。一九二八年省際商務委員會調查結果，曾將派該鐵道公司與聖地拿電力公司所訂電氣合約，因為這合約等於單方面的勒索，強迫鐵道公司付出它並未使用的電力費用。米爾瓦基鐵道公司宣佈破產後，該公司破產監理委員會仍舊由原來幾個大股東的代表律師所組成，此項監理

手續費竟達六百五十餘萬元，也是算在鐵道公司賬上。省際商務委員會曾打算對此項巨額破產監管費進行澈查，但爲聯邦最高法院所制止。因爲司法部長查理士·胡夫斯和高華法官約翰·大衛士，一個是代表洛克菲勒利益，另一個代表康根公司利益。當然，大富巨頭們是憎惡任何形式的調查的。

往最近來說，甚至當上院委員會對萬·拉威利根鐵道公司進行調查之際，該公司大股東們對該公司財產還在使用冒名頂替和假造賬目種種手法。在萬氏兄弟公司擱淺以後，很快地便出現了兩批莫名其妙的人將萬氏兄弟統治下（實際就是康根的）各路鐵道迅速接收過去。一九三五康根公司將價值三十萬萬元鐵道資產的統治權，以二十七萬五千元代價轉賣給一位印地安那玻璃製造商喬治·施爾（George A. Schell）。查理士·畢爾德博士在新共和雜誌上曾論到，照這樣的比例，一個普通人用九十二元錢便可買到對於別人一百萬元的支配權。更進一步說，「一個工人如果祇能拿出九元二角錢投資，便可以買到對於別人十萬元資產的統治權。一個三歲小學生如果從母親手中討到一角錢，也可以投資買到對別人一千元支配，有權利用這十千元資本至少可以規定給自已每天一角錢的酬金，一年之內天天有糖果可吃……據一般估計美國全國財富約達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如果按照康根公司賣與施爾先生的價格比例，那麼祇需三百二十萬五元便可把整個美國財富的統治大權買到手裏」。

施爾將他管理下的資產劃爲一種特別的所謂「慈善與宗教專業基金」，這樣可使一大部份他使用他人資產的轉移交易免納贈稅。這筆財產轉移稅如果按法繳納的話，很可能將施爾私人財富中很小的一筆現金完全繳光。

一九三七年四月間，施爾又將他對這三十萬萬元的統治權轉讓給兩位無名氏的繼承人。其中一個名羅伯特·楊格，他和杜邦及通用汽車公司有很長的歷史關係，因此和康根公司很容易接近。楊格出資二十二萬五千元，他的同事在邦克·克羅比，也拿出了十萬五千元，付予施爾的宗教慈善專業以百分之一萬五千的利潤之後，便將管理三十萬萬資產的權利買了過來。從施爾取得對萬氏兄弟（即康根）鐵道鋼的營運權時起，到應再轉賣出去時止，在這期間，據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六日新共和週刊所載，在賬面上營運的紅利達百分之七萬。施爾竟肯放棄盈利率達百分之七萬的股份，祇拿百分之一萬五千的利潤，這種不近人情的轉讓，說明他並非出於已意，而是在被脅迫板命令之下不得不然。

楊格與克羅比在購買施爾的營運股之前，據參院委員會後來意見，克羅比曾和萬氏兄弟，康根公司，紐約第一國民銀行，及杜邦的女婿，全國馬達公司代表康納德孫。布蘭奇爾關於管理問題。當然，這兩個新提拔起來的交易所經紀人，都一口否認他們對於統治管理有何利益企圖，但他們同時又表示反對修訂任何新章，取消康根公司曾經交給

論兩那批股票的管理權。

本章以上所述，不過是從一九一七到一九三七年這二十年間美國產業金融界黑幕的一角。聯邦貿易委員會，省際商務管理委員會，證券交易管理委員會和參議院各種調查委員會關於類似這種營私舞弊種種黑幕的報告紀錄，真是汗牛充棟，更僕難盡。總而言之，本書所述一切無一不有所本，不惟毫無誇張之處，並且在著者先絕沒有任何臆見，故其選擇片而事實來驚人顯露。

## 第七章 金融寡頭底新聞事業

新聞雜誌是影響和造成輿論一種最有力的武器，它可以變不測不覺之形或野蠻正，或喚起社會公衆的觀念和心靈。這當然可以引起在輿論心理下大財富主人們間避嫌和興趣。爲着保護他們的利益，誠免社會對他們的不滿與嫉妬行動，他們必須盡盡方法直接或間接，就某一特殊事件或就一般現象，經常爲自己進行辯護。這種辯護自己的手段反映在他們統治下的新聞雜誌上，便成爲有計劃的新聞封鎖，至如事實，加以洗滌動聽的詞句攪着社論揮筆代表社會公道的惡意與企望。

新聞事業在美國激頭激尾是在各鉅富家族津貼或收買之下的私營企業。在目前美國新聞出版中，不論其是好的還是壞的，很少幾家不是來自大富集團。事實上美國幾個新聞大王，都是屬於億萬巨富家族的。

美國普通新聞事業（爲有別於商業、科學、宗教、和會友等專門性新聞），可以分爲三大類層。最下一層爲各政黨直接統治和津貼下的機關報紙；在這一層之上爲各「獨立」的新聞事業家，其中有許多或係由金錢的成功或係由於政治上的聯屬，已和大財富階中空僚子密切結合，還有許多人把他們的報紙完全當作商業來經營，但他們大部份收



大要請各鉅富豪族的幫忙，因為廣告大部份是操在這些大亨們的手裏；最上一層是各鉅富豪家族所屬的機關報紙。屬於最上一層的新聞出版，大部份是最大的都會報紙和全國性的最大雜誌。這是六十家大富的私人喉舌機關。

在各政黨津貼下的報紙，大多數都是鄉村和小城鎮的報紙。據巴爾的摩太陽報政治編輯弗郎克·肯特估計：

「各縣鄉小報差不多百分之七五，係屬於共和黨。其餘百分之廿五係民主黨。……這些鄉村報紙的發行人和編輯人不僅在生活上大部份要靠黨的補助，並且他們本人也極力參加黨的及政治活動……日報，週報和半週報在美國總數約有一萬八千家，就中有一二萬五千家可以算做政黨地方報紙。在這一類的報紙中，根本無所謂政治鬥爭的公正精神。」

這一類小市鎮和鄉村報紙，對於美國兩大政黨，尤其是共和黨頗有補助之虞。……之隨形，等於散佈全國各地的傳聲筒。他們的經費收入主要係來自兩黨各處和各種委員會，而兩黨經費又是受幾十個統治家族的資助，因此這些報紙對於兩黨等團體……是毫無當然更竭力迎合，就如阿他們自辦的報紙一樣。實際上，這些鄉村報紙確有許多是……，二二三等的富戶們直接出錢經營的。

在中間類層中，有許多「獨立」的新聞發行人，他們之經營新聞事業主要是當做……

就的一種手段。此外有些出版家完全是爲的商業盈利，依賴各大公司的廣告爲其主要收入。

這一「獨立」的新聞類層——目前最著名的斯克利浦斯——霍瓦德系統 (Scripps-Howard Chain) 亦包括在內；從社會的意義上來講，可以說是美國新聞出版界唯一的比較乾淨的類層。在最近的一個產業時期內，對各方面權貴進行不斷批評，唯一成功的大都會報紙發行人約瑟夫·普列遜 (Joseph Pulitzer) 便屬於這一類層。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新聞界有一個顯著現象，那就是屬於這種「獨立」類層的報紙一天比一天減少。實際上，差不多有一千來這一類的報紙履歷了，變質了。在金錢資本日趨集中和強大之下，前此代表許多商業和工業集團觀點的各種新聞機關報紙已喪其繼續存在之必要，上述新聞界現象實乃必然之趨勢。

本章所述，主要是關於最上一個類層，即各鉅富家族集團直接或間接支配之下的新聞出版事業。但是爲着區別和比較，當然有時不免要談到其他種類的各報。直接所有，或秘密統治一、二家以上的報紙或雜誌，這已成美國大富之家一個主要的標誌。

茲將幾個大富家族統治下的新聞出版狀況，分別摘要備述於下。

#### 洛克菲勒家族 (The Rockefeller Family)

據作者所知，洛克菲勒家族為其已經放棄直接經營報紙雜誌的政策，改為利用所有各報的刊例出價將他們的利益買下，以備提供龐大批准證和登廣告為交換條件。除了摩德萊因以外，洛克菲勒持有動員公司所有各集團登廣告的長久權力。如果單是廣告還不足以保證某一家報紙的忠心，洛克菲勒支配下的各公司便直接出錢收買。

但是，顯然如此，洛克菲勒集團說對於新開出版機關仍有極極直接投資，像在不入以前一樣。當十九世紀的約翰·洛克菲勒遠望新開國政，備極苦痛的時候，他便開始經過他的僱傭代表積極購買左右各派的報紙。洛克菲勒拿到手裏的第一個報紙是海城《德意志報》(Donner)；該報立刻從他的死敵一處而為其忠實的辯護者。這是二八八五年的事。此後，美孚油公司一位職員查理士·馬太(Charles Mathews)將巴黎譯的全民雜誌(People's Journal)收買過來，而為洛克菲勒的機關雜誌。據着德里克曼的經理巴特里克·勃雷(Patrick Boyle)又替洛克菲勒收買在關多的一家報紙，對於當時一般反對將當地天條採氣使兩權讓與洛氏公司的人們，展開輿論的攻勢。

自此以後，詹寧士出版公司(Jennings Publishing Co.)成立。據俄亥俄省檢察官弗朗其斯·孟乃特後來發見，這個出版公司曾與俄亥俄省一一〇家報紙訂有合約，規定各報須發表稱頌美孚油公司和洛氏親信代表的文字與社論。一八三三年，洛克菲勒曾捐款給芝加哥大學，出版政治經濟雜誌(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由約翰

斯·勞倫森博士 (Dr. Lawrence Laughlin) 主編。雖然托拉斯問題在當時美國政治上引起軒然大波，成爲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但這個以研討政治經濟爲目的的雜誌，對於這個問題却一字不提。芝加哥論壇報主筆亨利·華爾特 (Henry D. Walter) 在一九九四年發表的傑作私有財富與社會公益 (Wealth Against Common Wealth) 一書中，主要內容即是暴露洛克菲勒種種違反社會公益的行爲。這本書雖然完全根據事實的公正論述，但却受到喬治·剛吞教授 (George Junton) 在社會經濟學者雜誌 (Social Economist) 上的嚴厲批評。爲了支持自己的批評，剛吞在文中竟故意誤引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翰·霍布森教授 (Prof. John A. Hobson) 的一封信，立刻爲霍布森所否認和斥責。後來剛吞任剛吞雜誌 (Grafton's Magazine) 主編，到了一九〇八年纔證實，這個雜誌是洛克菲勒出資創辦的。

在這期間，洛克菲勒召集一個會議討論他新創辦的通用教育基金會計劃。參加人有一評論之評論 (Review of Reviews) 主編阿伯特·蕭博士 (Albert Shaw)，世界事業 (World's Work) 主編華爾特·裴奇 (Walter H. Page)。蕭和裴奇兩人被聘爲教育會董事，自此以後，世界事業雜誌便分期連續發表洛克菲勒爲自己辯護的回憶錄。洛克菲勒秘密津貼製造家記事報 (Manufacturer's Record)，該報讀者係商工兩界人士，他們雖然每天在接受着某一集團的宣傳，却不自覺。阿其包德以一千二百五十元

訂國前途雜誌(Southern Farm Magazine)一年。雷曼·阿伯特(Lyman Abbott)主編的萬望(The Outlook)雜誌也有美孚油勢力伸入其中，因為該雜誌多年來便從紐約花旗銀行董事長詹姆士·斯蒂曼手中祕密領取津貼。

一九一二年參議院特權及選舉檢查委員會曾發見衆院代表西伯萊(美孚油公司出錢在華盛頓替他們活動的)在一九〇五年寫給約翰·阿其包德的一封信。信上有這樣幾句話：「我們需要成立一個有效的文化事業部，這不僅是爲了短期或應急之用，而是爲了對於聯合新聞社及其他向類新聞事業有一個永久的健全的統治。當然這是費錢的，但就最後的利和影響來說，却是最便宜最經濟的」。

「顯然這個意見是被採納了」，洛克菲勒傳的作者約翰·弗雷恩(John F. Flynn)說：「一位叫做J. I. C. 克拉克的老新聞記者被任爲宣傳負責人」。因此，報紙上對於洛克菲勒的持譽論調很快地便改變了。婦女家庭之友雜誌(The Woman's Home Companion)登載了一篇「世界最大富翁如何過聖誕節」歌功頌德的文章，同時星期六晚報(Saturday Evening Post)也發表一篇阿其包德爲美孚油公司辯護的文章。

美國工業委員會在調查洛克菲勒屠殺權罷並多省魯德婁工人時，發見洛氏何省燃料礦業公司的律師雷西·挪茨加特領有記事新聞(Chronicle News)及廣知報(Advertiser)兩種報紙；同時該公司又直接領有領袖報(Chieftain)。在其他工業區域中，洛氏集團

想經他們的經理人和律師秘密統治着許多地方報紙。挪茨加特曾利用他和柯省燃料職業區域當局的关系，將當地罷工工人提起公訴。據政府調查員發見，在記事新聞報館中竟儲藏着大批槍械子彈，專為供給鎮壓罷工的打手們之用。

前述工業委員會據洛氏私人宣傳代表李艾維(Ivy L. Lee)供稱，洛氏曾計劃以二十五萬元津貼全商業公會聯合會出版之全國商業雜誌(Nation's Business)。

當柯省燃料職業公會發生罷工風潮時，李艾維供給各報許多虛構的消息，同時洛氏集團正在設法購買丹佛洛山新聞報的統治權，結果未能成功。但另一方面，當洛克菲勒開始在各報大登廣告時，各報一般的批評論調，特別是各鄉村紙報的論調顯然漸趨和緩。洛克菲勒在全國各地大登廣告宣傳的出品是所謂內燃用的一種礦質油，這種名稱完全是為着便利在各反對報紙上送登廣告想出來的一種說法，因為煤油乃美孚油公司主要產品，實在不著廣告，如果照實登載，一定要引起社會的指摘。主軸滑油，是洛氏集團用以登廣告的另一種產品。

據C. W. 巴爾證明，美孚油公司經理阿弗瑞特·白德爾(Alfred C. Bedford)曾與哈維利週刊(Leslie's Weekly)訂十萬元，當白德爾與該報改裝時，該刊便突然重刊哈維利週刊(Harvey's Weekly)在歐戰期內及戰後，曾輸流從摩根，詹姆士·杜克，湯姆士·萊安和約翰·洛克菲勒手中每年領到十萬元津貼。

自一九二〇以後，洛克菲勒雖然爲了謹慎起見，已經將直接統治權交與和他們有聯屬關係的各家族如哈克尼斯與魏特尼等，但實際上，洛氏家族對全國新聞出版的操縱關係却無損無減。據一九三四年聯邦貿易委員會調查，新哲西美孚油公司曾於一九二七年送給該公司所附屬的柯羅利多省際瓦斯公司會計盧希 (J. B. Luce) 三十萬元一張支票，盧希將支票兌現後又轉給丹佛日報 (Denver Post) 發行人弗萊德·彭費爾 (Fred G. Bondla)。當時丹佛報對丹佛自然煤氣的訂價曾表示堅決反對。但當這筆錢達到以後，該報態度立即改變。同時，據聯邦貿易委員會調查，美孚油公司又送給丹佛市長五萬元。

一九二九年聯邦貿易委員會發見國際造紙及國際電力兩公司忽然對幾個重要日報中進行巨額投資。國際電力公司自始便受紐約柴氏國民銀行的協助；當時柴氏銀行已有洛克菲勒參加在內，所以國際電力公司之投資於新聞事業，即使不是主要爲洛氏集團利益而發動，至少也是和他們有密切關係的。

國際造紙公司，除了柴氏銀行董事在該公司董事會中佔有支配地位外，赫曼·詹南士、歐格登·費普斯 (卡尼基美國鋼鐵公司) 及紐約先施論壇報大股東歐格登·李德等也是該公司董事。

國際造紙公司對芝加哥每日新聞 (Chicago Daily News)、芝加哥日報 (Daily

Journal) · 阿爾巴尼晚報 (Albany Evening News) · 波士頓旅行導報 (Boston Herald Traveller) 布魯克林大廳導報 (Brooklyn Eagle) · 奧州新聞的記事報 (Chronicle) · (以上五家均屬於加奈德系 Gannett) · 新巴丹堡的先鋒雜誌 (Herald Journal) 及伊羅加的新聞雜誌 (Journal News) 均有秘密投資，此外還有二十五家大城市報紙正在計劃收買中。但經聯邦貿易委員會將這一秘密揭露以後，該公司幾要法將已有對各報投資轉讓出去，並停止新的收買活動。

洛氏家族和錢家主要新聞出版王朝都有很親密的聯屬關係。例如，愛迪絲·洛克菲勒係嫁給新聞巨子麥克米克家族。同時，許多和洛克菲勒有密切業務關係的個人，直接經營許多報紙雜誌。如日前哈克尼斯與魏特尼兩集團，便是經過直接投資經營關係，在新聞界中發生很大的影響。

#### 摩根集團 (J. P. Morgan Block)

這個偉大的私人銀行集團，爲了支持它的各家族利益，對於新聞出版的注意與關切也和洛氏集團一樣，並且它在新聞界中勢力的貫徹，普遍和始終不衰，甚至超越美孚油公司。摩根集團支配下的廣告總力，任何其他個別金融集團都不能望其項背。這個特點當然引起一切機構的獨立出版家對它的尊敬和注意。



康根公司第一次直接和新聞界發生關係，是在一八八七年，老J·P·摩根出錢給一個戲劇批評家威廉·拉芬(William M. LaFan)在紐約創辦太陽晚報(Evening Sun)。

一八九七，拉芬又將太陽早報(Morning Sun)收買過來。這兩個太陽報便成了康根在一切問題上的發言人。例如，關於巴拿馬運河黑幕一案中，這兩個報紙公開著老羅爾德·瓦里拉計劃宣傳計畫，圖為此項計劃是摩根及其親信暗中支持的。在摩根與其他商業界領袖與金融特權的隔門中，他們總是站在摩根方面說話。這兩個太陽報會舉動或變態都受其主持生意與陸的花旗銀行，對於麥金萊政府特別優待斯蒂奧與洛克菲勒等，表示不滿。後來，這兩個報紙對H·H·哈立曼和其他股東和康根銀行做對面在何方面對敵人，曾大舉攻擊，設法破壞他們的信譽。

一九一六年，太陽報改由一位很早以前便受雇於康根的弗郎克·塞塞接辦。據著穆塞便將該報和他在一九一二年收買的普來士報(The Press)合併。

由於他拿實和實情調查各報的方法，穆塞在新聞界中永遠是一個神秘人物。他的轉記作者發給。卜希特雖然搜集了所有關於他一生的重要事實，但可惜未能說明這個謎：一個頭腦清楚的人為什麼似乎毫無理由地故意破壞有價值的報紙財產？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研究穆塞不啻以鉅額代價所破壞的各報名單，如果我們再進一步查明這些報紙的政策，並且考慮到穆塞和那位狡猾的裴金斯的利害關係，那麼這裏面並沒有神秘難解之

處。穆塞將所有不利於摩根公司的報紙雜誌，不能如何美說，宣佈他們已死刑，另行創辦能夠對於在某時某地有關於摩根公司的計劃與政策，盡其應盡之美之能事的報紙。被他清算的報紙，有些是因對於摩根價值某項公用事業表示反對，便被穆塞設法收買過來將它關閉；有些是因爲會和摩根地方政治親信作過鬥爭；有的是因爲自由主義派報紙，其言論政策和摩根的金錢萬能與制制至上的哲學相反對。不管怎樣，這些報紙的消滅，都是對摩根公司有利的。

他的傳記作者說得好：「實際上，——如果不是在字面上，穆塞已經把他自己賣給摩根王朝。他和這個集團利害與共，休戚相關，摩根的意志就是他的意志，他在摩根的一切業務中取得了局內人的地位。穆塞激頭激尾是摩根的一個工具。」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穆塞的一舉一動係受命於喬治·麥奎斯。一八九〇年他第一次收買紐約明星報。原來此報係秘密屬於鐵道公司大亨庫里斯·洪丁頓 (Collis P. Huntington)，他利用這個報紙一方面替他的親友們捧場，一方面攻擊他的敵人。穆塞將該報買過後，又買回給洪丁頓代表約翰·考克里爾上校，改名爲廣知早報 (Morning Advertiser)，後來又被赫斯特買去。

一九〇一年穆塞收買紐約每日新聞及華盛頓士噠大報，於一九〇四年將前報停辦，將後者轉賣與赫斯特。一九〇二年，他又將波士頓雜誌買進，第二年便將這個雜誌和波

士頓新聞晚報一同關閉。總塞這種旋買旋賣或停辦的行動，是和摩根公司之興辦美國鋼鐵公司及萬國農具公司密切配合的，因為總塞四千萬元財富便是投在這兩個企業之內。總塞經過他統治下的報紙地命為這兩個新成立的摩根托拉斯鼓吹。

一九〇八年總塞收買巴爾的摩新聞報 (Baltimore News)，同時又創辦賓省太陽報；在一九一四及一五兩年又先後將兩個報紙停閉。一九一六年買進紐約太陽報，一九二〇年又買進班乃特隨家報紙。一九二三年他將一個自由主義派報紙紐約地球日報 (Globe) 收買過來，立刻便將這個多年來的摩根眼中釘宣佈死刑。一九二四年他從亨利·司徒德手中將紐約郵報 (New York Mail)，把它和紐約電訊 (Telegraph) 合併。紐約郵報多年來的一位秘密大股東，便是摩根夥友喬治·麥金斯。

所有這一切收買，創辦和停辦，需要成百萬的鉅款，這筆用款均由總塞經手投放於摩根統治下的各種證券投機。

一九二五年總塞去世後，太陽報和紐約電訊報所有權與京都藝術館 (Metropolitan Museum)。誠如紐約太陽報所指：「直到他的遺囑打開以前，沒有人知道總塞先生原來是藝術館的友人」。不過，J. P. 摩根是該館董事會主席，此乃衆所週知的事實，當時藝術館董事包括有裴恩·魏特尼、奈樂胡·特·喬治、巴克等及其他各大家族代表。總塞遺產共有一九七、四七、六八七元，其中有一七、三〇五、五九四元或

實業公司前和東部鐵路。

下列幾種新約的變更與經過上海特種在德政府所設銀行其總行在德方乃德意志銀行  
（Deutsche Bank）之德意志銀行之大銀行。經過德意志銀行之德意志銀行人德意志銀行公司（Deutsche Bank AG）  
或德意志銀行特種銀行之德國報紙德意志銀行。

茲將德意志銀行特種銀行，本報該報條例保證信託公司貸款一千一百萬元方式，而德  
意志銀行特種銀行最近均有六年曾來德意志。同時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  
之下，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  
事變或其中有一位事耶茲。施乃德。保該報前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

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  
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  
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  
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

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  
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  
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  
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

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  
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  
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  
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

親信影及喬治·裴金斯在指導秘塞之外，並且和芝加哥晚報，丹佛洛山新聞(Mountain News)及印地安那，慕西，特里根揭等揭明星報的發行入約翰·沙芬(John C. Saffner)保持非常友好的關係。所以沙芬系統下的各報，他們的言論主張常實和秘塞，哈威，拉勃與羅姆士·班乃特所宣傳的廢根政策不謀而合。

代表廢根的新聞聯絡人，在裴金斯之後，係由湯姆士·拉亞所繼任。關於裴金斯地位先在下圖還要提到。他在一九一八年公開從俄新瓦德·魏拉手中收買紐約晚報。在一九二二年又賤價轉售給柯蒂斯家族，據傳賤價二百餘萬元。

紐約晚報(New York Evening Post)於一八八三年屬於北太平洋鐵道公司創辦人亨利·魏拉特(Henry Villard)，後又傳與其子俄斯瓦德(Oswald)。在沙魏拉特註銷之下，紐約晚報在大多數美國新聞界中，宛如鷄宰之雞，成爲一個自由主義的報紙。但魏拉特時去以後，而倒金非，將魏拉特對歐運總統的批評態度立予中止，後來在柯蒂斯手中，該報更迅速變爲極端右派的報紙。

在讓出紐約晚報以後，拉亞特又暗中津貼該報文藝版主編亨利·塔日(Henry Sidal Copy)對塔日編六文藝評論。這個雜誌使廢根公司在將近二十年之內在密藉出版業中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由於拉亞特經常替這個出版業償付債務欠款，柯蒂斯雜誌又時常替塔日替塔日編的文章，因此塔日在一級人心目中極被公認爲廢根的文藝代言

雖然如此，與其說拉孟特是「新聞老闆」不如說他是一個新聞界的「精神操縱者」，更為重要。多少年來他担任克羅威爾出版公司 (Crowell Publishing Co.) 的董事，該公司所出版的美國雜誌 (American Magazine)，鄉村之家 (The Country Home)，周刊爾週報 (Collier's Weekly)，和婦女家庭之友等都是銷行遍全國的雜誌。自從拉孟特退居以來，摩根在克羅威爾公司的權益改由費凱特 (A. E. Lockett) 董事代表。

和摩根關係最直接的最重要的新聞雜誌，當首推太晤士出版公司，銷路最廣的太晤士週報 (Times)，替大富家族努力辯護的幸福雜誌 (Fortune)，規模最大的畫報生活雜誌 (Life)，和建築評論都是由該公司出版。有一個短時期，廣告業機關雜誌 (一時期月刊) 和拉孟特的星期六文藝評論 (Architectural Forum)，也是由該公司發行。在太晤士出版公司幾家大股東中有布朗兄弟哈立曼公司 (Brown Brothers Hariman and Co.)，(W. A. 哈立曼的金礦機關)，摩根公司 (由亨利·大衛孫代表)，蘇索特·杜克 (Rossolt Duke)，都蘭夫人，亨利魯斯 (Henry R. Luce 主編創辦人，大衛孫的木業至友)，紐約信託公司 (代表威廉·哈克納斯及美孚油公司)，威廉·格羅芬 (W. G. Griffin 詹姆士·布拉庇遺產的代理人，愛曼哈坦銀公司及二十間家其他公司的董事) 等等。由此看來，太晤士出版公司顯然是近現代美國金融界核心勢力的隸屬之下。

總它的出版政策一直到續繼事故無一不反映其主夫翁的意志。

摩根公司雖然憑藉它的廣告力量便已經對新聞出版界發生很大影響，但它仍舊是屬下的各公司保持它對許多報紙的直接統治權。摩根附屬公司統治各新聞紙最顯著的實例就在威爾遜路。布朗底斯代表政府訊問新海文鐵道公司董事長C. S. 梅隆時，報紙上。當時梅隆供認新英格蘭省有一千多家報紙在新海文鐵道公司的支出賬簿上每年付出四十餘萬元。直到一九〇二年，新海文公司所持有的波士頓導報的股票至少在四十萬元以上。

在這樣支配之下的各報，他們所著社論的影響，的確幫助了新海文公司能夠將它的股票抽備一般易款時中產階級投資券。摩根公司所支配下的其他公司，對於其他區域的報紙大概也有同樣的情形，不過是無甚可說罷了。譬如，貴省許多報紙很久以來便對美國鋼鐵公司對抗索局的種種問題上表示偏袒態度。

摩根公司和有權威的大報發生聯繫最近的一個實例，是經過鋼鐵公司和芝加哥每日新聞互相勾結。蒙持哥美。華特公司（摩根系）和美國石礦公司董事長，美國鋼鐵公司董事長威爾遜。阿維利（C. W. H. Avery），也就是這個芝加哥大報的董事。同時，該報大股東係一九二六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湯那克。諾克斯上校。此外，芝加哥每日新聞董事會完全是芝加哥各大商業銀行代表及美國中西部各省摩根所屬各公司代表所組成。

5. 諾克斯片係是撒斯特的公會導報 (The Worker Leader) 廣主人，一九三一年經查獲本報，遂成新的介紹，參加每日新聞報董事會。

6. 和在其他領域一樣，家族親屬關係幫助康樂集團擴大了他們對於新聞出版界的接觸與聯繫。例如，拉孟特家族和擁有萊斯莫尼記事報 (Des Moines Register) 與都會論壇 (Trihune Capital) 以及許多無線電廣播站的加德納·考萊士 (Garrence Cowles) 家族，便是至親。考萊士系各報是其和遠在中國部各州而領權報紙。

#### 福特家族 (The Ford Family)

據外間所知，亨利·福特祇有一次直接從事新報投資。那是獨立週刊 (Independent)，該刊在戰後每期銷路超過七十餘萬份。這個刊物比敵一般其他五項新出報的刊物，極成宏觀。它為雅陸和亞華，它特別對於猶太人舉行狂毀和攻擊。福特在這個週刊處化費了好幾百萬，不是發表他那一套心血來潮幼稚的幻想，便是宣傳極端分化的政策。自從獨立週刊於一九二七年停刊以後，福特便利用無線電廣播來宣傳他那種個人主義的，也對以這種態度主義的社會哲學。他的廣播評論旨在使金佛蘭登週刊注冊，卡門 (W. J. Cameron) 亨利·福特的汽車廣告使美國大部份新聞出版界都不能不表示尊重，以便得到福特們的光顧。



魏特尼、哈克尼斯、梅隆和阿斯托幾個家族 (Whitneys, Parkyness, Mellons and Astors)

哈克尼斯和哈立曼 (Harriman) 兩家，在太晤士出版公司中都有直接投資。該公司前出版之新雜誌不斷的頌揚哈立曼所屬企業和洛克菲勒以次的美孚油各家族，同時也不忘記時常着摩根家族及其所屬公司吹噓一下。這在前面已經說過。此外，哈立曼家族更與華特·阿斯托及約翰·海·魏特尼 (美孚油系)，又是公認宣傳華爾街政策的每週新聞雜誌 (News Week Magazine) 股東。每週新聞在紐約以外各州銷行甚廣，僅與太晤士週刊相匹敵。這個雜誌最大的股東還是公用事業業銀行家斯他林·傑爾德 (Sterling W. Childs)，和一位華爾街律師兼各公司董事威爾頓·洛德斯密 (Wilton Lloyd Smith)。

阿斯托家族分兩支，一支在美國，一支在英國。雖然美國這一支在五年以前在新聞界中並無顯著勢力，但美國那一支 (他們的大部份財產初是在英國) 却是全世界最有勢力的新聞家族。羅盧茨美 (赫斯特)，學文布洛克 (Rothbarber, Hearst, Foster, Brooks) 等所辦新聞大王亦難望其項背。自一九二一年以後，約翰·維多布·阿斯托 (John Walter) 所創辦。華爾頓家族統治這個報紙經過了兩代，終於一九〇八年以一、

五十二、〇〇〇元代價賣與北巖公爵 (Lord Northcliffe)。北巖公爵逝世後，這個代價大英帝國約戰者又以六、五四七、五〇〇元代價轉讓與約翰·雅各布·阿斯特和約翰·麥爾斯。阿斯特和麥爾斯是阿斯特家族的祖先。阿斯特在十九世紀末葉下層貴族以後，立刻便打進了新聞出版界，做爲抬高股份，獲取貴族封號的進身之階。他先後收買了池沫公報 (Pall Mall Gazette)，倫敦觀察者 (Observer) 及其他各種報紙雜誌，其持有許多至今仍在他後裔統治之下。

本報士報講於英國內政外交的偉大影響，但阿斯托家族因之亦儕於世界各大新聞事業主人翁之列。本報士報政變雖然只是保守主義的，甚至在社會思想上是反動的，但該報的新聞記載從未發生故意歪曲事實被人指摘的事。就這一點來說，美國那一家報紙都比不上本報士報，正如曼徹斯特導報在新社論與新聞記述方面，其自由主義精神在美國也找不到同等的報紙這樣。

安德魯·梅隆之子保羅·梅隆也是每週新聞的股東。這是梅隆家族第一次參加全國規模的新聞運動。查爾斯·梅隆便已經直接投資經營，威爾遜接續縱使皮特爾堡一帶的報紙，大部份都是與他無涉。弗力克探與協同合作。現在皮特爾堡唯一不迎合梅隆觀點（雖然還不是尖銳的對立）的大報就有赫克利普斯——雲瓦德系的普萊士報。赫克利普斯的大報訊 (Sun Telegraph) 和波斯特公報 (Post Gazette)。其露骨捧場態度，即梅隆自認

的聲譽亦不過如此。

### 杜邦家族(The Du Ponts)

華盛頓唯一的兩大報紙——每晚雜誌和晨報(Journal Every Evening and Morning News)，是在杜邦的克利斯坦那證券公司(Christiana Securities Co.)手中。當歐戰期間杜邦家族內部發生分裂的時候，阿弗瑞德·杜邦將晨報買進用以反對參議員亨利·阿爾各漢·杜邦。同時裴爾·杜邦也收買了每晚雜誌反對阿弗瑞德。後來電派糾紛在法院判決，阿弗瑞德敗訴，裴爾經過摩根公司幫助他一筆貸款，由阿弗瑞德將晨報讓與裴爾。同時裴爾又收買了每日晚報，將它與每晚雜誌合併。

杜邦在新聞界的影響，並不限於華盛頓與德拉威爾區域。他們的間接影響和潛勢力也是很大的，因為在這個家族統治下的許多公司，如通用汽車公司(杜邦握有百分之二十五的股束)，杜邦公司和美國橡膠公司等，擁有很大的廣告權力。

裴爾力著·諾維巴克在其所著私營軍火企業概況一書中曾指出：「非常明顯，杜邦對於其所屬各公司廣告的控制力量，使他在新聞界當然要發生很大的潛在影響。這種影響尤為危險的，因為它經過雙方(報館與杜邦公司)廣告經理的正式或非正式談判中，可以很容易地很自然很秘密地達到他們利用新聞出版的目的」。

據威廉·湯姆生上校於一九二〇年對參議院委員會證明，美國外語新聞聯合會的報費是爲了利用各大公司的廣告力量來統治銷數共約五百萬的國百餘家外國語報紙。該聯合會創辦費五萬元由湯姆生捐出，基金四十萬元，均係由杜邦、道奇、梅隆、顯赫、聯邦、摩根的保證信託公司等捐助。據湯姆生說，這個聯合會目的是爲着向這些外語報紙灌輸「美國精神」；但許多民主黨參議員却認爲支持這個聯合會的人們，他們的實際目標還是爲了各金融集團及共和黨利益，使這些外語報紙就範。

### 麥克米克王朝 (McCormick Dynasty)

麥克米克不單是各大產業王朝之一，同時也是一個新聞王朝。這個家族多年以來曾爲爭奪他們老福宗席魯支斯·麥克米克的遺產而發生內部分裂，其中一支仍得佔有麥克米克農具工廠，另一派別參加了約瑟夫·米德爾 (Joseph Medill) 的芝加哥論壇報的經營，由於利害相同的關係，後來這兩個支派又漸重歸於好。

約瑟夫·米德爾之長女赫瑟林嫁與外交家羅伯特·麥克米克爲妻；其次女嫁給論壇報一號編輯羅伯特·裴德孫 (Robert W. Patterson)。第一對夫妻生出兩個兒子，長子爲米德爾，麥克米克，曾任參院議員兼論壇報發行人，現已去世；次子爲羅伯特，麥克米克，即現任論壇報之發行人。第二對夫妻生一子一女，子名約瑟夫·米德爾，裴德

瑟沙安名暖淋諾爾·麥德烈。約瑟夫·麥德烈現在是美國銷路最大的紐約每日新聞報的  
主人。愛琳諾爾·麥德烈現任赫斯特的華盛頓先鋒報 (Washington Herald) 的主編。  
最近赫斯特將該報租讓給她。

雖然芝加哥論壇報和紐約每日新聞兩個報紙同屬一個家族集團所有，但是兩個報紙  
的言論主張却時常互有歧異，完全是將各該地區的觀點見解和各該報紙的大股東們的地  
方需要如何而定。芝加哥論壇報在美國各報的銷路中佔第二位，該報對一九三六年的新  
政表示贊決反對，而同時紐約每日新聞報却是新政的擁護者。兩報態度觀點的不同，有  
些地方是由於主持人員麥德烈和麥克米克的個性互異。

麥德烈曾經一度是自由主義改良派，當一九〇五——〇七年在職於芝加哥市政府時  
又傾向社會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會服兵役，擢升上尉隊長，返國後埋首經營每日新  
聞報（創辦於一九一九年，當時投資主要目的係為逃避戰時所得附加稅），決心使該報  
成爲一個賺錢的工業。麥克米克在一九〇五至一〇年間曾任芝加哥衛生實驗區主席，始  
終是一個極端保守派。

最近若干年麥克米克在芝加哥派別紛歧的新聞界和政界上種種極端行爲，使他爲  
訪遊被人時時不得不像舊時中國軍閥一樣坐在裝甲汽車上往來於辦公處和他的伊里諾  
亞州和鄰省。但這不足奇，現在美國大多數富翁們都隨身有許多私人武裝衛隊隨

著。從一九〇〇到一九一二年這個時期內，芝加哥論壇報在其發行區域內不斷這字赫斯特武裝打手的干涉與破壞，該報爲了自衛，便也雇了一批打手與之對抗，最激烈的流槍械鬥竟繼續了兩年多；芝加哥各幫流氓的械鬥，當以此爲嚆矢。同時，芝加哥許多流氓匪幫大都會經受雇於報紙的打手，他們從前在各報發行人法律顧問教導之下，都學會了如何逃避法律干涉的技巧。

芝加哥論壇報的投資表面上分爲兩千股，每股票面價值定爲一百元。但在所有股票中有一〇五〇股屬於米德爾信託公司，也就是說屬於米德爾的繼承人羅伯特·斐德孫和羅伯特·麥克米克夫婦和他們的兩個子女。羅伯特·麥克米克之長子米德爾·麥克米克娶馬克·韓利之女兒爲妻。韓利也是一個新聞志願，他這個家族在社會上和政界上的地位主要是靠着自已辦有報紙。

米德爾信託公司被信託給幾個巨頭，除了麥克米克和斐德孫爾。斐德孫爲了保持十個董事會的地位所必需持有的股票以外，都沒有股票，這還是他們逃避遺產稅的一種有效的方法。麥克米克和斐德孫現在祇收入稅利進款，用不着交付遺產稅，將來他們逝世時，再以太樣信託方法轉給他們的子女。例如，米德爾信託公司便於一九三五年替他的遺產成立一個信託公司，其唯一條件便是憑着繼承他從米德爾信託公司所得的進款。在這一時期，斐德孫和麥克米克曾經替自由雜誌(*Liberty Magazine*)，但總不賺錢。

。後來他們將這個雜誌和馬克頓交換，改辦狄德羅一個小報明鏡日報(Mirror)，結果在十個月內累積三百萬元。但這個他們是籌備起的，因為芝加哥論壇報和紐約每日新聞在一九二八和一九二九年淨賺一千餘萬元，在一九三三年賺六百七十餘萬元，當時芝加哥論壇報原來的兩千份股票每股價值達二萬六千八百元(票面價一百元)。

芝加哥論壇報是美國一個極端保守的報紙，在當地早報銷行中差不多居於獨佔地位。這個報紙公然歪曲新聞，捏造事實，封鎖消息，凡有利於羅伯特·麥克米克和太富集團者，無所不用其極，從社會公益方面來者，沒有一家報紙比這個報紙，更惡劣的了。

顯根翰姆家族 (Guggenheim Family)

顯根翰姆家族在新聞界的勢力不甚顯著，這個集團或者也和巴克，費許，費爾特，萬德比，勃文等家族一樣，在新聞領域內能夠附屬於康泰公司之後，便躊躇滿足了。雖然如此，顯根翰姆家族在凡有他們礦業和政治權益的區域，仍是直接參加新聞界出版的營運。例如，據顯根翰姆傳記者哈威·歐廉諾所寫，顯根翰姆家族實業議員顯根翰姆以賄賂詐騙方式當選以前，曾在蒙維劇游民主導報(Herald Democrat)。美國西部各州礦業資本家向例都是在各自勢力範圍內籌辦報紙，顯根翰姆大夥也不免有直接經營或轉對其地新聞出版的舉。

歐戰發生後，一九一五年美國金融產業與政治各界發起成立和平促進會 (League to Enforce Peace)，以動員新聞界與論督促美國參戰為目的；當時羅拔·赫德曼經過蓋那特·巴魯捐助巨款。其他各大產業代表們如查理士·薩瓦普 (軍火業)，阿道夫·威維森 (銅礦業)，道奇 (銅礦業)，詹姆士·庫贊 (福特汽車公司)，麥克米克，J. P. 摩根，德外特·馬羅等亦均有巨額捐獻。

所有鉅富家族大部份都直接間接參加這一類在龐大資金支持下的新聞動員，其目的顯是爲着爭取廣大民衆對於他們所主張的政策表示擁護。

### 柯蒂斯——布克王朝 (Curtis—Bok Dynasty)

柯蒂斯——布克家族，是一個比麥克米克更接近新聞出版界的家族，他們的財富亦得以列入六十家大富之林，主要的是由於經營新聞事業。柯蒂斯——布克新聞事業成功之秘密是在於大量散播中產階級的偏見，爲一般大富階層效勞。他們這種新聞宣傳政策，在一些特殊事件上是爲了某些個人，在一般問題上是爲了整個財富階層。在他們走上積富之路的時候，這個家族和德萊克梭公司 (Drexel and Co.) 及摩根公司幾家公司是有密切聯繫的。

席路斯·柯蒂斯在一八七五年創辦婦女家庭月報 (The Ladies' Magazine) 等



一八九七年又以二千元代價收買星期六晚報；一九一三及一九一四兩年又接連買進鄉村紳士報 (The Country Gentleman) 和大衆雜誌 (Public Ledger) 兩個刊物。許多年來，柯蒂斯家族在費倫新聞界中居於半獨立地位。總計起來，約有七家費倫報紙先後歸入柯蒂斯家族手中。此外，這個集團在一九二二年又買進紐約晚報，經營了十年轉售出去。當如衆雜誌買進以後，不久他們又開始創辦每晚雜誌 (The Evening Ledger)，又與費倫晚電訊報 (Evening Telegraph) 合併。同時費倫北美雜誌和普萊士雜誌也歸於柯蒂斯集團。一九三〇年，柯蒂斯將訊問者雜誌 (Inquirer) 從艾文生家族 (Eaton) 手中買進。後來，在一九三六年又以一千五百萬元代價買給赫斯特出版公司前推廣部經理安。以上這三大雜誌，銷行遍全國，這使柯蒂斯家族的勢力也隨擴展到費倫以外。在政界方面，這個家族全體都是共和黨；在社會方面，他們所做所為都是穩健保守派。關於這個家族的業務領袖是約翰·馬丁 (John C. Martin)

### 赫斯特及保爾·布拉克等集團 (Hearst, Paul Block, Etc.)

赫斯特家族並不屬於六十家首富之內，祇能列入九十家次一級的富戶。雖然如此，赫斯特在新聞界的權勢却遠過於其個人財富（不及三千萬元）應有的權力之上。和柯蒂斯及保爾·布拉克大的財富累積方法不同，赫斯特的財富不是得之於新聞事業，

總之，這種家族的致富是由於十九世紀時加拿大礦業發展，威爾遜的從礦業中獲益，主要的基礎是斯托克、洛德和荷維斯白克礦業公司，另外還有一些別的礦產，如安那達達礦等。現在名揚國內外的威爾遜、胡漢傑夫、威斯特(Wilson, Hurd, West, Hurd, West)雖然就活著那麼許多報紙雜誌的龐大累積財產，但他主要的並不是一個新聞出版發行人。儘管一般人是這樣看待他，威斯特主要的財產利是發現在他握有荷維斯白克礦業公司(威爾遜)的次批股票，其次為一些地產和若干煤礦財產。但威斯特(威爾遜)太都都已還押出去，或用存銀行優完股票及向銀行貸款的擔保。

總而言之，就他的財富來源和派基說來，威斯特是屬於美國大財富集團的小圈子內的，雖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他還是以獨立產業家的姿態熱情協助他的新聞力量的一切反對他的勢力。不說其為貧富上下相對抗，橫衝直撞，開闢他走上政治經濟權力之路。但是銀行資本的發展，使頑強的威斯特終於跳不出它的掌心。現在他已經不得不向柴氏國民銀行和花旗銀行負欠巨額借款。如果沒有各大銀行和大富豪派第爾在背後支持他，他將寸步難移。

通過新特系統，美國銀行資本完成了它對全國新聞出版業的普遍控制，當然另外還有些個別情形係由銀行資本與新聞業發生直接接觸，這在以後我們還要說到。威斯特的新聞系統包括以下各報：在紐約市內有日報(The Journal)，明鏡報(The Mirror)



，美國建築月刊，城市與鄉村 (Town and Country) ，家庭與社會 (Home and Field) 在英國，他所經辦的雜誌有：賞鑒者 (the Connoisseur) ，那希雜誌 (Nash's) ，與家政月刊。關於無綫電方面，赫斯特領有十幾個廣播站。

赫斯特在皮特 堡波斯特公報 及米爾瓦基前哨報的發行代表保羅。布拉克 (Paul Block) 另外經辦，和部份領有托來多的布雷德雜誌 (Blade) ，紐瓦克鵬星報 (Star Eagle) ，德魯茨新聞論壇 (News Tribune) ，托萊多太陽士報和德魯茨導報。一般人都認為赫斯特對這五個報紙雜誌均有投資。

赫斯特對於所有在他經辦的各項新聞事業參加投資的各大富戶們，始終保持一個原則：辦報能夠賺錢雖然最好，但並不一定要賺錢。他經辦至少有十種以上的報紙雜誌，在商業上是賠錢的，但他還繼續維持不輟。但這些賠錢的報紙都發揮了其應有，政治影響，同時所虧損的錢，可以從別方面賺錢的財產，從聯合持券公司所減付的所得稅款，以及從赫斯特的金礦和銅礦中足以得到補償。總而言之，這些賠本的赫斯特系報紙是有津貼的。程濠似後也是化費驚人巨額代價購買毫無盈利的新聞資產，但是當時他主要的目的，在盈利方面者少，而在宣傳壓根政策者多。一個新聞紙儘管在其賬簿上看不是商業盈餘，但對它的主人在政治影響方面却可能是有利的。

赫斯特新聞事業的領域，還包括有各種新聞電信社在內，如國際新聞社，寰球新聞

服務和全民通信服務等。另有最有名的週刊 (American's Weekly)。隨着赫斯特所辦各報刊例，每刊發行在五百萬份以上。統計起來，每天閱讀赫斯特系報紙雜誌的人數超過一千萬人，約佔全美國年人口百分之十以上。

赫斯特前辦開政變從一八八七年從他父親手里接辦舊金山考察者日報之日起，便是極端保守，自私和反社會的。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赫斯特系報紙完全是為大財富集團服務，主張提高等價稅，反對失業救濟等等，在最近幾年以來，這些報紙更顯然地成了替著名反動紳士白蘭聖宣傳的機關喉舌。

### 奎爾斯——李維集團 (Kills Reid)

奎爾斯——李維家族頗有共和黨主要的全國機關報——紐約先鋒論壇報 (Parade Tribune)，和巴黎華報。紐約先鋒論壇報係於一八七二年由赫特勞，李維所經手購置。赫特勞，李維之妻係加省大礦商達利士·奎爾特之女。他們所生的兒子便是現在的家族領袖，先鋒論壇報主筆歐格登·奎爾斯。

奎爾斯。李維家族在財富方面是列在六十家之內，在政治方面他們的勢力更為巨大。歐格登·奎爾斯之繼續梅隆任財政部長，便可證明。

赫特勞，李維太太在她丈夫去世後，多少年來雖離出歐蘇約論壇報，但繼續入職大

投資收入中撥出一部分基金津貼該報。紐約論壇報是在一九四二年以五百萬代價從穆塞手中買進，自從與紐約先鋒報合併後，每年盈餘甚大。當李德收買論壇報時，也許是因爲價錢過大，李德開始穆塞一張私人期票；穆塞死後，這張期票轉歸京都藝術館。到了一九三三年，這張支票滿期應予兌現，京都藝術館便將牠轉交該館財政監理人摩根公司。經過三年期間這張支票迄未兌現，後來亦無下文。所以，根據這個欠款支票以及其他實際利益關係，紐約先鋒論壇報應該算爲在摩根直接影響下的報紙。該報在許多事實上的表現，也是以證明。一般的來說，這個報紙的社論主張總是適合支配共和黨的財政資本核心集團的利益的。

#### 安那康達銅礦公司 (Anaconda Copper)

花旗銀行（斯蒂曼——洛克斐勒——戴樂仁——麥恩等）統治之下的安那康達銅礦公司，是美國最大的新聞發行人之一。蒙坦那（Montana）所有屬於新聞聯合會的報紙，差不多都歸它所有。

現在安那康達銅礦公司直接經營的報紙有：布特礦工報（Butte Mines），安那康達標準報（Standard），布特日報（Butte Daily Post），海蘭那獨立報（Helena Independent），記錄導報（Record Herald），米蘇里報，米蘇里聯邦報，畢林斯公報，和利文

額金雜誌 (Interprice)。

各銀礦資本家反映在蒙坦那報紙上，激烈的明爭暗鬥，曾繼續了好幾年。威廉·克拉克 (William A. Clark) 在十九世紀末葉收買了布特礦工報，主要的是拿這個報紙攻擊他的老對手，安那康達銅礦公司主要創辦人馬爾克斯·達雷 (Marcus Daly)。

達雷爲了報復克拉克的新開圍攻，他也創辦一個報紙——安那康達標準報，聘一位塞拉河沂大學前任教授擔任主編。最出名的是該報將克拉克賄買參議員議席一事公開揭露，因而引起克拉克的被參議院驅逐一事。據傳，直到他逝世時，達雷在標準報身上所破費的銀約在五百萬元以上。

威廉·克拉克之子係一改良主義者，他在他的報紙——礦工日報上對於銅礦公司繼續行爲會不諱予以嚴厲批評。例如，在一九三八年，曾在報上指摘銅礦公司逃避國家捐稅；將這賄賂新聞報紙與封鎖消息，特別是關於鎊工人的消息；取消工人學校以防止自由思想；從上到下操縱蒙坦那省政府等等罪狀。安那康達銅礦公司對克拉克的答覆，是嚴密將該報的統治權從他手裏收買過來。

小克拉克自己又創辦蒙坦那自由日報 (Free Press)，繼續他的舊門，企圖選出一位共和黨員擔任蒙坦那州長，以代替安那康達鐵籠下的民主黨代表。但銅礦公司馬上動員各有關公司對他實行廣告封鎖，一致不在自由日報上登載廣告，使克拉克被迫不得不

將該報出賣。

聯合銅礦公司集團在奧多斯圖·海爾茲領導之下，經過二十七家蒙坦那報紙和安那康達門等，直到一九〇七年經濟恐慌到來時方纔停止。據海爾茲所雇專寫社論的代表歐曼來爾 (P. A. O'Farrell) 寫給 C. W. 巴爾的信上說：「我每天看這些報紙撰寫社論，幾乎覺得要死；可是當地一般讀者還認這是各報編輯的意見，視若金科玉律呢。」

巴爾在他所發表的回憶錄中同時又引證了布特前任市長約翰·馬克金尼斯在一九〇四年的話：「在安那康達銅礦公司的薪金名單上，領乾薪或津貼的份子有好幾千個。該公司化費在蒙坦那省各報上的錢，一年工夫即在五十萬元以上。」

#### 飛力普道奇公司 (Phelps Dodge Corporation)

飛力普道奇公司集團，通過道奇與詹姆士家族私人關係，也算是附屬於花旗公司的一個集團。這個集團對該公司主要產業所在地——阿瑞柔省的報紙，也具有同樣間接的所有關係和支配權力。拉甫·艾雷伍德 (Ralph E. Whitewood) 他的父親是道奇公司總編輯，辦有特新康市的明星日報。畢斯比市的評論報和歐洲晚報，是由附屬於飛力普道奇公司的柯榮士出版公司 (Cochise Publishing Co.) 所經營。同時，阿瑞柔省不屬於該公司的各報，也對它保持很好的友善關係。例如，一九三三年所有阿瑞柔各報都一致拒



總統表關於一位當地政署和建築汽油管的舞舞案。遠在數千里之外的洛山磯太晤士報曾將這件事實製成幕幕發出來。

### 其他各集團

經濟學家的新聞紙活動力範圍包括了所有各部門。例如，著名的紐約雜誌 (New Yorker) 便是由經濟學巨擘弗萊什曼 (Paul Felschman) 投資經營。這個雜誌以無傷大雅的談話諷刺和漫畫來諷刺金商產業政治界要人的故事和文字，甚受讀者歡迎。美國水星月刊 (the American Mercury)，自一九三五年被鋼鐵資本家阿道夫·劉維松 (Adolph Lewisohn) 的親戚購買過去以後，言論與作風立刻變為極端保守派。

二三等的大都市報紙，有許多係由兩大政黨的政治代表所經營。這些報紙雖然不是由各政黨直接所擁有，但其言論政策也和受津貼的鄉村報紙一樣。基本上對於他們的利益極是多方保護的。例如，密西弗委，新滿快報的發行入是一位無名無姓的民主黨政客馬席·康諾爾 (William J. Connor)；巴弗莫太晤士報係由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席爾曼·麥克 (Herbert H. Mack) 經營，直到一九二九年才被斯克利普斯——霍瓦德購去。費非斯報係由紐約的大股東倫道爾凡尼遜省實業家協會的政治活動人共和黨聯邦代表約瑟夫·希隆地。紐約時報的太陽士報報和洛山磯太陽士報報發行入。讀者

是一位共和黨富翁和自由同盟會員，後者也一位有錢的共和黨人。

在政黨機關報與直接屬於各大富豪族的報紙兩大勢力層之間，還夾着一層「獨立的報紙」。這些獨立新聞雜誌，不僅並非真正獨立，而且為數不多。屬於這一類層的有斯克利浦斯——霍瓦德系各報紐約太陽報，巴爾的摩太陽報，聖路易快報日報 (Post Dispatch)，波士頓傳斯克力普報 (Transcript) 等；另外還有其他較小報紙，但數量甚小。這些報紙的獨立精神，主要是表現在大吹大擂堅持他們在共和黨與民主黨候選人之間有抉擇自由權利。在關於經濟和社會問題方面，這些報紙在基本上常常是和亨利·福特，杜邦和摩根等集團相一致的。所不同者是在細枝末節，大份是關於某些特殊事件，隨統治各報的大亨或津貼各報的政黨直接利害關係而各異其趣。

斯克利浦斯——霍瓦德系統包括近三十種報紙雜誌，分佈於美國美洲各地，另外還有合衆社，聯合通信社和新聞企業協會。這個系統最初是在E. W. 斯克利浦斯經營之下漸漸發展成爲一種龐大的商業性企業。E. W. 斯克利浦斯死後，他的兒子仍繼承大部份所有權。其次幾個大股東都是各報的主要董事與發行人，最著名者爲董事長羅易·W. 霍瓦德。在老斯克利浦斯主持之下，這一系的報紙曾登載許多關於政治與社會很有有效的批評文字，大份是關於地方市政和省政的事情。斯克利浦斯——霍瓦德系統繼續在地方問題上做這種口誅筆伐的工作，但總是很小心避免侵襲到那些有權勢的幕後操縱人物。

一般人都認爲自從老斯克利浦斯死後，這一系統下的各報其進步精神祇是限於過去的歲月 and 表現在地方的問題上，一九一二年斯克利浦斯系各報的一致擁護威爾遜，大部份係由於查理士·克蘭因 (Charles Crane) 的影響。歐戰以後，這些報紙逐漸屈服於金融資本威權之下。一九二四年大選時，這個系統下的克里伍蘭城普萊士報積極擁護拉福雷特爲大總統，在報紙宣傳之下，除了維斯廉辛以外，克里伍蘭是唯一擁護拉福雷特的大城。

一九二八年，斯克里普斯——霍瓦德新聞社，宣佈擁護胡佛，因爲希望他當選後可以大規模發展公用事業和加強政府統制。一九三二年大選時，該社擁護前陸軍部長牛頓·巴克爲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巴克是該社律師湯姆士·西德羅的夥友，同時又是萬施威利根公司 (摩根系) 的顧問。

當弗蘭克林·羅斯福取得總統候選資格時，斯克利浦斯——霍瓦德系統下各報也和赫斯特系一樣，雖然也表示擁護，但多少總有些失望和勉強。一九三六年，羅斯福參加競選運動時，斯克利浦斯——霍瓦德系各報竟完全支持共和黨候選人蓋敦。羅斯福再度當選後，號稱自由主義的這個新聞系統，不單反對極端頑固派的美國最高法院的改革，並且以隱蔽的方式在各方面進行反對羅斯福的新政計劃。

斯克利浦斯——霍瓦德系的報紙雖然在表面上自稱擁護工會組織，並且也的赫比其

他各種多登載關於勞工界的新聞消息，但是，同時他們對於約翰·羅維士的產業組織委員會組織重工業工人的運動都盡量加以攻擊和阻礙。他們堅持反對他們所屬的職工參加英國新聞業工會，並且採用各種手段從中破壞，所兼的只是沒有像赫斯特系及聯合新聞系那樣公開和露骨而已。

自從羅易·霍瓦德在斯克利浦斯公司中握有大權以後，這個系統下的報紙更加矛盾百出，該報在政策主張上是反對壟斷公司的，但他們本身便是隸屬於一個壟斷公司；他們一方面攻擊華爾街發售無選舉權的股票，而同時該系各報却將無選舉權的股票賣給他們的職工。

一九三六年，斯克利浦斯系各報聘任巴魯的私人秘書胡夫·約翰孫 (Hufsch) (Johnson) 爲副刊主編，鼓勵各副刊編輯以情感動人的文字模糊讀者對於各項社會問題真相的認識。另一方面，該系各報仍舊繼續登載各項進步主張的文字，常常不免引起某些地方大富翁的不快。

斯克利浦斯——霍瓦德出版社是經過一個蛻變過程的，每一次轉變，都更加顯明的表示它禁不住金融資本魔方的吸引與誘惑。羅易·霍瓦德個人野心很大，且富冒險精神，他認爲赫斯特失敗了獨立奮鬥的冒險遊戲，在他手裏也可以做倖成功。他將若斯克利浦斯遠離紐約範圍的違訓完全置之不顧，於一九二七年毅然購買穆塞和班乃特經營的

紐約每日電訊。一九三一年他又從普列塞兄弟手中買進紐約世界日報與世界晚報，併為世界電訊。所有這一切需要鉅額資金，其貸借來源那脫離不了摩根公司的勢力範圍。為此該社於一九二八年經過保羅信託公司（摩根）全圖化學銀行（蘭萊特）及丹佛爾公司（丹佛爾）等發行八、五〇〇、〇〇〇元的債券。如果這些債券不能證明盈餘的話，那麼斯克利蒲斯——霍瓦德系各報勢必直接歸於各銀行由掌握。

另有幾個報紙系統，也和克利蒲斯——霍瓦德一樣，完全按照商業經營，但他們對於泰爾佛的社論政策則在李德爾兄弟公司（Kiefer Bros）指撥之下。屬於這個系統的報紙有：紐約商業雜誌（Journal of Commerce）、韓文紐約省新聞（New York State Zeitung）聖保羅郵報、聖保羅前鋒日報，與聖保羅每日新聞，阿伯登美國人報，阿伯登晚報，及大佛克導報（Grand Forks Herald）。在圖雅爾太晤士報、李德爾兄弟公司也有一部投資。密其干省由布萊系統（Booth Chain）和加里佛尼亞省的麥克萊賽系統（McClatchey）各報也是同樣情形。

巴爾的摩太陽報（早報及晚報）係調該報幾個主要職員自己經營，頗負自由派報紙的盛名，因為該報對於濫用私刑及同類非法事件不情痛加抨擊。太陽報的自由主義精神是屬於南滿是民型的，那就是說它對於現代許多社會問題仍是十分保守的。這個報紙外邊中乾的實質，在一九三六年全國大選中可以充份反映出來。雖然該報幾十年來都是

站在民主黨方面，對於克里伍爾和威爾遜，甚至對於考克斯和大衛士，屢屢總統都是毫無遲疑表示擁護，但是它對於這位南北戰爭以來第一個總統企圖實現傑佛遜和傑克遜原訂黨綱的弗蘭克林·羅斯福却起而反對。巴爾的摩太陽報雖然不歸金銀資本所屬有，對許的羅受華爾街的支配，但是這個報紙在精神上是和金銀資本相一致的，它反對黨底改革，並且開始走上極端保守派之路。巴爾的摩太陽報和紐約太陽報的不同祇是在程度上的差別而已。

聖路易快郵日報 (St. Louis Post Dispatch)，在小約瑟夫·普列塞手中已經發展成爲一個賺錢的產業。該報當一九三六年大選時，也一反其多年民主黨傳統，反對羅斯福連任。不過，該報雖然從未完全奉行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普列塞傳統精神，但在有一個時期也的確做了許多值得讚美的好事，例如關於提拔東油田黑幕案，祇有聖路易快郵日報一家堅持於一九四二年繼續澈查；它反對判處兩個無罪的意大利無政府黨人沙可與樊士蒂 (Sacco and Vanzetti's) 的死刑；它爲被囚禁的無辜湯姆·穆尼 (Tom Murray) 公開辯護等等。

普列塞另一後代所經辦的世界日報，其成就表現遠比不上聖路易快郵日報。一九二〇年該報之所以揭露三K黨內幕，完全是另有動機，爲了爭取紐約廣大天主教和猶太人的信仰。在戰後同一時期，該報主任編輯係赫伯特·巴亞特·斯沃普——一個證券投機

家，通用電氣公司董事長格拉特·斯沃普之弟。該報最初由弗蘭克·柯布主編時，曾以犀利筆調不斷抨擊一般權富階級的種種違法行爲，但不久柯布便被撤換，改由華爾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 撰寫社論，言論態度立趨溫和，一九二八年該報爲了擁護阿弗瑞特·新密士當選，曾把斯密士所屬，聲名狼藉的「新塔梅尼社」吹捧成爲一個改革一新的半慈善性社團。

在我們結束本章以前，有兩個不牟私益，而以促進社會公衆福利爲職志的雜誌，值得特別介紹。一個是民族週刊 (The Nation)，創始於一八六五年，曾一度與紐約晚報合併，旋又分開，該報多年來都是由一位鐵道建築家之子阿瓦德·加里孫·維拉德 (Oswald Garrison Villard) 主持。維拉德雖然不是大富翁，但他家也是十九世紀時的富戶，他的收入全靠這個繼承下來的遺產。另一個雜誌是新共和週刊 (The New Republic)，創辦於歐爭爆發的前夜，經費係由威拉特·斯瑞德 (Willard Straight) 及其夫人 (威廉·魏特尼之女) 供給。

這兩個雜誌復久以來便代表着美國新開界最優秀的傳統，他們在始終如一，腳踏實地喚醒社會意識，散播社會，政治和經濟改革的自由思想方面，確有不少貢獻。如果美國新聞事業要實行整頓的話，一般說來，其所遵循的路綫應該便是民族與新共和週刊所早已指明的路綫。這兩個雜誌如果說會要失敗的話，那麼它們失敗的地方就在它們未能

像戰前「暴露性」雜誌和老世界日報那樣，擷取動人聽聞的材料，來擴大它們的銷路與影響。在這紛亂擾攘的社會中，這兩個刊物也許顯得大呆滯，太學院氣了。但無論如何，這兩個刊物所收到的津貼和捐助都是明顯的爲了公衆利益，隨着時日推移，它們所散播的思想終有一天會清除掉赫斯特，麥克米克，哈立曼，阿斯托，摩根，洛克菲勒，梅隆和拉孟特等人所經營的自私自利的新聞事業。

根據上述，顯然可以看出美國新聞事業是在美國金融資本的鉅富家族直接領有和統治之下。這些報紙不祇是受廣告控制或既定社會制度所產生的財富思想意識的影響而已，他們是如影之隨形，聲之於響，直接反應着這些從社會上吸取龐大利潤的富豪們的一切意願。他們是一種鉅額投資的企業，不論賺錢與否，它們的經營與存在都是爲一個特殊的社會集團利益而服務。



## 第八章 金圓控制下的新聞活動

出版自由在美國大部份是一種理論上的說法，是含有一種特殊意義的，它至多不過包括各政見不同的小集團對各自範圍內羣衆有發行少數報紙雜誌這一點微弱的權利而已。當一個刊物所倡導的思想至不合於大財富統治集團的胃口，而銷路甚廣時，它一定要被迫停刊，有如歐戰前盛行一時的暴露性的雜誌一樣。

一般出版家所津津樂道的出版自由，其涵意並不能照字面解釋，刊物出版需要脫離一切外力的限制與影響；所謂自由不過是要求不受政府的限制與干涉而已。正式爭取出版自由的爭鬥始於十七世紀時的英國，當時新興的工商業階級已經能夠勝利地和王室貴族相對抗，因而起來要求政治權利。在那一次爭鬥過程中，在政府資助的報紙是被打倒了，代之而起是個人主義的工商企業家所經營的報紙他們爲了維護本階級的利益，會堅持批評甚至攻擊政府當局及其他階級，乃是他們「天賦」的應有權利。

在今日美國，在少數財閥壟斷下的新聞界所最憎惡的是政府採取干涉行動，企圖使新聞事業脫離私人經濟利益的把持與操縱。這些報紙，正和過慣了糜爛生活的妓女一樣，他們不願意離開腰纏百萬支持他們的後台老拔，而得到自由。

經濟階級對於美國新聞的集中統治，可以從過去四十年來幾次席捲全國新聞界大規

模一致的宣傳動員上完全反映出來。仔細研究這幾次宣傳動員，雖德意日新聞統制當局皆亦自愧弗如。

表現這種集中指揮與發動的美國第一次大規模新聞統一動員是在一八九六年。在這一次動員之下，差不多每一個重要報紙，無論其為民主黨或共和黨，都一致擁護威廉·麥金萊和金本位政策，反對威廉·詹寧斯·布利安和白銀自由買賣政策。在所有大都市報紙中，祇有當時僅佔二等地位的赫斯特報紙擁護布利安，因為赫斯特在銀礦企業有投資利益。

第二次全國大規模新聞動員是始於一九一五年，目標是促進美國參加歐戰。到了一九一七年時，反對參戰的刊物僅有寥寥可數的幾家。當美國對德宣戰以後，政府對國內新聞出版實行檢查政策，各出版社均一致服從，很少有人表示異議。

一九二〇年全國各地報紙，連著名的民主黨報紙如紐約太晤士報在內，都表示擁護柯立芝的所謂「繁榮」政策。美國新聞界對於社會公衆福利最大的一次背叛，是它們對於迫近眉睫的經濟恐慌絲毫不提，雖然各報許多金融問題的編輯和作家們早就很清楚地看出這個危機。在一九二九至三三年恐慌期內，全國各報又來一個宣傳動員，有計劃地在社會人民之前隱蔽恐慌的深度和實際真相。

據太晤士報（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日）統計，在一九三六年大選時美國報紙約有百

分之八十，據新共和週刊統計至少有百分之七一以上，是反對弗蘭克林·羅斯福連任的。並且對於羅斯福總統本人和他的擁護者極盡詆毀之能事。

除了民主黨津貼的報紙以外，擁護羅斯福政權的祇有那些消費物品製造商，百貨店經理，股東人們所直接經辦的報紙，或是依靠百貨店廣告和消費者福利維持收入的那些報紙。這些份子是在財政上對於新政的主要擁護者。

當美國各地報紙紛紛詆毀羅斯福總統爲布爾塞維克和法西斯蒂的時候，世界最主要的資本主義報紙——倫敦經濟學者週刊曾連續發表文章，對於他的工作備致推崇，認爲他確已將秩序從恐慌混亂中逐漸恢復過。美國報紙一向常常摘引或轉載經濟學者週刊的文章，但關於這方面的評論都一字不提。

有些觀察家以爲一九三六年羅斯福在全國報紙紛紛反對之下，居然獲得多數選票，是以證明在目前無線電盛行的時代，報紙宣傳是無能爲力了。這種說法是不對的。新共和週刊（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七日）曾指出：「將近二百個無線電廣播站——在數量上佔全國無線電廣播站總數的三分之一，在電力，廣播區域及聽衆人數上超過三分之一是在各新聞紙統治之下」。換句話說，支配無線電的主要勢力，仍舊是支配報紙新聞的那些勢力。此外，共和黨利用無線電宣傳的時間比民主黨要多得多——在此次競選中前者共用時間爲六十九小時，而後者則僅達五十六小時半。

在大選結束後，美國報紙，在集中操縱下的幕後勢力和意志，比在大選期間表現更為明顯與露骨。如果說全美報紙有百分之八十反對羅斯福的再度當選，那麼在關於羅斯福修改自南北戰爭以來一貫護持公衆利益的最高法院章稿的提案問題上，全國報紙當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站在反對方面的。斯克利浦斯——霍瓦德系各報，對於羅斯福連任本來便持着漠視態度，這次起來更堅決反對修改憲法上關於最高法院的條例。所有無核電廣播評論員也開始猛烈抨擊。

一九三四年，議會爲了制止利用廣告實行欺騙的流弊，曾提出食物純潔與藥物法案，結果竟在全國報紙單獨表示反對之下被打銷了。這次反對運動係由美國各地新聞出版協會公開組織發動起來的。同年舊金山大罷工，也是在新聞輿論圍攻之下被鎮壓了的。美國新聞報紙很少爲他們自己的企業利益進行什麼宣傳運動，但是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他們的力量也是不可侮的。塔夫特總統曾說，因爲他沒有將印報的進口稅率減低希望廢度，因而引起新聞界對他的不滿；後來威爾遜上會，立刻將這一項稅則完全取消。雖然美國新聞界向來是保護關稅政策熱烈的倡導者，但是在主張印報紙自由進口問題上，却不懂得自相矛盾。

大富翁們堅持他們統治新聞專業的權利，其目空一切，唯我獨尊的態度，真是咄咄逼人。關於各大資本家的新聞哲學，最代表的文字說明會載於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的金錢資本的中心機關報——華爾街雜誌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上。

「我們簡直難以揣測紐約先鋒論壇報社論作者的用意何在，他自己究竟如何想法，嘗他說『美國報紙永遠是一種關聯社會利益的事業』這句話的時候。這是從外人嘴裏說出的法律語句，結果或將引起惡劣影響。這種說法完全不合事實，但關於這個問題確有許多人瞭解或故作虛偽掩飾，因此我們願意坦白言之。

「報紙是一種私人企業，社會既然沒有給它任何特權，它對於社會也沒有任何義務。所以，它和社會公眾利益並無任何『關聯』之處。它澈頭澈尾是它所有人的一種財產。經辦紙報的主人，也和其他企業家一樣，自己冒險自己承擔，製造他的成品在社會出賣。如果社會公眾不歡迎他的主張或他發表新聞的方式，那麼唯一補救的辦法是把報紙奪攬他們自己手裏。沒有人強迫大眾購買他的報紙……我們一點也不輕視總統在最近新聞編輯會議上所提出的指示，但我們可以說這些報館編輯，除了自編自辦者而外，他們的言論政策當然要遵照他們的東家的意見的……不過爲了很滑稽的明顯理由，有許多報館主人很願意給社會灌注一個錯覺，以爲新聞選擇和言論主張的大權是操在編輯先生們的手裏。……」

如果一個報紙是和社會公眾有聯繫的話，那麼它便是一種公用事業，在法律上要受政府機關的干涉，猶如聯邦貿易委員會或省際商務委員會一樣。反過來說，根據華爾街

雜誌上述指出，如果一個報紙和社會公衆沒有聯繫，那麼它的所有人便可以隨心所欲在法律範圍之內任意使用它。

一 華爾街雜誌的態度，對於瞭解美國報紙的影響社會人心，使一般人民，特別是中產階級的讀者的意識心理在不知不覺之中受華爾街經理大亨們的潛移默化，在這一方面是有重大意義。美國社會大眾有一個根深蒂固的信念，認為政府在歐戰期間經營鐵道事業是一個很大的失敗，這完全是報紙宣傳鼓吹的結果；而事實上，在那個時期鐵道在政府管理之任何時期效率都大。在資本家統治下的這些報紙不斷向一般人民灌輸一個虛構的觀念，認為公用事業在政府管治之下都是腐敗不堪，毫無效率；而實際上，却完全相反，事業證明國營公用事業較之私人經營要科學化和有效得多。

一般報紙讀者很少有人注意到美國政府在巴拿馬運河區係依照類似社會主義的精神在經營着所有各項企業，結果表現是效率增高和物價減低。例如，在運河區，政府麵包廠所出麵包僅賣四分錢一塊，同時資料和營養價值比較各大私營麵包廠要好得多。由於軍事上的原因，阿拉斯加鐵道係由美國陸軍經營；如果交由私人企業家經營，恐怕等於把海軍交給他們辦理一樣的靠不住。

美國一般報紙雖然時常評論政治賄賂一類的不良現象，但是却很少有幾家指出行使賄賂者究竟都是那些人，甚至連暗示都不敢。例如，一般報紙讀者從來不知道已故約翰

·D·洛克非勒大概是歷史上行賄最多的一個；同時，他們更不知道，如葛斯塔佛斯·邁耳氏（Gustavus Meyers）所指出，美國大部份鉅富家族的財富是建築在賄賂上面的。

總而言之，現代美國報紙的反映社會真實，正好像遊戲場中的凸凹鏡，所照出的人像一樣。在顛情形之下，所謂出版自由，不過是包括歪曲事實和封鎖新聞的自由而已。

一九〇六年富翁馬紹爾·費爾特第二在芝加哥一個上等妓館中一個西班牙姑娘開鎗或刀刺傷甚重。關於這位有新開價值的入物所遭遇的不幸，祇有芝加哥社會主義日報載了一段簡訊。當地新聞協會所發各報一致表示緘默，同時通知全國各報也不發表這個消息。十八年以後，一九二四年芝加哥每日新聞報偶然在另一個聯邦問題上提到這次事件，立刻在芝加哥新聞界人士中引起軒然大波，糾紛了九天才告結束。

安得雷·梅羅在一種難着情況下曾要求和他的妻子離婚。爲了在沒有充足理由之下達到其離婚目的，他竟然設法使嘲服的黃省議會臨時通過一個特殊法案，取消妻方在離婚案中要求陪審員出席審訊權；離婚案一經以後，這條法律旋即撤銷。關於這個動

凡屬聞的消息，祇有賓省北美日報發表。所有其他賓省各報——其中許多在梅隆的聯合信託公司中都有借款抵押關係——均一字不登；新聞協會所屬全國各報也一致保持沉默。

一九二四年一位著名的電影導演湯姆士·H·殷賽參加赫斯特的游藝跳舞會，當在洛杉磯靠岸時，殷賽突然死去。據報告有的人說是飲酒過度，有的說是心臟麻痺，有的說是病勢久等等。有幾家洛杉磯報紙暗示或係遭遇陷害，於是檢察官進行偵查，但毫無結果。當這個離奇新聞發生時，有名的人物如查理·賈波林、麥林諾、格林，蒂阿多，柯洛夫，瑪琳黛荳絲，赫斯特等人均在場。美國報紙對於關係好萊塢的新聞一向最歡喜找到一點影子便極力渲染，大登特登的；唯獨這一次殷賽離奇的死，却僅僅發表一條很簡略的消息馬虎了事。

美國報紙登載有關大富翁們聲譽的新聞事件，祇有在當事者很顯然願意這樣做的時候；否則他們是不肯冒昧的。

禁止有礙於個人聲譽的新聞，所關者尚小，重要的是它說明了富有階級對於新聞出版的秘密統治所發生的社會影響。例如，梅隆家族經過他們對於畢特堡新聞協會所屬各報的有力統治，竟然將他們是全國最富家族集團之一這個事實，隱瞞了許多年。這個事實顯然是有最大社會意義的，但直到梅隆被任財政部長以後才逐漸顯露出來。假使梅隆



的龐大金融勢力事先爲社會所週知，那麼參議院會拒絕通過這個任命的，因爲由金融界大亨來管理全國財政顯然是不妥當的，後來事實也確是如此證明。

鉅富集團操縱報紙還有另一種更惡毒的方式。最顯著的例子是在一九一七年，新聞協會所屬各報故意將參議員拉弗來特 (La Follette) 演說詞中的一句話：「我們已有充足理由向德國抗議」，改爲「我們沒有充足理由向德國抗議」。這些報紙一致拒絕更正，整整有八年之久。拉弗萊特在戰時的政治地位因而大受影響。在同一時期，阿莫斯·賓初特曾向議院提交關於戰時全國各種企業利潤的詳細報告，但各大報紙拒絕登載一字。

在各大銀行資本家統治下的各報，對於新聞的選擇與封鎖，有時甚至連政府機關的正式法令和法院關於私有財富違法案的檢舉程序也一併加以封鎖。

約瑟夫·布克林主教在其所著「提阿多·羅斯福生平及其時代」一書中，曾提到一九〇九年關於美國煉糖公司的舞弊案，說：「在某些隱祕的強大的勢力策動之下，紐約地方各報對於這次舞弊案的審判經過，有的輕描淡寫，有的甚至將該公司許多違法舞弊的明顯鐵證完全抹煞，一字不登」。當時這個幕後策動的勢力，便是海夫麥爾家族 (Havemeyer)。

一九二四年美國衆議院通過一項特別議案決定將一九二三年全國繳納所得稅總額全

都發表，讓社會各界公開檢舉。差不多所有全國各大報紙一致拒絕登載此項數字。祇有不識時務的普列塞所經辦的紐約世界日報將這個洩露秘密，引人注意的繳稅單全都發表，並且再版了好幾次。紐約先鋒論壇報最初也認爲發表這些捐稅數字是不合法的，但是第二天爲了和其他報紙競爭銷路，也把這個名單披露出來。紐約太陽報一面登載，一面揮寫評論指出一般富戶對於這個名單的公開發表表示憤恨是有理由的，可惜爲時已晚。「在此項法案來經通過以前，便應該加緊制止」。

紐約晚報始終拒絕發表此項名單，同時攻擊太陽報在登載此項名單時有意漏列該報發行人阿道爾夫·歐赫斯的納稅數目，顯係意存偏袒。其實，該報遺漏的人名還有賽路斯·柯蒂斯和其他各報發行人。經過紐約晚報揭穿以後，才將這些名字補登出來。

一九三三年參議院銀行貨幣委員會發見摩根公司在一九二七至二九年間曾將大批優先權股票分贈政界，新聞界，金融界及社會領袖。各報不但不將這個事實登載，反而抨擊該委員會措置之不當。紐約晚報甚至用諂媚的口吻替摩根辯護，認爲摩根公司「是幫助萬衆愛戴的美國大總統在老年時代賺一點錢」，「各方面的詆毀決不會損及摩根先生的大名的」。

美國新聞界大亨爲了維護各鉅富家族利益，急於設法封鎖在一般編輯和記者看來具有重大新聞價值的消息。另外一個最顯著的例子，是關於提拔東油田一案。發行範圍限

解銀行界，交易所經紀人和投機家的華爾街雜誌，首先登載這個不尋常的消息：政府當局已將海軍油田租讓與私人經營。這條消息雖然是在用大字標題登在第一版上，但其他報紙却沒有一家認為應予轉載或加評論。

在華爾街雜誌登出提拔東油田的消息以後，整整有二十二個月工夫，美國各大報紙終始保持緘默，隻字未提。阿布奎奎日報(Albuquerque Journal)主筆加爾·馬基(Carl U. Magee)因為和內務部長阿伯特·伐爾是政治上死敵，早已在各方而搜尋伐爾貪贓枉法的證據；這次聽到了哈雷·辛克萊會送給伐爾鉅額贈款的消息，他將這兩個消息互為參證，認為其中含有重大黑幕，一方面將這個消息和他的猜測在報上發表，一方面訪問參議員伯登·惠勒和他商議辦法。丹佛郵報的發行人和編輯彭贊爾和塔曼讀了馬基發表的故事以後，大為高興，認為有機可乘，便在報上公開痛擊辛克萊和非法的油田租讓。當辛克萊急忙送給他們二十五萬元禮金並且允許繼續捐送七十五萬元的時候，該報馬上便假廉息鼓，停止攻擊。但這又引起小約瑟夫·普列塞的注意，便在他所辦的聖路易快報日報上，開始呼籲參議院進行澈查。

當參議院忙於討論和調查此案的時候，全國新聞界除了很少幾家報紙以外，都紛紛起來對於參議院的調查極盡詆毀與譏諷之能事。幾個大機關報如紐約太陽報，先鋒報，壇報，太陽報，芝加哥論壇報，芝加哥每日新聞，柯蒂斯與赫斯特系所屬各報等一致指

斥參院調查委員會的委員爲藉機敲索。故意擾亂政治秩序等語。

美國新聞界封鎖官方正式新聞消息，當然不止提拔東一案。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紐約世界電訊報忽然發表一九一七年美國駐英大使表希拍給威爾遜總統的一封電報，電文大意是：警告政府如果不實行參戰，幫助康樞公司脫出對同盟國的財政僵局，則美國內部經濟將不免陷於崩潰之途。世界電訊報證明他們所以發表這個電報，是爲着提供尼維軍需調查委員的偵訊材料。雖然這個驚人的電報從未見過報紙，可是各大都市報紙將它轉載的只有紐約郵報（斯特惠恩系），路易斯維利的新聞雜誌（賓漢姆——弗雲格爾系）和皮特堡普來士日報（斯克利浦斯——霍瓦德系）三家報紙。在一九一七年的當時，合衆社將表希拍電報全文當天登出新聞通訊，但各報一致將這條新聞扣下未登。其他通訊社如聯合新聞社，國際新聞社，和環球社（赫斯特系）則根本未將這個消息發出。所以一直到今天，大多數新聞讀者依然不會知道有這樣的一回事。

當新聞消息事實上無從封鎖的時候，在各大鉅富統治之下的各報便採用一種避重就輕或顛倒事實的巧妙技術手腕。這種手段特別慣於用在勞工問題上。在鉅富掌握中的新聞報紙對於勞工階層一般的都持有敵視和憎惡的成見，在他們這種成見下關於勞工糾紛的記載，常常和新聞照像的真實記錄互相矛盾。例如，一九三四年安布列支，賓西拉，凡尼亞和舊金山的工潮，和一九三七年芝加哥五月三十日的南北戰爭紀念日慘案，在新聞

記錄影片上看來，當時警察並沒有遭遇任何挑釁，便向井然有序的游行隊伍（還在重慶上是有規定權利的）開鎗射擊。雖而在報紙上游行關於此次「衝突」的記載，却說工人首先開鎗。在紀念日大流血案發生以後，芝加哥論壇報，竟然顛倒事實，公然認為工人游行隊伍向全付武裝的警察大隊進攻。事實在被打死的七個工人中有三個鎗傷在脊背，兩個傷在兩肋，然而各報對於這個關係重要的報告却一字不提，直到後來華盛頓調查此案時才被宣佈出來。

美國報紙一般的是仇視有組織的勞工的。在報紙一慣的歪曲與污蔑宣傳之下，因為影響到社會一般人民每當勞工組織爲了維護本身權利有所行動的時候，總是持着懷疑與憎惡的態度。普通新聞讀者常常認爲勞工界多是搗亂份子，是法律與秩序的敵人。各報對於工會團體的曲解，差不多很少例外；其原因是容易了解的，因爲工所爭得的利益（雖然間接地也是有利於中產階層和農民），當然要多少減低各鉅富豪族的紅利和薪俸收入；而這些鉅富豪族正是各報的主人和老闆。

各鉅富豪集團的新聞機關在曲解勞工運動時，常常有計劃地挑撥農民與中產階層對於勞工界的成見和反感。而同時，對於一般勞工悲慘的生活狀況，和使他們不得以集團力量要求改善的真實原因都從未加以披露。農民和一般小有產者的特性是極端個人主義，勤儉和安分守己，很容易接受報紙片面的歪曲宣傳。

另一方面，農民和一般中產階級的利益，在這些富家所統治下的新聞政策下，也是大部份被背叛了的。這些中間階層在他們做爲消費者和投資者的方面上，一頁的受報紙的蒙蔽和愚弄。例如，在一九二九年，全美各大報紙對於明知即將到臨的經濟恐慌事先不但不露一點風聲，反而極力粉飾太平，以致在此次大恐慌中受損失最大的正是這些小有產者的中間階層。

在一九二九到三三年的不景氣期內，美國新聞界的虛偽報導和紛飾宣傳，由爲顯著。例如，各大報紙不斷登載所謂副商務部長朱力斯·克萊恩，證券投機商羅賓爾·巴比森，克里伍蘭信託公司副董事長，阿利斯等冒充經濟專家的樂觀論文，隱蔽恐慌的最真實情，故意散播樂觀空氣。而對於一般有聲望的權威經濟學者客觀的觀察，和評論，却不予發表。

各銀行的不穩固真相，各大報一致加以隱蔽。銀行發生倒閉的消息在報上登在最不引人注意的地位，並且在評論中認爲純係個別偶然事件。有些專家指出國立郵政儲蓄銀行比一般私立金融機關要穩妥得多，這個意見馬上便遭到許多報紙的反駁和諷刺，結果很多讀者因被蒙蔽而上當。

在不景氣時期內，失業人數驚人的急劇增加（不僅工人，即一般公民和中間階層亦蒙受嚴重影響），全國各報差不多都是竭力隱瞞，不予披露。我們在當時各報紙上很少

看到登載關於各大公司如通用汽車公司，福特公司，美國鋼鐵公司，和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等整批停止解雇的消息，雖然關於這些新聞華爾街新聞處總是按時發出電報。但另外一面，當經濟情況在一九三三年開始好轉的時候，各報又連篇累牘充滿了產業界成批恢復雇用工人的新聞報導。如果我們把一九二九——三三年全期的報紙會來翻閱一下，立刻便會感覺一個顯然不可解的矛盾：各公司工廠從未看見他們解雇員工的消息，突然在一九三三年開始恢復雇用！

在公共衛生方面，零售商，一般公民和中產階層更明顯的被唯利是圖的報紙所蒙蔽。農業部與商務部，關於品質低劣或有礙健康的某些食物，藥品，化妝品和衣着雜物，曾有明文禁止；但各報仍舊大登廣告；坐令一般農民和小市民上當，正如它們對於一文不值的濫發證券和貶價地產所採取的蒙蔽政策一樣。能夠深身自愛，完全拒絕登載美國醫藥協會所抗議的各種假藥廣告的報紙，祇有基督教科學警世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美國日報（商業報紙），紐約世界日報，奎爾瓦基領袖報（社會主義報紙）寥寥幾家。

所謂「出版自由」的濫用對於公共健康方面的影響是如何的危險，可以從美國醫藥協會月報的論調中得到證明。該雜誌根據一九二四年的統計，指出美國天花死亡率，佔全世界第一位，這種現象，一部份責任應歸之於反對種痘的刊物，如生理文化雜誌等。

惡劣宣傳。

當一九三三年世界展覽會在芝加哥舉行期間，芝加哥報紙對於當地流行着的痢疾病症（最初發源於芝加哥的一家旅館），完全不予發表，因為恐怕引起社會恐慌，影響職業。這樣有案可稽類似的事，很多。最著名的如在歐戰發生以前，太平洋沿岸各州鼠疫猖獗，許多報紙則是故意隱蔽，不予登載。

這些不金剛勢力控制之下的報紙，一方面既然隱蔽重要事實報導，接受剝削中間階層的各項有害廣告，另一方面便對於凡是背說真話，提高讀者覺悟性的書籍和機關，毫不留情地加以封鎖，拒絕替它們刊登消息廣告。例如，紐約太陽報對於專門暴露劣等藥品和珍假食物的機關——消費者研究所的各種通告，一概拒絕登載。一九三七年紐約先鋒論壇報曾拒絕一位有名會計師班納得·賴斯所著虛偽證券論一書在該報登載廣告，因為在這本書中曾將公司簿記各種弊端情形予以揭露，並舉出若干有名大公司的實例。紐約太陽報並且更進一步甚至拒絕接受所有描寫社會悲慘狀況與黑暗面的各種文學著作廣告。

現代美國報紙在億萬鉅富直接控制之下，種種狹隘利害關係的限制，造成了美國新聞界的一種神經質的病態。因為無論在新聞報導或社論分析方面犯忌諱與被禁止的均太多，所以它們的全體活動領域只有局限在狹小的「安全」圈子之內。



這種情況說明了爲什麼美國一般報紙充滿了黃色趣味新聞，特別注意盜匪的搶劫案，女明星，棒球隊員和二三等以下政治要人的逸聞趣事，以及各種運動比賽和次要富翁生活活動一類的新聞報導。一句話說來，這些報紙既然在有意義的生動的領域內受到了嚴格的限制，那麼它們必需在靜止的範圍內設法找尋刺激的材料，以資補償。對於各種公正的，有意義的每日新聞消息不能自由報導，偏於一方面的新聞記述，又難以引起讀者興趣；因此便祇有藉助於滑稽故事，沒有理性的「特寫」懸賞比賽，趣味小說，瑣事漫說，烹飪食譜，高爾夫球，象棋和橋牌遊戲指導等等的無聊篇幅，來吸引讀者的經常注意。換句話說，乍聽之下似乎矛盾，實際却是真情；現代美國的新聞紙，除了少數例外，已經不成其爲新聞紙了。

鉅富勢力對於報紙種種干涉與限制，造成了一種不相信報紙弗洛依特式的矛盾心緒，不但消息靈通有地位的人們，甚至連工商企業界也不再相信我們，因此，連帶產生一個很可注意的現象，即特別情報與私人通信服務組織的日趨增多。直到現在，一般社會人士還根本不知道這些組織的存在。

目前美國企業界的經營活動，已經完全不依賴那些爲了華爾街利益的報紙和專業雜誌新聞。關於市場消息，他們現在主要的是看東區和布拉特街（Dun and Bradstreet）所出版的刊物，商業金報（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和標準統計供

Standard Status as Service) 的報告。關於新聞事件，他們大部份依賴華盛頓幾個特別新聞情報機關的報告。在這些特別新聞機關中最出名的是吉布林格和惠雷——伊頓，兩個通訊。(Kehring and Whaley Eaton Letter) 1

這兩個特別通訊社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內，每天將未經檢查的新聞情報供給企業界參考。祇要一般市民仍舊蒙在鼓裏，戰時政府對於這種組織的活動並不加以阻止。大戰結束時政治的颯蕩，再加上一般報紙內容材料的日趨貧乏與空洞，使這些特別新聞組織更有發展的可能。

華盛頓各特別新聞通訊實際上等於一種小型報紙，祇是去掉了那一套虛偽濫調而已。有時候在這些特殊通訊上所見的新聞情報，和一般報紙的記載相差的程度實在可驚。差不多各大公司，為着打破謠傳和虛偽報告的迷宮，都訂了若干份這樣的特別新聞，分發各部門的負責人。

這種奇怪的情況，說明了社會上祇有很少數人經過各特別情報通訊社有權利可以隨時得到真實的消息（雖然他們是化了很高的代價的），而大多數普通民衆在各報不約而同真偽混淆，是非莫辨的宣傳之下，祇有永久墜在五里霧中。

一般報紙發行人對於外界認為他們的報紙唯利是圖，隨時可以被收買的指摘，似乎頗為憤慨，一致堅決予以否認。然而，事實勝於雄辯，從下面隨便舉出的幾個實例中便



一九二三年五月間，芝加哥論壇報董事長拉伯特·麥克米克曾寫信給拉新克，要求海運局在該報巴黎版多登廣告；拉斯克在回信上說，該局廣告新計劃已經規畫。芝加哥論壇報每星期廣告篇幅佔一千四百行，同時並隨函寄上商輪津貼法案和該局對於此項法案的研究計劃。數本，他建議麥克米克最好能夠指定一位作者關於美國商輪運輸問題編撰系統論文和他們合作。果然不久芝加哥論壇報特闢一欄「迅速發表許多宣傳文字，題目是由拉新克擬定，『爲什麼美國應該實行商輪制度』？

隨後商輪局便和該報訂立合同由該報承包該局所屬各種船上的新聞活動；在這個合同規定之下，賠錢由商輪局負擔，盈利歸該報獨享。

芝加哥論壇報亦自號爲「世界最偉大的報紙」，實際上這個報紙在拉伯特·麥克米克主持之下，它的作風與記載幾乎處處都可以受到指摘。據芝加哥大學弗力德立克·傑曼教授研究，在十九二五——二七年這個期間，芝加哥論壇報差不多成了一個激進派屬假造新聞的散播者。最多的是關於俄國消息，其他方面的虛構新聞亦不在少，因限於篇幅，不克備舉。自從一九三三年以後，這個報紙對於羅斯福政府新政計劃每一個有虛構的方面，更盡其歪曲與虛構的能事。

一九三四年當馬普頓·辛克萊發起半社會主義性的「消滅加州貧窮」運動 (End Poverty in California, 簡稱: EPIC Movement) 參加該省省長競選的時候，加州報紙

蔡廷鍇等在加拿大酒同業公會收買之電，職員所有報紙一律作反辛克萊的宣傳。結果使辛克萊的宣傳終於失敗。

此種種種，在各報社這種現錢交易的事例，更爲人所熟知。一八九八年曾發見赫斯特總社六年以前便和南太平洋鐵道公司簽訂合同，應將該公司不作非盈利的宣傳。總社每年得酬金四千萬元。自從和赫斯特拉機關成立了這個協定以後，赫斯特系各報便開始作祖護第三帝國的宣傳。

據詹姆士·洛提在「我們主人的聲音：廣告」一書中，曾估計現代美國報紙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係來自廣告收入；所以在此種情形之下，新聞政策從來不受廣告控制的影响的報紙確屬罕見。不過，廣告對報紙的影响，終究在於直接統治各該報紙的主人。尤其是在各鉅富集團上層份子直接統治之下的報紙，反而時常拒絕廣告者支配它們言論政策的企圖。同時一般說來，各發展強大的新聞出版，大致都不願爲了適應廣告人要求，而影響它們的基本方針的。

許多大報發行入常常以能夠拒絕大廣告主顧的要挾自囑，藉以表示他們堅決保持「出版自由」的熱忱。然而，他們這種熱忱的真實性有八九是因爲他們另外還有更有勢力的主顧需要顧慮；他們的報紙另有應用。一八九五年紐約一家大百貨店馬爾公司需要

報總約導報權讓該公司大股東特勞斯任紐約市長，因為該公司是導報的一個最大的廣告主顧。然而該報發行人羅士·班乃特竟拒不接受，並將馬勝公司這個企圖在報上公開發表特勞斯差備之下，聯合所有各大百貨店一致停止在該報登刊廣告，結果該報損失廣告收入達六十餘萬元。

總而言之，當一個廣告主顧的利益和出版某報的個人或集團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那麼這個廣告主顧決沒有影響該報言論政策的可能。連最著名的唯利是圖的芝加哥論壇報也曾拒絕那些不識時務置然企圖控制該報社論主張的廣告主顧。

以替富翁們個人作吹捧宣傳著名的刊物，最初為克勞維爾出版公司（Crowell Pub. Co.）的美國雜誌。一九二九年太晤士出版公司也出一個這樣的雜誌——叫做幸福雜誌（Fortune）。

太晤士出版公司主辦人孫亨利·魯斯，和摩根的密友亨利·太衛孫在耶魯大學是同學同班。公司創辦資本便是由太衛孫，哈立曼，故外特·馬羅，哈維·發斯東，和哈克納斯家族等所捐出。關於這幾位大股東的地位和關係，在前一章中已經說到。根據這些點，便不難瞭解了太晤士雜誌和兩個雜誌有什麼要抨擊參議院貨幣銀行委員會對於摩根公司進行檢查反對尼德曼調查委員會對於杜那拿各軍火商的調查。

太晤士雜誌從一九二四年創刊之初起，便一貫的替各鉅富家族作辯護人。它不但在

論文上公開擁護產業金融各界巨頭們的政策主張，並且用遠播，特寫，照像等等方式，把洛克菲勒，摩根等大亨們在讀者面前描寫成爲一個值得敬仰的偉大的英雄人物，一切歌功頌德的字眼都盡量加在這些人物的身上。幸福雜誌也和太陽士一樣，對於一般國人從來不吝加以頌讚的。

這兩大雜誌祇有當政府對摩根公司有不利表示或舉措的時候，才發表不客氣的攻擊。他們是反對羅斯福新政的，但當一九三六年大選期近時，這兩種刊物又躍興型的機會主義作風，對於共和黨競選人蓋敦忽然表示冷淡，不像以前那樣熱烈支持，原因是幸福雜誌在舉行民意測驗中已經看出羅斯福必能獲得壓倒多數勝利。

關於太陽士出版公司刊物的特質，幸福雜誌前任編輯蘇外特，麥克唐納在民族週刊（一九三七年五月）上曾發表一篇長文，作了極深刻的分析。據他親自經驗的觀察，「太陽士雜誌一頁的歪曲和封鎖勞工界言論，對於凡是具有進步意義的社會運動，十樣加以嘲弄和詆毀」。

「幸福雜誌在一九三〇及三一年對於阿伯特·魏金和撒木耳·伊索爾之死，曾發表頌讚的文字。同時，該雜誌編輯又集中力量寫現在編歷蘇維埃革命精神外極善其歌頌蘇維埃的事。一九三四年三月間，高麗威和樓尼爾等黑幕黨領袖在紐約與論蘇俄情勢，對該雜誌揮筆連發表了一萬五千多字的文章替他們曲爲粉飾，又在華盛頓雜誌這部蘇俄雜誌

最優秀的一次是一九三〇年十一月魯斯親筆所作關於皮特堡礦區的驚人的「報導」。他認為「這是一個和平友愛的城市」，「梅隆家族也是非常和善的」（但是他却不提及）。B·梅隆用譏笑口吻所說「不用機關鎗是沒法經營煤礦的」（應句名言）。關於礦工生活情形，魯斯也是宿筆寫得天花亂墜，完全和事實不同。

太晤士和幸福兩雜誌在他們的編輯部中聘用了許多著名的自由主義與急進派作家，因為這些人對於社會和政治現象最為敏感。不過，據麥克唐納聲明，這些人的作品每篇都經過各主任編輯詳細的修改和歪曲，有時乾脆完全不予發表。同時，幸福雜誌關於上述個別人物和企業的文字，常常事先送請本人或他們的屬下審閱「修正」。

一般讀者很少有人能夠透過太晤士和幸福雜誌自稱為客觀中立的虛偽宣傳，認清他們的真實背景和本質，因為這兩個雜誌運用新聞技巧和顛倒黑白的手腕，已達爐火純青程度；一兩個形容詞或副詞的變換，可以使整個一系列的事實表現為之改觀。這種高明的技術應該歸功於亨利·魯斯——弗郎克·福塞精的後繼者。

在現代美國新聞界中大概湯姆士·拉孟特是唯一的最有勢力的一個人物。他的聲跡是從担任紐約論壇報的金礦界探訪記者開始。

拉孟特之為摩根密友和喬治·裴金斯的精神繼承人，其所負任務是多方面的，不過就中他對於新聞界聯繫與控制確佔一個很重要的地位。裴金斯與拉孟特，當他循正走紅



選的時候，都會是摩根銀行集團的和平使者，糾紛調解人，營業的拉攏人和設計者，外交和辯論者。

和裴金斯一樣，拉孟特對於使各報發表摩根政策主張的手腕非常熟練。裴金斯對於操縱新聞報的才幹，甚至在最初半官性的參戰會議上，弗郎克·羅塞曾積極主張應該委派裴金斯負責新聞檢查職務，也認為裴金斯「是一個冷靜所謂言專長出色專門人材」。

裴金斯死後，唯一繼承衣鉢者為拉孟特。拉孟特在華爾街二十三號的辦公室中，堆滿了世界各地的報紙，雜誌和書籍，（每種都是剛出版後便立刻寄來的），有關係的部份都經過特雇的許多專門讀者劃了記號，外國文字都譯成英文。拉孟特在閱讀和估計所有各方面對於摩根公司的稱讚和指摘之後，便將這些資料歸檔保存。有時他和作家編輯直接通信往來；有時他寫信送交各報發表；有時他授意第三者出面表示否認，更正或贊同。

拉孟特所接觸的外界人物至少有一半以上是發行家，作家，新聞記者和編輯。許多和拉孟特不相識，有地位有聲望的作家，有時常常會接到請帖邀他和他一同便餐。他他指出在寫某一個書評，某一篇序言，或某一篇論著中提及摩根公司或其所屬某一個企業的部份，他們有了一些什麼錯誤。他要求他們設法收回這些意見，否則就難免和摩根

緒惹，導他領受他在整個的報界中對他們的報復。

另一方面，凡和拉孟特相友善的作家，很容易走上名利雙收之路。例如編輯兼兼編輯，在拉孟特幫助之下，都得到屢次的升擢。因此，無論是外國和美國作家，編輯或出版家，對於拉孟特夫婦的經常邀請參與家宴，都認為是很大的榮譽。在歐戰作家時常受拉孟特招待的有萊爾H. G. 威爾斯，法國莫里哀，英國桂冠詩人約翰·曼殊斐兒等；這幾個人，都擁有很多的美國讀者。雖然這些作家在他們的作品中從未涉及摩根公司，但他們對於現社會的一般態度，却頗得這個大金礦勢力集團代表的歡心。

拉孟特在新聞界和文藝界這些活動，顯然有了效驗。一九三三年他通知紐約各出版家，以後關於保證信託公司，銀行信託公司，第一國民銀行，和紐約信託公司不得再稱為「摩根銀行」。在景氣漸趨恢復的時候，這種表示顯然是對於摩根公司有利的。自通知發出後，除斯時屬的紐約普萊士報以外各報均一律遵從。同樣的情形，曼斯時系統各報自從拉孟特起而加省訪哈特後，也停止一切對於銀行券的批評和攻擊。結果對付在萬里盧利模兄弟公司宣佈破產以前，雖然早在一九三二年紐約金礦案案便開始進行調查，但拉孟特却有力量使報紙關於這方面消息一點不往外洩露。就在一九三三年歐戰已經結束，報紙因為他們動搖板李維家維持而萬里盧利兄弟公司生機勃勃，其時該報地位翻轉，赴克羅僅備調查萬里盧利公司不應消除虛偽真象。既經五個一體變家派派派

這便陌生的新聞記者對於萬氏兄弟公司的「秘密」如此熟悉，頗感恐慌，立即打電話通知摩根公司。於是這個先鋒論壇報的記者突被召還，他所懷疑的問題是證實了，但是他動任薄薄確有完備，同時又不准他寫出關於此行兩報告。

一九三三年先鋒論壇報另編採訪記者寫了一篇報告記述高施威利根鐵道公司與實行大改組的消息。這個報告底稿在該報經理部堅持之下，先送交拉孟特審閱，結果拉孟特將報告全文重新說作，說明萬氏兄弟鐵道公司的危機正在由摩根公司設法整理中，並且華盛頓方面頗表滿意。這篇實際是由拉孟特寫成，完全粉飾實際真相的報告，發表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九日紐約先鋒論壇報的第一版上。

後來，紐約太陽報又寫了一篇長篇通訊詳細記述萬氏兄弟公司對於摩根公司債款到期不能償還的經過，已經排印在第一版上，但是當半夜間接到拉孟特的電話以後：該報編輯部連忙趕寫一篇改登在第二版上。同時，第二天摩根公司所屬各銀行又一致否認萬氏兄弟公司有到期不能履行還款義務之事，不過將應付利息展至下年而已。

拉孟特這樣類似的成功已屬司空見慣，祇有很偶然幾次有些編輯不能瞭解他的觀點時，纔使他感覺怪奇。

一九三六年四月七日紐約世界電訊報登載一段新聞證明堪白，拉孟特的星期六文藝評論主編（即將德絲·斯坦因所著不祥之日 (M. Day) 一書的校樣送交拉孟特審閱。因為

這本書論及過去和現在的各項戰爭準備，並且批評到摩根公司。據堪白承認，他這樣做，祇是爲着拉孟特可以推薦一位適當的批評家對這本書寫一個書評。拉孟特推薦耶魯大學教授（後任該校校長）查理士·薛莫擔任這一工作。薛莫在瓦爾塞和平會議中與拉孟特協調一致，努力宣傳美國參戰完全是因爲威震德國潛艇威脅之故這種廢除理論。薛莫接到這個委託之後，雖然他自己還在受着歷史家的指責，仍舊勇敢地對斯堪因這本書痛加批評。

堪白得到這本書的校稿並不是依廉價常方式向原作者索閱，而是從出版者哈爾克特·布雷氏書局手中非法取得的。拉孟特看到這本書的校稿以後，曾多方引誘哈爾克特·布雷氏書局將書中他認爲不妥的幾段加以刪改，但被拒絕。

同時，前線報社論編輯華爾特·密爾斯也寫了一本「到戰爭之路」的傳單。格拉坦在新共和週刊中曾批評作者在這本書中竟將一九一七年美駐英大使裴奇致威爾遜那一封關係重要的電報遺漏過去，殊屬可怪。因爲這個電報是摩根公司所最忌諱的。參議員尼維爾在這件事實的時候，接近庫倫的報紙都一致不表贊成。密爾斯這本書行將出版之前，經過星期六文藝評論的介紹，拉孟特曾和作者有過一次會談。哈爾克特·密爾斯這本書的批評所載，裴奇電報在原稿中確實是對，但後來爲了縮短篇幅，延阻時指出。無論如何，這本週刊雜誌是這本書的一個極嚴重的內容精華，因爲這本週刊雜誌是這本



和二次歐戰危機毫無根據等理論。關於後一種理論，是當他在一九二六年由歐洲歸國之後，經他親自署名對外發表的。因此很快地和拉孟特有關的各報館及出版機關便開始在新聞社論和書報雜誌上總動員起來響應，一致作二次大戰危機純粹無稽之談的宣傳，使社會人民在精神上解除武裝。

拉孟特在新聞出版界中這種活動和影響，比替洛克菲勒服務的已故李愛維氏的威靈更爲普遍和深入。他這種幕後操縱新聞界真正無冕之王的權勢，從何處開始，到何處為止，祇有經過一個政府認真澈底的調查，纔能完全揭露出來。

# 寄售部

請藏有中西文之數本或參考書而不需要者，拿來出售。

寄售。

請書要上頂書刊者來。 生路四十號本社選購。

## 第九章 非商業性的投資——慈善事業

現在美國的慈善事業——或者說是非商業的投資，是一個光怪陸離，五光十色的迷宮。處在這個迷宮裏，許多事情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因為每一件事情在表面上似乎可以瞭解，而其實不過是一個無窮盡的幻象。

在美國，所謂實際慈善事業大部份集中在各種基金之上。研究美國各種慈善基金內幕作用著名的專門權威林德曼 (E. C. Lindeman) 在他一九三六年出版的紀念碑的傑作「財富與文化」(Wealth and Culture) 一書中，曾寫道：「第一件令人驚異的是，就是那些經理這些基金會和託事會的人們並不願意他們所經營的這些機關組織被人調查。假使在當初我便預先知道，這次調查，會需要八年繼續不斷的訪問，用去完全不敷比例的費用來得到我所希望的那一點基本的數字材料，那麼我相信我一定會立刻放棄這個研究的」。

所以，讀者在這一章中應該準備鑽入現代資本主義的一個下層穴道，立刻拋棄前此所有關於那些經濟王侯們爲了人類福利慷慨輸將等等先入之見。在一般大富翁們的報紙和宣傳機關宣傳影響之下，所形成的這些先入之見在鐵的客觀事實前面簡直是找不到什

根據的。

但是，人們不免要問：洛克菲勒不是曾經捐出了五萬萬至七萬萬元的巨款麼？這些不是明明白白登載報紙上，有目共睹的事實麼？難道美國許多億萬富翁不會捐獻巨額款項麼？難道大部份科學研究事業不是靠着有錢人的捐助麼？許多藝術和文化的專業——從音樂團，歌劇院，藝術館一直到各大學？不都是大部份靠着一般富有階級的捐款？而這些專業對於他們不是並沒有任何私人聯繫麼？

不幸得很，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那麼，所有這一切衆所周知的事實又將如何解釋呢？

不錯，有些慈善事業活動確是沒有私利雜於其間，但是這些慈善事業在大專職業之區，其影響所及，猶如一顆石子投在一片池塘裏，只激起幾圈細微的漣漪。關於事實，富庶美國的富有階級所捐出的錢不僅數目極微，而且這些捐款大部份將在二九一三年所得稅期繳以後才捐出的。在這一方面來說，「捐贈」這個字眼最好改為「財產安排」和「轉移」等名詞，似乎更為切合事實。

羅伯特·普尼(Robert R. Putnam)在其「美國財富之測量」(The Measurement of American Wealth)一書中，所指出之在二九〇九至二九一三年期間內，美國各階級戶戶及小康人家等捐贈給各機關團體的款項共為二七、八八八、〇〇〇、〇〇〇元，



會家及慈善機關被徵收的音響區區而徵收共銀二千八百八〇〇〇〇〇〇元。  
或據例年性之統計，從二〇八〇〇〇〇〇元現之三年來，在這七十年中間，所有貧富各階層所捐出的慈善事業，慈善事業等捐款，僅佔政府所用去的社會事業經費的百分之三十。  
五。

(一) 據雷易斯及歐馬耳·羅西林 (Phyllis Ann and Omar P. Goslin) 在「窮人，富人」(Rich Man, Poor Man) 一書中所計算，一九二八年在三千家平均每年收入在三十萬以元上的富戶中，每家平均捐款僅合二萬五千四百元。一九二九年大恐慌以後，各家捐款又減至一萬二千九百元。在同一時期中，二四八家每年收入在一百萬元以上的最大富戶，每家平均捐款僅合三萬一百元，所有對教會，大學，賑濟等各種捐獻，通統包括在內。

林德曼教授對於報紙上所宣傳的許多富翁會將大部份財產遺囑捐給慈善機關這個事實，曾加以揭穿。他將一九二七—三三年間紐約市法院擋存的遺囑加以科學研究之後，所得結論是：所有遺囑中百分之九十四係規定將財產百分之九十四以上贈與親友。由於全國最大財富的主人係集中於紐約市區，這個統計是可以說明美國財富在遺囑上的分配趨勢。

收中。一句話說，在私有財富的重新分配中，文化的意義是很小的。林德曼所謂「文化」係指那些有集體意義價值的人羣活動而言。在他看來，文化的涵義應該包括使團體經驗上組織化，提高社會生活品質的各種方法與精神。文化的價值不僅在於維持現況，主要的它應該成爲一種永遠向上的動力。

在南北戰爭以後，當一般產業家和銀行家財運大發，蒸蒸日上時候，美國一般慈善事業活動豈不是也跟著擴大了呢？

平穩這個答案，不確也是否定的。亨利·萊因，李奧爾在其私有財富與社會公益書中曾引證一八九三年紐約醫院聯合會的報告：「自從現任偉大公司種搖搖新船成立後，舊有的個別競爭方式已成過去，因而一向依靠各施其私入捐贈慈善機關的收入亦隨之而受影響。」

據金律基金董事會 (Goldberg Fund Foundation) 統計，一九三六年慈善總收入較之一九三二年多出四八七、八〇〇、〇〇〇元，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四以上。在聯邦儲備內，全國一〇五家最大產業公司的收益增加了百分之三三九七五。而同時對各次學捐款却減少了百分之十八。對各團體捐款減少百分之二四，對於十種慈善機關減少百分之三九。對各教會減少百分之三十。

摩本著名社會調查專家和改良主義者阿伯拉罕·愛普斯坦 (Abraham Epstein) 曾發表

圖水藍維識(一九三一年五月號)指出：「現有各種慈善事業基金會大體係由當業大富翁如卡尼基、洛克菲勒、哈克納斯、羅森瓦德等人所施贈」。然而這些富翁的慈善事業却未有間斷在：「即便我們承認愛德華斯堪遜所舉出的都是真正的大慈善家，則賴斯列舉的名單大體適登於此數。在卡尼基、哈克納斯、福特、杜邦、波普、費爾德、巴克萊、麥克米克、格林、希力、施根、斯帝曼、萊恩、福爾德、顧根翰姆、萬得比、顧萊特、阿斯托等等，這些富翁無論怎樣也沒有理由說他們和慈善事業有任何關係。」

誠如愛普斯坦所說：「如果我們考察一下美國各種有組織的慈善事業，我們馬上便會發見有善者居大多數。而慷慨輸將者則居極少數。這種粗略的分析，可以舉出這多數慷慨的大慈善家。他們捐出的數目在他們神託的龐大財產中僅佔半毛。微乎其微。在富有階級中捐錢作慈善事業的百人中，雖有幾人，甚至在捐錢贏勝萬紳紳商區亦復如此。在附有慈善事業中，富翁們的個人捐款所佔比例，簡直微不足道。極大多數僅有陸幾毫一毛不拔。」

只，在各城市各種公益團體的捐款者從未超過全部人口百分之十七以上。美國三六〇〇〇個公益團體總籌募捐，幾種方法，以年捐款所得總額未達幾百萬元。比較最速五人贈法一項所化用的款項不及半數。紐約市儲蓄協會共捐款二百五十元即可取得永久會員資格，然而參加該會的個人和公司僅有八百餘人。

據說，在紐約，有許多城鎮，各慈善機關，爲了救濟失業工人所化用的錢，比之在倫敦或巴黎多得多。狄德羅市的一位律師最近曾向美國參議院報告說，會議場雖然該市應用錢百分之三十六以上係用於救濟勞務汽車公司的失業工人，然而特先生却對市政府不納一文捐稅。他的兒子愛瑪索，福特捐給狄德羅公益會的款項僅有三萬元，俸及該市救濟特失業員工每月經費的百分之十五。許多公益團體價值極高最近竟指運籌的失敗，完全是由於各富戶集團的慳吝。同時，他們極力稱讚一般貧賤階級却歸罪於慈善家，他們指出的錢比任何時期都多。

愛普斯地教授很痛切的指出：「民辦慈善事業，永遠不能救濟根生於現代產權制度與比俱備的貧困和艱難。另外還有一個理由說明這種制度是應該被否定的。在這種制度之下，社會病態的負擔完全加在少數慷慨好義的富人和大多數那些貧苦的窮給勞動者——這些人當他們的老闆命令他們拿出捐款時，他們是不敢違抗的。這種辦法和公營負擔的現代原則是完全反對的。有錢人大多數反而完全逃避了他們理應負擔的義務與責任。」

齊理這裏，讀者不免要問：各種慈善事業基金不是已經集中了巨額捐款麼？

是的，這筆巨額捐款總數也不過十萬萬元，尚不及美國鉅富資產的三百五十分之一。據據三十世紀基金會（係由波士頓一位百貨店主人創設）在一九三四年發表的報告

報告說二十個最大的基金會共有六二二、〇六六、三〇八元，約佔全國三十一種大小基金會資產總額的百分之八八·六。

全國各種慈善基金會總數尚不及十萬萬元，而五百個大富翁一年的進款便超過此數，他們的資產總數更在二百萬萬元以上！

二十家最大的基金會從一九三四年的投資收益中所捐出去的數目為三〇、九六八、七七八元，佔全國各基金會捐款總數的百分之九〇·五。在前一年——一九三三年所捐贈的款項較多，共約五千萬元，拿這個數目分配給全美男女老幼，每人可分得四角錢。

據二十世紀基金會總計，洛克菲勒與卡尼基兩人的捐款即佔一百二十三家基金會資本總額約百分之六十。從這方面觀察，我們便很容易看出這種組織化固定化的慈善事業，就全般來說，是一種放長綫的投資企業。不過，這種放長綫的投資雖然在積極建設意義上所裨益社會者甚小，但它却使支配它的人增加莫大的社會勢力，正和各大富翁們對於各大公司銀行放長綫的統治方式一樣。

根據二十世紀基金會在一九三四年調查，美國最大的二十種基金如下：

- 1、紐約卡尼基基金(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 Y.) 資本額……
- 五三、〇七三元

- 二、洛克菲勒基金會 (Rockefeller Foundation)..... 一五三、六〇元、九四二元
- 三、洛氏普通教育董事會 (General Education Board)..... 四五、八二一、四  
十元、六元。
- 四、社會公益基金會 (Commonwealth Fund 哈克納斯捐助) ..... 四三、四三〇  
元、五二五二元
- 五、凱洛格基金會 (W. K. Kellogg Foundation)..... 四一、五九一、〇八七元
- 六、華盛頓卡尼基金會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三四、  
六一、四一六元。
- 七、卡氏師資促進基金會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三〇、八二一、五四五元
- 八、羅素·薩奇基金會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一五、四五七、五七五元
- 九、布爾基金會 (Buhrt Foundation)..... 一三、一一〇、八五〇元
- 十、卡尼基國際和平獎助基金會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 二一、一二七、四一五元
- 十一、密爾班克紀念基金會 (Milouk Mbevirale Fund) ..... 一〇、四四九、八六二元
- 十二、米琦干省兒童基金會 (Childrer's Fund of Michigan) 庫贊捐助 ..... 一〇、一



可獲利益。故若欲將現有之利捐出，則關於這些基金的投資管理，包括捐  
 贈人所屬之遺產繼承人，在利及利基金各項特殊章程條文的規定之下，大概仍保留  
 在捐贈人之遺產繼承人，如捐款人參加董事會或擔任職員，直接處理基金會的一切重要事務  
 捐贈人在捐贈手續中，應正而捐出，不過是資本款項的戶主由捐款者私人名下轉移到  
 基金會的戶主名下而已。基金會收入不再以利息和盈利的形式直接歸入捐贈者手中，而是經過  
 慈善基金會的投資管理，其運用及慈善和反社會的用途，仍用於直接有利益於捐贈人的事業上  
 本書

同時，我們更要注意到慈善專業基金，這些捐贈者一方面仍舊保留着對於這  
 些基金的支配權，另一方面又可藉此避免繳納遺產稅和所得稅。在捐款法上規定，納稅  
 者得將其應納捐稅的純收入五分之二或五分除會在三年之內轉用於慈善企業，即使這筆錢  
 在慈善機關中例舊轉為投資，亦不立即使用，亦無須向該管各般富稅捐看自己的財政  
 力量在該法條之下，亦無須減少的時候，他們當然樂得將一部份必需納稅的錢拿出，利用  
 捐稅法的規定，來將應納稅的錢，統統地存下，慈善基金會保管。這樣，他們不但可以獲得  
 慈善家的姓名，而且可以獲得高舉他們的財政實力。



查新聞雜誌流傳之下，社會一般人士不僅對於基金捐贈的總數有一種誇大的概念，並且關於許多個人捐贈的實情也有一種錯覺。卡尼基沒有子嗣，他將他的財富百分之八十，共約三萬五千元，委贈他的基金會，其中有六千二百萬分配在英國，二萬八千八百萬分配給美國。雖然卡氏遺囑規定此項基金必需永遠保存，但他在死後對於這筆基金的應用却不能過問。據調查，卡尼基委員會將這筆基金大部份用於建築圖書館，大學校舍，和各種教育事業。最近該基金會曾撥出大宗款項幫助成年教育事業，這筆款項都是出美國或華教育協會經手勞的，因為該會主要負責人就是卡氏基金會的前屆職員。當然這筆捐款大部份都用於該會職員薪俸，出版和研究上面。

洛克菲勒被給所謂慈善用途的捐款數額常被報紙誇大，甚至有些比較認真的評論家也受其蔽。因洛克菲勒的發言人不斷將同一筆捐款在不同時期用不同名義三番五次地對其公佈。有許多基金最初宣佈由普通教育董事會與洛氏基金會受領，後來轉撥芝加哥大學與洛克菲勒基金會，又由這兩個機關宣佈一次鳴謝受領洛克菲勒先生捐款。

此外，除各機關籌款不情地最初撥贈的資本金和後來從這筆基金歷年收入中再分配出若干的撥款外，基金的關係又越界各方面對於洛克菲勒撥贈各種基金團體的捐款數目估計，最多和最少相差竟達一萬五千萬餘元之數。

此外，在方面計籌洛克菲勒家族捐款時，常常將那些政治性的捐款（實際就是賄賂）也

包括在內。「捐款」是一個很籠統的名詞，並不一定和慈善有關，有時甚至相反。例如，老洛嘉非勒會送「給麥院和衆院議員許多」「捐款」，實際這完全是政治賄賂。在紐機和瑞士國所發行的洛克非勒慈善捐款總數中，裏面有一項是捐給反沙龍同盟會的五十萬鎊元，這有一項捐給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十一萬八千餘元，這些「捐款」竟然都確之爲慈善事業。當然，在洛氏家族看來，在沙龍同盟會（洛克非勒之持下的一個政治團體）和共和黨都屬於慈善事業機關，因爲最低限度，這些機關對他們確是很慈善的。

洛氏不滿意其應該承認至少老洛克非勒有一八、三六五、〇〇〇元捐款確係慈善性質。沒有疑問，這筆款子是捐出去了的，洛克非勒從小便遵奉他母親的宗教遺訓，不斷將他遺產的一部分捐給教會或個人。因爲洛克非勒一生都是爲擴張個人權力而奮鬥，我們可以推斷他一定會體認到這種捐助他人的偉大效驗。他知道一個人的野心，最隱微，倘他保持謙遜，是可以利用錢購買的。因此，當他財運日益亨通之後，他愈加增加對教會的捐贈，學樣和旅客的捐款，因而使社會上對他種種不好的營業行爲的批評和攻擊逐漸完全潛沉下去。洛克非勒在全國產業上確有如此鞏固地位，這未始不是一個重要因素。

雖然，我們不該以此爲其謙虛如何，是否可以認爲有益於社會人類呢？如果存在對這種問題提出論辯，必定會遭到人們的痛斥。但是我們可以很有根據的指證，洛克非勒在他們所有各種零星捐贈中，實際完全不建「捐贈」，他是在購買一個個人實業。

一百萬元錢，他一定可以博得各方面的好評，稱讚與羨慕。要提高自己的地位，或變轉少一點也很容易做到；如果「捐出一千八百萬元，要購買聖人的專號書亦非難事。

在洛克菲勒各種零星的捐款分配中，有一個很特出的例子。小約翰·洛克菲勒有一次忽然大發雅興，撥款一千四百萬元，重建從前殖民地時代維金尼亞省的遺跡，威廉堡舊城。建築費許，完全是恢復舊城遺跡。這筆錢如果動機是爲了慈善和社會福利，大可以用在建築紐約市哈西區迫切需要的義務醫院或南部貧民區的住宅。很顯然的，洛克菲勒破費這筆鉅款來興建這個歷史遺跡，一方面是一種利用人民愛國情緒的廣告手段，同時更藉此減少所得稅負擔。

還有一筆更可懷疑的洛克菲勒慈善捐款，是在一九一四至一九年間，洛氏基金會捐給戰時服務活動的二千二百五十萬元，其中分配給紅十字會的數目僅有八百餘萬元。在歐洲方面，得到他的慈善救濟的祇有土耳其一國，數目僅五萬五千餘元。因爲他這爲慈善救濟完全集中在一方面，而對於另一方面人民的苦難却袖手不理，所以他這種慈善捐款決不是應天個人的慈善救濟，而是鼓舞他所袒護的交戰國一方面的民心士氣，做種參戰的一種手段罷了。

那麼，洛克菲勒對毫無疑義的真正慈善事業，究竟捐出多少呢？他們的確捐出了他們的基金收入的一部但斷不是全部。根據洛氏各種基金會的報告表

的報告計算起來，洛氏家務所捐出的基金收入，共不過二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同時，這筆數目中的有廿萬萬元，係撥給芝加哥去學，洛克非勒研究所，中國醫院補助等事，及其僅在盜賊劫掠之下的各機關，又轉化為基金資本，所以，真正放手捐出去的款數，總共一萬二千五百萬元。但是就是關於這筆真正捐出去的款項，洛克非勒也和其德慈善家一樣，隨着他們的好惡與興趣，都是經過預先指定用途和規定嚴格遵守條件的。

洛克非勒氏家族慈善味持對於他們的各種基金的直接統治，捐款的分配那要在他們總取一專家顧問的意見之後，依照他們的意志和興趣能決定，所以，他們所捐撥的基金資本，絲毫並未放棄，更沒有脫離洛氏一家的支配。在目前安排之下，很奇怪的，小洛克非勒可以將他所有幾種各銀行公司的股票證券轉移到他所屬各種基金會的名下，同時絲毫也不影響他在產業界與金融界的權力，因為他仍舊可以決定和運用這些股票證券在各洛氏公司中的表決權，因而他可以決定各該公司應該付給他多少報酬，或各基金會應該付給他多少薪津，以補償他對各基金所捐出去的紅利收入。

## 二

關於大富翁們慈善基金的運用，有兩重可以感覺的現象，表面上似乎互相矛盾，實

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統一在一個意志與目標之下，那就是說為了維持社會現狀。從這種兩重現象的觀點來分析，這些非商業性的基金所表現的作用是內包的，特殊性的，同時也是外延的和一般性的。用理學的名詞來說，這些基金的性質是屬於熱情的，人格化的和感性的。同時也是無情感的，冷酷的和非人格化的。這種似乎矛盾的兩重現象，可以從這章概括的說明：就它的內包的，特殊性的和情感的方面來說，這些慈善基金和它們的捐款人與管理人總是「和善心腸」；但就外延的，一般性的和非人格化的方面來看，這些人們又是「鐵面無情」的。就好的成就方面來說，——毫無疑問，他們確是做了一些好的成就，——這些基金係為真理與人道而服務；從它們外在的一般的非人格化的方面說，這些基金存在的真實原因即在一於此——而論，這些慈善事業也和新聞事業和政治組織一樣，主要的為着私有的金錢勢力而服務。

所以，根據這樣的觀察，我們對於那些領導「慈善」事業的們，同時就是那些歷次歐陸運籌經費的輔助者漸漸出版的統治者，和那些機關報條之下和他們的雇員工人「談判」的大冊上市這個事實便不覺其矛盾和難解了。現在讓我們看一看幾個慈善基金會的重要人物的姓名？對於以上所述將更可瞭然。例如，洛氏基金會的董事包括道頓·洛克菲勒，潘茨·潘甫，阿德里士·約翰·狄維斯，歐文·楊格，哈羅德·羅斯威夫特等。卡尼希基金的董事有：約翰·狄維斯，胡佛，霍爾，海因茲，安德留，梅隆，羅伯

特許經營權(任再新) (非商業) 和而西拉斯·斯卓恩(萬國商業機器公司董事長)等。雖然期間，所有各種基金會的董事，他們的生平業績，不出多步和夫道與博愛等。這雖有顯赫的遺產，最多是顯赫的表現，還是為着私人金錢慾望的權力擴張。

法人權操於總教授深入的研究所，在七十個基金會的董事中，至少有一半以上是屬於權勢服務而不是為治理服務的社會階層。百分之十五係律師，百分之十是各大公司經理，董事百分之九是銀行家，百分之九為大學校長或其他行政人員，百分之五是金融界專家。

在本書後述分析中，舉例均以洛克菲勒各種基金會組織為任，因為社會上一般人對他們還存有許多幻覺，同時關於他們的事實材料也最豐富，容易說明。當然，有時也引證其他各種慈善機關，祇要他們的事實材料具有一般性。

現在，我們要問：這些慈善事業基金在他們內在的，特殊的，情感的和近於服務裏邊，在哪些方面是怎樣的使用呢？

○據林頓·亞拉曼在《王夫研究》一百種最大基金的使用方式，所得結論：使用在教育方面，而其餘各案其目的為醫藥衛生再次為社會福利事業。

林頓在書中在敘述範圍之內，特別注重高等教育，決非偶然之事。因為高等教育產生下層階級，產生社會的進步，這些非是各大公司所需要可以擴充業務，增殖利潤。

關於軍國非商業性的投資——慈善事業

的木材、燃料，這些人有的供過於求，又可以不斷地減低待遇水平。幸而，來以技術人員的生產週期，是加資本階級利潤的一個必要條件。

其次，據林德曼教授調查，在一九二二到三〇年間，各基金會撥出的教育專款共達二二三、〇〇〇、五三四元。其中百分之六〇、九係用於高等教育，用於成年教育的僅佔百分之四三。而在一九二六——三五期間，政府所用的成年教育經費却有一百五十餘萬美元。祇有兩個基金，肯撥款幫助勞工教育。初級教育和中等教育所得基金捐助僅有百分之二。

關於這一方面，在下章中當再作詳論。

關於醫藥衛生，在戰後經濟繁榮的十年間，佔全國基金捐款百分之三二、二。教育佔百分之四三，共數為一七三、一四一、一二九元。在這一領域之內，捐款所着重的範圍，也是包括着富有階級的私人問題在內。例如牙科衛生之門，是關係國民健康甚重要的問題。美國私人牙科診所患着牙齒疾病，但是因為富有階級力量可以聘請私人醫生得夠最好的護理。這個問題對於他們毫不涉完全不關痛癢，所以這一部門捐款的基金捐款，僅佔千份之七。牙科病科，也是對於富人關係很小，而一般平民在經濟壓迫，滋活不安環境之下，患精神失調者日趨普遍。結果這一部門所得捐款僅佔全國醫藥捐款百分之五。據精神病專家阿伯特·梅羅著統計，在一九三七年三月美國各精





實，洛氏是根據埃德華納爾天華西萬利五百六十六種瘧疾傳染食物營養延年益壽方法  
 瘧疾等傳染病應是起於克非勒所屬屬屬屬，後來他認為瘧疾是由於用過期的  
 食品從那有富發們的醫藥中施治中，中因差不多都是拿半斤換八兩的為子價元和瘧疾是  
 現實主義的開始，洛氏研究所在研求瘧疾熱帶疾病的治療法曾做了許多工作。這種甚低  
 價價是有價值的價值是我們必須注意這對於在熱帶的拉丁美洲進行經濟制前治瘧疾然有  
 很大的實際幫助。因為洛克菲勒在這些地方擁有廣大油田。

更詳細無疑將會發展對於各種疑難病症的治療方法。當然若有價值的；但是另一方面有  
 許多更大概普通或受磨難的疾者，其診治方法早已為人所知。然而這些方法現沒有廣  
 集備至。其種現社會商品的大量製造未能與商業推銷互相協調的矛盾。這層困難與醫學  
 界組織力和推廣這種能力的設備二者間也是有很大的距離。如：蜀黍（中世可食）這種瘧疾  
 早已發明其有效的治療方法，但實際上在美國南部州却是普遍流行。這層困難對於  
 普通病者的人，主要的是缺乏適當營養。還有心臟病發生的主要的原因，大家都知道是  
 由於過度疲勞（因為工廠盛行加快制度），營養不良（失業之故），和對於瘧疾發生不  
 善的預防所致。

瘧疾於瘧疾流行，天花，傷寒，白喉等流行疾病的經費大為減少。是為瘧疾，秋風  
 愈發者填大，瘧疾一類的疾病雖然療法早已為人所知，但據統計在美國瘧疾

症時，天每氣診五十餘萬人。據芝加哥衛生局長卜德孫博士估計，差不多平均每五個美國人中，就有一人或半個染着各種形式的花柳病。然而，最近美國盛行的根治花柳病的運動，乃是醫藥業借這和撥款推行的。

○◎一般醫藥們雖醫藥撥款，實願大規模集中使用在研究試驗室方面。這是因爲這種工作很煩瑣，容易惹起，而且一旦有所新發明，便立刻可以名聞全國。醫助查及一般醫藥家，工作不勤，費錢又不容易表現成績。

以前經過許多醫藥們有時直接一個人，有時經過他們的基金會，似乎對於醫藥事業甚爲熱心。報紙新聞關於這方面的新聞記載和報告，常常使一般不明底蘊的民眾，爲之驚佩。他們以爲這些醫院的維持完全是靠着這些慈善家的施捨。但是，這些私私醫院除派派讓讓在太可厭附近者爲了便利工人治療的醫院，很顯然這些醫院的作用，對於特種製造利潤的機器設備之一種附屬物。而然，沒有一家是完全免費的。就大多數病人而言，這些富人捐辦的醫院，最嚴格按照商業原則經營的。雖然也種「朝陽」醫院，將醫費定得極其廉潔和免費，住院的辦法，但貴重的實驗室，手術室和一般設備，都有捐辦。未和修繕的規模，自有權隨時享受。他政府所辦之加爾各答醫院和紐約白里維爾醫院，雖然是慈善的機關，在那些富有的捐款中，並不無一。而然，其目的，在於使病者，立於同時，這些由富有的捐款，而經營去，其目的，在於使病者，立於同時。

立醫院。建備對於一般市民除了住得附近而外，更應得步，而對於所有這層層是極便利的設備。這一點便值得我們注意。各地專科醫院所有一切設備，無論它們距離遠近，對付傷病人們隨時都可利用。一個富人在遇有疾病的時候，他請以乘火車或乘飛機便到這等醫院，如果傷病在床不能移動，醫院馬上便會派專科醫生以最敏捷辦法趕來診治。居在較遠地帶的窮人，甚至大多數中產階層很少有車馬到這等專門醫院就醫的麻煩。所以，現代醫藥的新發明與新設備，對於普通老百姓是更有許多益處。我們復濟藥業社立醫院的興辦，帶着很奇怪的個人色彩。例如，在紐約一區六十七號街那幢巨大的商業性的「紐約醫藥中心」，大部係由哈克納斯家族創建。這幢醫藥中心時常擴充，現為社屬。在這個商業中心區設立醫藥機關。這個醫院二十塊地，地產是參差以前哈克納斯家族當這地帶還是一片荒涼的時候購得的。這幢醫院的建築費是參差在九到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元。其中地產值一、四一八、〇〇〇元。其餘建築費五、二七五、〇〇〇元。地產稅、建築稅、地產投資及流動資產共有二五、三六、〇〇〇元。這幢他為醫藥機關與備款。

人中總負責方面基金捐款共有二五、一五八、九四七元；其餘各聯主要負責基金共五、二七五、〇〇〇元。地產及建築價值可以概括。

在進款收入方面。一九三五年度總共進款一百七十一萬餘元。全年醫治的價值總計共值一百三十三萬餘元。只夠哈克納斯家族及其親友在公園舉行三周年紀念大會的費用。

據紐約醫藥中心和私立紐約醫院報告，它們所屬各醫院診治的住院病人佔有總進款百分之七十的收容量。而同時紐約市內每家公立醫院卻感覺癱瘓不敷，過度操勞的苦痛。這是在美國（也許是在全世界）最華貴最考究的醫院是紐約市的醫生醫院，係由一百八十四名富貴家族籌資創辦。這個醫院完全是爲了富戶。其裝璜與設備比之華德森夫人醫院。阿斯托大飯店有過之無不及。一個短期住院病戶可以特闢整齊的房間。這個醫院也另設有一個小小的診所爲附近居民的義務診治，以表示澤及平民之意。

關於「社會福利」這個空泛的工作領域，據林德君調查，在一九二一至三〇這十年來之間，共收到基金捐款七千八百七十萬餘元，佔全部撥款百分之十四。這筆基金一半備作慈善機關，在這個範圍內的「明活動對於故遺使太多窮人人民痛楚的社會福利」很少有何進展。據林德君統計，公益團體佔「社會福利」事業全部捐獻額上佔百分之五。其餘的捐獻額爲百分之二八。八。其次爲「俱樂部工作，孤寡津貼，平民服務，調查研究，慈善機關」各項基金。偵察，消防等。一。照估比例依次遞減。但每個未償還了五十年來年的慈善事業。這一點慈善的事業基金的分配不但是杯水車薪，簡直是杯水車薪。

關於教育、衛生與社會福利三大部門，在一九二二至三〇年期內，佔去所有之慈善金總數的百分之九〇。六。在目前社會制度之下，這幾個部門的慈善事業完全是墮於靜止的消極的社會範圍。

那麼，當有者怎樣做纔能使他們的基金捐款發揮積極的建設意義呢？他們太可以仿照大投票經紀商的未亡人所創立的薩奇基金的模範。這個基金會所辦理的是扶助和獎勵社會研究工作，以客觀態度與科學方法研究解釋社會各種病象，將他們的研究所得經過刊物和議會公諸社會，幫助一般人民正確了解應該如何自助互助。或者他們也可以按照另一個較小的基金會辦法。據財富與文化一書中所載，這個小規模的基金如對於個人慈善、傳統的教育，這些方面的注意和努力日益減少；而對於藝術、學術實驗與文化交流、國際問題、科學的大衆化運動等方面，却日益加強努力推進，同時他們對於社會設計、社會立法，和保衛自由與正義的運動，也是盡量予以協助。

一個鉅富家族很可以創辦一個偉大的有價值的日報，像威拉特·斯瑞特與艾爾斯。赫斯特夫人的支持新共和週刊及維拉特先生之支持民族週刊那樣在財政各方面支持它。這樣的一個日報，如有人捐資，辦，交給一個包括如杜威博士，查理士·畢爾德博士，魯德士·蓋柏蓋爾士，及卡爾·阿克博士一流真正為真理服務的人物的董事會來經營，那麼這樣的報紙必能發揮很大的啓蒙作用，促進聰明合理的社會與政治行動。

這樣的報紙，從私人特權的觀點來看，一定是破壞性的，要不得的。

我們可以舉出很多有趣的奇怪實例，說明一般富人一方面企圖博得慈善家的榮譽，同時又不願使他們得以獲得應得的社會現象到影響。於是挖空心思，手段百出，提出一些絕對影響不到現存社會關係的所謂慈善活動。他們常常打算做些好事，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世界上却沒有那麼許多絲毫不得失自己利益的好事。大富翁華爾特·克萊斯勒最近也參加了慈善活動，捐出一筆錢研究兒童營養問題，他準備拿出更多的錢來提倡這種兒童活動。這種別出心裁的慈善事業固然新穎動人，但這些所包括的社會利益却微乎其微。

因此，我們得出結論：就社會健康一點而論，現代富翁所辦的慈善事業在他們內心的，特殊的，情感的，和服務於真理入道方面，顯然是盲人騎瞎馬，走白雲間。林德曼教授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新共和週刊上，關於這一點曾有一段很精警的評論，他說：「雖然各種基金常常做一種慈善的掩護，但很明顯的這種掩護只有很少部份是施用在特別慈善性的用途上。……祇有很微少的一部份基金捐給找到它真正途徑達到那些在經濟上真正需要援助的人手裏。……各種所謂慈善基金，其基礎固乃在維持現行制度」。



在為權力而服務這方面，所謂慈善事業的意義最深刻，影響也最鉅大。以上所述那一部分的活動表現，不過是為着掩飾其存在真義的一種表面裝璜而已。

儘管我們對於慈善事業的作用與效果見仁見智，結論各異，但是有一點必需指出：有一切慈善事業都是為着適應某些家族的特殊需要而興辦。捐款分配的大小，和對於各種慈善部門的畸輕畸重與多少不同，都是要看捐款人的特殊需要而定。以下舉例仍是洛克菲勒家族的慈善事業為中心。

一、很少所謂慈善活動，不是當這些表面堂皇而皇之的慈善家遭到很尖銳的政治打擊或輿論評論的時機開始實行的；這樣的慈善事業在本質上是向社會輿論買好，是一種沽名釣譽的手段，所以它必需盡可能向外宣傳，使盡人皆知。

二、差不多所有慈善事業活動都和全國或某一特別地區在當時規定的捐稅制度有直接關係。因為慈善事業成為逃避捐稅和保持或擴大產業統治權力的一種手段。

三、各種慈善基金本身可以帶給它們的發起者以鉅大的集中的社會勢力，而這種社會勢力的運用主要是為着現行一般社會制度的存續。

四、有許多慈善事業的創立，完全是因為那些慈善家沒有子嗣，事實上不得不如此。

洛克菲勒屢次向社會宣布「捐款」，總是當社會上或政治上反對洛氏家族的空氣突

轉緊張，或是當基本捐稅法將實行改革的時候。老洛克菲勒宣布他對芝加哥大學第一筆捐款，是在一八八九年，當時政治上反對美孚油無孔不入的勢力的形勢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芝加哥為美國中西部各省的中心城市，反對洛氏集團的空氣尤為緊張。

直到一九〇二年，洛克菲勒差不多每年對芝加哥大學都有捐贈。自一九〇二年以後，每年捐款都是由普通教育董事會撥款，雖然也是用洛克菲勒的名義。洛克菲勒從最初很容易一次把全部捐款拿出來，但他不願如此，因為這樣祇能得到一次喝采。他知道社會公衆的記憶是很不容保持長久的，必需三番屢次重複地喚醒和加強它。

一九〇一年九月，麥金萊總統逝世，一九〇二年老羅斯福（提阿多·羅斯福）上台後，無論在公私場合都顯明地表示他對洛克菲勒的仇視，把他當做一個重要的政敵。就在這時候，洛克菲勒宣布捐款一百萬元，成立普通教育會。一九〇五年，老羅斯福仍在不斷地和他為難，於是他又宣佈他撥給普通教育會的基金前後已達一千萬元。當時，美孚正在被各省紛紛提出控訴，有幾省法院甚至發出對洛克菲勒的拘票。

一九〇六年，老羅斯福向議會提出他所屬公司管理司的檢查報告，並附帶說明他的意見說：「美孚油公司直到現在仍舊在享受各鐵道公司秘密運費的便宜，而這許多秘密運費的規定顯然是違法的。」

就在此時，美孚油公司在印地安那省被控違反愛里金法案（該法案禁止秘密減低運



費)；在華盛頓省被毀破產的取羅托拉新法。另外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威脅，那就是在一九〇六年十二月間老羅斯福向參眾兩院提議實施遺產稅法。

在這裏一個連着一個的打擊之下，洛克菲勒在一九〇七年二月間宣布，爲了人類福利，決定再撥三千二百萬元給普通教育會。一九〇九年七月，又撥捐一千萬元。很熱熱的，洛克菲勒是着慌了，但他最着慌的還是害怕喪失對於他所「捐贈」的基金會的統治權。據說，在洛克菲勒捐款約三千二百萬元的前幾天之前，法院爲他這法減付運費一案，曾判決罰款二千九百萬元。後來這個判決經上訴後又撤銷了。

第二批撥款是在一九一〇年，宣布以一千萬元捐給芝加哥大學，當時正是在美孚石油公司律師關於違反取締托拉斯法控案提出聲辯節略的幾天之前。但這筆捐款係由普通教育會的基金收入項下撥出，所以它並不能算是新的資金。洛克菲勒不過是將他早已捐過的錢再拿回去，故意賣弄，用以惑惑社會罷了。

到這時爲止，洛克菲勒的基金撥款前後共達六千萬元，在緩和社會的仇視情緒方面已經發了效力。同時洛氏對於報紙編輯和發行人的許多「捐助」，在改變輿論態度上作用尤大。

一九〇九年七月十二日，美國國會對於憲法的所得稅補充法案分別通知各省，洛氏議會均表贊同。一九一〇年三月二日洛克菲勒請求衆院關於他所捐的各項基金，提出特

許的免稅的通知；但國會對於此項法案所訂條款十分嚴謹，奈難變通，結果到了一九一三年五月十四日纔算得到紐約省的免稅特許。於是洛氏基金便立刻組織成爲一萬萬元。到了五月三十一日，國會增訂的憲法第十六條補充法案，即授權政廳徵收所得稅的法案開始實施。但這時洛克菲勒已經將他的納稅義務大大減輕了。

根據上述我們已可看出，洛克菲勒是一個現代美國最精明的一個逃稅者，同時或許也是有最高權力慾的一個人物。洛氏家族所擁有的錢遠遠超過他們自己可能想像的價值以外，所以非常明顯，他們一切而不含的各種金融活動完全是爲權力而努力，凡是以保持和增大他的權力——甚至關於慈善事業的統治的手段與方法，他無不使精。他的兒子也能克紹箕裘，繼續乃父精神。

由此不難明瞭爲什麼第一次所得稅法係由洛克菲勒多年的法律顧問瑟夫·周愛德頓頭反對；同時周愛德頓也有辦法設法影響最高法院在一八九四年宣佈此項法案無效。擁有最大收入的洛克菲勒，這個所得稅法案對他的損失當然比對其他任何人都大。

洛克菲勒基金，也和普通教育董事會一樣，將一大筆錢（也就是統治勢力）安置在任何擬議的所得稅或遺產稅法所不能達到的方面去，在四周圍插上輝煌的慈善大廈。這是不是說得過火，冤枉了好人呢？假使洛克菲勒真的是願意將他這筆錢用在有效的公共是業上去。那麼爲什麼不甘脆將錢完全交給國會去統籌分配呢？

洛克菲勒第二批遺產的捐款直到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年才宣佈撥出，這時候正是美孚油的戰時利潤空前增大，同時國家的所得稅也提高到近似懲罰的水準。關於所得稅前面已經提到，現在我們應該再將新興的遺產稅稍加介紹。一九一六年國會通過實行徵收遺產稅，規定超過五百萬元的財產徵收百分之十；第二年稅率又行增高，規定在一千萬元以上者徵收百分之二十五。洛克菲勒看見這個趨勢，似乎頗感恐慌，因而便開始將他的大部份財富預先轉移給他的兒子；所以，當他逝世的時候，他的個人財產登記僅有二千五百萬元。

在一九一七年，洛克菲勒有一千三百萬元應繳與所得稅徵收局，但他用捐給基金會的方法仍得保持對這筆款子的支配實權。一九一八年他又創立勞拉·斯派爾曼·洛克菲勒紀念基金會，使七千三百萬元的戰時利潤仍保留在他掌握之下。否則，這筆錢是註定要歸於稅務署的。一九一九年他撥給教育會五千萬元，洛氏基金會七千萬元，一方面逃避了鉅額的課稅，同時又保持住他對於這些基金的統治。

根據洛氏基金，普通教育董事會，芝加哥大學，勞拉·斯派爾曼·洛克菲勒紀念基金，洛氏研究所，和中國醫藥董事會的報告，我們可以斷言洛氏家族由於戰時利潤和避稅所得稅等原因，他們在一九二〇年在美國產業中所擁有的投票表決權比從前任何時期都大。

但是自從彼共和黨當政，逐漸減低高級所得稅及遺產稅的稅率以後，洛克菲勒捐款給各種慈善基金的狂熱也便突然中止。約有十二年之久，除了小洛克菲勒爲着減輕納稅義務照章捐出他的收入百分之十五以外，洛氏家族沒有再捐出一個錢。根據所得稅法，關於高級稅率方面，一個人將他收入的百分之十五「捐出去」，此保留這一部份繳納捐稅，要劃算得多。

不過，在這個期間，洛克菲勒的宣傳機構仍繼續不斷宣佈他的各種名義捐款；事實上這些捐款祇是從他們早已捐出的基金收入中的撥劃而已，他們並沒有另掏腰包。

自從一九三五和一九三六年新稅法通過後，拿出一部份數目捐出去尤爲合算。康乃爾大學年報在對一九三六年畢業同學的致詞中曾指出：擁有納稅資產一百萬元者如果捐給學校一萬五千元，可以少納財產稅四、三四〇元，節省管理費三五〇元；每年納稅收入在十萬元者，如果將其收入捐出一萬五千元，則可少納聯邦所稅法八、六五〇元；各省平均所得稅一千元。

在羅斯福新政的捐稅法案之下，財政課稅比率在二千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者，只徵收百分之六十九，較之一九三四年的稅率增加百分之九，較之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二五，較之一九二六年增加了百分之四九。

在這種捐稅急劇增高之下，洛克菲勒家族又對自己權力的保持大感不安，又開始他

們的「慈善」活動。新證券票據交換法，也是促使他們加緊實行財富轉移的一種推動力。

一九三六年八月證券交易委員會報告在羅斯福總統要求國會提高稅率九天之後，小洛克菲勒「捐出去」索康尼汽車公司股票二百一十萬股，價值二千七百萬元，因為沒有宣佈捐給「慈善」事業，顯然這筆款子是分贈給本家族子弟。如果這筆錢分做六份，那麼按個人財產轉贈捐稅法規定，這筆錢轉贈所課捐稅至多不過百分之三二。如果轉贈給一個人，則應納稅增至百分之五一。三。假使洛克菲勒保留他的財產不動，並假使他死在一九三五——三六年新稅則正在實施的時候，那麼他應納的財產稅當為百分之六九。另外還要繳納各省的捐稅。如果洛克菲勒保留他的財產不動，每年進款收入按佔財產百分之五計算，則他應繳的遺囑所得稅率當為百分之七三。

洛克菲勒將他在索康尼汽滿公司所持有的股票實行分散，這樣一方面就可減少應納捐稅，同時又可不再受法律約束，按期向證券交易管理委員會報告他的股票持有額，因而也就容易保守他們的家庭財產秘密。

卡尼哥基金董事會主席菲基福利克，閉着嘴會說：「人們關於捐稅的差權和野心，是促進「捐贈」的動力。在比較繁重的財產稅和所得稅的時代，祇有「捐款」可以確實戶能夠保障最高限度的資產支配權；許多人已經認清，凌亂與統治比直接擁有財產更價

值要更大，並且負担不到直接全權所負擔的那許多義務和責任。

據林德曼教授統計，在一八〇〇年以前，美國只有二種基金會，從一六〇〇年到一八〇〇年這一百年間，也祇有五種基金會成立，雖然在這個期間，阿斯特、洛克菲勒、范德比爾特已經積有鉅額財富。從一九〇一至一九一〇年間，又有十二個基金會出現，這期間青靈學會和洛氏研究所即在其中。但是各種基金會盛行一時，祇為時勢，這是在所得稅補充憲法通過和財產稅法案宣佈實施以後；從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四年之間便出現許多二種基金會。在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〇年稅額增高期間，又成立了二千一個。當基金的功用日見顯著之後，各種基金會更如雨後春筍，普遍成立起來。從一九二〇年以後，二種捐稅率隨着稅率之內，我們看到了四十九個新設的基金會。在一九五〇年以後，二種捐稅率隨着稅率之內，我們看到了四十九個新設的基金會。在一九五〇年以後，二種捐稅率隨着稅率之內，我們看到了四十九個新設的基金會。

但若干省內的特種捐稅依然存在，就是當全國捐稅減低之際，這些基金會仍保持其原有的作用一樣，仍舊不失為運用資金和收益最穩妥的一種有效的方法。

至於這些基金可以增強捐贈人在產業界和金融界的實力這一方面，我們從洛克菲勒各項基金捐款的使用方式中便可看到。例如，一九三九年抑地安那美孚油公司董事拉伯特，司徒華之被撤職，就是因為小約翰·洛克菲勒利用洛氏基金，進期教育董事會。其他洛氏家族捐贈的該公司股票，集中投票反對司徒華。總而言之，基金會捐款是一項避稅捐稅，另一方面仍可繼續保持產業的一種手段。富翁大亨們捐款創立基金，雖然多少

犧牲了一些個人現款收益，但他們的權力却絲毫未受影響。

關於基金可以提高捐贈者的社會地位一點，林德曼教授曾指出大部份的基金捐款是用作薪俸。如果說支配一個人的生活便可支配他的一切行爲，那麼這些基金的設立對於那許多在社會上有地位有威信的人物也不免會發生具有決定意義的影響。林德曼教授在其所著『財富與文化』一書中會說：

「各項捐贈基金不僅對於那些得到他們金錢幫助的人們可以發生影響和直接控制。在各種複雜交錯和間接的關係中，這些基金捐款可以發揮更微妙更普遍的影響。那些直接領受基金捐款的人們對於加在他們身上和他們工作計劃的許多限制與干涉，倒有時隱中表示不滿或批評。然而那些希圖得到基金捐款，還未到手的人們反而更爲卑躬屈節，誠惶誠恐。」

林德曼上面這一段觀察，異常重要。基金捐款的力量和影響入火之深，有時竟然用不到拿出錢來，便可以左右那些需要金錢援助方能繼續他們事業的學術界和技術界人士的態度。這些人們憧憬着有朝一日某種基金捐款的恩惠會降臨到他們頭上，因而有意或無意地便改變了他們的態度，以便博得那些可能的施主的歡心。同時，這些基金捐贈者不費吹灰之力，便能夠達到他們的目的；使那些未來受款人在他們影響之下，自動爲社會現狀辯護，或對現社會諸多不合理現象與事實保持緘默，不惹的話，這些人們絕不會

如此安分和馴順的。

這一點說明一個似乎神祕不可解的事實：為什麼許多衆所公認的獨立、自由思想的學者，科學家和一設有學問的人們所發表的公開意見竟和華爾街銀行家所表示的，如出一轍一人之口。在私人談話中，這些人們有時彼此意見根本不同，但是在公衆場合裏他們的言論表示竟和報紙社論作者那樣的協同一致。關於這樣人物的許多言論，在下述論述教育問題時還要提到。現在我們在這裏先引證一個最典型的實例。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紐約太晤士報第一版上有一段新聞大字標題「外科醫師會議的意見：對富戶增稅開辦醫院工作」，在這個標題之下登載着紐約紀念醫院弗郎克·阿戴博爾士在費州美國外科專門學校的常年醫務會議席上的一篇演說。他這篇演說的主旨已被上面這個標題包括無遺。復明顯地，阿戴博爾士根本沒有想到國家捐稅收入的增加對於醫院可能給予的幫助，要比依賴那些不可靠的、偶然的、利己主義的富戶捐贈大得多，穩固得多。

普通讀者也許不記得同年四月二十八日紐約太晤士報第一版曾經登載過一種消息：「紀念普通教育董事會捐贈紐約紀念醫院三十萬元，作為建築新樓房之用。隨伴着這個新跡的公佈，太晤士報又將他多年來每逢有一家富戶宣佈「慈善」捐款時便來一篇歌功頌德的社論再重寫一遍。



對於一般眼光短淺如阿爾爾博士之流的專門家和技術人士，一兩筆的基金捐款很容易使他們感動，有時他們挺身起來為富戶慷慨辯護，不憚們認為曲就為真理辯護。其實他們自己還要來得迅速而勇敢。這些專家們完全沒有意識到他們所擔負的這筆捐款：自從南北戰爭以來，不斷遭受猶猶和攻擊的政府所撥款與聯邦社會公益事業比較起來則難者僅在四倍以上。同時，這些專家也沒有意識到他們第一需要效忠的應該是他們的技術和智識所由來的整個國家民族。

「讓如林德曼教授所說：『在我看來，最引人反感的莫過於這些墮落之徒和社會毫無貢獻的人們，侈言發揚文化那種驕傲傲慢之氣』。他並且進一步指出：『在戰前社會不但對於研究工作有支配的影響，並且成為阻撓美國文化發展的一種障礙。』」因為他們對於文化與社會事業是站在保守主義觀點加以選擇，總歸於然或否涉一切有礙於活動。

「本報關於慈善事業的分析，祇選出洛克菲勒一個家族的活動作為實例。但事實上還有許多同樣的觀察和結論，可以適用於其他一切富戶捐款基金會。洛克菲勒捐款基金會的捐款數目多，因為他所擁有的財產也比較多，更因為他祇有七個兒子承繼他的產業。有些富翁沒有子女，事實所迫，不得不將他的全部遺產交與社會公益處。如九世相商爾德本和第十世相商爾德本，格拉德 (Stephen Girard) 和羅蘭德·斯坦佛 (Leland Stanford)。因為

沒有後裔，他們死後，便將他們的財富遺囑交諸社會。有些富戶如杜邦，萬德比，梅隆等家族，子孫衆多，用不着完全依靠基金捐款來逃避所得稅和遺產稅。因為捐稅義務往往在許多子女身上，不但數量不大，而且稅率亦可減低。關於這一點最有興味的是，小洛克菲勒有六個兒子，在一九三四至三六年間他的財產轉移中他沒有將應該納稅的超額版入據贈他統治下的任何一種基金。

#### 四

雖然如此，洛克菲勒等各種基金對於社會人類也多少做了些有益之事。譬如，在洛氏基金與羅森瓦特基金幫助之下，美國南部各州的黑人至少有一部份學會了讀書識字。經過洛克菲勒的捐助，有許多人得以免於瘧疾。當然，這些人被救免於肉體的死亡，不過是爲着延長他們在社會上被剝削的生命存在。不過，這是另一個問題，在此姑不具論。在他們這種慈善活動中，有時或者不免保存了一些他們所不喜歡的人物如悲多汶，林肯，達爾文，牛頓之流。私營慈善事業表現成績最卓著，最爲人樂於稱頌的部門，大部份是在醫藥工作這一方面。

洛克菲勒，哈克納斯，顧根翰姆等慈善家，常常以人類救星的面目出現。這些人儘管他們壽終正寢的時候，各報總是以大字標題，稱頌他們爲「大資本家，大善士」。在

現代新聞詞典中，「資本家」和「慈善家」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就目前社會價值的觀點而論，一個人要作一個慈善家，不能不兼為資本家。反過來說，一個資本家要維持其資產尊榮的社會地位，也必需是一個慈善家。

昔，傑林德曼教授調查，他很少看見富翁們在遺囑上要做慈善事業的證據。現在該調查已着辦個大富豪們的遺囑，從這里面可以很明顯的反映出富翁們的心理。成悲成好，林某亦享稱。克雷·弗力克人 Henry Clay Frick 死於一九一九年。在他生前便早已將

其全部財產分贈給他的親友，臨死時他的遺產共有七千五百萬美元。這筆遺產有二千萬元傳給他的女兒，五百萬元給了他的家工人，其餘指給各教育機關。哈佛和哥倫比亞大學各得一千萬元。麻省理工學院得五百萬元。於與全國報紙便將這筆遺產大舉頒贈。

稱讚他為偉大的人類救星。但是這些歌功頌德之詞，祇能蒙蔽局外人。一個與辦波才頓鐵路的富翁弗力德里克·普林斯在他寫給 C. W. 巴蘭的信上，曾率直的指出：實際上弗力克約遺囑原稿，所寫的是所有遺產稅（當時佔全部遺產百分之二十五）應全部由慈善

機構繳納，扣除這筆結果，他的各項慈善捐款實際上祇剩百分之十。這筆遺產中，小

然繳法百分之稅。杜克英 (James B. Duke) 在他死前便將遺產分給他的女兒，其遺產中

遺產稅和財產稅。其中三分之一給了他的太太，三分之一給了他的女兒，其餘百分之

杜克基金仍保留在他統治之下，備作創辦杜克大學之用。所有各煙草公司股公與股票大部分歸入基金會保管，既可免稅，又隨時可以用做支配該公司的實力。同時，杜克基金始終對外保守秘密，拒絕外間調查，和詢問。

安待留·梅隆（曾任柯立芝的財政部長）之兄弟查德·梅隆死於一九三三年，遺產財產據官方估計約在三萬萬元以上。當時紐約太陽士報在新聞標題上稱他為「著名慈善家」，並且稱頌他「生前慷慨好施，熱心慈善」。但是這位新聞編輯唯一能夠舉出他生前所做的慈善事業，祇有捐助三百萬元建築皮得堡教堂一事和「對於失業者曾施捨了許多錢」一句空話。雖然如此，這位查德·梅隆先生在有名的一毛不拔，向來不做慈善事業的梅隆家族集團中還是一位衆所公認的「大慈善家」呢。

梅隆在他的遺囑上說：「余生平關懷宗教，慈善及教育機關團體，尤以余感覺特別需要援助者為最」。這位「慈祥愷悌」的死者怎樣規定他的慈善遺囑呢？一千一百萬元留給對他個人有利的梅隆研究所；二十五萬元贈給他的僕從；一萬九千八百六十五萬元分給他的太太和一子一女。並且，他的遺囑執行人爲了遺產稅的爭執，曾和賓省政府打了四年多的官司，最後始同意繳納一千三百萬元的遺產稅。同時和聯邦政府的爭執，直到最近還未得出結果。根據一九三二年捐稅法案，梅隆的遺產稅應按百分之四十五課徵，連對賓省應納數目，共計應爲九千萬餘元。

梅隆在皮得堡所建立的梅隆研究所，在一般人心目中都認爲是提倡科學研究，俾益社會的一個學術機關。殊不知這個研究所創辦費僅用八萬元，完全限定於工業方面的研究，和實驗；自從成立以後，這個機關做出了許多有利於梅隆產業的發明，這些發明的專利權都歸梅隆所享有，有的留歸自用，有的高價轉賣。同時，這研究機構藉化驗證明產品品質之名，使許多可疑的並不精純的商品得以在市場上暢銷。研究所大部份收入，就是這些製造廠家所捐贈。

最近以來，各種慈善捐款和基金可以發揮更廣泛更微妙的效用已日漸爲一處富戶所注意，其實，許多人現在總瞭解的，眼光遠大的洛克菲勒很早以前便看清楚了。

當印地安那玻璃製造商喬治·鮑爾以二七五，〇〇〇元代價從摩根公司手裏買到對其價值三十萬萬元的萬施威利根鐵道公司資產的統治權的時候，許多敏感的觀察家已經感覺蹊蹺。當鮑爾隨後又將統治萬氏兄弟公司的股票攆作一宗教和慈善基金的時候，許多局外人更認爲其中必有故事，因而留神觀察他這種股票轉移的究竟結果。當鮑爾基金在兩年之內又放棄了他對萬氏兄弟公司的統治權，將他所持的統治股票以較小利潤轉賣給兩個紐約股票經紀人的時候，這種交易更使人感覺出乎情理之常。如果鮑爾將萬氏兄弟鐵道公司全部資金都放慈善與宗教基金名義之下，必可大獲其利。然而，鮑爾不此之圖，竟爲了很低的利潤將這些股票轉賣他人。這一切的内幕，直到現在還是一個謎。

有一點我們可以確定：有很大一筆資本收稅權被逃過了。

美國所得稅，財產稅和財產轉贈稅各項法案的條文規定，特別是財產轉贈稅法，使富人子孫愈多，愈佔便宜。關於這一點，在本書未章中還要說到。這些捐稅法案不遑是限定富人們必需將他們的財產設法化整為零，纔能逃避捐稅而已。

巧克力大王霍爾頓·赫斯萊 (Milton S. HERSHEY) 在一九一八年捐款在賓省創辦赫斯萊工業內科學校。他「捐出去」的股票價值六千萬，保留在他手裏的祇有一百萬。但是，赫斯萊對於這一筆免稅的捐款基金仍舊保有絕對統治權；基金收入用於辦理體格強健的白種孤兒教育。同時，他的赫斯萊工廠仍和從前一樣，照常工作，當有工潮發生的時候，依然不吝氣用警察和武力鎮壓，毫無慈善氣象。至於他們辦的學校，全部課程訓練都嚴格限於關係製造巧克力的技術部門。據某些教育專家觀察，這些「受惠者」所受的教育訓練祇能在赫斯特工廠服役，決不適合其他工作部門。

銀行家查理士·海登 (Charles Hayden) 在一九一七年逝世，所遺財產據非官方估計，約在五千萬元以上。根據他的遺囑，這筆財產全部捐做救濟青年兒童的慈善基金，因而依法全部免納遺產稅。這個基金即名之為查理士·海登基金董事會。海登生前未結婚，沒有子女，這是可注意的一點。更可注意的是這筆基金完全交由海登的企業同夥保管和經營；因此他們仍舊可以利用這筆巨額基金來加強他們在產業界和社會上的統治實力。

藝術家將他的遺產轉贈給他這些朋友個人，那麼這筆財產就必須依法交納百分之七十的遺產遺產稅。因為這個遺產擁有六十家產業的統治權，利用這個「慈善」的遺產來保存它的完整，當然是有利的。

現代各種慈善基金的創立，確已成為一種藝術，所危險的是資本主義在它前捐稅法制推動之下，可能有一天整個的變成一個「慈善的」體系，不但統治着經濟機構，而且支配着人類的心靈。

最後我們應該將許多富翁愛好藝術收藏這個問題稍加分析，因為一般社會時常在報紙上看到某某大富翁將他豐富的珍貴藝術品交給某有關公共機關，公贈社會，因而不禁衷心感佩，認為這些富戶們至少在這方面對於社會人類是有貢獻的。

拆穿了西洋鏡，完全不是這麼回事。這些億萬鉅富十之八九不但說不到是真正的藝術家，並且他們的藝術興趣也總是充滿了銅臭氣味。一件古董和藝術品，在收藏者競購之下，已經具有很高的經濟價值。同時，因為各項稅率的差別，外匯市場的變動種種關係，在國外收購藝術品這裏面更大有文章。

第一、美國捐稅制度非常複雜。在聯邦所得稅，遺產稅，和財產轉移稅之外，還有各省的所得稅和遺產稅以及各縣地方的個人財產與不動產稅。因為古董和藝術品價值可以隨意規定，不受市價約束，買進或賣出在賬簿上登記可以有很大的收縮性，使聯邦

買賣遺產和舊商標委託無從查考。譬如，國外古董商人常常聽從美國顧主之便，可以隨便虛報價值，有時可以抬高，有時報得很低。

如果這些買進的古董是做爲私人財產，或是預備收藏在私人藝術館中，做爲不動產的一部分，應報低價是有利的。如果是用做減少納稅義務，高價虛報是合算的。譬如，一舊富翁在海外有七千五百萬元的營業收益，打算將這筆錢匯回美國，依法必需繳納財產轉移稅或所得稅。如果他將這筆錢買成藝術品和古董，那麼便可以其價值報做二千五百萬元，將其餘五千萬元匯購過去。同時，藝術品進口向例是免納關稅的。如果將這些藝術品推古董陳列在一幢建築起爲博物館，那麼便可以依法爲這個博物館的房產地產要求免納地產不動產稅，經過一個時期，單是這些地產的漲價有時便足以抵過全部藝術品銷費本。

第三、歐洲外購率的變化有時可以使美國富翁用極低廉的代價收購古董，賺到很多的錢。如果這些古董運回美國以高價轉售，那麼所得鉅額利潤依法必需課稅。但是他們絕不肯這樣做，對於其他從美國且多方設法隱瞞，對於古董當然更容易上下其手了。譬如，有一位美國鉅富派遣他的古董經紀人赴歐洲某國收購一批古董，假定價值五百萬元，因爲該國通貨膨脹價格係用去十萬元的代價。這經紀人並不馬上將貨物運回美國，他先在市場上和他弄幾好了的其他古董轉了幾次手，一次比一次將價格提高，最



德魯巴黎某古董店（也是預先約定的）實行公開拍賣，由那個美國富翁另一個代表以五百萬元買去。於是這筆交易便在報上發表，美國某某富翁以五百萬元代價買去一批古畫的消息便為社會所週知。

於是這批古董運回美國，照章免納關稅之後，這位富翁要做需要現款，按四百萬元一減價轉售他人。在表面上他還賠了一百萬元，當然用不着繳付所得稅了。這樣結果，他賺了實際買價十萬元，獲利三百九十萬元，雖然在這筆鉅額利潤還要除去他的幾位經紀人和古董商的佣金，回扣和種種開銷，可是他卻逃過了應納的一百萬元所得稅。

現在讓我們舉出幾個真實的例子。老摩根在世時曾任首都博物館理事長，他將他所獲藏的藝術品和古董送交該館陳列，一般人當時認為他已經「捐贈」該館。直到他死後，他的兒子以二千五百萬元現金賣給該館的時候，大家纔知道他原來是暫借的。同時，從前商業們曾經提到，摩根公司並且利用這個全國藝術寶庫的首都博物館，作他們買賣報紙的一個替身（因為他們不願直接出前）。統治首都博物館的一些理事如穆塞等人，在前章中都已說過，不再詳論。

此外，摩根家族在麥迪遜馬路他的私邸近旁還建築了一個規模宏麗的圖書館，陳列許多價值鉅萬的名人原稿手跡和古版文家書籍。雖然，該館章程規定少數外界參觀者必

需憑證纔能進內參觀，事實上絕非公共機關可比，但是摩根却假借這個名義向市政府要求免納地產稅。如果這個圖書館的地產要課稅的話，至少每年當在五十萬元以上，這筆錢是夠維持和營運該館的一切開支而有餘，這當然是很合算的事情。這塊地皮正在興繁盛盛的曼哈坦中心，四周圍盡是摩天大樓，地價每年都在上漲，然而擁有這塊地皮的主人摩根却可不納一文捐稅。同時，摩根一方面將這個所謂圖書館在白天嚴格限制少數外人參觀，另方面晚上又將它完全做爲他們家庭舉行宴會和獻祭的場所，真是一舉而數得，無往而不利。

亨利·弗力克也是爲了逃避地產稅，將他在五馬路的私邸改爲私立藝術館，後來對外開放。政府對私人城內宅邸的課稅，有時候甚至超過它的價值。但有時顯爲政治變動，稅率可以減低，這時他的這個產業仍舊可以還原嚴格的私有狀態，因爲法律上的所有權是保留在他的家族手中。

一九三六年，安得留·梅隆突然宣佈將他所藏價值五千萬元的古董完全捐贈政府。根據一九三五年的捐稅收法案，梅隆這批古董在他的財產目錄上應課稅三千二百三十六萬二千元。所以在這樣情形之下，梅隆當然樂得慷慨一下。

這里不免讀者要問：如果說梅隆所搜藏的古董果真破費了五千萬元的話，那麼難道他將這批寶藏捐給政府不是一種真正的捐獻和犧牲麼？要答覆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先考

察一下他這批古董在梅隆財產累積內幕中所發揮的作用。假定梅隆當初購買這批古董的確化費了五十萬元的成本，那麼這批古董對於他在金銀上一定是一種很大的便利，或是因為當時他存有過多的現款，或者這筆錢原是存在國外由於通貨或其他限制不能匯回國內。我們知道，現金有時對於一個億萬富翁倒是一種麻煩；鉅額現款存放銀行常常拿不到利息；在某一特殊情況之下，將這一筆巨款投資出去，有時又感覺不安全感。但是，具有永久不變價值的古董或藝術品既不容易遭受毀壞和損失，又可代表比較固定的真實價值。

那麼，為什麼他們不甘願將現錢保存起來，可以得到同樣的安全呢？但是，現錢是時常貶值的，這種貶值可以從物價的上漲方面反映出來。例如，一九一八年，美國在輝煌的匯換率跌至三角以下。一九三三年，美金一元貶值竟達百分之四〇。四。

一個億萬富翁自然要將這些問題都考慮在內，他們必需設法將他們手中的財富盡量化為各種可能形式加以保存。古董和藝術品便是保存財富的一種特別形式。財富的形式變換，不僅要利用各種股票，證券和現金，並且也可以利用地產，古董，藝術品，珠寶和保險政策等等。如果在國內各種變換的方法都已用盡，遂可向國際方面發展，收購外國各種證券，和通貨，以及國外地產等等。最後，還有免稅的慈善事業基金可以利用。此外，傳統收藏古董和藝術品，也和上述保險政策一樣，這是保護財富，避稅營生。

深及其他各種金融風險的一種手段。藝術品很像黃金，實際上是一種國際通貨。各國政府非常瞭解，常常沒收私藏古董和藝術品，及藏黃金和外國貨幣證券。

由此看來，梅隆家族在他們大規模的藝術品收藏中確是得到了顯著的經濟實利。假若他們會將這批古董原數保存二十年，在這二十年間他原來成本五千萬美元，每年應減少二百五十萬美元。對於一筆鉅額財產，這是一種比較廉價的保險。在目前，財產稅率的增加使這種特別形式的保險太不合算；因此，梅隆家族便很慷慨地將他們這批古董捐出去了。

一 如果不是一九三五年新頒的財產稅使梅隆這批古董收藏太費錢的話，那麼他們一定還會繼續保存下去。不論將來美國貨幣貶值到如何程度或者他們的公同受到什麼樣的限制，他們手中這五千萬財產的實價永遠是不會改變的。即使在美國賣不出去，歐洲各國也會以相當價格再收購回去的。

對於局外人，以上這種種考慮和設想，似乎感覺牽強，難以索解。這是因為他們沒有接近過鉅富家族，不知道一般富翁們對於他們的財富時時刻刻應想得到適當處置的不安心理：第一，要設法獲得最大收益；第二，要避稅免稅高領的捐稅；第三，要設法化整為零人壽可歸化為多種多樣；第四，要能保證永久長壽。考察一般富翁的遺囑，便足以看出他們這種複雜糾紛的心理。

不知內情的局外人常常指責一般有錢人祇是對於「死去」的藝術發生興趣，而很少有人關心現代藝術，更少有入願意資助現在活着的藝術家。其實，理由非常明顯，因為這些富翁們實在關心和發生興趣的也還不是那些「死去」的藝術，而是如何運用與保存他們的財富權力。他們對於過去的藝術發生興趣，不過是因為這些古董已經成爲一種實際的金錢媒介物。

這從下面的事實便可證明。最近幾年以來，聯邦政府在其失業救濟單上有五萬多個藝術家需要救濟，但末見一般富翁對這種現象有何表示。現代美國有許多藝術家，他們的作晶已經屬於不朽之林，但除了真正有審美頭腦的國外人士對於這些作家能夠賞鑒外，一般腦滿腸肥的富翁們也是漠不留意。

關於戲劇和音樂，在鉅富階層的心目中，不過是當做一種娛樂和消遣。當經濟蕭條上黨的戲劇演具陷於困窘狀態的時候，很少富翁對此表示關切。聯邦音樂團在政府資助之下，不但在各大城市，並且巡行各鄉鎮，以兩三毛錢的門票，舉行公開演奏，備受社會歡迎。然而各大家戶富麗輝煌的音樂隊，却祇是備做家宴和跳舞會之用。

某些鉅富家族與辦所辦慈善或公益事業，顯然是零零碎碎，毫無系統的，這是因為他們的經濟要求和洛克菲勒一類的富翁有所不同的故。所有這些富翁每年多少總要對一慈善機構或教會基金捐出一點錢，以便使他們的芳名至少能夠每年有一次見報。這些

富戶大部份都有一兩個自辦或特別眷顧的醫院，學校，公園或運動場，以便揚名社會，同時在經濟繁榮的年月，又可以做減輕納稅義務的藉口。每一家這一類的捐款行爲，首先我們要就他們個人立場加以詳細考察，然後才能決定其中究竟有多少「慈善」成份。作者曾經研究過許多實例，發見差不多無例外地，各富戶的從事慈善事業較之不這樣做，要少繳納很多的捐稅。

福特和杜邦兩家，不是常常在報紙被稱爲大慈善家麼？讓我們看一看他們「慈善」的真相罷。

不錯杜邦家族的確出資在德拉維爾省建築了許多初級學校的校舍；該省大部份公路也是由他們出錢建築的；同時他們又創辦了幾個主要醫院。但是我們要知道他們這一家人和他們親戚在這個小省份（德拉維爾）裏，是唯一有錢的集團；這些公路，醫院和學校如果由政府經辦，經過增加稅捐方式，大部份的錢也還是出在他們身上的。與其經過政府的筆，何如由他們自己來辦，這樣一方面既可化費最低的成本，同時一切建築材料設計工程由他們自己的公司工廠承包，也可賺回幾文。此外，更可博得慈善家之名。真是「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爲？」

福特和杜邦兩家（密球卡省）曾捐出鉅款設立許多醫院，因爲這兩個地方主要靠礦業工感，這些醫院大部份是爲診治替他們効力的傷病工人。很明顯的，這不

是美國企業活動的一部分，絕沒有任何慈善成份在內。赫森特，顧根，姆，道奇等富翁，也在他們的機關中心創辦了若干醫院，其動機與性質也是一樣。

玩樂，有些富戶對於藝術，音樂，和科學等事業的慷慨捐獻，確是出乎誠意，毫無任何自私利企圖的。但是，這一類的事實真如鳳毛麟角，寥寥無幾，在整個假慈善之名以遂自私之圖的普遍趨勢和現象中，是無足稱道的。

總結起來說，富有家族經過他們的慈善事業，愈求愈富，愈有權力。——這句話似乎荒唐，然而却是實在的真理。

## 第十章 教育——利潤和逃稅

第一層虛偽的慈善事業活動中表現得最露骨最明顯的當以教育這一部門為最。富有階層為着逃避捐稅，想出這個免稅的捐款途徑，實際上不過是將他們的錢從這一個口袋換到另一個口袋的一種巧妙的手法而已。

大部份指定高等教育的私人捐款，都是捐給差不多完全屬於富家子弟的學校。西瑪爾薩學院院長阿伯特·華特 (Albert N. Ward) 曾在一九三〇年調查四百個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捐額分配情形。據調查結果有十個學校係屬於最富階層的，佔全國學生總數百分之十七，所得教育捐款佔百分之四十三；有九十個學校係屬於中上階層的，佔全國學生總數百分之四十二，所得捐款佔百分之三十八；其餘三百個學校係為中下階層而設，佔全國學生總數百分之四十一，所得捐款僅佔全數百分之十九。

在華特博士的調查研究中，各省私立立高等教育機關，所謂公立專科學校和未學尚未包括在內。除開很少幾個例外，這些公立教育機關，經過前面我們所分析的在這些最後勢力操縱之下的各種政治組織，也是間接受着少數鉅富家族的支配和控制的。目前美國教育的主要基礎，當然是依賴國家捐稅創辦的公立學校制度。有錢人傾囊於教育



這些種種成績是當它可以坐收公立中等學校的成果，在私人捐辦或政府上容易籌辦的大學與專科學校中可以較法達到他們的特殊要求的時候。

未論及聯邦政府的統計，在一九三三——三四的一個學年中，公立初等學校學生總數

達二〇二萬，八八〇，一二〇人，而私立學校（大部份是教區學校）僅有學生二，三八二

萬五二一人；公立中等學校共有學員五，七一五，六〇八人，私立中等學校（一部份係

教會所辦）學員人數三八〇，八八〇人；祇有在高等學校中私立大學和專科學校僅佔

僅係教區創辦和公立的不相上下，前者為五二九，九三二人，後者為五二五，四二九人

。如果我們將那些訓練做師資的除外，那麼私立高等學校的學生要比公立的多得多（一

萬五二八，五七八九，一為四〇〇，五九八人）。

關於公立大學和專科學校本書不擬論及，不過，以下我們關於私立學校的社會偏尚，也同樣可以適用於一般公立學校，祇是程度上不同而已。

所以不是美國最主要的私立大學和專科學校，他們所得捐款佔七百個機關全部私人高等教育捐款總分之七五以上，這二十個學校的統治集團主要捐助人和捐款數目表列

一、學校  
統治集團及主要捐款人：  
摩根統治。最大捐款人：  
美孚油（魏特尼，哈克納

最近捐款總數

美孚油（魏特尼，哈克納

二、耶魯大學

三、哥倫比亞大學

四、芝加哥大學

五、羅徹斯特大學

六、台克撒斯大學

七、麻省理工學院

八、斯坦福大學

斯·洛克菲勒(喬治·巴  
克等)

聯根(洛克菲勒聯合統治  
最大捐款人：美孚油集  
團，斯特金，斯蒂曼等

花旗銀行統治。最大捐款  
人：巴克，道奇，高德，  
海文美爾，施曼霍恩等

洛克菲勒統治和主要捐款  
者，較少捐款者：費爾特  
，萊爾孫，施威夫特，雅  
克斯等

喬治·伊斯特曼(柯達公  
司)

捐款者包括各派集團

杜邦統治。主要捐款人：  
伊斯特曼，杜邦等

南太平洋鐵道公司及加省  
各公用事業公司。主要捐  
款人：李爾德，斯坦頓。

一二九, 〇〇〇, 〇〇〇元

九五, 八三八, 五六八元

六九, 五七六, 九一五元

六五, 三八九, 四九八元

五八, 〇〇八, 一〇三元

三三, 六四二, 五四六元

三三, 〇〇〇, 〇〇〇元

三三, 〇〇〇, 三二八元

尤、樣素大學

十、康乃爾大學

十一、普林斯頓大學

十二、約翰，霍布金大學

十三、西北大學

十四、華盛頓大學

十五、麻省大學

十六、萬德比大學

十七、賓西拉凡尼亞大學

主要捐款人及統治者：杜克（煙草與公用事業）

格克非勒統治；捐款者包括各銀行。

花旗銀行統治；捐款人：萊特，斐因，麥克米克，道奇等。

美以美會統治；最大捐款者為沃爾索族（萬國農具公司）；次為柏登，麥克米克，華特。

主要捐款人：拉伯特，布魯金斯等。

克羅克，金安尼尼，羅斯特，杜福尼等。

主要捐款人：萬德比。

摩根統治；主要捐款人：摩根，德萊克賽，威爾納。

三〇，八八〇，〇三五元

三〇，三一，七四二元

二六，九二九，八一〇元

二六，九三四，八二七元

二一，七八二，四八二元

二〇，九一一，九八六元

二〇，二二八，四四四元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八，九九八，二七九元

十八、歐伯林大學 捐募者包括各富戶

十九、達特茅茨學院 同右

二十、卡尼奇理工學院 梅隆統治，卡尼奇捐款

一八，一四九，八二二元  
一七，二三九，八三九元  
一六，三六九，三八二元

以上這些學校都是屬於上層社會的學校。第一，上層社會子弟均集中教育於此；第二，這些學校的畢業生，不論其階級出身如何，對於上層階級在社會上的經濟活動，都是有金錢價值和直接幫助的，如律師，會計師，生理學家，工程師，銷售員，商業經理等等。很可注意的是各私立學校，差不多已成慣例，從來很少注意師資訓練這一部門。

除開很少幾個公立大學如威斯康辛大學，密琪干大學，和敏尼索他大學等以外，上述二十個私立大學在全美高等教育學術機關中要佔屬一屬二的地位。他們在現代美國生活活中的影響和重要於此可見。

在各鉅富家族直接統治和支持之下的高等教育機關當然不限於以上二十個大學。如皮特堡大學是在梅隆統治之下；柯魯蓋特大學是在牙齊和修面肥皂業家族統治之下；狄塞爾研究所是在狄塞爾家族（摩根系）統治之下；列海大學是由各鋼鐵業和產業公司所購資創辦。此外如布郎恩大學阿姆赫斯特學院，威廉學院，加省理工學院，聖勞倫斯

大學等等都是在各大小富戶津貼和支配之下。

所有這些學校實際上等於各大公司銀行的一種附屬機構，他們的組織和行政或多或少都是這樣的表現。證據隨處可見，最主要的如：（一）這些學校的董事大部份就是各大財富的代表，或是富翁大亨們自己兼任；（二）這些學校相關的基金投資和各大公司銀行的資金業務混合在一起，不可分立；（三）學校課程特別注重實用科學，工商管理，和專門技術訓練等，對於鉅富階層有直接俾益的各種科目；（四）這些學校校長經常發表正式言論替當前政治，經濟和社會現狀辯護。

據賈羅姆·達維斯 (Prof. Jerome Davis) 教授調查，二十七個擁有一千萬元以上捐款的最高教育機關，共有董事六五九人，這些董事的職業有二五四人是銀行家，一四一人是商業界領袖，一一人係公用事業經理，六三人係鐵道公司董事經理，一五人係專家（這些人的參加，顯然是一種掩飾），二二人係法官推事，代表兩大政黨，七十五人係屬其他各種職業。

這些機關的捐款總數達八萬萬餘元，約佔所有私立大學和學院全部捐款總數（十一萬五千萬元）三分之二強。但另外還有許多鉅額財富如免稅地產，樓房建築和各項設備尚未包括在內。總計起來，所有一切私立學院和大學的捐款及其的各項財產總值約在二十五萬萬元以上。

銀行家和其他唯利是圖，腰纏百萬的富翁們高踞各最高學府的董事會席上，這在一般現實主義的美國人看來，已成司空見慣，毫不為奇。但是在其他任何文明國家，這種矛盾荒謬現象，確屬罕觀。譬如，在英國，各大學校都是自主，自治的獨立機構。馬金·加萊爾（J. McKean Cattell）在其權威著作大學管理（University Control）一書中曾說：

「歷史悠久的英國兩大學，牛津和劍橋，祇是幾個獨立學院的聯合體。教授和研究員乃各學院主體；房舍建築和基金捐款由他們共同經營，收益亦由他們分配。院長，和繼任同事當然也由他們推選。院長祇是一個名譽的社會地位，並沒有多少執行實權和責任。一切行政均由會議和委員會行之。這種中古世紀僧院式的自治制度當然也有它的弊端，但是就全般來說，他們却始終保持着學術空氣和教育品質的崇高水準的。歷年從住院研究員和學生的隊伍中曾培育出不少的各方面的偉大人物。雖然這兩個大學的學生人數合起來還沒有美國一個大學的人多，但是英國政治，學術，科學，文藝各界的領袖人才差不多有一半以上是來自這兩個大學；同時，英國所產生的偉大人物比任何國家都多。

「牛津和劍橋兩大學本部，主要的祇是學位授予的機構，另外設有幾個特別講座和圖書館。兩大學的行政由各專任教授選舉評議會主持，但最後管理權後來逐漸由各文科學

系長負責。英國教會在這兩個大學中雖然頗有影響，但他們對學校行政的干預也祇限於規定學位授受的條件。無論如何，這不過是一種暫時的局面。同時，相當限度的保守主義對於一個最高學府也並不能算是很壞的事。如果將由一批富商巨賈組織起來的永久性董事會來管理牛津和劍橋，那纔是可想像的荒誕之事。大學校長也是一個沒有行政實權的名譽職位。……一般教授由有關各科權威（一部份聘自本校，一部份聘自校外）組織各科委員會遴選推荐。我從來沒有聽說過牛津或劍橋有雖免教授或研究員之事。一位教授的薪俸高低要看校長對他感情好惡或關係深淺；祇要取得不駐校的校董們的同意，校長便可事先通知地隨意將一個教授解聘這類的現象，在美國最高學府中更屬稀罕外奇談。」

自從南北戰爭以來，美國一般大學和學院已逐漸脫離教會的統治，金融勢力開始取得了決定的支配地位。銀行老闆，大富翁，大資本家和他們的代表之所以盤據美國各大學校董會，操最高學府的行政大權，實乃理有必然勢所必至。因為這些學校的基金捐款以及各項基金和教會捐贈，就是在這些人們的監督之下；不但使他們有權可以干預教育和學術研究，並且也可以使他們利用這些基金來增強他們在金融界和產業界的統治實力。所以，美國各大學基金捐款，實際上是提高產業統治和社會統治的一種工具。也和他慈善專業基金一樣，學校教育基金也是免稅的，結果對於各鉅富集團有百利而無一害。

使他們的權勢地位越益擴大，越益鞏固。

關於這些私人捐助的教育機關，其慈善性質亦頗可疑。我們祇就以下一件事實便可看出，據聯邦政府一九三三——三四年統計，各私立大學的進款收入百分之四七·二係來自學生繳費，而公立大學的學費收入僅佔全部進款百分之一六·七。私立大學的全年基金進款僅佔全部收入百分之二二·七。另外臨時捐贈和撥款佔百分之一一·二。在一般公立大學，各省市政府所撥經費竟佔全部收入百分之五六·八。

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在各大學中所佔董事席位較其他任何大公司都多。在銀行界方面，摩根公司所佔的各大學董事人數最多。洛克菲勒各項基金在各高等教育機關中的統治地位比其他各鉅富的慈善基金要大。摩根，洛克菲勒，杜邦和梅隆幾個集團是操縱美國高等教育最強大的聯合勢力。

在美國第一流的大學中，祇有威斯康辛大學直到最近還在拒絕財政資本的統治。他曾經多次拒絕接受洛氏基金的捐款，他們的理由是這種捐款將使受者難免受其影響。

美國各私立大學董事將他們所監管的基金捐款大部份作投資活動。據一九三二年統計，資產總額在五百萬元以上的各大學和學院其投資分配情形如下：

投資種類	投資數額	百分比
地產	一四六，九三一，五一〇元	二七·四



公用事業	一二五,六四六,七五〇元	一三·四
鐵道	九九,五八六,八〇〇元	一八·五
各項工業	八七,七七九,〇一〇元	一六·四
雜項	三〇,九〇七,九一〇元	五·八
政府公債	一七,七五七,一五〇元	三·三
外國證券	一三,二七四,二四〇元	二·五
銀行及保險公司	九,六九八,一六〇元	一·八
市政公債	五,〇二四,五六〇元	〇·九
共計	五三六,六〇六,五六〇元	一〇〇

上表最值得注意的是各大學所持政府債券僅佔其全部投資百分之四。二。乍看起來，似頗奇怪，但仔細研究一下，這其中有緣由的：第一，學校基金用不着購買政府公債來逃避捐稅，因為他們的一場進款收益都是免稅的；第二，一般巨富對於各大學的基金捐款，一個主要動機便是企圖利用鉅額股票和證券的集中和各大學理事會與各公司董事會的互相聯鎖關係，來加強他們在產業界的統治地位。

因為這些私立大學的投資收益大部份來自各私營工商企業，利害攸關，遂使這些學校經過他們校長之口對於政府當局任何企圖限制工業金融資本過度膨脹的措施，表示不

滿和反對。同時，因為投資利益所在，也使得這些學校對於歷次某關係大公司被控有違反社會利益的行爲時總是保持緘默。

美國各私立大學之漸變爲一種金融組織機構是和所得稅，遺產稅及財產轉移稅等各項法案的實施，有密切關聯的。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八年，美國各大學和專科學校的土地，建築和基金等各種資產由五萬五千四百萬元增加到二十四萬萬元；在同一時期中，他們的基金捐款也從二萬五千元增加至一十一萬五千元。這些數額的增加大部分始於歐戰以後；這說明了一般富戶羣起紛紛將他們的戰爭利潤移植到免稅的領域之內；這正和洛克菲勒在一九一七，一八和一九幾年間撥出巨額資金積極從事「慈善」活動一樣。

我們在此需要指出，在現代美國社會，凡是有金錢聚集的場所，不問其來源如何，我們總可以看到各鉅富家族趨之若鶩，設法也捐出一筆錢，以便插足其中，取得統治大權。這些基金目的不論在表面上是爲了慈善也好，救濟也好，藝術也好，祇從各項基金的投資對象性質或從它們的使用方式來看，便可證明其內幕真實動機是經濟的和自我主義的。其他不論，單是學校董事有權可以指定基金的存儲銀行或投資對象（即使所指定的銀行和公司並不爲這些董事所屬有）一點，便有很大的好處。如果再能使學校在他們指定的公司商行中採購一切必需材料，當然好處更多。

鉅富階層維持他們對於各大學的統治，方法多端，其中一個很有效的方法是分期分批撥付捐款。一般富翁們對於各大學的捐贈很少有人一次全部捐出。這樣，各大學校當局估計到在一批捐款之後將來還會繼續有更大的數目送來，因此便更加小心翼翼，儘量使他們主持下的學校避免捲入一切不合乎捐款人胃口的社會或政治紛爭裏面去。許多富翁的捐款常常指定某種特殊用途，對於捐款人有關，而對於學校正常教育計劃毫無裨益。有許多捐款人指定要造並不切要的新樓房建築，甚至連建築的地位他們都指定出來。爲了獲得某項巨額捐款，有時某一大學必需添設某一系或某一科目，對於高等教育風馬牛不相及，而對於工商業賺錢之道則有密切關係。

二

那麼，爲什麼美國鉅富階層要控制高等教育呢？他們的目的何在呢？

自從北美移民以來，教育制度問題對於各社會集團的富有公民便是一個關係切要的問題。但直到獨立戰爭五十年以後，在城市工人不斷要求之下，纔有小學免費制的實現。隨後，由於上中階層的力爭，又逐漸實行中等學校免費制度。再以後，西部各省又有若干大學免費開放。

富有階層對於他們自己子弟的教育問題總是特別關切。美國歷史最老的高等教育機

——哈佛大學，從創辦之初便是一個富家子弟的學校。耶魯和普林斯敦，也是同樣的情形。自南北戰爭以後，在初期美國各學院中佔支配地位的神學課程，逐漸被自然科學等新課程所代替，因為這些課程對統治及其他各項工業技術是有莫大幫助的。於是學院改為大學。

新興的工業資本家，不像前期的地主和商業資本家那樣斤斤於學生的階級出身或宗教信仰，他們拿出大量的錢來發展屬高等教育，他們捐助獎金來幫助貧苦階級有希望的天才子弟。當時以及現在，這些美國的新主人翁最感興趣最重視的課目是技術和工程。這從一八六四年以後，各種技術學院紛紛設立，和各大學的增加工學院和技術系方面可以證明。

現代美國一般大學校長，也都看準了這個趨勢，在他們向各鉅富家族進行基金募捐運動時，便利用這一點來打動一般富戶的心理。例如，西北大學校長狄爾·司各脫博士在一九一四年向工商金融各界領袖呼籲捐款時，便指出牛頓·瓦特，法拉第，巴斯德，亨斯利特等大發明家都是大學教授，他們的發明曾使一般工業資本家獲得鉅額利潤。

新興產業資本家當他們對於那些從事自然科學或機器技術研究的大學教授們盡量予以自由和便利的時候，同時也感覺社會科學對他們的威脅，因而在各方面採取限制辦法。因為這個暴露階層在財源旺盛，躊躇滿意之下，認為已不需要再對於使他們致富的社

會有所批評，分析和考查了。至於關係農民，勞工和中間階層的問題，他們更是漠不關心的。他們這種態度最露骨的代表是喬治·F·巴克爵士在普求調查委員會上的發言，他公開地表示認為現行社會制度十分滿意，無可指摘。亨利·福特也曾經說過社會科學和歷史「都是毫無意義的廢話」。

自一八九〇年以後，美國各大學盛行着一個壓迫社會科學各科系的暗潮。在這以前，當神學風想當勢的時候，一般自然科學家們在各學院中也遭受過同樣的迫害。但是現在他們是被新興產業勢力解放了，除了很少幾個落後區域而外。

社會科學家——一般從事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和政治學研究的學者，因為遭產業與銀行資本家之忌而被摒除初大學以外之事，最著名如權威經濟學者李查德·伊來（Richard T. Ely）之被追脫離威斯康辛和約翰·霍布金大學。研究美國勞工運動的著名歷史學家約翰·康門斯（John R. Commons）被賽拉庫斯大學解聘，因為在財政上支持該大學的美孚油公司大亨約翰·阿其包姆根本就不承認有「勞工運動」這一回事。布郎恩大學經濟學教授E·B·安德魯斯（E. B. Andrews）因為主張「白銀自由」政策為金融界所不喜，亦被解職。一九〇六年芝加哥大學（美孚油公司捐款最多）將美國最有造詣的社會思想家左爾斯坦·魏布俞（Thorstein Veblen）教授解聘，表面藉口是他講戀愛而未舉行正式婚禮。兩年前魏布俞曾出版一本很溫和的暴露現實的書叫做「工商企

業論』(Theory of Business Incorporation)另外還有一本『有閒階級論』(Theory of Leisure Class)···很顯然地···這纔是他被解聘的真實理由。同時還有一位經濟學教授艾德華·白米士(Edward W. Benis)因為會對鐵道私營問題提出批評，也受到同樣待遇。如果將一八九〇年以來美各國大學學院社會科學各系被解聘或停用的教授講師名單一開列出來，那簡直可以編印很厚的一本書。

另一方面，許多大學教授爲了鞏固自己地位，盡量發表能夠迎合各鉅富家族的學說和理論。如威廉·撒木納(William G. Sumner)在耶魯大學，約翰·倍提斯·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在哥倫比亞大學，主張放任主義的經濟學說，認爲資本主義不加拘束，聽其自然發展，是最公平合理的經濟制度。一八八一年一位有錢的製造廠家，捐錢在賓西凡尼亞大學特設一個華爾頓財政學院，完全是爲着宣傳保護關稅政策。

美國各大學反對獨立的社會思想家，根據下面兩大理由。第一，大學教授不應該過問校園以外的問題；第二，違反這個條律的教授就是社會革命家。在那些被驅逐的教授中究竟有幾人確是社會革命家，當然大可懷疑；但有一點是很明白的，那就是說這些人「忘事干預」的現實問題都是關係捐稅，勞工政策，經濟政策，公用事業價格以及種種不合理的社會現象等問題；總而言之，都是一些有違一般鉅富特權利益，使他們聽了不愉快的見解主張。

在此我們需要指出，一般大學董事認為這些教授不應過問學校以外的問題這種說法，完全是一種沒有理由的詭辯。因為當自然科學的教授常常出席工程師或銀行家會議演講關於技術和工業建設問題，或是外科教授到校外參加某項特別困難的外科手術的時候，從未有人表示異議。各大學校當局反對教授參加校外活動，祇是針對着那些多少不利於社會現狀或某些鉅富特權利益的言論行動而言。

再進一步來看，一般大學校長自己便違反這不過問時事問題的學院規律。我們時常看見許多大學校長利用他們在教育界或學術界的身份和地位，公開出來在社會上為現行制度或某方鉅富特權利益辯護。

最代表的例子是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布特勒博士(Nicholas Murray Butler)，以七十歲的高齡每年要做五十次以上的公開講演，每次都是對於當時現實問題有所主張。在一九二五至三六年間，他用很長時間到處發表演說，反對議院通過憲法限制童工補充法案，名義上是為兒童有工作「權利」而辯護。一九三六年九月，他大聲疾呼痛斥美國新聞業公會在西雅圖所發動的工潮有非法「恐怖」行為，但最有資格說這句話的地方當局却否認這次工潮有任何恐怖行為，事後也沒有發見任何這樣的證據。

在一九二九至三四年的經濟恐慌中，布特勒博士更露骨地為現狀作粉飾宣傳，他認為當前的經濟恐慌是過份誇大了——這完全是神經過敏的幻想心理的結果；同時聯邦政

府和美國總工會關於失業人數的報告也誇大了幾倍。關於財富分配不合理現象的調查與研究，他認為完全是過激派的言論和毫無根據的憑空創造。

著名物理學家兼麻省理工學院院長卡爾·康普頓(Karl F. Compton)雖然不像在康勒博士那樣能言善辯，但是在他幾次演說中也是毫不猶疑地利用科學家們的外在作同樣的表示。一九三六年十月，當羅斯福總統要求工程師和科學家們與政府協力合作推行新政時，實現社會改造的時候，康普頓博士便抓住這個機會對於國家失業救濟經費來一個高而的側面的進攻，因為失業救濟正是麻省理工學院董事們對當局措施最感覺不滿的一個問題。康普頓博士以科學家的立場表示他的疑懼，他說：「政府把金錢和注意集中在救濟和管理方面，影響所及，勢必減少對於科學的基本貢獻的注意和援助。我們相信，祇要給他發展機會，我們的科學對於國家社會一定會達成這種基本貢獻的」。第二天報紙便將這位著名科學家這個意見大登特登。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美國銀行協會會議席上，這位大學校長感覺他自己有資格發表反對公用事業收歸國營的意見。很顯然這個問題是超越乎科學範圍之外，但是如果我們想到麻省理工學院四十八個董事中有二十位是經辦公用事業的顧問，那也就難怪了。

耶魯大學前任校長詹姆士·羅爾德·安奇爾(James Rowland Angell)自一九三七年退職後，仍利用他在全國廣播公司教育部主任的新職，繼續向社會宣揚他的保守主義。



理論。他的女兒嫁給洛克非勒——麥可阿平家族之一員，從前他曾在芝加哥大學（美華油系）任教，他在許多大學校長中是反對羅斯福政權最激烈的一個。他認為已成僵屍的美國民主精神是被羅斯福破壞了。但是這以前他對於哈丁，柯立芝，胡佛以及梅隆黑幕重重的統治，却沒有一次批評。他認為美國民主的最大危機，不是那些經濟貴族的壟斷與操縱，而是退伍軍人的要求津貼，勞工要求改善待遇的紛爭，和羅斯福對於司法制度改革的等等。一句話說，他反對一切改良的新政。

當各大學校長大談其時事問題以討好他們的董事和捐款人，當許多直言不諱的社會科學教授紛紛被追離職的時候，在這樣情形之下，其他教授和學校幹部當然只有小心翼翼，儘量使他們的學說理論「正統化」，對於當前熱辣辣的現實問題儘可能充耳不聞，聽若無聞。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在許多被解聘或被勸自勸辭職的著名社會經濟學者當中，為社會所熟知的有哈佛大學的拉斯基教授（Prof. Harold J. Laski），哥倫比亞大學的加麥爾（J. McKean Cattell），羅漢孫（James Harvey Robinson）和穆賽（Henry Mussey）；阿梅赫斯特大學的麥克萊真博士（Dr. Alexander Meiklejohn）；賓西凡尼亞大學的尼林教授（Prof. Scott Nearing）；耶魯大學的狄維斯教授（Prof. Jerome Davis）；西北大學的雅特教授（Prof. James N. Yard）；阿里維亞學院的克爾翰奇克教授

(Prof. John. B. Kirkpatrick)；海羅氏大學的邁耳及狄格拉夫兩教授(Prof. M. W. Meyers, and H. O. De Graff)等。

在大戰期間，著名歷史學者查理士·畢爾德博士(Dr. Charles Beard)雖然擁護國會的戰爭目的，但因爲他主張言論自由，結果感覺哥倫大學的環境對他不很舒服，不久便辭去教授職務，當時，他曾有一個聲明說：「在哥倫比亞，一個教授的地位比一個手工工人還要低下」。他痛切的指摘：「少數隱在幕後而意志頑強的校董們支配着整所大學，成着一般青年有爲的教師」。

### 三

美國一般鉅富階層之熱心高等教育，除了經過各大學貫徹他們維持現狀的保守政策外，還可以得到很實際的利益，如自然科學的發明，大批技術人材和專家們訓練等等，對於工商金融業務的發展和財富的增強都具有莫大的直接幫助。羅斯福再度當選後，一般報紙對他特聘許多社會科學教授組織「智囊團」，顧問全國行政一節，時常加以讚揚；然而他們(這些報紙)對於各大公司銀行之聘用各大學校長教授，却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話。

通用電氣公司董事長歐文·楊格從前曾任波士頓大學法律系教授。紐約第一國民銀

行董事長傑克遜·雷諾德直到一九三七年底是哥倫比亞大學法律系副系長。公平人壽保險公司總經理湯姆士帕金孫，原係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院長。像這一類學者教授兼學術顧問名單，真是更復難數。

耶魯大學校長安奇爾博士對於許多大學教授被羅斯福總統委任為政府各委員會顧問一節曾表示痛心疾首，認為這是學術界的一種墮落。但是耶魯大學教授雷文·費盧 (Walter Fisher) 在柯立芝和胡佛時代參加政府職務，以及後來在華盛頓及華盛頓各地方極參加禁酒運動，却表示默許。

由於教育政策，和人材使用種種利害關係，美國一般私立高等教育機關董事和行政當局，對於在政府捐稅收入補助之下各公立免費大學與學院的發展，最為嫉視。康乃爾大學校長李文頓·法蘭德博士 (Livington Farrand) 當他退休之前曾警告紐約省各私立大學學院聯合會，要努力奮鬥，防止公立大學的競爭。公立大學的發展，對於那些純粹屬於上層社會的私立學校，無論在他們傳統的教政策方面，或在他們對整個高等教育的統治地位方面，顯然都是一個致命的威脅。

一般美國大學畢業生可分為兩大類型。第一種是專門技術人材，在某一特殊部門如法律，物理，化學，工程等，確是學有專長，但對於他們所專擅的部門以外不是毫無興趣，便是茫無所知。第二種的典型是抹煞智識的大學產物，他們的理想境界在於各種

環報和散頁雜誌，就這編輯，看星期六晚報一類的小說畫報，研究股票市價，和如何配製藥劑等類。

不過，很奇怪的，是屬於後一種類型的捐款最多。這些人的謀生之道，大半都是做股票生意，買賣地產，辦雜貨生意，流車或拉保險生意，或者是當銀行和公司各類的經理，這些人都是那裏用不着很大的聰明才力的，而且生活安定舒適。

對於這一類種類的大學畢業生，這人就會便成爲一個有充分訓練的技術專家，或者公司特聘的發明家，工程師或醫師。但是，現在這樣的人材在大學生輩之中，也都不算多，和速記員一樣，感覺過剩，許多人很難找到適當的工作。

這一類專門人材雖然在各該技術部門或許會經受到很完備的訓練，但是很少有人能在那裏基本思想要認識上受到啓發，使他們能夠從更廣闊的視野與同情精神方面來瞭解社會於生，他們不僅認清他們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和作用，因而不免時常對自己的工作上有「空虛」與「無助」之感。

這種情形現象也是一般基金捐款人對於高等教育所希望的。這些富翁們對於各大學的捐款都各有其特殊動機與需要，各有其指定用途；很少有人拿錢幫助大學教育，是爲着培養青年完整的思想智慧，使他們將來在社會上能夠擔負一種有積極性和創造性的任務。

- 一般富翁階層對於各大學的捐款分配，最注重的第一是自然科學與技術，次爲商業教育。

各種科學管理及其相關的現代外國語與文學，再次為建築遊藝場，宿舍，俱樂部及其他  
社會活動的建築。

如果各大學的捐款人目的真是為了社會福利，他們一定要鼓勵社會科學，使科學由  
思想之殿向前發展，他們必定會設立各項社會科學的獎學金。使科學與科學發展，無那  
樣的踴躍。如果他們熱心高等教育的動機是為着社會福利，而不是為着他們自己狹隘的  
集團利益，他們一定設法使所有大學各科系在「一種進步的實驗的社會實驗」中（即杜威博士  
所提出的）基礎之生產生密切的相互聯繫，而不是主張各種科學互相隔離，毫不相關。  
同時，他們對於農業，勞動問題以及社會市場內在的詭詐性的科學研究，也更應該有所措  
助。

然而事實上，一般大學所訓練出來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對於他們所處的社會是毫無積  
極的創造的自覺的。他們所受的教育，他們以為自己是處在一個個體社會中，他們是完  
整美滿的社會中，他們的任務祇是「製造」一些可以暢銷的奢侈品，人造美滿，人造美滿，  
「新式」無窮無盡的奢侈品，使這個社會點綴得更加「美滿」。現代美國大學雖然於各種科學的  
各種特殊部門發展到乎極致，但同時他們都成了歷來偉大科學家所懷着的「科學的動機」  
的障礙，為了造福全人類，而不是專為給通用電氣公司，美孚油公司，汽車公司，鋼鐵  
公司等私人企業增殖利潤。

## 第十一章 「新政」以後

當羅斯福「新政」(New Deal)在一九三三年開始實施的時候，共產黨人斥之為半法西斯主義，社會黨人稱讚它是半社會主義，騰傲的民主黨和共和黨人認為這是他們自救之途，而表示默助的歡迎。例如，羅斯福一舉便會表示歡欣鼓舞的，因為羅斯福本來位高權重，這值大亨的表示態度，使一般滿懷疑懼的保守份子也安穩下來。雖然，羅斯福雖然隨着以後事實的發展，共產黨人對於「新政」漸持容忍態度，雖然仍不免有所懷疑，而社會主義黨人都感覺這裏面含有極權成份的萌芽，開始轉背相向；一般保守的民主黨與共和黨人很快地便大驚地趕來，認為這是布爾什維克的計劃。雖然，這些都是各黨派的一個表現，都是根據各派變化着的政治經濟需要而提出的。但是，各黨派這些見仁見智的反應，却很明顯地說明了「新政」計劃是當時危機的產物，在混亂與過渡時期中是有它的存在基礎的。

在各黨派紛紛表示歡迎的聲聲中，美國西部各省的進步共和黨人和農工黨人以及一般自由主義的民主黨人，就全體來說，是歡迎「新政」的。同時，頑固的廣大美國人民，從瀕於飢餓、凍死得救，在聯邦政府幫助之下又恢復到胡佛政權以前較易與較安的生活

狀態。他們對新義更是由衷的感戴。正是這些廣大人民，因為他們的迫切需要竟接受到一個意外而神祕的慈愛政府所眷顧，在異常興奮與歡悅之下，使羅斯福總統在一九三六年得以壓倒的大多數再度當選連任。但是，問題和事實真相，却沒有一般那樣易與的人民那樣簡單。

關於「新政」，當然現在我們還不能作最後評斷，因為目前它還在發展中。但是，根據已有的一些事實表現，我們在某些問題上可以試作一些初步結論；關於這些初步結論，我們盡量本諸坦率的批評精神和原則，希望能夠避免一般感情用事的觀察者所犯的錯誤。

羅斯福「新政」，儘管怎樣嚴格的批評它，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否認它所包含的進步因素。在這個從來沒有盡善盡美事物的世界裏，是獲得一般有自由思想和人道精神的人們的擁護的。同時，如果我們再看到目前一般左派政黨——共產黨、社會黨和共產黨，始終不能成立一個共同的實際行動綱領，足以取得多數選民的擁護這個事實，那麼「新政」當然更難歡迎，實更有足多者。

首先我們可以指出，「新政」無論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算是過激的或革命的政綱；正相反，毋寧說它僅保守主義的。它溫和而審慎的改良主義色調，不過是在普遍的恐慌不安之下的一種必要的讓步而已。在其基本原則和實際目標方面，羅斯福「新政」

這完全適合美國政治傳統。它是羅斯福總統「勝利品屬於勝利者」這句名言的具體現者。它依照着這個指示，嚴懲阻礙它的敵人，厚獎擁護它的友人，特別是那些僅僅指助這個運動的人。弗蘭克林·羅斯福，也和威爾遜與老羅斯福一樣，特別擅長於以勸人詞令來掩蔽其所代的集團的經濟目的。

一句話說來，「新政」絕不是一種制裁少數貪婪無厭的私人特權利益的「人民大聯合」。這不過是在宣傳上所表現的一種姿態而已。骨子裏，「新政」是代表「擺大財富集團」——輕工業資本家，反對另一個大財富集團——重工業資本家所進行的一種劇烈的政治鬥爭。羅斯福雖然對於鉅富階層不惜盡量口誅筆伐，但他在一九三二年的當選和一九三六年的連任，却得到一部份鉅富家族的擁護。不過，因為幾次競選運動的宣傳，對於羅斯福所直接反對的那一派鉅富大張撻伐，盡量渲染，掩蓋了另一派鉅富對他的擁護的事實，因而一般社會便很容易相信「新政」和整個財富集團是在勢不兩立的。同時「新政」的高額捐稅政策也助長了這個錯覺。

一從創行之初，「新政」便得到那些主要收入依賴剝削零售市場的富戶的贊同。如百貨店商，紡織業主，紙煙廠主以及各種獨立經營的產業資本家和地產商等。除開地產商而外其餘均屬於輕工業集團，因為「新政」的目的是要用恢復社會購買力的方法來恢復輕工業的景氣；而社會購買力的提高當然要連帶使一般工人和農民也獲得一些實益。



大規模公共事業建築計劃，再加以失業救濟計畫，以確保普通勞動者提高新社會購買力。同時也相當的解決了千百萬貧民迫切的經濟要求。「新政」之所以能夠獲得有組織的工人和一般平民的熱烈擁護，其原因即在於此。

坦白或許是最有效的政治手段。羅斯福總統關於他的施政目標，常常是坦白真爽，毫無隱蔽的；因為他知道這種坦白公開，並不需要什麼代價，反正他的政敵對於他的說話無論怎樣，總是要加以指摘和譏諷的。他曾經再三再四地表示「新政」的基本目的是「要使復購買力，在這一個目標之下，他所走的道路是一本中庸之道。共和黨對他們採取的反對策略，絕不願揭露「新政」的真實目的，因為如果這樣做，那就不免要將共和與民主兩黨相同的政治本質也一併暴露出來。因此，共和黨不得不對於「新政」提出許多不切實際的批評，如譏毀它為過激主義，背叛美國神聖傳統等等。罵「新政」是過激主義這種故意捏造的指責，很滑稽地，反而幫助了「新政」；不但未能嚇退中間份子，反而使一般經濟困苦的人們更熱烈的來擁護它。

在哈丁，柯立芝，和胡佛歷屆政府之下，重工業和銀行資本（二者是不可分的，因為重工業不變更向銀行貸借新資本）在國內可以說毫無所礙，毫無阻礙。在胡佛治平下，美國各銀行對於海外的經濟恐慌堅持「聽其自然發展」的政策，以便實現他們久已企圖壟斷和壟斷整個工業界的目的。繼續的通貨緊縮政策，已經使日趨不振的輕工業積資

品等項運銷，應有的機械之項，整頓美國經濟機構，種種的困難，在鋼鐵廠，有富強銀行和重工業各界，也不希望社會購買力完全消失了。雖然鋼鐵廠的運銷種種困難，確是向著這個方向推進，而他們所希望的，就是在較低的物價水準上，相當恢復購買力，以圖使所有「新工業」都集中在他們統治之下。

輕工業資本家和商人，看透了這條道路就是他們完全喪失獨立自主的死亡道路，因而力謀自救，很敏捷的抓住胡佛政權的不得人心這個機會，抬出民主黨來實行「新政」。在「新政」之下的所謂經濟革新，主要的是以犧牲各大銀行和重工業為中心。例如：一九三六年的徵收公司過分利得稅的法令，完全是對各重工業和銀行而發，因為他們在一九二〇年累積了大量的超額利潤，並且在恐慌時期用解雇幾百萬工人的方法來保存他們這一批優厚利潤。幾百萬重工業工人的解雇，就等於幾百萬人購買力的喪失，影響所及，使一般輕工業的利潤大為減低，因為輕工業所生產的主要的是消費商品，這些商品並的生產必需一年週轉幾次，才能獲得利潤。「新政」下的輕工業資本家，為着保護自己，應付因重工業實行普遍停工解雇所造成的零售市場的蕭條局面，他們曾經多方促成約翰·劉維士 (John L. Lewis) 的重工業工會計劃和他的產業組織委員會 (Committee for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簡稱 C. I. O.) 的實現。這個計劃完全是向各重工業的工人提出：鋼鐵業，石油，化學，煤礦，和汽車等工業進攻的計劃，發動重工業工人組織工

會，從內部起來反對重工業資本家停工解雇的計劃。

簡單說來，「新政」是反映大資本陣營內部嚴重矛盾和分裂之一面。雖然關於資本主義的根本問題和基本理論並沒有什麼真正的衝突，但關於如何應付資本主義危機的方法，現在却有了鮮明的激烈的爭鬥。「新政派」份子，自覺或不自覺地，都長在救濟企圖打倒那個在哈丁、柯立芝和胡佛任內形成的金融資本壟斷勢力。他們企圖利用各種可能的政治手段，擺脫銀行集團的壓迫和統治，使資本主義重返個人主義產業資本家和企業經營家獨立自由的時代。

但是，這裏需要指出，「新政」的目的並不是想完全消滅重工業和銀行的勢力。他們所企求的，不過是能夠使輕工業和重工業（及銀行）處在平等互贏的地位而已。

二

「新政」的執行者——佛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生於貴族家庭，和柯立芝及其他各大家族（最近又加上杜邦家族）均有姻緣親屬關係。青年時代，曾在格魯頓和哈佛大學受教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曾任海軍部次長，（一九一三至一九二〇），因為他積極擁護一九一二年威爾遜的初選運動，一九二〇年曾被推為副總統候選人，當時他的競選演說會馳名全國，主要的是因為他的強烈的軍國主義思想，在許多主戰派中，有

第七項主張全國學校實行普通軍事訓練。

● 經過一個長期的疾病休養復原之後，就開始他的政治生涯。一九二八年當選為全國第二個最高的職位——紐約省長。前任省長阿弗瑞德·斯密士 (Alfred E. Smith) 因為在一九二四及一九二八年兩次被推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時，曾受羅斯福幫助不少，同時又看出羅斯福名字的歷史魔力和他本人的政治天才，便自甘退讓。他在紐約省長任內，羅斯福和斯密士政策唯一顯著的不同處，是關於電氣問題。斯密士祇提倡建立省營發電廠；羅斯福當政後，更進一步實行省營電力供應及傳送，定備設私營電氣公司要低廉甚多，一般市民大為稱便。羅斯福這個政績，使他在一般自由主義者羣中，獲得許多有力的擁護者。

羅斯福後來在他任職大總統時，許多次的演說都洋溢着對於下層社會的同情。或許果如他的親友所說，是由於他的長期疾病曾喚起來了對於社會上廣大顛連無助者的深刻關懷所致；但是，這種同情與關切在他的省長任內却尚無表現。

一九三三年參加總統競選。當時他對於國內一些普遍的基奉社會問題尚未有何積極主張。他的競選運動很顯然是利用胡佛總統之失民心，所以祇是集中火攻批評胡佛政府的種種措置不當和虛糜國帑，應尤在他當權後努力調整政府各部機關緊縮開支。當時在他和他的黨人的演說中，還沒有顯出一點後來他們所計劃實施的務政消息。一般

觀察家都認為當時全國選民的投票，出於權謀惡感者少，而出於反對胡佛者多。

一九三二年羅斯福總統競選，在芝加哥，加里福尼亞，塔克羅斯，伊爾諾查賓民主黨初選提名大會上的獲得勝者，得力於赫斯特，威廉麥加多，約翰南德，加納等人的幫助者不少。在維富階層中，對羅斯福競選運動捐款者赫爾沙特，阿斯基，威廉阿茲丁（美國汽車機構製造廠），表西，斯特勞斯（馬開公司），威廉R·赫斯特，雷納德，詹姆士·格雷（雷納德煙草公司），伯特，巴樂門（芝加哥地產商），哈勃，華納（電影公司），愛德華，普爾尼（波士頓百寶公司大股東）等以捐款總數共約一百五十餘萬元。其餘大部份都是由那些希冀在新總統任內獲得一官半職的職業政客所捐助。

同時，關於禁酒問題羅斯福的解禁主張，甚得參加反對禁酒禁禁協會的各經濟團體的歡迎，在競選經費募集上也是一個很大助力。

當羅斯福當選就任之時，正是全國經濟恐慌達於極點之秋。全國各地的幾百家銀行紛紛停業倒閉，銀行儲蓄業和金礦危機的爆發，影響到紐約，芝加哥，波士頓和費拉沙維亞各地也陷於危殆之境。於是宣佈全國各銀行放假，面對着這樣危急嚴重的局面，為謀根本解決，避免這種危險的現象，政府應該採取這種機會，將銀行救度與救濟事業。但新總統顯然地仍舊繼續禁酒，他的目標祇是設法使搖搖欲墜的現行經濟制度

恢復舊態、提高社會的購買力。雖然「新政」的許多措施，被一些批評家稱之為「一和」復興」，實際上每一種措施都是以恢復出口貿易在國內零售市場為首要。這種政策都是直接有利於輕工業資本家和一般商人的；同時，政府後來更進一步的加強這種幫助輕工業的政策，對重工業和銀行採行許多嚴厲限制辦法。

但是這一切計劃在最初並不是有意識有系統提出的。我們很懷疑是否有人事先便已經在腦子裏將整個計劃想好。這不過是由於總統最接近的推諉人加爾頓，在各人所感到的迫切問題督促之下，各有其要求與主張，相互交錯，相互影響，自然而然的形成了現在的這個局面。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這種計劃愈來愈成爲有意識地和自覺地。一句話說，「新政」並不是總統一人「調製」出來的，直到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以前，牠還沒有二點這樣的意願的表示。

在停止金本位制（這是提高物價第一個最重要的措施）和停止與英國的黃金兌換以後，「新政」很早的最引人注意的兩件新舉一爲農業調整法（即爲全國農業復興法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 and the 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這兩個法案都被最高法院判決無效；後來司法改革的呼聲，即起因此。農業調整法是由羅斯福（A. A. A.），鼓勵農民減少耕地面積，限制生產，由政府補助津貼。這對於適應着改革的基本目的——提高農村購買力，確收了顯著成效。在一年之內，農村收入增加了百分之

之二八。一般農民的購買力增加了百分之二五。

農村購買力的提高，使那些資助羅斯福的工商集團，馬上得到實利。例如，麥克米克的萬國農具公司，便因農具銷路的增加又恢復了繁榮。郵遞訂貨公司以及衣服、紙煙和家庭用具等製造公司，也獲利甚多。

國民工業復興法是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六日通過實行的。關於此項法案的內容，總外特·羅歐爾·杜蒙特教授(Dr. Robert Lowell Dumont)在其所著「從羅斯福到羅斯福」(From Roosevelt to Roosevelt)，前者係指老羅斯福，後者係指現在的羅斯福)，曾有很確切的分折。他認為這個法案：「其目的，第一，是使那些隨着胡佛總統撤銷救濟托辣斯法，而日益發展的各種自動成立的工商同業公會合法化；第二，採行強迫方法進一步使一般拒絕聯合組織的各業必需參加公會，使這些公會的力量更加增痛；第三，政府給了各工商業團體這些特殊權利，其交換條件是他們對於勞工和消費者必需實行若干讓步，來表示他們的社會義務」。

總而言之，這個法案是企圖通過保證勞資關係現狀的方式，來恢復產業界的穩定。凡是贊同的遵守此項法令和各項產業，都可不受取締托辣斯法的制裁，自由發展。在這樣情形之下，政府實際上比從前更露骨地在助長着產業界的壟斷。此項國民工業復興法有許多條例簡直就是照抄那些壟斷性的同業公會的現行規章，不過由政府立場再重述一

並且保障它的推行。差不多在所有的實例上，代表政府執行各項條例的負責當局，就是各同業公會的董事。

國民工業復興法各項條例大部份都有每週四十四小時工作制和待遇最低工資不得低於十二元至十五元，以及取締童工等規定。在該項法案第七章第一節中，並且允許工人有選擇自己工會來監督這些規定實行的權利。但是，事實上，在各大產業資本家雇用大批勞工偵探和種種違反工資與工時規定的巧妙方法之下，這些法令規定差不多等於具文。同時，由於這些法令的執行當局大部份就是這些大工業資本家兼任，因此他們不但利用這些法令條例來壓迫勞工，甚至來壓迫一般獨立的小企業單位。據國家復興局（之勞部）許多調查報告，都證明國民工業復興法確已被利用成爲助長壟斷的工具。參議員波拉（William E. Borah）也提出同樣的批評。

杜蒙特教授更深刻的指出：「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事實，證據，政府將自治的權利賦予私人工商資本家，使他們所組織的各工商同業公會的規章蒙上聯邦法律的外衣，雖然這些條例的制定完全是爲着私人的企業利益，絲毫沒有顧及到整個社會福利，但是却當做經濟議會審慎決定的一種國家政策。」所謂計劃經濟提出在全國人民之前。

「新政」所實施的龐大的失業救濟計劃，直接幫助了一般零售商和農民，因爲發給失業的津貼立刻便用以購買生活必需品。此項計劃最初由好幾個政府機關負責辦理，但



一九三五年五月後，所有一切救濟工作統由新設立的工作推進處集中辦理。工作推進經費係用於海軍樓舍建築，市區建設造林，和其他各種建設；這一切的主要目的都是設法使貨幣流通。在這個計劃中關於房屋公路等項建築，自然需要大批水泥，礫石、機器、鋼鉄和木料，對於各有關重工業當然是有利的；但是無論如何，總沒有對於那些和零售市場有直接聯繫的各項輕工業所受利益，來得太而迅速。

另一方面，在「新政」之下，羅斯福總統曾批准了打擊銀行勢力和它們在重工業中的統治地位的各项法令。第一個這樣的法令是一九三三年的銀行管理法，規定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必需分別經營，限定各銀行存款必需提交保證金，並賦予聯邦準備局有權干涉銀行貸款作設備用途。銀行存款儲蓄和保險兩項職權的分開，顯然是存計對地對華摩根公司的一個打擊，大大削減了各私人銀行集團的權力。毫無足怪，這個法令措施，正是洛克菲勒柴氏銀行董事長溫莎普·阿德雷士所企求和贊同的。在胡佛任內的時候，洛克菲勒集團的勢力曾受到不少挫折，自羅斯福實行「新政」以後，曾經有一時候，他們的勢力隨着煤油價格的急劇上漲和地產市況的漸趨繁榮，又恢復起來。因此，雖然小約翰·洛克菲勒仍舊堅持他的共和黨立場，但美孚油集團却在許多地方積極擁護「新政」，並且對於各項有關法令表示熱烈服從。在其初期階段，「新政」對於美孚油王國的勢力範圍可以說絲毫未加侵犯。

在銀行法通過之後，康根公司立刻設立一個康根公司專為經營股票證券行業，但因為這個分公司雖然依法和總公司完全分立，它的作用卻不無以前那樣運用自如。同時，聯邦準備局權力的擴張，可以直接管制公團市場委員會，和所屬各會員銀行的現金準備，這些點也削弱了康根公司在金融界的勢力，因為從前的規定之下，聯邦準備局操縱在紐約金融市場和康根銀行集團的手裏，差不多等於康根公司自辦的一樣。『新政』以後的聯邦準備局監督馬琳諾爾·愛克利斯是馬他省的小銀行家，職業是康根公司沒有任何關係。同時，金融市場的統治權，也從紐約轉移到華盛頓，隨時都在政府直接監督之下。

獨立工商資本家對於華爾街金融資本另一個嚴重的打擊，表現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總統簽署的聯邦證券管理法。此項法案規定各項證券必須向聯邦貿易委員會申請登記，但毋須得到該委員會的批准，同時規定證券購買人對於證券價值虛報有要求賠償損失權。華爾街對於此項法案進行堅決反對運動，歷一年之久，結果政府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又通過一個新的證券交易法。根據這個新法令，政府特設一個證券交易管理委員會，賦予聯邦準備局以更大權力管理全國金融市場。同時禁止操縱市場價格各種投機手法，一切證券必須先行登記，嚴懲證券經紀人虛報市況。毫無疑問，這個新法案對於金融資本家仍是一個不可忍受的限制。因為在過去以前，利用虛報市況及各種投機方式操縱一般

投資者存款，已成為該資本的權例。

一、新設之聯邦銀行資本第三種嚴重不打擊，是於一九三五年八月通過的惡動——雷伯恩法案 (Wheeler-DeBunin Act)。在該項法案中，規定聯邦聯邦管理委員會有監督實際電力傳送之權。而時以此項法案又禁止各銀行交易或投資公司職員兼任公用事業公司董事或經理。這個規定的目的顯然在使公用事業脫離銀行的掌握。此外，根據這個法案，聯邦證券委員會曾有權決定利率標準，各公用事業公司必需向該委員會登記，隨時接受監督。無擔券公司凡有違反社會公益行為者，聯邦證券交易管理委員會得隨時予以封閉。

二、「新獎」的捐稅政策一般說來，是對進鉅富集團加重徵收的，雖然在許多捐稅法的規章中對於它（「新獎」）所代表的集團仍不免照顧。而，留出不小漏洞。  
「在胡佛時代，一九二八年的贈稅法案，在八千五百萬以上者徵百分之五；一萬至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元者徵百分之八；超額所得稅在十萬元以上者，一律徵百分之十徵稅。羅斯福「新政」以後，根據一九三三年的新稅法規，每年收入在十萬元以上，七十五萬元以下者徵百分之十，收入在七十五萬元以下者，徵百分之五；二十萬以上，三十萬元以下者徵百分之四，五十萬至七十萬元者徵百分之五，二百萬元以上者徵百分之五。到了一九三五年此項超額所得稅率又行提高，由百分之五八起至百分之七五。在一

六三六年，沒有改。所以，「新政」在這方面的表現是卓著成績的。

參閱遺產稅，在胡佛任內，一九二六年的稅率，財產值十萬元者僅徵百分之三；其百萬元者徵百分之八；五百萬元者徵百分之十五；在一千萬元以上者，一律徵百分之二十七。羅斯福「新政」以後，根據一九三五年的新稅則，十萬元者的遺產稅增至百分之廿七；一百萬元者徵百分之三二；五百萬元者徵百分之五六；一千萬元者徵百分之六五；一千萬至二千萬元者徵百分之六七；二千萬元至五千萬萬元者徵百分之六九；五千萬元以上者徵百分之七十。

同時，「新政」以後一九三二、三四和三五年的所得稅法中，又增加一種新稅——遺產移贈稅，為的是杜絕一般富翁為了逃稅，在他們未死之前，便將他們的財富移贈給他們的親屬這個流弊。根據一九三五年的所得稅法規定，移贈財產在一百萬元以上至一百五十萬元以下者，徵稅百分之二十四；移贈在五百萬元至六百萬元者，徵稅百分之四二；一千萬元至二千萬元者徵稅百分之五十零五分之一；二千萬元至五千萬萬元者徵百分之五一、〇七五；五千萬元以上徵百分之五二、〇五。

一九三六年，羅斯福又批准了一個新稅法案，杜絕了富戶納稅者迴避所得稅的另一個流弊。此項新稅規定公司收益在四萬元以上者徵收百分之十五的稅款；同時公司未行分配的盈餘加徵最高至百分之二七的累進稅。在這個新稅實施以前，一般公司大股東均

常常不分配紅利，將這筆利潤積累在盈餘金項下，留待將來他們設法運動使所得稅率減低以後再行分配；這筆未納稅的盈餘隱藏在股票價值裏面，對於銀行往來其作用與現金無異。這些擁有鉅額現金盈餘的股票其市場價格的增漲，便是上述情形的反映。在一九三六年的新稅法之下，一般富戶感覺分配紅利比較積存盈餘要合算得多，因此各公司均紛紛改變方針。

羅斯福這些捐稅政策的改革絕非偶然的輕率之舉，而是經過對全國稅收狀況的精細研究和考慮而後纔下此決心的。這可以從一九三五年七月間他在招待新聞記者會席上的說話中可以看出。據政府調查，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全年收入在一百萬元以上者達五十八人。羅斯福認為這些人應該稱為「美國最慳吝的五十八人」，他們利用免稅證券等方法將他們總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七，共約二千一百萬完全未繳一文捐稅。同時，他又指出當一九三二年議會正在討論實行財產移贈稅的時候，有兩位富翁，一個將一萬萬元財產，另一個將五千萬財產立刻分配出去，逃過了即將實行的財產轉贈稅。還有一家鉅富爲了逃避遺產稅，原來的一萬萬元的財產在它的主人逝世兩年之間，竟然設法減少至八百萬元。

在這次記者會議上，羅斯福總統還提到某富戶在一九三三年內曾將他們的財產分作一百九十七個獨立的信託基金，這也很顯然地是爲了逃避「新政」的高額捐稅。雖然他

沒有指出這一家鉅富的姓名，但一般人都知道是指洛克菲勒家族。後來洛克菲勒對新政態度日逐敵對，即從此而起。

「新政」下的捐稅政策雖然比從前要嚴厲而連帶得多，但仍不免留存許多漏洞。例如財產移贈稅，係對受贈者個人徵收。結果家族大的富戶，分贈的單位多，合計所納數目較之家族小的富戶要小得多。同時，許多富戶用鉅款購買私產如汽車，飛機，汽船，房屋以及「捐助」慈善和教育基金等方面，仍舊可以避免大批捐稅。但，無論如何，「新政」的捐稅政策，是近年來美國政治上一個顯著的進步。

此外，羅斯福「新政」對於一般社會福利，及社會建設，也做了不少的努力。如在田尼西河流域，發展電氣設備，建設肥料廠，大規模培植森林，防制水災和改良土壤，建築大批住宅，增辦學校等等，使南部七省人民受惠不淺。一九三四的人民住宅改良法案，政府撥款貸與一般房主做修理和改建房舍之用，對於市政改良及安定農村幫助甚大。保險法案規定聯邦及各省政府實行養老恤金及失業保險計劃。關於藝術家，音樂家，作家等文化人，政府亦訂有津貼及資助辦法。

「新政」堅決反對胡佛時代使國外貿易陷於停滯狀態的關稅壁壘政策。羅斯福上台後，國務部努力打開僵局，與許多國家談判關稅互惠協定。同時，羅斯福政府對於關係重大的美國中立問題也採取了較開明的政策。它正式聲明放棄從前武裝干涉南美政治的

政策。斷絕了約十五年的對俄邦交，亦在羅斯福上台後正式恢復起來。

最值得稱道的是「新政」對於勞工所採取的比較友善的政策。在美國歷史上，羅斯福政府可以說是第一個對於勞工問題企圖用比較公平態度加以解決的政府。如約翰·D·維工的產業組織委員會在政府幫助下所成立與發展，一九三五年華格納勞工法的通過（成立全國勞工局，宣布勞工集團訂約爲合法行爲等），等等，都顯然有利於勞工階級的。當然，「新政」下的勞工政策，也在其他方面的政策一樣，完全是財勢所迫，環境需要如此。

總而言之，「新政」在任內發展階級上，絕不是一種根本的社會改革。世界資本主義最權威的理論機關報——倫敦經濟學者雜誌對於「新政」曾有很中肯的批評，他們認爲「新政」是代表一部份開明的資本主義，在當前危機四伏的混亂局勢之下，它的種種表現可謂盡了最善的努力。除了很少一些在其將來發展趨勢上，帶有半點似是「越軌」的現象外，整個「新政」所作所爲均完全沒有超過資本主義歷史發展階級的範圍。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美國六十年家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初版



著者：美國倫德堡

譯者：張冀聲

發行人：金佑

發行所 五十年代出版社

總社：重慶鄒容路四十號

成都陝西街一三八號附二號

分社：西安北大街曹家巷十號

蘭州顏家溝三十三號

定價：每冊國幣二百元

